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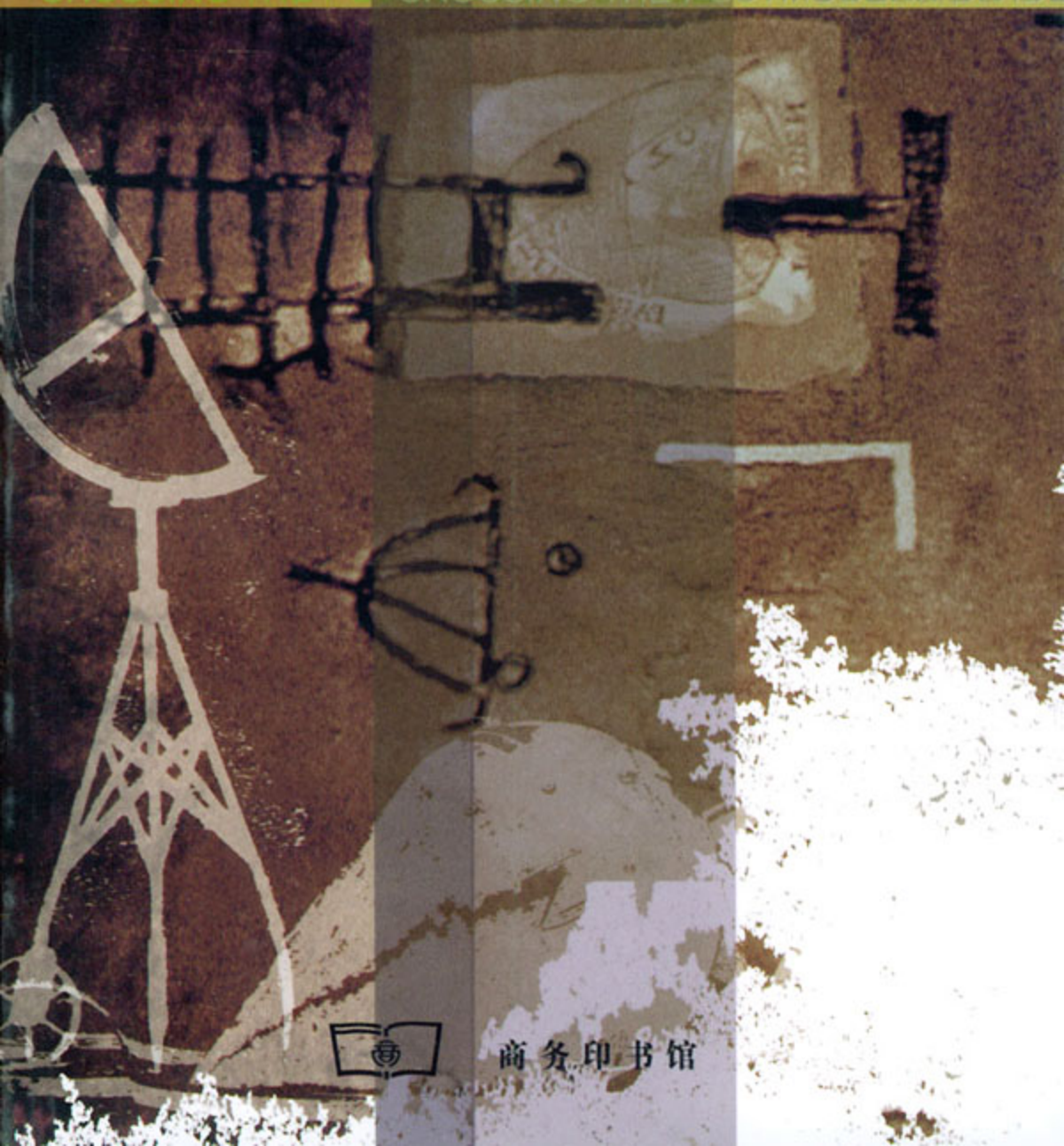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

〔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 著

现代性研究译丛

周宪 许钧 主编

CROSSING THE POSTMODERN DIVIDE



商务印书馆

现代性研究译丛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 著

孟庆时 译

商务印书馆

200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美)鲍尔格曼著;孟庆时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ISBN 7-100-03605-4

Ⅰ.跨… Ⅱ.①鲍… ②孟… Ⅲ.社会发展史-研究-世界 Ⅳ.K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7915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现代性研究译丛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美〕艾尔伯特·鲍尔格曼 著

孟庆时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民族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3605-4/B·545

2003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8

定价:14.00元

现代性研究译丛

总　　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

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曰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鸦片战争以来,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像,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

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 80 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

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

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与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 宪 许 钧

1999 年 9 月 26 日于南京

目　录

致谢 …… 1

第 1 章　结束和过渡 …… 2

导言 …… 2

愠怒不快 …… 7

过度活动 …… 15

第 2 章　现代主义 …… 24

现代主义的兴起 …… 24

侵略性的现实主义 …… 32

方法上的普遍主义 …… 42

意义含糊的个人主义 …… 45

第 3 章　后现代主义 …… 58

后现代对现实主义的批评 …… 58

后现代的经济 …… 72

第 4 章　超现代主义 …… 93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和模糊性 …… 93

超现实 …… 98

过度活动 …… 117

超智能 …… 123
第5章　后现代现实主义 …… 132
道德决定和物质文化 …… 132
焦点的现实主义 …… 139
忍耐的活力 …… 147
共同的庆祝 …… 152
注释 …… 179
索引 …… 224
附录　努力寻找哲学 …… 239
译后记:关于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 …… 245

致　　谢

我感谢丹尼尔·凯米斯(Daniel Kemmis)和我讨论有关政治和共同体问题,也向长久支持我的哲学和技术学会的同事们,尤其向卡尔·米查姆(Karl Mitcham)和保罗·德宾(Paul Durbin)致谢。

第1章　结束和过渡

导　言

我们越来越感到，我们不仅是正走到一个世纪和一个千年的尽头，而且也正走到一个时代的终点。这种感觉还没有变成人们的共识，可是时代终结与转变的迹象则几乎到处可见。迹象之一是，我们很难找到能帮助我们从现在过渡到将来的那种话语。我们自现代初期以来所喜欢的习语无法激励人的信心，无法启迪人的洞见；而那些公开声称新时代到来的人们的语言，看来却只具有破坏性，或者是无限的超前，言之无物。

我们时代独具的话语一直是一种预测性与控制性的。面对严重的文化与道德危机，我们继续使用着这种话语，似乎只有这种话语才能替代愠怒的沉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把我们拱手交由预测与控制摆布，我们则深感失落无助、无能为力；即使我们能够随意预测与控制，这种无能为力感仍然存在。

我们预测天气，我们企图控制物价上涨，因为我们不是天气，也不是物价。它们是对象，不是我们自己，是我们想要使之受我们自己支配的事物。严格地说，并不是我预测或控制我自己或我的

行为，而是我答应或决定去做某一件事；我保证去做这件事。我并不是为了达到期望的结果而控制或安排我的行为，而是我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者我未能做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我也不会想到去预测与控制我所尊敬爱戴的人们。我根本不会把他们同天气与通货膨胀混为一谈。可是，关于我们社会的未来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却都是用预测、投射、推断、方案、模型、程序、刺激、鼓励等这些空洞无意义的词语来进行，仿佛我们已把我们从现实中拿了出来，仅仅把我们自己对象化了的、推卸责任的变体留在宇宙之中，而这个宇宙理应是我们要设法了解与塑造的。正当我们决意要对世界前途负责任的时候，我们却放弃我们的本来地位，放弃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毋庸置疑，这里面存在着无权过问和无能为力的情况。

自由主义者向来是最坚决要集体计划、管理社会，使之日趋完善的。因此，他们深深涉足于争吵不休的社会政策问题，以及公众话语的无聊、空虚。保守主义思想认为，正当尊重事物的自然秩序，才是代替那种误导的自由主义雄心勃勃计划的合理方式。我们只能以消极态度去影响社会的巨大设计。我们能够做到的，只能是大家积极地一起让到一旁，让每个人以原来的志向和小群体的自发动力，走他们自己要走的有益道路。[①]

但是采取这种态度也是无能为力，不得已。这种态度把社会现实视为像天气与季节那样的自然事实，并且力劝我们和社会现实归于和好。和自由主义者一样，保守主义者也感到，必须客观、眼光远大地看待社会，要根据当前条件决定如何取得最好结果。在这里，人们脱不开的也还是某种集体性的社会。

4　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

我在揭示关于将来的现代话语之预测意图与控制意图的过程中，并不想突出表明社会科学的局限性，以及社会与环境的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都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即使用某种方式解决了这些问题，预测与控制的统治所造成的极度虚弱仍将存在，公众生活中的背井离乡、格格不入感依然存在。我们在强加给自己的流放中生活，远离集体的交谈与活动。公共广场裸无人影。美国政治已丧失其灵魂。共和国已变为程序性的国家，我们人已变成无拖累牵挂的自我了。个人主义已变为像癌症那样的不治之症。我们生活在自我中心主义的时代，追求孤独。[②]这些措辞是许多论著的标题或表达方式，真使人惊恐不安，这倒不是因为它们预示国家的毁灭；预测与控制尽管有其不利的方面，但还是继续提供舒适生活和稳定的条件。那些痛苦失望的表达之所以使我们深感不安，是因为它们指出了：我们没有共同的生活，把我们捆缚在一起的乃是冷漠的、不具人情味的设计。

4　后现代主义的语言具有严酷的批判力量。但它大部分似乎都没有什么意义，几乎不能帮助我们看到后现代的分界线，或者分界线以外的东西。那么，我们怎么能指望找到用以探查这一分水岭的话语，并且找到我们跨越它的方法呢？很多人都考虑过采取种种措施，鼓励积极参与无拘无束的会话。人们也规定了恢复充满生机活力的民主制度所必需的种种条件。尽管这些措施、条件出自善意与精心研究，但我认为，这些努力被引入了错误道路，并且也会把别人引入错误道路。[③]维护适宜的程序斗士们在市政厅门口设置门岗，阻止不主张民主的一类人进入。大厅里面，桌椅看来是按平等的顺序和公开性摆设的。但实际上，根本没有人进入、坐

下并开始交谈。这样关心直接参与的民主政治的前提条件，这样关心一种理想的演讲场地，是企图控制公共环境，以便可靠地预报真正民主的交易与结果。但这些预备性努力的结果却总是违反宽泛民主的本义。

我们必须大胆走到大千世界，发现它的界标，审视它的特点。我们应互相分享我们的发现，不再无尽无休地谈论什么手册与指南了。因此，我想要详细说明，我怎样看到从现代地平线上升起的后现代分界线，详细说明一旦我们跨越现代领域以后，展现在眼前的景物。我们可以把即将出现的后现代主义，想像为一片峰峦叠错的山脉。我们怎样才能有望找到过山的方法呢？这当然不能靠对它一平方英尺、一平方英尺的细致探察。我们必须仔细先察看山的主要峰峦与溪流，然后选择其中一些山峰、河流当作我们旅程的标志。每一件历史说明均有其特殊的出发点，心理的特殊目的，并且都是受特殊考虑所指导的，不管承认与否。

尽管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路标，又有选择的自由，但我们不能随便任意地确定路标的位置。我们必须确认它们实际的位置，以及它们相互关联的方式，并且我们应该选择那些真是显然突出、能指明方向的标记。我选择的路标是一组一组的，每组有3个标志。我希望，那种选择方法比一个鲜有教益的纲要会提供更让人记取的指导。当然，被选为3点一组的路标不大可能落在一条直线上。实际上，它们描绘的是一条围绕着经济与文化、劳动与闲暇、科学与技术，以及历史与哲学之间的曲折迂回的路径。

本书的纲要部分对我们考察现代终结所碰到的浩瀚材料与大量特点，仍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保持距离以便了解现代性，克服

现代性。但这是不够的。为了要超越现代的框架，我们必须允许超出现代性控制范围的事物，凭它们自己的合法权利说话。因为叙事论文是描述事物细节，我要讲述别人已谈过的事情，并且叙述我自己观察的事物。

从框架上说，本书一开始就提出中世纪区别于现时代的3大特点，即地区的封闭性、宇宙的中心所在与上帝的律令。我们由哥伦布、哥白尼、路德联想起的种种事件，摧毁了中世纪的宏伟大厦，打开了探险与建设的广阔天地。为了探索的目的，我们不妨把培根、笛卡尔、洛克看作是一个新时代的奠基者，现代规划的设计师；他们倡导的主要是对自然的支配、方法的首要性与个人的独立自主权。现代规划利用技术与经济这两个专门科目，发展成为一种以侵略性或掠夺性的现实主义、方法论的普遍主义与意义含糊的个人主义为特性的社会秩序。

快到20世纪末，现实主义、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已变成令人难堪的批评的对象，因此现代规划，虽然作为政治与经济的运动仍向前推进，但已丧失它理论上的信心与可信性。然而，后现代对现代主义的批评，除了空洞地建议我们要尊重自然、特殊主义* 与社会共产主义**以外，一直未能提出相应有力的建设性意见。人们只能在经济领域察觉到一种更具体、引发重大结果的后现代范式，其特点是信息加工、灵活的专业化与信息灵通的协作。

后现代状况整个来说是令人注目地摆脱了现代规划，并且对

---

* 特殊主义：一种用单一的原因解释复杂社会现象的趋势。——译者注

** 社会共产主义或译社群主义：社区或群体中小规模合作、部分集体主义的社会组织。——译者注

现代性危机来说也是有益的反应。但是，这种状况仍然充满非常含糊不清的事物与思想。可以用两种十分不同的方法对此加以分析。一种方法是现代技术的直接产物，并且在近代种种发展的层面上，占有显著支配地位，我称之为超现代主义。这种方法完全用 6
来设计一种技术错综复杂、富有迷人魅力、脱离实际的世界，其特征是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超现代主义的活力主要得自于它所想像的可供选择的方法，即对现时代衰落抱一种愠怒不快而无可奈何的忍耐态度，这种忧愤、郁闷不乐的现象，尤其在我国，确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还有另一种超出愠怒不快与过度活动范围以外的生活方式，即重获富有表情、形象的事物的世界，接受后现代批评并且实现后现代的种种渴望。我称此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并着重指出它正在形成的特点，即焦点的现实主义、忍耐的活力与共同的庆祝。

关于本书结构方面就谈这么多。[④]当然，如果我的说明真的完全是纲要式的，它根本就不算一篇文章；它就会是以现代风格写成的论文了。为了要超越现代的框架，需要写一篇文章，做个实验和大胆的尝试，至于它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则取决于它所详加描述的细节了。

愠 怒 不 快

在本文开头，让我初步看一看全国的景况。描写景况很像是画一张画儿。在亨利－乔治·克劳佐特的影片《毕加索的奥秘》中，人们一再看到照片与油画。[⑤]油画的第一笔总是那么有迷惑力、似

驾驭全局的态势,但完全是不明确的。它预示什么?它将怎样画下去?当线条越加越多时,起初的那种模糊不清就不见了。一条曲线变成一个背脊,一个躯体变成躺着的体态,一位妇女正在看书,躺在睡椅上面,背后是明亮、饰以图案结构的墙壁,等等。我们的理解,随着画面上不断添加用点、线描绘的种种特征,直至一幅画完成,而逐步明朗、加深。对当前社会景况的描绘,其方法虽是散文式的,但与绘画很相似。它不过是把国家的现在精神或情绪特征一一画出而已。没有一个单个特征本身是重要的,但把这些特征综合在一起来看,其意义却重大了。

令我惊讶的是:这个国家的一般精神或情绪是愠怒不快。虽然这种愠怒不快可常在最发达的技术国家见到,它在这里却具有一种独特的美国面孔。一般来说,它表现的性质与形式是形形色色的。愠怒不快既是消极的又是侵犯性的,既懒散又愤恨。这种愠怒不快在明显的社会弊端中,以及在扩散的与个人的不满情绪中,都有表现的迹象。

7 人们时常认为懒散就是懒惰。但从这一词的词源来看,懒散这种消极性,本质上是经受不住办事不成功与负于挑战带来的痛苦所造成的。我们也可以把这种对困难挫折无力作出正当反应的现象,看作是麻木瘫痪,不负责任。我认为,美国的懒散消极,表现在两个明显的经济指标上。一个是外债。美国是绝对第一大债务国。贸易不平衡反映人们的需要和他们实际收入之间的差距。美国人靠他们过去取得的成就,才能够消费多于他们现在收入的东西,现在,他们正在烧家具和典当家传珍品保暖呢。⑥

从联邦预算可以看到不像上述那么严重的、消极不负责的现

象。它反映人们所需要的政府服务量和他们愿意纳税付出的服务费之间的差距。不计算外债,这种不平衡只是一个内部问题,由美国人借钱给美国人用。且不说外债,预算赤字横竖也能说明消极与懒于作为。这种赤字等于购买现在的联邦权力与善行,其代价是招致联邦在处理国家将来的挑战与弊端方面,越来越欠缺慎重从事的能力。随着联邦债务的不断增加,债权人越来越负担更多税款,而有了更多税款,则导致政府的任意决定权。权力从公众转移到私人手里。美国联邦债务的增长等同于日益严重的政府管理的瘫痪症;这本来是人们早应料到的共和党几位总统执政的必然发展。[7]无论如何,它表明自己一手削弱了这个国家的活力与完美形象。

我国公众想要自律与自治的意愿正在衰落;这种消极懒散不仅表现在消费者与政客的不负责任的决定上面,而且最要命的也许是在选举人的冷漠上面。在民主制度中,投票是表达人民的声音,它是政治权力和合法性的源头。但在美国,它却是活力不断衰退的根源。自 1960 年以来,参加投票者已减少 20%,现在是世界上任何民主制国家中投票者最少的国家。[8]

通常对这一趋势的各种解释,并不责怪人们的懒散消极。主 8
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有权势者与他们的小官吏采取并维护一种限制穷人与未受教育者的选举人登记制度。第二种解释提出,人们厌恶政治,对政治不抱幻想,尤其谴责电视,认为它对政治产生消极、庸俗、浅薄的影响。

必须承认,第一种解释所说的选举人登记制,在许多地方的确是不必要地复杂化了,可是其复杂程度,也很少超过像买一台电视

机,或领取司机许可证等绝大多数人容易做到的事情的手续。[9]穷人与未受教育者是民主党的潜在支持者,在未投票者中占大多数,这也是事实。但远非只有他们如此;1988 年总统选举中,共和党的支持者减少 5%,民主党的支持者仅增加 0.9%。[10]至于说电视化的政治,人们对它作出的反应,决不是关闭电视机,或者是选举主张改革的代表。

大部分参加投票的人确实表现了愠怒不快的怨恨一面。当沮丧郁闷与无力作为的情绪具有一种侵犯性与破罐破摔的心态时,愠怒不快的心境就充满了怨恨。怨恨是忧愤,这种不满并不导致坦率与建设性的行动,却变成不直截了当的妨碍因素。这样的怨恨可以从上述投票者那里看得很清楚。虽然他们声称支持公民各项自由与福利措施,他们最后还是憎恨对帮助穷人、无依无靠者以及非文化主流者采取有力措施。[11]他们断然关注和投票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财富的不平等;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他们对在其上者羡慕,对在其下者责备所决定的。[12]

上述人中有些人喜欢利用道德问题,诸如堕胎与死刑,一面表示出又一面掩饰他们对他们认定的低等人的藐视。当美国中等与上等阶级的人热情支持极刑的正确性与严肃性时,他们自己并不坚持崇高的道德规范,因为他们那种人中没有任何人可能被处死。准确点儿说,他们却宣告人口中"一伙人"——贫苦的少数民族有罪。许多人用同样的道理不给堕胎公共基金。他们并不全面地反对堕胎——事实上,他们通常赞成人们享有堕胎权——但虽说这是他们喜欢行使的一种权利,却也要用来惩治贫苦妇女所谓的缺乏谨慎与节制。

愠怒怨恨情绪更为显著的社会标志，就是这个国家中的失业率。从历史上与国际上看，我国的失业率并不特别高。但失业率引人注目地一直居高不下，而且一直对此不予置疑。我们终于接受这样的失业率作为保持经济稳定的代价。如果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其通常水平，工资会提高，物价会飞涨，并且经济的不确定性就会蔓延。

美国国内失业的悲惨结果，完全倾压在一个群体即黑人身上。种族正被用来作为挑选受害者的方法；一旦挑选出受害者，他们不仅要为稳定付出代价，而且还要沉重地自己负担熬过其苦境。[13]存在着另一可供选择的保持经济稳定的基础，即：那种能制约任意增长工资的团结。但是，这正是怨恨情绪一直在腐蚀破坏着的那种公共纪律。

一定社会阶层的忿恨是小心谨慎的，假装的。这种忿恨关注的是维护产生不平等的根源。这种忿恨的小心谨慎或假装，可通过检验他们对艾滋病的态度而大白于世。忿恨的主要趋势是把这种灾难限于不重要的群体范围以内。这种限制使极简单易行且有效的对付艾滋病的战略无法施用，这一战略是：自愿、普遍与互相善意帮助鉴别艾滋病的传染；对受害者从道德原则上与组织上给予支持；采取从技术上说很简单的预防措施。美国人的主流在拒绝这些方法以后，就把赌注寄托在两个希望上。一个比较天真的希望是找到治疗或预防的技术，这个希望落空了。另一个希望是，这种疾病将继续存在于那些与社会隔离以及据认为是微不足道的群体之内 。[14]如果第二个希望也破灭，那么，对这种疾病采取社会限制的措施，以及保障传统的中、上等阶级的办法，必将加强并且

大大增加。

普遍滥用毒品,是与此相似也许危险较少的问题。致命危险极大的毒品是酒精与烟草,它们是造成每年 40 万人死亡的原因,我们从好处说不过是半心半意地对此采取了一些防范措施。另一方面,我们却向每年造成不到 4000 人死亡的非法毒品宣战,为此每年大约要用掉 30 亿元。[15]

严重关注被宣布为非法的毒品,是有充分理由的。[16]但是我们采取的军事手段与自诩为正确的解决办法,不过是愠怒怨恨的另一种表现。我们集中向毒品生产国与贩毒者开火。[17]我们也变得越来越惩罚吸毒者了,因为像艾滋病一样,使用海洛因与可卡因,对大多数中产阶级美国人来说,并不是多大的威胁。[18]我们要求自己不严,没有深入不断地思考有利于滥用酒精、烟草、大麻、可卡因与海洛因的社会环境;也没有决心认真去帮助与治疗吸毒者。

还有其他能说明愠怒不快的社会动向:阅读与写作能力的退化;科学理解的缺乏;身体健康状况可悲;电视文化恶性发展。但是,懒散与忧愤不仅在这些大致可度量的现象中表现出来,而且也在爱唠叨、喜街谈巷议中,在无数粗心、"冷面"的服务事件中,在劣等工作、浪费时间、乱扔垃圾以及满不在乎地花钱等各方面表现出来。有时用警句或简短说法表示愠怒不快情绪。在"这是我的选择"这种常以斩钉截铁语气说出的短语中,流露出懒散与漫不经心。听起来很像要承担最后责任的话语,却常常是一通在道义上打退堂鼓的华丽词藻,拒绝对决定进行讨论、解释与论证,终至倒退到自暴自弃。

当不幸出人意料地突然临头时,怨恨脱口而出:"我不需要那

个!"是什么使这句话显得如此哀怨而自以为是呢? 这句话暗示这样的不幸:某人错误地认为我们本来就需要一个孩子,或一个有残疾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次车祸,或者某种其他的不幸。而且在这种含意中隐藏着更深层的设想,即一个人不过是他确实需要的事物之合理接受者。既然负担根本不是这样的事情,这种怨恨从好处想是不可理解的,而从坏处想被认为是道德上大大出乎意外的。

人们一向把生儿育女这一主要拖累视为理所当然。在美国,正如在一切技术发达的社会一样,没儿没女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传统上,抚养子女的负担沉重地落在妇女身上;所以在某种程度 11
上,为了对不公正与招致苦恼的社会安排作出反应,通常是妇女不要孩子的居多。但是存在着更为普遍的现象,即对当父母应尽义务的忿恨。[19]

当然,从道德上看来,确实存在极荒谬的重负,存在由偏见与压迫置于我们生活道路上的种种障碍。因此应该设法通过法律去消除或减少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也存在可以分担的负担,这些负担是能够而且应该分担的。伤残或失业的工人有权从受法律委托的保险系统得到救济。但普遍对抵偿与赔偿的期待与要求则更多。实际上,一直是这样做的:一个人希望任何负担都能得到补偿,不管它是怎样引起的或感到如何痛苦。[20]法律体系与保险业都已经扩大与重组,以便充当普遍赔偿者的角色,成就似乎完全公正的事业。

完全的公正是社会对愠怒不快的迁就或和解;似乎是美国独具的对懒散与愤恨的反应。[21]例如拿严格负责理论来说,它并不要求人们使用吉普车或修草机必须经心,并且把任何事故责任都转

嫁给生产厂家,要它承担严格的、差不多无条件的责任。[22]这种理论承认普遍懒散的事实,承认人们无力为他们取得的东西或行动承担合理的责任;它认可他们对因不负责任引起的痛苦与损失之怨恨。[23]

从为灾难与痛苦支付赔偿费的具体情况中,可以看到懒散消极的一种新的寓意。支付这种费用已有相当长的历史。[24]但可给予赔偿的事例范围,以及赔款额之大,近年来惊人地扩展,在美国尤其如此。不但因伤害造成的身体痛苦要赔偿,精神痛苦也要赔偿;不但要赔偿因伤害产生的精神痛苦,而且对例如因目睹亲爱者死于意外事故所造成的心灵创伤,也要赔偿。[25]

为痛苦与灾难支付赔偿,当然不会把人完全治愈。那么它有什么好处呢? 为什么要给赔偿? 有人会说,既然人们花钱保险以避免和防止灾难与痛苦的发生,那么他们遭到不幸时,理应得到钱。可是,在前一情况下,花钱是为了避免痛苦,在后一情况下,用钱并不能除掉痛苦。可能有人会争辩说,难道赔偿不就是受害人
12 迫使罪犯或肇事者接受的惩罚吗? 显然不是,因为受害者一般地说对那些引起他们痛苦的人并不感到怨恨。[26]也不是要从个人大量索赔也使他们痛苦以图报复。赔偿费是从保险公司强要下来的,而最后还是由所有投保者提供的。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赔偿就是公众认可懒散,认为懒散是人们无法理解痛苦的含意;认可怨恨,认为怨恨不是对人而是对不能让与的痛苦的怨恨。

表面看来,美国人依旧很乐观。实际上在 80 年代中叶,似乎涌现出一阵子乐观主义。[27]但国外的观察家认为,这种乐观主义似乎是一种以自我为中心、危险、自信的表现,脱离世界现实,也许从

根本上说，与那种极其明显地普遍存在而有时愤怒拒不负责的愠怒不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28]

这些关于愠怒不快的结论性思考，对被懒散怠惰与怨恨不满所掩盖的更深层问题，提供了暗示。现实，根据它根本的中心的意义，乃是以它本身的性质、价值等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像喜出望外的快乐与无法逃避的痛苦就是。我想要指出：我们有丧失我们现实感的危险。即使一个人热忱欢迎用钱去消除或减轻不可避免的痛苦的努力，他也会怀疑，是否决意这么干的态度与观念，就不会夺去我们的真正快乐。

过 度 活 动

愠怒不快表现出许多特点，但并非都一样明显。极容易看到的是反映我国在世界的地位显然下降的那些特点，因为一国的世界地位是由它的经济力量决定的。因此人们时常认为，经济学家最清楚我国的疲惫不妙状况，并且能提出最有效的整治对策。

考虑到医生与病人的复杂性，从经济上诊断与医治国家愠怒不快情绪的方法，就十分清楚无疑了。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就是经济专业，一种软弱无力又缺乏能充分阐释问题的规律的社会科学；病人就是我们多元化的多样性社会。我们疾病的病症或弊端是：13
我们生活水平提高缓慢；我们国际竞争乏力。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我们必须增加税收、储蓄与投资，以便加强资本设备、技术与研究、基础设施以及改善劳动力水平；我们必须减缩政府开支和消费；最后我们必须加强公共与私人两部门的协调配合。[29]

我们这种对形势的看法得到了广泛支持,这且不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看法实际上回避了需要费大力进行改革的问题。为提高生活水平与恢复我们的经济实力,不得不采取的经济措施,已经详加阐述,并被合理证明为对症下药。因此,似乎恢复与加速推动我国的经济机器,是我们惟一的需要。这一工作当然需要一定程度的加强、注意与训练,但本质上,它似乎无非就是合情合理与谨慎的工作。虽然如此,实际上,标准治疗应是治疗活动过度的处方。可以肯定,上述设想的治疗措施中有些是正确的,而且有利于节约,但若把这些措施加在一起,并使之服从标准目标,它们将把我们改变成一个过度活动的社会。

"过度活动(hyperactive)"是个有来头的19世纪的词,最初出现于1867年。[30]一个世纪以后它才作为指称不守规矩年轻人的标记出现;这些年轻人急躁、不耐烦、无耐性,教育者便怀疑,这是一种病。虽然当他们看到这样的孩子时,就能识别出他是个活动过度的儿童,但直到最近,研究人员才发现应对此继续深入研究的具体而重要的原因。[31]

我想在更广泛的文化意义上使用"过度活动"一词,这种意义大致存在于词头"过"或"多(hyper)"。临床综合病征与文化综合病症有极相似之处。临床病人注意力分散,与此对应,则有文化型的神经纷扰不安。病人患的病是注意力极难集中,而文化病则极度狭隘地聚焦于世界与其纷繁。最后,患活动过度症的人似乎是难管教的,患文化活动过度症的人则似乎不能容忍比他们更文静的人。但两种病症也有非常不同的地方:临床综合症是警告有病的信号,并且需要治疗;而文化型综合症则受到尊重,并且被称赞

为可治疗国家之病的良药。

一个真正过度活动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呢？可以把它的特征想像为一种社会总动员状态，在那里，为了追求一个更高更紧迫的目标，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工作以及日常生活的自然节奏，都被暂时停止了。我们甚至在今天国家的领导者中，也可以举出这种动员状态的实例。他们长期紧张地工作；家庭、文化与宗教的生活都无条件地服从于对成功的追求；长期紧张的工作重担只能靠短暂零星的奇特休息娱乐方式来缓解。当然，甚至在一般的，纵令不是全面的动员条件下，也没有几个人愿意在前进的最前线奋斗。但是所有其他的人都注意到，他们相对的平静是不应得的，不保险的，而且他们任何时候都可能被转移、征招或辞退。我们还能更准确地说，动员起来的活动过度的社会展示出3个特征，即文明礼貌中止、前驱者统治与平民百姓屈从。我们需要对此加以考察。

文明礼貌的中止并非小事一宗；因为这种举措事先设定，为了追求目标要有热情奉献的精神，为此就应缩减对文明与礼貌的追求。这种总动员必须搞得像一场圣战。我很怀疑，提高生活水平与全球经济领导作用这两个目标，能在这个国家唤起这样的热情。如果它们真能做到这一点，我倒会很感悲郁。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识到，那种极大的献身精神，实际是暗示标准计划中经济活动应有的精神。

因此，若为了实现这两个经济目标而表现出普遍热烈的奉献精神，对文明礼貌的要求就会被暂时中止。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初步中止措施已在社会领域与个人环境中实施。关于文明礼貌的要求，我是指人道主义与文化的计划或安排。这些计划因企图减少

联邦赤字而受负面影响。为建筑住房、促进公民权利与实施工厂卫生安全规定的法定资助以及公共资助,都已经削减。同样,对基础研究与对艺术、人文科学的支持也被削弱。

为中止文明礼貌辩护的理由,也可以用来解释前驱者的必要性。强制力或压力的直接起源是国际竞争。自第二次大战后,这种竞争越来越变为专心致志的大事,越来越激烈。传统上对舒适条件、礼仪与领土的约束,都被鲁莽的好奇心与奉献精神毁灭了。现在想要在任何学科中在国际上领先,除很少特别幸运或有天赋的名人以外,就要求人们敢冒使自己的能力经受极大压力的风险。

这种发展情况源于远离现实,对此我们后面再多谈。在这里我仅仅指出:我们眼看着自然、艺术和宗教的丰富与奥妙不断消失。或者我们也许已经变得对困难与深刻意义感到不耐烦,所以一直坚决要求减少复杂性与含糊不清,并且要以一定的数量与尺寸固定起来毫不含糊。这种思想使我们联想到政治选举,在那里,本应是反思问题与确认主张的机会,却变成一场狭隘竞选运动的军事行动。而竞选运动又被更狭隘地看作赛跑,在那里候选人在跑道上的位置,是不断由民意测验结果判定的。候选人的论战,大都是缺乏深度,平淡无奇,直到人们投票给它们评分为止,对我们来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

当代文化加强了单项的老一套比赛记分制,希望各类竞赛者为取得胜利能发挥特殊技能,令人不安的是,凡是竞赛者敢冒生命危险取胜的多记分。他们时常渴望这样做,因为这些比赛者比旁观者更能深刻地感受到,忠诚于一项目标明确、很费力气和普遍受敬慕的工作,对生活有多么大的鼓舞与激励。全心全力为此而竞

争的一生，有其惊人的素朴性、荣光与脆弱性；其目标十分明确，其成功受到普遍赞扬，可其幸福则永远受到危害。

今举 B.L.杰弗里斯为例加以说明。[32]1962 年他与人合办经纪公司，公司用他的名字命名。公司迅速发展，接收项目很多，雇用人员大增，他很快致富，因为他打破传统的营业限制，特别是每天的工时限制。他的公司日夜 24 小时工作。他差不多也是这样，他早晨 1 点半或 2 点半起床，开车上班，经常到晚 7 点才离开办公室。

他热爱的是工作，他离不开工作，陶醉于工作。为了使自己的买卖发展，他什么事都愿意做。但是他这样生活、工作也有危险。他说过："如果我真一直做买卖，我也许早就累死了。"但事情并没 16
有达到那种地步，因为杰弗里斯先生在打破传统营业限制的同时，也违犯了法律的限制。一经被控，他就同原告达成协议去作证人。由此，他总算从他狭隘陈腐观念的羁绊中解脱出来了，生活变得平静，多些变化了：他有时住在加州家里，有时住在科罗拉多州家里；他有时涉猎企业投资；夏天开儿童高尔夫球讲习班；他和 3 个孙子孙女玩，消磨时间。可是，他的律师说："离开了他的职业生活，他深感空虚，百无聊赖。"杰氏热诚地相信"在我的将来闪烁着一颗耀眼的明星"，这颗明星是指他希望能再去干的买卖。

这种过度活动的工作习惯，在我国多数权力精英中，在著名的律师、政客、官僚、新闻记者、科学家、医生与学者中，都可以看到。[33]这是一种倾注于过度活动的奉献精神，宗教热忱。这种过度活动的工作习惯为懒散、无所事事与疑惑不前指出了方向，也是个人获得成就与集体得以延续的保证。父母把这种过度活动向子女

推荐。我们都知道,只要我们是强者,过度活动就是我们每个人应该为之奉献的东西。

然而,我们大多数人不是强者。过度活动是经济与技术的发展前线上先驱们或先锋们的重大职责与特权。可是后方的平民百姓也生活在过度活动的支配之下,虽然他们在较小压力下工作时间不长,但这些情况根本不是有闲暇与行动自主权的标志;更恰当地说,它们表明平民的懒散与依赖,他们的好运气归功于突击队的努力,作为回报,他们必须听从先锋们的指挥命令,要为谋求经济霸权的斗争,做出任何牺牲。

平民的软弱性,突出表现在被人用后即抛弃的非战斗的劳动力问题上面。先锋们处置工人的方法很多,他们可以根据经济生产能力及稳定的需要,自由决定劳动力的规模。如果雇用较少或更少的工人有利可图,就让更多的人失业。先锋者可根据国际竞
17 争需要调低工资。尤其重要的是,参加战斗的精英随时可根据机遇或利害得失,雇用或辞退后备或辅助部队。用比较明确的经济术语来说,平民的依赖或隶属性在以下各方面表现得很清楚,即日本式管理方法兴起;高度失业水平;真正全日制工资停滞;以及临时劳动力增加。上面所说第一与最后两种现象最能说明问题。

日本的管理也称"集体概念",最近称为"紧张管理"。[34]这些不同名称表明,在日本管理体制下,工人几乎是活动过度地干活,但仍没有先锋者的地位与权势。集体概念的意思是将工人分成小组,把生产过程一部分交由整个小组负责,要求小组提高生产率,加强协作,并给以奖励。

所有这些措施都能使生产条件更加一体化,更加便于管理,提

高生产效率,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因为这一体制结构严密,更容易受到压力,更容易受到监督。施加压力的典型办法就是加速生产过程,直到这一体制的极限——崩溃。这就是用紧张管理。由于这一体制中没有懈怠马虎的余地,各种问题都无法掩盖;超出一定程度,工人也不想掩盖问题;他们知道,他们关于改正体制弱点的建议是会被听取的。

当然,作为调查分析工具的紧张与作为鞭斥工人更加卖劲工作的紧张之间的界线,并不明显。工人既没有资格划清那条界线,也没有资格规定他们工作于其中的更大范围的程序设计。他们不过是变成了过度活动的拥护者,也许是同犯者,可是他们仍被排挤在过度活动统治权之外,分享不到为全球霸权而战斗在最前列的光荣。毋庸置疑,工人的支持者们一分为二:有些人为那些极度限制工人的严酷紧张条件而哀叹,其他人则为工人已订立协议的合理性与有益性而辩解。

能充分说明平民隶属地位的另一现象是大量临时工的增 18
加[35],其中包括工作不固定或非全日制的工人,他们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反对任意辞退的保障,也没有保险、退休金以及照发工资的休假,等等。有些工人宁愿做零活或临时工作,但大多数工人喜欢固定工作,希望事业稳定有奔头,社会福利有保证。但工人们所珍视为坚实宜人的那种经济建设大厦,对过度活动的勃勃雄心来说,不过是个笨拙迟缓的庞然大物。在国际竞争激烈多变的环境中,必须迅速抓住机遇,以回天之力应付挫折失败,并且要迅速变换和布署劳力资源。只要这种被动员的经济前景得到公众支持,公众对取消劳动领域社会福利的做法,就会越来越采取宽容态度。

被苛刻雇用的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以及艰难困苦,就是后方必须做出的牺牲,否则无法打胜全球性经济的前沿战役。

正像在一个为战争动员的国家一样,在一个充分过度活动的社会里先锋与平民的分裂,绝非突然。有些人显然战斗在前列,其他人慢腾腾地殿后,但两者之间还有人积极程度不同地参与和牵涉。在这个国家,前方与后方的分野甚至更不明显,因为如果人们常警告我们要振奋起来快快行动——过度活动,我们感到的主要是忧愤,是愠怒不快而已。

充分发展的过度活动的前景实际如何?它当然是一种技术上切实可行,心理上可接受的社会秩序。日本就是人们常高度称赞的过度活动社会的例子。日本早就发动全国疯狂般地提高生产力,或许在二次大战后又重新开始,继续努力,才获得普遍敬慕。英国战后走向一种平均主义、开明的社会,但 70 年代末,M.撒切尔吹响过度活动性革命的号角,尔后并享有授权促进英国经济竞争与进步。她也赢得全世界的好评。

19 但是,在这两个事例中,善于思考的观察家,也清楚地看到过度活动阴暗的一面。R.贝拉说过:"日本是个动员起来的社会,管理是从上而下。"[36]R.德沃金曾说:"那些 60 年代因其社会与政治的文化而爱英国的人,现在不如从前那样爱它了。"[37]似乎追求全球经济领导权这一突出目标,使社会远离传统与文明礼貌,远离它应处的位置以及此时此地的快乐。一切企望与努力都指向别处,其借口是:全球性经济与即将到来的经济成果。国民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被放逐,被摈弃。过度活动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和本文前面考虑的关于预见与控制的谈论本质上是一致的。这种对正常秩

序的破坏,始于现代。如果我们想要避免这种社会纷乱的终极后果的话,那么,一出现这种纷乱的苗头,我们就不能掉以轻心。

第2章　现代主义

现代主义的兴起

现代正走向其尽头，我们正进入后现代，人们有这种感觉并不新鲜。二三十年前，在有关社会和文化发展前景的划时代变化的一大批观察报告中，突然涌现出许多冠以“后”(post)的语词——后资本主义的、后意识形态的、后工业的，等等[①]。丹尼尔·贝尔在1973年所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便是这些辩论值得纪念的学术成就。但是，正如贝尔指出的，在1917年阿瑟·彭蒂已经预见到，或者至少热情地希望后工业景况的到来[②]。新的一千年再次激起感情，越来越迅猛地以各种形式广为扩散。现在人们喜欢用“后现代”这个词召唤结束和过渡。无论这个词有什么缺点，它毕竟提醒我们，只有了解现代时期，它的特点和它的界线以后，才能克服其缺点。

为辨认现代的最终轮廓，回顾这一时期及其名称出现的情形是有裨益的。“modern”(现代)源于拉丁语 modo，意思是“正是现在”。它原来的意思和近来的、现在的、或当代的意思差不多。一旦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人们萌生了某种类似对文化的历史意识

时,就产生了要把他们自己的文化和原先的文化区别开来的愿望。早在公元前2世纪上半期,希腊语法学家阿里斯塔科斯(Aristarchus)就将“较现代的”诗人和古代的诗人荷马加以区别。从此以后,某种像这样的“现代的”先驱之物就被使用开了,直到公元5世纪后期,拉丁文才产生“现代的”这个词,并把它传给正出现的中世纪[③]。显然易见,既作为一名称又作为历史界线的中世纪时期,其出现是与人们意识到新时代的破晓联系在一起的[④]。

我们从思考这些术语中可以得出的教训是,西方各个历史时期之所以产生,是由于人们日益增长的不同感情,是由于人们越来越感到与一切往事的亲近关系变得减弱和失落了。与过去的决裂是用最正式的和一般的方法说出来的:此一时,彼一时;他们是古人,我们是现代人[⑤]。这种现象在大部分“后现代”术语中似乎频 21
频出现。如果历史是可信赖的话,“后现代主义”,而不饲诸如“信息时代”这样的实体词语将成为即将到来的新时代的名称。

虽然这种划时代的种种感情在历史上被人们以这种粗略的、近乎空洞的方式说出来,它们确是对深刻的、实在的事件作出的反应。当人们考虑到中世纪两边界各有许多不同的桩界物时,他们容易相信,定时代之界限并不是机械的,或很令人信服的计划或行动。[⑥]更确切点说,这种定界表明它是一种共同的对话,对我们来说,它必然是对现代主义所掩盖的自然及文化的真实力量作出的反应。

现代主义现在已经遍及全球,但是它源自于中世纪有强烈地方色彩的环境。中世纪文化发展时停时续,也没有定式可循;它获得其定义及其辉煌壮丽,乃是由于现代主义长期以来作为一工作

计划或事业所取得的成就。中世纪显然在9世纪初就到来了,当时查理曼大帝成功地把3种各自独立的要素融合在一起: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的文化和学问;德意志传统的封建秩序;以及最重要的,基督教的精神幻想。

中古时代的成就像责备的阴影一样笼罩在现代事物上,其责备程度在现代后期和末期,达于极点。骑士精神与谦恭有礼,群体精神与共同庆祝,权威与行会,这些中世纪优越性的残留形式正在我们眼前消失。但中世纪秩序的活力在15世纪后期才消失殆尽。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化缓慢的变动不居的衰亡不同,中古的生活方式迅即而一刀两断地终结了。我们通常认为,那种生活方式之毁坏是由于受到哥伦布、哥白尼和路德的三大打击。

这三个人全都生活在15世纪和16世纪之交。在反思和发现新世界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是他们共同摧毁了旧时的大厦,
22 开拓了广阔的考察和发明的崭新领域。中古世界像一切现代以前的文化一样,是个地区间隔绝、自认为处于宇宙中心、以神命组成的世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推翻了中世纪人所共知、一目了然的地理学。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把地球排除其居于宇宙中心的特殊地位。路德的宗教改革通过确立《圣经》和其信仰者为基督教的最终权威,致命地削弱了神性的教派力量。[7]这仅仅是从后现代的观点图解式地回溯,说明过去的发展变化。可是约翰·多恩*在短短的一个世纪内,就充分感觉到这些变化的力量了,他这样说道:

---

* 约翰·多恩(1572－1631),英国玄学派诗人,散文作家,对17和20世纪的作家影响巨大。——译者注

太阳丢失了，地球也一样，任何人的机智
都想不出好的指引，到哪里去寻找它。
并且人们自由坦率地承认，这个世界已耗竭，
当人们在行星中，而且在太空里
寻找到这么多新的世界时；他们看到这个世界
又在崩塌变成它的原子微粒。
这个世界已支离破碎，一切联系已成过去；
所有公正的供应救助，一切关系：
王子、臣民、父、子，全被忘却，
因为每个人自己认为，他已经开始要
成为不死鸟，并且除他以外，
别的人虽属同种，谁都成不了。⑧

在继续谈论现代产生的过程时，我们必须指出，四分五裂的中世纪，同样与罗马帝国的衰亡不同，没有苟安于废墟很长时间。从中世纪秩序的最后破坏者到现代的第一位奠基人弗朗西斯·培根，历时不到二三十年。培根和勒内·笛卡尔以及约翰·洛克一起，奠定了我所谓的现代主义（用“现代性”[modernity]标明现代的时代）规划的理论基础。⑨我们还能够更具体地论及现代主义的三个奠基性文件：培根的《新大西岛》（1627）、笛卡尔的《方法谈》（1637）以及洛克的《政治论下篇》（1690）。⑩

这三篇论文都既是恳切的希望也是郑重的宣言。它们祈求新的秩序，并且它们从对中世纪的混乱无序、日常生活的束缚、传统 23
的积弊陋俗和等级制度与社区的压迫之控诉鞭笞中，吸取很多力

量。它们极力主张达成新的基本意见一致，即以摧毁摇摇欲坠的、枯朽的中世纪结构为目的，着手在牢固的基础上重建新秩序。

培根的不满集中在科学探索无原则和无组织的状况。由于对人生艰难的新的理解，他感到无法容忍下去。虽然他认为人类面对自然暴露的弱点是人类堕落的结果，但这种以宗教定位的解释已经失去它的真正力量。它只说明了我们的痛苦不幸如何开始，却再也没有指出我们应如何接受或容忍它。对中世纪好幻想的妇女来说，疾病曾是考验、新生活的呼唤、神力所占有的存在、神秘死亡的体验，或者与写作重负的角力。[11]培根在他为改善人类处境的探索中，利用宗教掩护他的侧翼。[12]但是他认为，从本质上说，人类的痛苦不幸是不必要的、难以忍受的丢脸之事，应该通过控制自然加以克服；自培根以来，我们也一直这么认为。

培根不仅教导现代要勇敢面对旧时留下的人类灾祸；他也把哥伦布发现的新世界看作是必须强迫使之屈膝的敌对者。当然，征服新世界实际上并非实施培根的规划。历史的发展真像洪水，泛滥无际。尽管理论家只不过是上述那些激流的涓涓源头，他们却担当了事物发展动向的主要指示者。无论如何，培根为了人类利益，发出拷问、强取和征服自然的激烈语言，清清楚楚地给我们，也必定给他许多同时代人，为接近现实，减轻日常生活重负，以及开发广袤荒芜的大自然，勾画出了现代的方法或门路。[13]

《新大西岛》一书，虽然只有稍多于 1/4 的篇幅图解式地略述培根的乌托邦的研究和发展事业，但它仍被人们推崇为现代的研究和技术的计划。大部分故事内容，企图使读者摆脱他们对当时种种传统与灾难的那种中世纪的顺从态度或束缚，说服他们应该

认识到驾驭自然的紧迫性和巨大利益。培根认识到需要有个彻底的新开端,并且他永远热衷于为此新计划增补细节。但他对《新大西岛》中的方法说得极少,却津津乐道和描画萨洛蒙宫的研究设备,以及将来一切科学技术机构的模式。

与此相反,笛卡尔争辩认为,行动程序的激进性是关键。他主 24
张,激进的重建计划或生或死,取决于两个必要条件:第一是发现绝对不动摇的基础,这要靠大胆清除所有现存组织而取得;第二是要有建设性的极有说服力的方法。一旦能满足这些要求,一切个别具体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更重要的是,笛卡尔的纲要提供了解决哥白尼的难题,即如何成功地应付一个迷失方位世界的方法,这个世界已不再有支配中心和范围广泛的特权了。正确的方法能导致秩序,而不必求助于什么方位或定向。

这是程序对实质的胜利。培根仍强烈地被新世界的实质性特征与细节深深吸引。在《方法谈》中,笛卡尔只利用具体例证表明他的程序的力量。他的论文第一部分就力陈,没有强有力的行动程序,任何实质性成就永远是可疑的,有缺陷的;然而,如果能在有说服力的程序下进行,任何实质性结果定将不难得到。

笛卡尔和培根一样,似乎也已经把宗教当作他的方法的枢纽。但合理性是真的保证;上帝和神学是非物质的点缀装饰,仅仅是对传统的让步。笛卡尔进一步把社会和政治秩序排除在激进的重建范围之外,这也是对他的时代的急迫需要做出的妥协。但是其言外之意是明显的,即专制的和传统的秩序需要改革。

半个世纪以后,洛克草拟一设计,表达了现代规划的社会含意。正如培根在追求"合适的基础"以及笛卡尔决心"从头重新开

始”一样,洛克也从事政治权力改革,即从它“最早的”,也即从它“原始的条件”,推导出重新铸造政治权力的方法。[14]他借助理性的指导,在原始自然状态中找到这一本源,而理性又得自于上帝。现代规划似乎又一次在上帝的权威面前止步了。但自路德伊始,各种改革运动已经震撼并且粉碎了宗教的共同权威。洛克的《政治论》仿佛情系宗教,但这不过是传统的装饰而已。

在自然状态和理性统治中,也存在伪装成分。这些观念导致我们期望一种包罗万象的,庄严的公共秩序。然而,事实上,洛克的《政治论》是对个人的歌颂,对无拘无束、自律的人的歌颂。[15]自然和理性不过是为个人布置的模糊背景。自己一个人的自律就是最后裁决的新权威。公共秩序依个人之间的同意而建立,并且这一协议始终服从于个人的意愿。

我们可以把现代主义看作是培根、笛卡尔和洛克三个人规划的结合,是驾驭自然同方法的首要性以及个人主权之融合。再者,上述故事是图解式的,有所侧重的,但它对文化产生了普遍影响。这里所描述的三位一体,曾在托马斯·杰斐逊* 的生活中有着颇为亲切而有力的不同表述。他在 1789 年从巴黎写给约翰·特朗布尔的信中,谈到他得到的一些半身塑像和照片时说:

> 我将把这些东西全都收起来,等到我从美国回来后再处理,只留下培根、洛克和牛顿 3 人的照片。我麻烦你把他们的

---

* 托马斯·杰斐逊(1743 – 1826),美国第 3 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有影响的政治哲学家。——译者注

> 照片给我复制下来:我认为他们3位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他们给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中已建立的那些上层建筑奠定了基础,所以我希望将他们的像片用一块帆布捆包好,以免同其他一些伟人混在一起。[16]

杰斐逊对现代规划的了解和认识,直到今天仍有其意义。他认为现代规划是一项文化事业,或者,更确切地说,认为它在知识和行为领域有其正当位置与影响力。在我们通常称谓现代规划的术语——启蒙运动中,就表现出了这样看待现代主义的方式。我们把启蒙运动看作解放理性的黎明,它驱散了中世纪的迷信与独断论、压迫与专制主义。我们已经深深地把对现实的文明幻想内在化了。杰斐逊称作自然科学和道德科学的上层建筑,已经在科 26
学组织和民主政治中实现了。在西方世界,民主政治和信奉平等,现在已成为每个人精神组成的主要部分,如果还认为谁是隐蔽的君主主义者,那会是很可笑的。很少见到有人明目张胆地企图通过立法取得封建的荣誉。同样地,接受科学的世界观无论从哪方面考虑,都是不会引起异议的。

自然,启蒙时期规划的进程并非一帆风顺或稳步向前。在希特勒的德国和斯大林的俄国,有理由令人们对这一进程感到失望。启蒙时期的革命也不是完成了。这与现代的规划的特点是一致的。现代主义伊始就是一项计划,并且依然是一项计划。它一直在继续搜索并且摧毁传统的组织结构和阻碍;它极有信心地设计强有力的程序和种种机器,填补新出现的空间。但是它究竟用什么填补这些空间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现代主义者不在场的情

况下，通过把现代主义安置在遥远时代、异国他乡而预先找到了。

人们对这种现代的缺乏中心和终结，一定持有许多保留意见。可是，最令人失望的莫过于我们未能完成启蒙运动纲领中社会方面的基本条款。[17]在我国以及国与国之间，存在着刺目的、难以克服的不平等，迷信与偏见在死灰复燃。为避免一切误解，请允许我声明，我全心全意献身于完成启蒙时期革命中其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献身于妇女、黑人、美国土著、同性恋者和少数民族的普遍机会均等，献身于促进纯粹科学研究，发展其有美好硕果的事业。

可是，显而易见，启蒙时期规划的社会运动已陷于停顿状态。人们已不再团结在平等自由的旗帜周围了。因此，只求加紧实施启蒙运动的纲领而不顾一切其他种种探索和趋势，这是个错误。老一辈启蒙运动的近卫军已经失去它的听众，并且实际上已无法承担对平等所肩负的义务。除非我们认真考虑为什么争取平等的运动已陷入冷漠和令人厌烦的灌木丛，就不会有恢复活力的希望。

27 对这一问题的挑战，不是拘泥于细节的挑战，而是具有广泛性和深度的挑战。不承认社会公正已陷入现代主义网络的困境，而绝对地主张社会公正是判断现代规划的标准，这是很天真的看法。所以我们必须通过纲要式的说明和史话要弄明白，对自然的驾驭、方法的首要性和个人的主权，是怎样使现代规划复杂化的，以及该规划反过来又如何使公正成为纠缠不清的复杂现象。

侵略性的现实主义

现代对自然的支配或驾驭，不是贵族式的对它执掌统治权，而

是激烈的征服活动。这种活动是和下述这些事情一同开始的:现代初期航海的发现;贸易路线的扩大;风力和水力的广泛应用;大规模消费工厂的建立,以及记账方法和财务工具的发展。这些范围内的扩展很快碰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河流、航道限于一定的位置,容易冻结、泛滥和干涸。风力只限于一定时间使用。马的力量、速度和耐力只能运载旅客到不很远的地方。多远?在1830年,你从纽约1天的旅行可达新英格兰几个极东部的地方。1周的旅行可到阿巴拉契亚的东部海滨。需时6周可达密执安湖[18]。不仅东西的移动和制作受到限制,并且用以制作东西的原料也受到限制。石头易损坏且沉重;可作木材的树木生长缓慢;金属又难得。

所有这一切障碍,在18世纪晚期被煤、蒸汽和铁以及在19世纪中叶被炸药通通粉碎了。[19]这些发展的爆炸性力量之特别令人惊愕的实例,就是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系统的扩展。1830年在美国第一条铁路出现。到1850年,新英格兰和南方有了不少像样的铁路网;到1860年,铁路已达到中西部。1869年5月10日,来自东部和西部的一群工人,在犹他州普洛蒙托利岬,把他们的轨道联结成为横贯大陆的铁路线。在20世纪之交,美国有将近20万英 28
里的铁路线,1920年达到25万英里的最高峰。今天已降至差不多一个世纪以前的英里数了。[20]

对空旷的美国西部的征服,特别富有戏剧性。在欧洲,新的交通系统插入的是年代久远的环境,那里远离原始自然状态和数千年靠狩猎、采集生活的部落环境。这种侵扰真够令人痛苦的。当

1844年计划通过英格兰的湖区建一条铁路时，华兹华斯*写了一首14行诗抗议，发表在同一年10月16日《晨邮报》上。

《论修建肯达尔和温德米尔湖之间铁路的计划》

那么，是不是英国土地上的任何偏僻角落
都免不了要受轻率鲁莽的袭击？
年轻时萌生的隐居计划，在忙碌的世界中
仍像它们最早的希望之花绽开时那样，
保持纯洁不变，而今却必须毁灭；——
它们如何能忍受这种摧残？
并且若有谁蔑视那些随意投在祖传田地里
虚伪的功利诱饵，
难道他也必须为这残酷的变化而悲痛？
摆脱这样的威胁，登上奥莱斯特山岬远眺，
亮丽的景色令伫立的旅行者狂喜：
祈求你的幽静，你美丽大自然的罗曼司；
并且，如果人心已死，吹拂的风，请你说话；湍急的水流，
用你响亮激荡的声音，对错误提出抗议。[21]

40年以后，测量员爱德华·吉列特为伯林顿铁路公司在内布拉斯加地区寻找新建一条铁路线的位置。只有美国土著和牛仔比

---

* 华兹华斯(1770－1850)，英国浪漫派代表诗人，1843－1850年桂冠诗人。——译者注

他先到这个荒凉空旷野之地。吉列特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牛仔们看到一大批铁路工人非常惊奇,谁也不相信会有铁路穿越那个荒无人烟的地区。”[22]1885年严冬,吉列特和他的同事们不得不携带着生活必需品奔波在覆盖着白雪的荒野中,在内布拉斯加布满沙丘的空旷荒原中,时时有迷路和丧命的危险。

随测量员之后来的是筑路通行权代理人,他从农民和牧场主 29
那里购买土地。然而,有通行权的路线经常穿过大片无人认领与无人居住的土地。在这些情况下,政府便根据收到的铁路公司承诺建一条铁路的申请,给它筑路通行权和周围的或另外加给的数百平方英里土地。但是,这块土地之所以在那里,决不是为了让美国政府或任何别的人占领的。美国土著人已经在这里生存了几千年之久。

1882年8月末9月初,司法部长助理约瑟夫·凯·麦克坎蒙和阿尔里、阿道尔夫、恩尼阿斯及米查利会面,后者是蒙大拿州西北部弗拉塞德人居留地弗拉塞德人、本德·多瑞勒斯人及库特内人的酋长。内政部长指派麦克坎蒙同他们协商,以便为北太平洋铁路公司修建横穿大陆铁道经过这居留地的筑路权,达成协议。

这些土著美国人一再被迫从原属他们祖先在爱达荷和蒙大拿西部的土地迁移,最后被困居于弗拉塞德人居留地。他们想要能单独地在故乡最后一块土地上自由生活。阿尔里说:“我想留在我家乡生活,安安静静不受干扰。”[23]但是,他又一次将受到现代对大陆征服行径的进逼。这种征服行径的代表是代表私人公司的联邦官员;公司背后是矿工、伐木工、筑坝工、农夫和商人等日益高涨的向西流动的热潮。

麦克坎蒙开始以自己是“长者”的化身所具有的能力，采取又屈尊又随和的姿态说：“我是受远在千英里外华盛顿的“长者”派遣，来看你们，和你们谈话的。”当酋长们提出反对意见时，他警告说：“当‘长者’听到印第安人不相信他的善意时，他将感到很难过。我回去告诉‘长者’说，这些印第安人并不相信在这件事情上他对他们是公正的，这好吗？他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你们的利益；而如果你们不提出这些土地的价钱，我就回去的话，他会说，他们不是我原来想像那样的好印第安人和诚实朋友”。㉔

美国土著人在回答中提出应按建立居留地条约的条款执行。
30 他们提出另一条可供选择的路线，实际上被后来的铁路线采用了。他们提醒麦克坎蒙注意，拟建的铁路会严重破坏他们的生活。根据这狭长的一块土地对他们的价值，他们索价 100 万美元。他们恳求对方理解这块土地对美国土著人的意义。当时恩尼阿斯说道：“我的家乡像一朵花，而要我把它最好的一部分给你。”阿尔里说：“你们好像喜欢你们的钱，而我们喜欢我们的家乡；家乡就像是我们的父母。”㉕

所有这一切都是徒劳的。麦克坎蒙说话掩饰着不耐烦的神气，坚持己见，确信自己说一不二。酋长们最后只好改变主意，要求对方比最初的给价多给 1000 元，并且要求付给现金，不用年金方式付款。他们的第一个请求被准许了；他们被告知，第二个请求则要听凭“长者”自行决定。

如果这条铁路按恩尼阿斯酋长要求的那样修建，从密苏拉沿克拉克福克河到它和弗拉塞德河汇合处，北太平洋公司就要多负担 30 英里的轨道。㉖然而，在这一汇合点之南，从克拉克福克河直

到爱达荷州一线，必须要经过极陡峭的狭谷，没有巨大的蛮劲，克服种种险阻，是无法通过的。同一时期的一份记载说："在这狭谷中，这里那里全都是几英里长高耸的平地，工程师们急切地占据这里，认为不必再千辛万苦从陡峭石壁或悬崖险坡上，挖掘和爆破出一条路基，可以稍事休息了；但是，这条线路相当长的一段必须先爆破险峻山坡，才能够通过那些突兀似臂延展入克拉克福克河的山岗地方。"㉗

为要在峡谷峭壁开路并使斜坡达到一定水平，最初是人工操作用甘油炸药从山顶把岩石一块一块崩削下来，开出一片狭窄但平坦的地面。总工程师J.L.哈利特设计了一种新方法：他在预计开拓的斜坡下面，开凿许多直达山坡的T形隧道，然后用炸药一下子把它们炸掉。这位年代史编者说："这效果惊人，整个山坡一下子炸得杂乱纷飞崩落到河里。"过山的铁道路基也用同样方法开凿。"数量很大的火药一下子能炸开一条24英尺深、400英尺长的路基。"大自然不仅以大量山石，而且也以破坏性活动阻碍筑路进程。编者告诉我们："1883年4月，一大块40英亩的表土，连带 31
它上面的树木塌落到河里。线路从斜坡坍塌深达60英尺，造成1300英尺长的深谷。"㉘

急于求成的做法使公司碰到更多困难。建设工程不顾严冬大雪急速向前推进。"有时为了减少道路用地斜度使之较近于水平以及铺轨工作不间断进行，得要有几千人铲除线路上的积雪。"㉙大量的甘油炸药和大批工人用来修建这些铁路。有900名中国人和800名白人在哈利特指导下干活。㉚他们许多人，"刚刚从移民船下等舱出来"，便被用来干活，而当建设完工不再需要时，就被抛

开不管了。[31]

与这一伙建设人员相伴的，是娼妓、饮酒、赌博和暴力。詹姆斯·H.凯纳是个铁路包工头，负责为联合太平洋公司在尼布拉斯加和南爱达荷修筑铁路线。为要建立自己在工人中间的威信，他有时就殴打工人，常常显示他是个打枪能手。为支付他的工人工资，他必须设法躲开拦路强盗，在万籁俱静的深夜，急驶有弹簧座的马车从银行跑回筑路工棚。[32]凯纳在他的自传中说："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和善和体谅，毫不知耻，侍仗蛮力和向来不更改的决定，差不多是必不可少的，它们成了那些日子里我们工棚到处屡见不鲜的现象。"[33]

有时，人们为驾驭或支配自然而进行的活动之严酷，实目不忍视。虽然铁路通过弗莱塞德居留地使北太平洋公司节省了筑路距离和时间，但确实需要跨越密苏拉附近两个陡峭峡谷，那较大的峡谷需要 226 英尺高、860 英尺长的高架桥。它最初是木制的，1885 年冬用一钢制桥代替。[34]芝加哥的查尔斯·希利负责这一工作。他的妻子陪伴他，当她怀抱她的婴儿毫无畏惧地走过桥的横木时，赢得所有在场人员的赞美。一天早晨希利从桥上一个平板车迈步下来，一失足，就摔死了。人们把他抬到附近酒吧间，放在弹子台上。当人们唤来希利夫人时，作者告诉我们："她只说出来一句话：'查
32 利，就对我再说一次话。'"她回到芝加哥，精神失常，被送入疯人院，不久便故世了。[35]

无论什么都阻挡不住这条铁路的掠夺性的推进。土著美国人根据权利的要求挡不住，大自然的阻碍挡不住，人们的放荡无度和诸般痛苦挡不住。最后，大量的贪污腐化也挡不住。创办像横贯

大陆铁路这样范围广泛的事业，其所需资金远非任何企业或银行所能提供。因此，创业者们通过在美国和欧洲出售股票和债券筹集资金。就是这些创业者们，为保证自己获利，不管对铁路会发生什么事情，到处设立和铁路公司签订合同的建筑单位。凭他们的铁路大王的职分，他们作为承包商，获得千百万美元的利润。[36]19世纪最后20年，美国铁路史是财政和组织的衰败史。[37]但是人们绝未得出结论，认为铁路可能是太难控制、太爱出毛病和太容易腐化的受造之物，而无法为之操心；衰败以后必然接着是重新组织和再度筹资。对自然的驾驭或支配需要征服距离和地势、天气和季节。对现实的掠夺态度，促进了这种征服，这种态度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历史学家把它的进展描绘为显然必要性。说它伴有暴力的进步符合对一种交通运输系统十分合理的要求，此种系统“又快、又便宜、又可靠”，“全年有规律地运行，迅速、便宜，横越大陆并且路线不限”，提供“快速、全天候交通”，以及“平安、定期、可靠的货运与客运”。[38]

不过，忽视激扬于暴力、腐败之下和暴力、腐化之间的建设热情，是度量狭隘的；热情之高有时对巍巍大陆作出感人的甚至无私的响应。试图认清和唤醒正出现的美国人个性的R.W.爱默生，在这块土地上，尤其在“刚健有力〔即精力充沛〕、多石的西部”，看到了那种能激发并能镇定美国人性格的力量。他把这条铁路看作对广袤千里国土合宜的回应是“一根魔杖，具有唤醒沉睡中的陆地与河川的力量”。[39]

爱默生情绪激昂的希望，被广泛地折射于陈腐、令人尴尬的断 33
言中，说这“铁马”胜利的行进，撼天震地、喷烟吐火地奔驰在它的

道路上时，会消灭一切阻碍而散布崇高的美。[40]但对这一话题知情的人们也为爱默生的看法辩白。斯托扬·克里斯托20世纪早期离开严遭战火破坏的巴尔干国家，开始他的美国人生路程，在大北铁路公司蒙大拿处的路段班工作。他被“这远方西部的魔法、自由和流动性”迷住了。他回忆起到西部的旅行说：“广阔平坦的大地携带着美国的富饶，从眼前飞驰而过。我的生命渴望与之成为一体。”在他看来，美国大地上修筑一条铁路不会破坏自然，却会点缀自然：“前面的轨道不过是白茫茫漫无边际大地上一条薄带。就在这扁平的钢铁薄条带上，有一百人像栩栩如生的风滚草，弯腰扭身、又钻又挖地忙碌。就在这块美国似白色胸部的大地上，我们雕刻上一条钢项链——固定在轨枕板上，用螺栓和角铁铆紧，饰以突显的道钉。它牢固地铺设在大地上，纹丝不动。”[41]当克里斯托用手触摸钢轨时，他似乎感到有只蜡烛在内心亮闪闪地燃起。他惊异地说：“我过去绝没有像现在这样，在这阡陌皆无的平原上，感到这么和美国亲近。我知道，当我触摸一节连接一节的铁轨时，我是在把我自己和这新的国家连接在一起，是在建造我自己走向新生活的坚固的道路。”[42]

努力从荒野中获取广阔的安居之地，并不卑鄙。正如亨利·巴格比提醒我们的，那种建设激情有些保持了下来，成为反对把荒野地区置之不理的力量。[43]它以其全部富于青春活力的热情，激起了华莱士·斯特格纳所著《安宁角》中一个男主角的感情。建设热忱赋与奥利弗·沃德几乎无穷无尽的心力和机智。最终导致奥利弗屈服的不是土地崎岖不平，而是人事变化无常；也不是贪欲促使他坚持不懈和发挥机敏创造力。有如他的孙子若有所思地说：“他不

是追逐财富的那种人——正是争着发财的心态使祖父厌恶开矿生意。他们是制造者和实干家，他们想把得来的一块荒野之地变成文明之家。我设想他们是错误的——他们的整个文明都是错误的——但是他们和卑鄙或贪婪毫不相干。"[44]

错也好，不错也好，反正那种文明——现代的文明——已经到了它的尽头。米尔沃基铁路过去跨越大陆，并且取道蒙大拿州，经 34
密苏拉城，沿克拉克·福克河而下。今天米尔沃基公司破产了；它的铁路线已被夷平。北太平洋公司必须与大北公司及柏林顿公司合并。但即使这个庞大系统也发现它通经密苏拉城的南线，负担过重，无利可图，便将它卖给当地商人了。北太平洋公司留给密苏拉的主要遗产是对它的供水的威胁。50年代后，当火车头不用蒸汽转而使用柴油时，好几万加仑燃料流洒在铁路调车场。这些柴油渗透到土壤里，现在则飘浮在地下水面。杀虫剂、油漆和各种溶剂都渗到社区的饮水水源。[45]

铁路建设并不是现代性在美国大陆上的最后破坏。50年代后期，联邦政府开展连接州与州之间高速公路系统建设：1－90号公路通过密苏拉的一段，大致和铁路线平行。一条4车道、全封闭高速公路，是比一条铁路更宽得多、更为巨大的建筑物。因此高速公路建设比它先前的铁路甚至是更富掠夺性地侵扰土地，尽管这种建设得利于重机械和先进的后勤，使劳工工作较为轻松。国家选定发展空运，密苏拉为适应喷气式飞机扩大了机场。当然，空运航线比起铁路和公路来不那么有形、显眼，这种运输在这个大陆上已是无处不在。现在任何地方都躲不开飞机引起的刺耳的大气噪音了。这些侵扰和建设的伟绩已就，将不再重演了。可是，我们已

经在这块土地上找到我们安宁的角落了吗?

方法上的普遍主义

在其初始阶段,战胜自然的活动还是成千上百次比较有限和孤立的侵略战争。驾驭和支配自然的精神普遍深入,可是成果各种各样而且分散。随着征服、掠取不断增加和巩固,大规模的综合一体化就十分需要了。培根的侵略性开始需要笛卡尔的秩序加以补充。最后,笛卡尔主义通过科学和工业表现自己的权威。

35 科学开始揭示并且传播热与能之间以及气体压力与体积之间的普遍的规律性的关系,从而阐明、证实并且大力推广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通过直观或反复试验法已取得的成果。[46]在工业中,笛卡尔的秩序也不容置疑地出现以满足许多甚至一切结构的需要。这种需要来自培根艰苦努力的规模和力量,它再也不能受共同的和传统的理解或认识所遏制。资源太不稳定,机器太昂贵,产品太丰富,交通太扩展,市场太变换无常,不能用直观评估、信用债券和局部调整指导了。现代的反应就是建立合理的、机械的和包罗一切的设计,今天我们称之为公司。[47]和蒸汽机一样,公司在许多线的交叉点出现,在急迫需要与独创性、在空想计划与增值改进的交叉点出现。公司的历史复杂而无规律可寻。[48]但是,加以反思,我们能够在产生的结构中,辨认出笛卡尔方法的模型。

在《方法谈》中,笛卡尔用 4 条规则解释他的方法:抽象的规则;分析的规则;重建的规则和控制的规则。[49]面对一个问题,我们必须首先从它那里抽出身来——往后退一步,从远处怀疑地审视

它。人们也需要将这问题本身抽象——把它从它的关系域以及我们暗自的理解中分离开来。为要把这一规则应用于工厂和商业组织，人们必须不拘泥一揽子的、常见的管理安排，要探问个人的和家庭的联系所及范围，探问一个人同时做所有者、操作者、记账员和商人，其效率如何；人们要考察可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附近的老主顾的经常需要，以及由于季节、需求和伙伴关系而变化的工作效率。[50]

笛卡尔方法的第2条规则，要求我们把目前的问题剖析为它的最简单部分。因此，早期的现代经济一揽子习惯作法，必须分为若干职责：法律顾问、财务人员、审计员、采购人员、工程师，等等。[51]那些实际上无法分开的过程，必须通过财政、统计以及其他 36
的分析措施或步骤，从概念上加以分析，然后用图表、曲线、账目、分类账和档案等显示。

第3个规则指示我们，从若干要素开始，由简而繁，建造一个新的大厦。[52]在公司经济中，从概念上说简单的和有指导作用的概念，是合理组织的思想，这种思想尤其逐渐被从上级领导到越来越多的下属单位所接受。[53]结果便形成等级制，最高层是董事会，最低层是班组。这样一种结构之合理的和机械的功能，与机器的功能是相似的。[54]

第4条即最后一条规则，要通过归并等办法对关系重大的事情进行控制。在公司领域，必须管理控制一些方面。要通过横向合并、购买企业应对竞争威胁；对资源和供应的不稳定，应纵向地把原材料和供应公司，归并入公司结构。类别繁多的需求所表现的怪异现象，可以通过合并广告与销售机构加以控制。暂时地，命

运的无常是要通过研究与发展、长期计划以及财政自足自给，加以掌握的。[55]地区时间的无限多样性，是通过建立 4 个标准时区解决的。[56]最重要的是，公司本身可以说是世界标准时间的纪念物。公司建立以前，工商企业是随着个别家庭的命运或者合伙人暂时利益的兴衰，而或起或落的。与此相反，公司则是具有永恒生命的法人。[57]

公司组织是现代主义对这新世界自然和社会景象的开放性作出的反应。公司通过其井井有条和包罗万象的组织，能够动员并且整合所需的巨大财力物力，用来征服一个据说是极为开阔的大陆。与此同时，公司给一大群个人同等地位，以积聚凝聚力，这些人已经背井离乡，迫切希望建立新的社区或社会。在曾经保有并且仍然保有自己社区的欧洲，现代的技术有时通过共同理解、相互
37 支持与彼此协作，得以更灵活和分散地发展起来。[58]在美国，最复杂和持久的通过合作协议稳定铁路产业的种种努力，终于落空了。[59]

公司的创造力在于它将人性和技术、个人希望和大机器融为一体。这种创造力在公司的生产线－管理组织中，完美地表现出来了，在那里，公司之界定明确、结合在一起的部分，其全部责任被委托给一个人负责。在生产线上的人，由职员协助，在公司的等级制中占一地位，并且对他的(或她的)特殊领域，有广泛的指挥或管理权。[60]同时，这人在等级制中有晋升的前景以及能指挥比以前更多的公司事务。就这样，个人与公司认同，反过来，通过他们个人的努力展示公司的同一性。这种融合在公司等级制较高级官员的经理间最为密切，而这种融合力量在较低等级劳工间以及更高等

级董事与股东间，则越来越减小。[61]各大公司已经成为美国社会中无孔不入的社会一体化力量。从它们在这个国家经济中的分量，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它们是多么成功。虽然这些大公司尚占不到全部公司的 10%，它们却控制整个经济的一半。[62]

公司的这种合乎历史时宜的大量出现，使公司的结构看起来似乎是铁一般的、合理的必然结果，仿佛现代的规划只能以这种形式实现。但是，这是现代的欺人之谈。工业经济是能够用完全不同的方法组建起来的。[63]无论如何，当我们走近后现代的分界线时，公司的结构正在衰退。过去曾一度是个人性格认同框架的东西，现在其自身正经受性格认同危机。[64]

意义含糊的个人主义

当过渡到现时代，人们对神和君主政体之为公共秩序的基础感到怀疑时，洛克提出个人的主权是权威的根本。尽管培根和笛卡尔给与现代的遗产是相当明白易懂的力量，洛克的个人主义则一直是件混乱纠葛的事情。 38

洛克以个人主义当作批判旧秩序的有力工具。但是，我们怎样使分散的、自主的个人组成为包罗一切的、有约束力的国家呢？为解答这一问题，洛克诉诸于粗略构想出来的权力，这种权力意义非常模糊，从它的多种多样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自然状态、自然法则、理性法则等。[65]尔后，个人政治的不完全性以及这种补偿力量的模糊性，已经使个人主义成为令人烦恼的概念。

在洛克的词汇里，很少见到“个人”一词，“个人主义”一词则根

本没有。洛克一般是谈及“每个人”或者“人人”。“个人主义”一词是 A.de 托克维尔杜撰的,当他在 19 世纪初研究美国民主制时,他感到不得不使用这个词。[66]然而,不完全性和模糊性并没有阻碍个人主义的发展。事实上,个人最初看来似乎是执行现代规划的自然补充物。个人是企业的创始人和其成果的受益者。[67]这两种作用的前一作用已作为强健的个人主义被牢牢固定于美国人的意识中;后一作用导致在商品消费中的诡秘生活。我愿意称这第二种作用为享乐的个人主义。

在托克维尔看来,其特点非常凸显的美国人的个人主义,也还是避免不了模糊性。在这个国家的生活中,喜欢祈求并且时常祈求的强健个人主义,不仅有个比较软弱的享乐的兄弟或姐妹;而且,强健的个人主义和享乐的个人主义两者,既揭示又掩饰现代规划的性质,尤其在美国实现的现代规划的性质。这也还不是模糊性的终了。拆开每一被分解的合股线,似乎还需要更多和无穷的分割。

坚强健全的个人形象,使我们回忆那些面对荒野大陆、激励而起,做出机智、坚韧的超人伟绩的人们,他们经受雨打风吹的面庞和坦率耿直行为,显示了他们争战这块土地的雄伟风貌。测量员 E.吉列特、工程师 J.L.哈利特、承包商 J.H.凯纳、工人斯托扬·克
39 里斯托——他们全都是坚强健全的个人。没有他们,现代规划绝不会在这大陆上如此蓬勃迅速地发展。

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这些坚强健全个人的儿女们,在他们选择的私人生活方式中,继承了安逸享乐的自由——尤其是几近随意而行、到处活动的自由。1889 年,J.罗伊斯,当时是哈佛大学教授,

有人请他“描写一下加利福尼亚的主要自然景象，并且指明它们与这地区的生活及文明的关系。”罗伊斯认为，引起听众注意的最好方法，便是设想带领他们进行一次从密西西比河到太平洋沿岸的旅游。自然，这是一次乘火车的旅行，旅行的舒适和快速使罗伊斯深深感动：“今天这么快、这么容易进入的地区，昔日是一横越大陆旅行的目的地，从密苏里河出发常需要历时6个月，而且还要冒经常发生的种种危险。”[58]

从那时以后，流动性和商品更增多了。今天很少有人会认为出门乘两三天火车可算真快真容易，因为乘喷气式飞机几个小时就够了。同时，安逸舒适也不仅仅在于横越空间的享受，而是在于能在社会领域内毫无阻碍的活动。强健的个人主义的继承人认为：他们结婚或不结婚；结了婚生孩子或不结婚就生孩子；若他们不想再在一起生活，便各走各的路等等，都是自由的，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他们是挪威人的后代，但对意大利文化颇有兴趣，他们能转而喜欢意大利式烘馅饼、帕瓦罗蒂*和《道路》**。如果他们不喜欢他们的耶稣教教养，他们可以改信天主教或佛教。

我们已经从公司实际使用笛卡尔的普遍主义中认识到，个人主义者对现代的说明是片面的。虽然公司经常是由杰出的个人建立和组成的，但成熟的公司却把个人改变为无名无姓的管理人员和工人。现代的人所共有的意见似乎承认个人主义的界限，并且区别私与公，区别个人自由处理范围与集体管辖范围。但是，这种

---

* 帕瓦罗蒂(Pavarotti)，当代意大利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译者注

** 《道路》(La Strada)，意大利著名影片名，费里尼(Fellini，1920－1993)导演，获奥斯卡最佳外语影片奖。——译者注

公—私的区别远未能明确个人主义的界限并加以澄清说明，它本身在现代规划中究竟把权力与责任置于何处的问题，差不多是人
40 为地搞得一团糟。首先，公与私之间存在着两种背道而驰的特性；我们可以称之为经济的特性和社会的特性。每一特性均标示个人主义发挥作用的领域。社会的特性把私人领域划定为享乐的个人主义范围；经济的特性标明私人王国是强健的个人主义将可充分发展的领域。实际发生的情况是：社会的特性会掩盖享乐的个人主义的衰弱，而经济的特性则利用强健的个人主义来证明现代经济的暴力和不公正是合理的。

这种社会的特性源自于家庭生活和群体生活之间的古老差异，前者的特点是亲密、幽僻，后者特点是较为公开、涉及面较广。[69]在现代时期以前，这是一种很灵活的区分。随着季节和节庆有规律的节奏，人们的生活从家庭的改变为群体的，是很自然而容易的事，如此循环往复。在公众关于欧洲文化的回忆中，乡村群体标明这种生活的地区边界，教堂提供它的中心，贵族构成它的权威。直到今天，我们共同的渴望仍然被乡村群体中可观察到的个人生活，被宗教和封建庆典活动的充满欢庆气氛的壮丽情景所萦绕。[70]我们对雅典以及罗马共和国有类似的回想。

中世纪的私人生活与公众生活的有机联系结构，任何地方都没有突然或完全地割断，它的残余形式留传至今不曾泯没。但它确实在现代早期爆发的文化和政治冲突的大火中逐渐焚毁了。工业主义，培根的幻想的遗产，开始破坏乡村生活的本质，启蒙运动、笛卡尔和洛克提倡的新方法、新观念，开始胜过教会和贵族在文化上具有的权威。

18世纪在伦敦和巴黎出现了公—私生活的新构型。这种生活的主角是新发迹而自信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分子能够迈出他们隐私的家庭，进入不自然的公共庆祝场合，穿着入时，谈吐优雅，在公园和大街上，在剧院和咖啡馆内，扮演各自的角色。[71]但是为了这一成就，资产阶级曾从旧制度的文化宝藏中借来大量的东西。41
可一直未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取得那种将是民主的、现代的公—私生活之和谐发展。

当然，美洲大陆从来没有受中世纪生活结构的束缚，可是早期的开拓者却把中世纪晚期的风俗习惯和组织结构带了进来。在许多情况下，拓荒者生活的艰难困苦以及征服这块土地的过度匆忙，使人们无暇在新世界重建旧世界公共生活的魅力。但是甚至在西部最荒凉、刚开发的新拓居地，定居者立即共同努力建立一所学校和一所教堂，它们是公共生活的有力中心。

然而在19世纪，公私之间的有机交往不断遭受压力，终于被破坏了。破坏是随铺张炫耀而来。正是在这一时期，商业大厦、图书馆和歌剧院纷纷建立，成为公众能在那里聚集、消遣、娱乐的重要设施。但是坐满这些地方的人们已经变得沉默不语，没精打采，心灰意冷了。他们不再是公开展示的演员和艺术家了，已开始变为由专家为他们制造的各种商品的领受者和消费者了。[72]

各铁路公司在改变公共秩序方面起着最主要的作用。它们建起极堂皇富丽的公共建筑——既有蜿蜒广阔的铁路网，又有巨大豪华的火车站。纽约市的中央大火车站，已成为数以千计的人们和数以百计的设备聚集与汇合的标志；它也变为建筑的宏伟的象征。[73]

在每个城市，不论多小，都可以看到一些这样的东西出现。更准确地说，铁路车站的出现，差不多是每一城市在这大陆上赖以存活的条件。铁路不仅带来了商业繁荣，而且也汲取了沿线周边农村文化的生机。有铁路为之服务的城市，车站变成了好奇、娱乐的中心，它代替了学校、教堂和城市中心区，成为公共生活的中心[74]。

不过，这种铁路车站的欢乐缺乏实质性的中心。它的主要目的毕竟是作为工具或手段；它是为了交通运输，不是为了庆典。当有了更快或更方便的交通运输工具时，铁路和它的车站就被舍弃了。[75]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公共生活的显著建筑物衰落了，这本应使美国人对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的失衡保持警惕，但这个问题，由于公共生活空间比修建铁路时发生了甚至更迅速、更彻底的变化而被遗忘了。连通各州的公路横向地重塑生活，多层高楼纵向地重塑生活。

42

这些建设在规模巨大和充分发挥工具作用两方面，都远远超过铁路。作为工程上的伟绩，它们控制公共空间，纵令不是窒息它。尽管我们不喜欢它们，可它们使我们感到不胜惊奇。它们之所以存在完全因为是一种工具——移动与储存的工具。因而20世纪末期，美国的公共领域已经变得既过度膨胀，又发展滞后，既过度发展它纯属物质的存在，又缺乏内在或决定性的尊严，丧失了节庆与欢乐。[76]

近现代公共领域的豪华，已差不多发展得远远超过私人领域。可是，既然公共领域显然是工具性的，它需要休闲与消费的私人领域成为它最后的补充物。现在隐私已被当作意指私人领域的本质的词了。它的特质在它的法律背景中看得极清楚。如今我们感到

隐私既特别值得想望，又常常受到威胁。这种紧张关系自然已引起讼争，导致到最高法院打官司。但是宪法中并没有明确地提到隐私。为保护隐私，法院必须在《人权法案》的界限不明部分，找出这样做的根据。[77]

不只存在着为什么说隐私应该加以保护的问题，而且首先就很难说清隐私是什么，以及哪些事情会构成对它的干扰侵犯。毫无疑问，隐私与自治权和个人自由不同。因为可能在所有个人方面给某人自由，却由于窥探或偷听而侵犯他的或她的隐私。并不是对个人领域的任何侵扰就是侵害隐私或独处。有一些干扰，例如不想闻的气味或不想听的喧闹声，不过是令人讨厌的东西罢了。[78]

沿着这些思路推理，托马斯·赫夫把作为自由的隐私概念与一些侵扰分开，因为它们会导致无理由地判断个人隐私领域已受到侵害。当然，我们最近的亲属，他们自然是我们个人圈子的成员，以及我们已邀请加入这圈子的朋友，他们有资格评判我们所做的 43
任何事情。但是任何别的人未经我们允许，都不能这样做。[79]

这种隐私概念，在现代以前的环境中是狭窄的，不会引起兴趣的，在那种环境中，工作和庆祝活动相互关联的本质，反映在家庭和社区的较大连续性中。家庭和社区的道德标准是一致的；家庭为了娱乐与庆祝活动依赖和公众的合作。但随着现代繁荣以及自由的产生和逐渐结合，这些共同联系逐渐被看作负担，并且从此以后便被消除而让位于享乐的个人主义，无限享用消费品或商品。赫夫称之为隐私的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消费共同确认为自由权的行使，这种自由权会受到评判干扰的阻碍。被谁干扰？赫夫谈到私人领域是“我们和家庭以及朋友相处生活的那部分”。[80]但

是,我们越来越不考虑我们的朋友、父母与配偶的评判了。在极端情形下,隐私领域在每一情况下,都是被一个消费者所占领。

我们正照直地向那极限行进,并且在此过程中我们已改变了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习惯。我们周围事物的变化在 1986 年集中展示出来,当时消费者协会在回顾《消费者导报》出版 50 周年之际,从大约 10 万种产品与服务中,选出那些"使我们生活革命化"的 50 件,[61]并在杂志中加以评述。最初看起来有那么多种多样的项目,最后很顺当地分成 5 大类:舒适、方便项目(15);健康、安全项目(13);运输项目(11);娱乐项目(8);教育项目(3)。这些产品与服务总的效果是消除或减轻生活负担(过去我们指望家庭与社区给以帮助和安慰来消除或减轻这些负担),给我们以追求目标时的个人机动性,使我们能随意地享乐。从按英文字母排列出来的前 10 个项目来看,上述情况是显而易见的:

	air conditioners	空调
	air travel	航空旅行
44	antibiotics	抗生素
	Austin/Morris Mini 1959	奥斯汀/莫里斯微型汽车 1959
	automatic transmission	自动传递
	black and white T.V.	黑白电视
	color T.V.	彩色电视
	compact discs	激光唱盘
	credit cards	信用卡
	detergents	洗涤剂

个人主义还表现在日常生活习惯中，日常生活习惯是与这种越来越舒适安逸的环境相一致的。个人主义最为明显地反映在我们如何使用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即我们的闲暇时间上。闲暇时间是指：当我们做完工作，照看完我们的子女，料理好我们个人的和教育的需求，为各种组织服务完、款待完朋友以后剩下的时间。考察闲暇时间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发展变化，我们发现，从1965年到1975年间，闲暇时间增长10%，增至每周28到29小时。[82]闲暇占我们醒着的大部分时间，多于工作（一般每周约26小时）、家务劳动（15小时）以及一切其他事务（21小时）的时间，需个人照料的事情的时间除外（78小时，包括睡眠）。[83]

闲暇时间80%是被动的消费；因为是被动的，闲暇基本上是独自度过的。[84]看电视占闲暇时间60%，电视可以使人方便地享有不受干扰的自由，很有诱惑力，因而也越来越吸引我们当中技术水平较高、受教育较多的人们。[85]听音乐与读书这样的活动，本质上和看电视一样是私人爱好，占用了大部分剩余的消极闲暇时间。[86]我们每周仅有两小时的会话才是消极的、共有的闲暇时间。[87]

在闲暇中，个人主义似乎接近于一个半多世纪以前托克维尔预见到的极端隐私生活。在这里，个人主义迫使人“永远依赖他自己单独一人，并且最终有把他完全禁锢在自己心灵的孤独中的危险”。[88]但是，我们已经狡猾地把这种孤独的悲凄藏在公共领域的辉煌炫耀背后，藏在司法对隐私的复杂精巧解释之下。有嘲讽意味的是，正当享乐的个人主义似乎终于被归结为对它并无异议，并且受到保护免于大家检查时，新的疑惑与思想认识的分歧出现了。似乎人们对他们最恣意放纵于其中的东西却很不欣赏。一般说 45

来,他们觉得,个人之间没有互相交往的活动并不令人满意。并且,特别是电视,被认为根本没有内在的益处。[88]事实上,就在看电视增加得很快的这 10 年里,抵制电视或拒绝看电视的现象也增多了。[89]

1975 年以后,被动的闲暇时间似乎没有增加,工作时间也没有进一步减少。实际上,看电影已稍减少,互相交往性的空闲与对话,至少通过电话,已经增加了。[90]但是整个情况并未改观。对私生活安逸享乐的追求,还是既强烈又遭人嫌。虽然如此,工作,这一强健的个人主义传衣钵之物,看来是很受尊重的。[91]

那看来是很自然的。工作是困难的、严肃的、建设性的;闲暇当然是安逸舒适的,纵然不是寄生的,也许是没有价值的。工作就要精力充沛地与现实接触;工作就是要获得金钱与财产。关于劳动者,洛克说道:"那么,他从自然所提供并留之于其中的状态里,取出来无论什么东西,他已经把他的劳动与它混合了,并且已把他自己的某种东西加入其中了,从而使之成为他的财产。"工作的男子与工作的妇女,有资格得到报偿和尊敬。上帝,洛克说(他也可能是说自然或理性)把世界已给了"勤劳、有理性的人使用(并且劳动是他的权利),而不是给爱争吵、好争辩的人们去空论和贪图"。根据我们对他的理解,洛克是在谈健全坚强的个人,他们在寻求征服一个生荒大陆事业中的满足。美国是自然状态的世界的典型例子,是赋与人们的机遇与任务,因为,洛克告诉我们:"初始之时整个世界曾经是美国。"[93]

个人通过他们的劳动从自然采集的果实,正如洛克所说,变为他们的"私人权利","为他们私人使用而占有。"[94]这个国家,为保

障个人勤劳活动和享受他们劳动果实不受阻碍，一直积极地为个人经济努力划出广阔的私营部门，并加以保护。

这样就使我们看到经济上的公—私区分。显然，这种区分和 46
社会的区分并不一致。如果我们同意称有社会部分特点的为“领域”，那些有经济部分特点的为“部门”，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大部分私营部门是在公共领域之内的。私营部门远在空旷之地，居住集中，管理严格——与洛克描绘的田园般状况大相径庭。特别是近年来，私营部门似乎在重重报偿“爱争吵与好争辩人们的空论和贪图”。

私营部门既不有助于自决自主，也不有助于同自然的充满活力的融合。年轻人并不把市场看作创造性的自我实现之地。相反，他们想在这庞大的经济机器中，寻找可能插入他们劳动的夹缝。如果他们抱负不凡，他们会殷切地这样做，当他们无助时，他们会愠怒地这样做。一旦他们找到工作，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是土壤、岩石或森林，而是无休止的技术设计、监督者和无名顾客的种种要求。他们当然找不到在他们工作的勤劳、合理性与他们劳动报偿之间的任何自然平衡。

那么，为什么我们还坚持要极力称赞并且捍卫私营部门呢？为找到答案，我们必须更仔细地考虑将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分开的那条界线。传统上，认为公共部门由3部分组成。第一，政府及其机构、官僚政客与全体职员，他们制定、执行公共政策，直接为政府3个分支部门服务。第二，属于国家的某些生产商品与服务的手段，例如木材、放牧地带、教育系统、全国气象服务，等等。第三，社会资源混合组成的部分，它们是政府为公益事业，通过私人企业

收集和消费的，例如，拨给私营建筑公司修筑与维护公路的税款、拨给私营企业生产军火或重建公用林地的税款。其余经济部分组成私营部门。

公私两部门的界线，在不同国家其划分有所不同。在欧洲各国，铁路是在分界线公共的一方，而在美国，它们属于私营部门。不过，虽然我们的铁路是私有的，若是没有公共支持，也不会像过
47 去那样迅速广泛发展。[55]现在，政府通过立法严格控制铁路系统的福利——确定税额、金融交易、工作条件、环境影响、运费，以及分配给相互竞争的运输方式的比较利益或负担。

这些论述阐明了 J.K.加尔布雷思 1967 年提出的一个较为广泛的论点，大意是说，在新工业国家中，政府、企业、工会、教育界与科学界，仅仅组成紧密结合的一个系统。[56]当然，这并不是说，新工业体系不能有机能迥异的部分，或者说，保有那些不同部分不重要。确切地说，要指出的是，我们这么严格划分与积极关注公私部门间界线的做法，从纯技术和工艺学的观点看，是无助于增加知识的，是令人迷惑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这样认真关注私营部门呢？我们坚持指明一大部分经济是私人的，为的是我们能够拒绝为经济弊病承担公共责任，能够夸赞个人对经济繁荣功不可没。作为公民团体，我们不愿赞同医治穷人的贫苦生活、对环境的破坏以及文化的浅薄无聊化，这些都是伴随我们高度发展的工业经济所产生的令人忧虑的事情。与此同时，对那些要求拥有他们强健的个人努力的果实的权利之富有者及权势者，报以掌声，我们是在认可我们所持的态度或我们的愿望。

个人主义这种令人恼恨的种种模糊不清，虽然它们已经在文化和道德上十分有害，但只要经济尚能有利运转和消费适度，它们在政治和经济上仍可容忍。但是最近，享乐的个人主义已变得像脱缰之马，无法控制。同时，强健的个人主义者则坚持把惟有合作才能兴旺发达的事情分开来做，这种做法正在使经济发展缓慢下来，并且，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来看，实际是在把经济置于令人苦恼的不利地位。个人主义一直是意义模糊的。现在，它终于越来越变得成问题了。

第3章　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对现实主义的批评

后现代主义是一广泛而丰富多彩的运动。我的目的不是要考察、分类研究它。[①]我使用这一术语标示两个时代之间正出现的分界线。我从不少作者那里已经认识这一分水岭，其中有些人会欢迎标明他们的著作是后现代主义的，另一些人则会因这种称谓而恼怒。但对我的目的来说，重要的是：他们已帮我弄明白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一个时代的开始。

当一个时代的基本信念开始衰微，不再能在它的拥护者中激起热情时，这个时代就接近尽头了。这对于前述现代规划的3部分：现实主义、普遍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每一部分，都是适用的。我已经主要地勾勒出这一计划在它社会和经济框架中的轮廓。但现代主义也是一项智能上与艺术上的事业。为了全面明了现代精神的衰落，我们必须思考，哪怕是简短地思考也好，这些方面，既包括它们设计的概括公式，也包括曾提出反对意见的各种批评。

智能上的事业不需要介绍了。对于整个现代主义的讨论，我已利用哲学家的思想构筑我说明现代主义的框架。在这样做的过

程中，我认识到现代哲学起到的地震仪般的重要作用。诚然，哲学家有时认为他们的著作更加宏伟重要，好像有震撼天地的力量，足可夷平过去混乱不整的结构，并且具有为建设一更好世界的原则铺平道路的根本权威。

虽然这无疑是幻想，但哲学在关于人类的对话中，从来是重要的声音。哲学的主张和批评确实以各种方式支撑和削弱，揭示与掩避公共秩序的结构和愿望。所以，我们应该承认，哲学在概括和实施现代规划中，一直具有某种实际影响力。进一步说，如果它的地震仪般的重要作用，有助于读解那曾宣布现代时期形成的激动 49
兴奋的话，那么它也能帮助我们阐明现代精神的衰落。

在现代哲学中，发生了对经济事业更加激进的说法，哲学帮助我们记载它的关键特点。重组思想领域的工作，不仅是战胜与重整，而是完全刈平，并且重新从地面建起。笛卡尔是头一位想出这个规划的人。从笛卡尔到20世纪中叶，现代哲学主流不过是一系列建议，每一建议均企图在它革命的破坏激烈性和开明的重建论据力量方面，压倒其他建议。

哲学家们一直认为，这些尝试不是修正他们的专业计划，而是对现实世界的变革。他们已把思想想像为现实或实在的母体。那么，要重新阐明思想，就是一劳永逸地确定今后什么应算是实在的，什么不是实在的。使现实服从哲学家的指令，就要用其他手段追求侵略性或掠夺性的现实主义，事实上就是更激进的与不太合逻辑的手段。其激进性显然可见：即企图把矿工、移民、铁路建设者们临时在各处干的工作，全都一劳永逸地做完。哲学家们的要求显然是，一旦他们能使现实服从他们提出的有效标准以后，所有

的人类事业必将会从哲学那里,取得它的现实的尺度。②

事实上,这样做的极少。特殊的哲学工作计划大部分并没有什么结果。局外人几乎都能看到,虽然差不多一切哲学工作者都热心追求一般的现代工作计划,但即使个别计划实现了,也从未获得哲学界的一致同意。可是现代风气的革命生动活力支持了哲学规划。哲学工作者一致以新的尝试对失败做出反应,增强取得成功的决心,要更加谨慎、清楚中肯地克服以往努力的失败之处。

50 每当现代哲学在它的建设性转向时便经常遭到失败。这种思想的目的就是以无可争辩的坚实材料重建思想大厦。但是,这些结构的主要部件都证明有这样那样的缺欠。笛卡尔认为,自我应是重建的奠基石。但人们很快便提出怀疑,并且从此以后一直被置疑:自我是否像笛卡尔声称的那样牢固不容怀疑;而且即便它牢固不容怀疑,它是否能当作实在的重建始点。

批评对推动现代哲学从规划到规划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但这种批评预定的目标是用爆炸性的谴责,清除某特殊前驱者的特有主张,因此这种批评总是零敲碎打,而且具有破坏性。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这些批评才开始出现连贯一致,随之也出现了确然不同于现代哲学观念的替代物。这一决定性和要略的成果属于理查德·罗蒂,他十分细心、广泛地涉猎许多主要现代规划后指出,无论什么被倡导为有说服力与根本的东西,都一律被发言者群体的一种存疑的同意,所巩固和加强了。③

因此,笛卡尔一面倡导自我和意识作为对实在或现实开明重建不可动摇的基础,一面负责对他那个时代紊乱无序的文化做出反应,并且设法说服他的读者,要在科学革命和宗教战争的惊涛骇

浪中有一个不容置疑的停泊处。④但是一旦我们认识到，不容置疑的精确性实为个别性的同意之可疑的僵硬不化时，我们便准备赞同其他允许有许多声音的人类会话的公认标准。

罗蒂以“人类会话中的哲学”作为所著《哲学与自然之镜》最后结论部分的标题。他解释了他的选择，说道：“我间接提出以奥克肖特的著名书名结束我这本书，因为我认为，它抓住了人们讨论哲学应有的精神或特性。”⑤这一标题确实再好不过地指出了现代哲学的精神或特性，因为妇女完全被排除在现代会话之外，虽然罗蒂肯定并没想把她们排除在后现代的会话之外。⑥这一笔误，如果并非敏感性的错误的话，它正好提供了探求后现代哲学的不实特性的线索。

虽然罗蒂在他近期论著中高兴地允许在人类会话中须有女者 51
的声音，他的会话仍然是一严格的人类会话。正如罗蒂所说：“人们谈论，而事物则否。”对罗蒂来说，自然是完全沉默不语的，它只不过有幸借着人类的习俗与让步而说话，因为“自然根本没有优先选择可被显示的方法”。⑦罗蒂不仅反对侵略性的现实主义，而且反对任何承认事物雄辩似的表现力的现实主义。当一位后现代理论家，在坐有几百听众的无窗户的演讲大厅里，代表被讲堂四壁压静下来的声音，毫不迟疑宣明那一主张时，他需要施展比我们大部分人可有的敏感性和勇气。正如结果证明的那样，允许妇女参与会话，不仅丰富会话的音调色彩，而且也增加它内容的真正分量。

琼·罗思柴尔德选集《意外的解围神力》，也是对现代的侵略性现实主义的批评。⑧可是，它不只是指控哲学家大多无结果的种种尝试；它还揭露现代规划的暴力与残酷。我们从罗思柴尔德选集

学到:现代规划不单是对人类长久以来为更舒适、更安全生活而奋斗之促进,而且也是打破古代种种束缚限制的一种特殊力大强壮的攻击性总动员。[9]我们从这本书中还得知,现代的进步,在减轻日常生活负担、使之安逸丰富方面,对妇女的价值是不明确的。这些进步是减轻了家务劳动的负担,但它们也削蚀了它的社会与经济的真义,并且使它可有的共同联系机会消失了。这些进步起了解放作用,同时也起了削弱作用。[10]罗思柴尔德选集强调指出的是:表征现代与现实关系的是暴力和空虚的共在。我们在那里看到,现代规划与自然和社区的剧烈冲突,在冲突以后,无论在什么有利条件下,只要现代的稳定宁静达到它范式的样子,那里现实的力量与存在就似乎像蒸气一样消失,仅剩下空虚了。

对普遍主义的批评

我们应该记住,掠夺性或侵略性的现实主义不是完全蛮横的掠夺或侵略。它部分地是对中世纪秩序解体的建设性回答。丧失
52 内聚力与发展方向,不仅迎来了重建自然和哲学的现实的挑战,也是对人类行为的挑战。随着乡村社区和宗教的中心地位丧失的,还有农村生活习惯以及基督教圣事的庆祝活动也丧失了,它们曾起到日常生活道德的里程碑作用。一旦这些指向标记被打碎或者遮蔽,便需要另找人们涉身处世之道的新方法,某种像罗盘的东西,可普遍适用于道德航行的工具,不论人们的特殊情况如何,都照常起作用。在这种精神指导下,笛卡尔在他的《方法谈》中找到了"从这方法中推导出来的一些道德规则"。[11]笛卡尔的规则显然是对他所感到的迷失方向作出的反应,可是这些规则在设计可靠

的普适工具，在反映谨慎默许和明智计划的混合性质方面，未能竟其全程。

康德在1875年出版的《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想出一普遍的道德指南针的计划，获得了它应得到的名誉。[12]康德认为，特殊情况与动机，差不多根据定义就可以说它们都不适合作道德的指导。这种特殊情境可能暗示诚实是行动的最好方针，并且我的倾向在当时可能是有崇高理想或原则的，是直率的。但谁能保证，下一次周围情况下不会建议欺骗，并且我的态度不会是缺乏自信或羞怯的呢？

康德对此作出反应，他呼吁建立不论特殊情况如何均有效的人类行为法则——一项无条件的，绝对的命令。康德以思想的独创性机智宣告：纯粹地与特殊及偶然相反的是普遍性，它是道德行为必要的与充分的基础。绝对命令这样说："按普遍法则行动。"更准确地，它是这样说的："只按照那样一个准则去行动，凭借这个准则，你同时能够要它成为普遍法则。"[13]

这是人类理性给予人类自身的法则。既然人人天赋都有理性，每一个人在道德王国，既是立法者，又是属下。康德用这样的推理，把个人主义和普遍主义用轭连在一起，这就为自由民主理论以及它的自律与平等的理想，提供了基础。这些理想构成现代规划的珍贵遗产以及尚未结束的工作日程。无论如何，显而易见的 53
是，现代主义已经用尽了它的能力，现在凭借它自己的资源，按照它自己的概念，是不能实现自主自律与平等了。

不久，人们回答康德：他以思想空泛的高价换得普遍性；绝对命令如果没有特殊情况与默许的同意的支持，不会告诉你任何重

要的事。[14]劳伦斯·科尔伯格为恢复康德设计的名誉，曾进行引人注目的尝试。他的意见是，由追溯道德的普遍态度产生于道德发展的特殊阶段，把普遍与特殊相谐调。此外，那种道德的日益成熟，被视为从屈从于特殊与他律的力量上升到普遍道德原则的自由。特别是，科尔伯格认为道德的发展始于婴儿期，当时儿童的行为是由长辈权威的规则塑造的。一个人逐渐认识到：能够和别人商量事情；能够分担、关注有关他们的重大事情；存在着加强或巩固个人关系的社会秩序；这种秩序反过来又是建立在基本权利上的；最后，基本价值源出“整个人类应遵守的普遍道德原则”。[15]

科尔伯格详细说明这种道德发展有 6 个阶段，并且尝试通过经验研究证明，人类道德发展事实上是经过这些阶段的。[16]他声称，每个人都是从这一发展路程出发的，虽然并非每个人都达到路途的终点。卡洛尔·吉利根说：“当用科尔伯格的尺度衡量时，那些在道德发展方面显得最为欠缺的是妇女，她们的判断似乎可以作为例子，解释他的 6 阶段序列的第 3 阶段。”[17]在这个阶段，人人“关心别人和他们的感情，保持忠诚，信赖伙伴”；人人“意识到和别人共有的感情、期望及一致意见，这些比个人利益还重要”。[18]

吉利根同意这种关切和态度是妇女道德行为的特征，可是她不同意这些特征表示一种较低级或不够成熟的道德生活。吉利根发现，妇女是道德的载体，这种道德截然不同于普遍权利与原则占优势的男性道德。她一面固守这种差别的根源与原因，一面强调指出：妇女在她们的道德行为中，把关系放在规则之上，把爱护放在公正之上，把亲密放在个人个性追求之上。

54 吉利根的书是女权主义的一部不朽杰作。同时，它也是批判

现代主义的普遍主义的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献，因为它比任何其他文献更突出地证明了普遍的东西即特殊的。道德普遍主义只是整理或安排公共秩序，觉察其中优缺点的一种特殊方法。这种整理或安排有利于兼容形式与抽象的智力，有利于使特殊服从于某种普遍尺度。

男性和女性道德的争论焦点，是科尔伯格提出的一进退两难困境，即一个名叫海因茨的人的妻子病危，急需一种很昂贵药品治疗，海因茨买不起，而药商又不肯减价卖。海因茨怎么办？男性的方法是伸出手去拿普遍原则，把它套到目前的问题上，解决办法就出来了。让这原则为：生命重于财产。因此结论是：海因茨应该偷这药。

女性的方法是自己深入考虑这困难工作的特殊性，考虑偷窃会对海因茨和他妻子的生活产生的后果，探索其他不同于偷窃的方法，像设法借钱或寻求海因茨与药商间的谅解。[19]普遍主义忽视这些移情与小心照料的方法，对那些不适用于普遍原则的人类精微之处和弱点，有些苛刻，缺乏善意。

迈克尔·沃尔泽用“支配”一词来说明一种社会安排，在那里一种商品是所有其他东西的尺度，不管它是金钱、教育或生来即有的权利。如果你拥有大量占支配地位的商品，你就能通过交易控制大部分其他商品。[20]如果占支配地位的商品集中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沃尔泽称这种安排为“垄断”。根据这些定义，可以说吉利根的批评是对现代男性道德的支配地位的挑战，对它独有的要求决定道德重要性的权利的挑战。与此相反，在现代道德之内的挑战，向来主要是针对垄断，针对道德权威的集中，而不是针对道德权威的

特殊性质的。

道德普遍主义不能令人同意之处，是它的支配地位；支配的后
55 果使道德生活变得贫乏，郁闷，难以忍受。吉利根在普遍主义与支配地位的墙壁上戳出了大窟窿，而沃尔泽则证明，这墙壁上除道德部分外，还有许多部分；每一部分均是对一丰富而充满活力社会的障碍。尤其是，沃尔泽认为，公共秩序是由各种重要商品组成的，每一种商品均需要有对它的特殊评价与分配。分配福利的尺度是需要，分配教育的尺度是才能，分配荣誉的尺度是功绩，分配政治权力的尺度是领导能力。

普遍主义已经从差不多所有当代文化领域被推下台了——从数学，经由物理学与生物学到人类学、法律以及文学。[21]现在人们认为，普遍主义在一个难于控制、爱好奢侈的世界中强求严格一致的努力，是令人焦虑的、自负的，但终归是无效的。

对个人主义的批评

在学者们的会话中，普遍主义可能已被揭示为一赤身裸体的皇帝，但是在这个国家的实际事务中，以科技的侵犯性武装起来的普遍主义则已成为一种可怕的力量。坚强豪迈的人一直带领它继续前进，为之喝彩，但是，并非这个大陆上所有的人都站在个人主义风头浪尖上，也不是紧随其后。他们中有些人曾作为昔日社区分子在这里生活。普遍强大的机器和种种措施的进步侵入他们的生活，先是阵阵不祥的轰隆声，以后就是毁灭性的洪水。

在路易斯·厄尔德里克所著《爱情医药》中，我们看到了这种破坏后的惨状。[22]土著美国人对坚强豪迈的人感到恐惧或有鄙视的

心理，而且他们生活在享乐的个人主义的外边。格里·南那普什回击一个称他为黑鬼的牛仔的挑衅。从那时起，就是这个人，天赋身心强壮，命定可以当上他人民的领袖，却被判有罪只得过逃亡生活。格里的异父兄弟亨利·小拉马丁从越南战场回来时已是生活恍然迷离，精神忧郁痛苦，最后自溺终结一生。金·卡普肖，格里儿子的异父兄弟纵酒成癖，经常怒气爆发，他最后变成痴呆，被隔离在双子城。金的父亲戈迪沉溺于饮酒不能自拔，被送往身心康复中心。格里的养父亨利·拉马丁由于不慎或内心痛楚驾车闯入火车轨道，死于非命。

这些生活在北达科他州北部地区的人们，在反映他们绝望生 56
活的14个片断经历中，出现在我们面前。当他们共同的感情、利益纽带遭到破坏时，尤其更多的是男人们陷于孤寂悲惨境地，以至死亡。琼·卡普肖，那位给格里与戈迪生了儿子的妇女，也不例外。正是在该书第一段经历中说，她发觉自己半裸地直挺挺躺在小运货车座位上，被压在一个烂醉得不省人事的石油工地工人身下。她打开车门，离开运货车，竭力振作，穿过荒原和春季暴风雪，向回家的路上走去。她也死了。可是厄尔德里克却这样结束说："这个复活节下的雪比过去40年来下的都大得多，但琼像水一样轻快走过雪地，回到了家。"[23]琼在她可耻的与这白人最后遭遇以后回家，因为她已开始要从堕落中挣脱出来，清除自甘堕落的耻辱。她完全是在大雪纷飞的白茫茫旷野中结束了她的生命。

这个包了一层白人文化的世界，不能为她的强有力而雅致的美提供一个家庭。但是卡普肖和拉马丁家族的世界，并没有完全屈服于享乐的个人主义的诱惑和践踏蹂躏。当厄尔德里克著作的

片断逐步积累多起来时，男女亲戚像为其生存斗争的维管组织般地开始出现。妇女处在这组织的中心，她们有宽恕与容忍的力量，两个女族长更是如此。玛莉·卡普肖和露露·拉马丁，她们大部分时间为追求有天赋但性情不稳定的奈可特(玛莉的丈夫、露露的情人)之爱而竞争。最后，奈可特逐渐衰老死去，玛莉与露露合作了。里波沙是她们的共同亲属，恢复并且坚持奈可特的传统的爱情医药。他的最可信赖的堂兄弟，阿尔伯丁到医学院读书。

在厄尔德里克著作里所描述的美国土著人中，他们生活的激情与健康状况仍极衰弱，受到危害。现代规划终于破坏了：他们的社区与宗教仪式；他们的寄身之处与他们的手艺；他们的史话与他们的舞蹈；他们的忠诚与他们的神。不过，对于现代以前的白人文化，也完全应该这样说。它也已经丢失了它发于心灵行动的习惯。当然，两者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白人中，现代规划是受到大量舆论或至少是共谋的支持，才逐渐膨胀发展起来的。土著美国人的
57 遭遇却是突然的，是可痛恨的劫掠破坏。这一差异长期以来掩盖了现代个人主义对它自己祖先造成的文化破坏。

这种掩盖在 1985 年被一本书揭开了，即罗伯特·贝拉、理查德·马德森、威廉·沙里文、安·斯维德勒与史蒂文·蒂普顿出版的《心灵的习惯：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考察了现代规划的典型受益者、美国富裕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他们发现了厄尔德里克所描绘的那种在十分动人、串通作弊的法令规定下，人们贫困匮乏和郁闷难以忍受的环境。这些白人们也离开他们的家，变得精神失落，被剥夺了好工作，寻庇护于幻想之乡，经不起轻浮声色的诱惑，宁要麻醉疗法而放弃爱情医药。[24]

这些损失，正如作者们认识到的那样，通常被中产阶级生活安逸享乐的表面现象所掩盖，被自恃与英雄的个人主义的神话所掩盖。[57]使贝拉和他的合著者能够揭露个人主义恶果的，是他们对可供选择的其他力量、对共和与《圣经》传统的回忆和反思。那些揭露我们共同创伤的东西也提供精神更生的希望。记忆中的社区和献身精神，在社会的边缘仍然有鼓舞激励的力量。[58]这些我们必须学习去恢复和尊重。

现代时期文化争论中的普遍主义，通常是在背后充当无可非议的、而且时常是见不到的权威。当它成了人们批判注意的中心时，它的势力陡然下降了。一直难以表达的个人主义，在批判之下竟然是有伸缩性的。当然它还没有被《心灵的习惯》所粉碎或取而代之，但是这本书已受到特别广泛和热情的欢迎，这就足以证明个人主义已变得大成问题了。

对建筑的批评

在现代建筑中，华丽与卑劣肩并肩地出现和发展。19世纪后期的工厂和廉租公寓街区是巨大的、黑暗的、肮脏的。与此同时，58
学校、图书馆、博物馆、歌剧院、剧场、火车站与教堂，则建筑得颇为豪华，意思是为了公众娱乐和文明而采用传统建筑物的壮观华丽风格。建立起来的城市一直在为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与和谐而奋斗，因为它们要绞尽脑汁解决供水问题，要尽力清除垃圾，它们被纷乱的马车堵塞，被头顶上许许多多条电话线包围，并被无数煤火冒出的烟灰所淹没。这些城市仍与中世纪的那种肮脏杂乱，毫无二致。

这些城市由于汽车的催化作用,变得真正现代化了。[27]建筑家与城市设计者绝没有偏爱汽车,可是他们感到汽车的现代威力不可抗拒。甚至可以说,客车使个人能用一种普通装置来征服时间与空间。因此汽车成为现代主义的传播工具,成为授权给建筑者重新整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那些不整洁与不合理建筑结构的力量。

自古希腊和古罗马时代以来,街道和城市街区就一直是城市生活的基础。街道向来有综合的功能:生活空间、运动场、剧场、生产车间、商品市场、交通运输连接点。这样分界不清的复杂事物,从一开始就触怒了现代有才智的人,终于因课税过重以及汽车交通而遭到破坏。[28]这种情况就特许了建筑师们彻底毁弃传统的城市组织,取而代之的是独立式的矗立于中心的高楼大厦及其周围无限延伸的郊区。城市不同部分由高速公路连接。[29]

现代规划对城市环境的这种冲击,展示了遭受挫折的革命前辈的坚决热忱。在这件事情上,现代主义没有决心去摧毁古老的传统,或者征服难驾驭的自然;它攻击了它首先出生的子女,即已成长为现代创造物的城市,但它们未能具备合理与文明秩序的水平。[30]就这样,掠夺性的现实主义,过去曾毁林炸山,现在则用甘油炸药清除贫民窟,为高速公路开凿峡谷。充斥于剩余空地的仅有一种设计,称之为"现代的"或"国际的风格"。[31]正是这个名称显示了它现代的与普遍的力量。这种设计的结果具备了严格笛卡尔式
59 的纯洁性,实现了 3 – 维直角座标系,在那里,定方位已为航行学与采用识别编号所取代。[32]高层建筑已经成为建筑的普遍形式,旅馆、办公室、豪华公寓以及公共住房都适用。[33]

清除出来空地以及把许多住房高高堆在一起，本来是打算让开通的光辉充满人的生活环境。它的目标是光明的城市(la ville radieuse)。[34]但是混乱、伤害与犯罪行为充斥于这些空地；塔式高楼公寓疏于管理，衰败随之而至。侵犯行为和个人主义双双乘虚而入。当局与开发者放弃了公共空间和穷人，反而偏爱完全掌握在私人与金融业者手里的大楼建设。这公共区域衰落得成为纯粹实用的公用事业之地。[35]

现代主义时常是野蛮的，但它决不是极权主义的。它对自然与文化已造成可怕的损害，但它决没有使之灭迹。因此可以说，建筑的现代主义已深深损害、扭曲了我们的城市，但它并没有消灭它们。它已经破坏了纽约的宾夕法尼亚火车站。虽然它已经建起泛美航空公司大楼，使中央大火车站相形见绌(正如空运使铁路运输相形见绌一样)，却绝对无法把它夷为平地。[36]像智力的现代主义一样，建筑的现代主义最终将因它的掠夺性暴力，它的普遍主义的枯竭贫乏，以及它的个人主义的孤独凄凉，而受到怀疑。

在建筑中，我们目睹后现代主义最戏剧性与突出的表现。1969年，文森特·斯卡利在所著《美国建筑史》的结论中，极痛心地呼吁人们要勇敢地承认和对付现代建筑的野蛮力量。1988年该书的附录一开始便这样说："一个建筑上的革命——有人会称之为反革命——在写完前页后就已经发生了。"[37]掠夺已不反对保存与便利；普遍主义被折衷主义与多元主义取代；个人主义遭拒斥而赞许公共与公有的空间。

现代主义并没有被完全消灭。现代技术的制度惯力很可怕，令人望而生畏。更糟的是，现代主义仓促、简单化行事的作风仍有

影响力与吸引力。[38]但正像在智力会话中那样，现代主义铁一般的控制，在建筑上已被永远打破了。固然，后现代主义建筑家们仍在为取得真正辉煌业绩和关系域的完整而奋斗。后现代主义多高层
60 建筑的古典图式、装饰性涂漆绘画以及有雕塑的接合方式，通常都是米斯·范·德罗艾* 式摩天大楼的核心部分，只是给它们加了不同装饰而已。城市的环境主义不过时常为继续在愠怒、怨恨与过度活动之间摇摆不定的生活，提供更愉快的环境而已。可以明确地说，哪里企图建立公众娱乐与练习的地方，哪里的人们就感到，这些环境的中心地区是空虚的，智慧很差的。[39]虽然如此，我们应该感谢这比较温和的建筑氛围。我们面临的任务是解决后现代的模糊性，以利于筹建真正欢庆的、有事实根据的建筑。

后现代的经济

现代经济的衰退和后现代的选择余地

后现代主义在智力会话中最能表达思想感情，在建筑中最具戏剧性，在经济中最有渗透影响力。就经济来说，它也是隐蔽的。后现代主义的力量被“后工业化的”、“电子的”、“服务”、“信息”或“计算机经济”等一些可选择的标签掩盖了。可是，在现代经济的各种发展和后现代运动之间有着深层联系，这种联系能够在不同证据的层面上加以揭示。在每个层面，这种联系仍然只有以现代

---

* 米斯·范·德罗艾(Mies van der Rohe)，20 世纪杰出建筑师之一。1956 – 1958 年建造的纽约西格提姆大厅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堪称国际式风格的顶峰。——译者注

规划为背景去考虑时，才能看得最清楚。

在最显著的层面上，现代经济发展变化中的后现代特征，在那些注意到现实主义、普遍主义与个人主义侵蚀作用的经济学家的观察中，是极明显的。先看看现实主义，现代对自然的支配在于掠夺物质资源——木材、矿石、煤、石油——并且在于把它们转化为大大小小物质商品、桥梁与铁路、器具与家具。丹尼尔·贝尔认为，榨取是前工业化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制造是工业化时期占支配地位的经济活动。两种活动在后工业化经济中都未消失；虽然如此，贝尔称为加工的活动使它们都蒙上阴影。[40]从而，埃里克·拉森与他的合著者劝告我们要认清这种历史变迁，并且要高瞻远瞩，“超越物质时代”。[41]贝尔认为，侵略性的现实主义的起落在 61
公司的演变中极为明显，这种公司，先是美国钢铁公司，以后是通用汽车公司，最后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被认为是美国经济的范式。[42]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描述与此相似的力量演变：从土地经由资本到专门知识或技术。[43]土地，我们仍然说是不动产，是最有形、持久的财富基础。或者一直到哥伦布发现大陆，是可以这样说；这一发现开拓了似乎无限的土地资源，提高了为占有土地所需的价值，即资本。资本不像土地那样真实；它可以比较迅速地移动，而且作为金融资本，是相当无形的。但金融资本总在有形资产的招呼距离以内，前者对后者有权要求占有；它的权力依赖和物质商品适当平衡。然而，专门知识或技术是既无形又几乎是自足的力量资源，它能产生大量资本与商品，并不依靠稀缺的物质资源，日本已经很好地证实了这一点。

笛卡尔式的普遍主义在经济上已经在大公司中实现了,其中少数将会控制某一整个经济部门。这种公司企图通过普遍性创出稳定局面,如果做得到,就把用原料生产以及零售商业并入自己内部,如果可能,便占领整个市场,并且几乎要凭借计划策略与资本资源征服未来。但是过去一度曾为大量生产提供肥沃田地的巨大市场正在消失。最近大部分的经济增长一直出现在小型专业化公司之中;大公司已衰退或解体了。美国钢铁公司作为一钢铁生产者已名实全无。通用汽车公司的市场份额继续下降。甚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也不得不大量减缩职工总数。其余的大公司也正在改变其方法的普遍性骨架:它们僵化的等级制结构正被差距较小的等级制和更为灵活与非集中化的组织形式所代替。[44]

鉴于个人主义在现代经济中导致了一种分裂与欺骗性的生活,它不是后现代了解的重要对象。但是这种个人主义强健的与享乐的两方面已遭到谴责。强健的个人主义已为公司的自主自决提供思想上的掩护。在公司之间以及在工业与政府之间进行更多更大的合作,这种几乎普遍的要求呼声,是对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含而不露的抛弃。当这个国家的贸易不平衡与低储蓄率受到公众嘲笑轻蔑时,享乐的个人主义因为它追求极度消费而间接地受到斥责。当消极的闲暇时间增长导致一观察家沉思"美国可能正逐渐向勤劳以后的社会,而不是向工业化以后的社会发展"[45]时,对商品的喜爱倾向也引起叱责。

62

这些衰退症状有一些为美国所特有,因而人们时常在更富内涵的《衰退中的美国》标题下,加以探讨。[46]根据这一透视,美国经济的衰弱可能是由于它内部的,而不是现代主义的发展结果造成

的。当美国经济相对衰退时，其他现代的经济，例如日本与德国的经济，却在蓬勃增长。既然20世纪大部分时间中美国工商业的发展，被看作现代经济的典型例子，美国经济的衰退也可以视为现代主义的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设法发现，现代经济变化和最初形成这种经济力量之间存在的更深层的关联。[47]显然，侵略性的现实主义力量正趋松劲。这力量似乎当现实本身的阻力减小时变弱了。在有穷的世界上，使物质现实完全服从人类愿望或需要的努力，必然会受到自身的限制。最初，自然与传统构成难以克服的反对者。最后，它们终于被克服，变为顺从人意的资源。当生产与消费在现代文化中心大幅度扩大时，自然资源与传统习俗被推到边缘地区。20世纪末，中心地区与边缘地区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边缘地区日益贫瘠脆弱；中心地区因消费品充斥而膨胀起来。

石油、矿产、木材、水等资源，现在变得越来越稀少，越来越难取得了。但这不过是威胁现代技术发展的自然极限之较小危险。更加不祥的危险乃是环境脆弱得再也无力承受现代规划的冲击，吸收不了它的废弃物了。人们从对传统道德的认识中，能够观察到类似的损坏，即现代主义曾经部分地只有依赖现代规划具有的结合力与善意。[48]

经济的普遍主义，有如我们在反思中看到的，过去它的发展与 63
稳定所需要的，正是被侵略性的现实主义减少或破坏的边缘地区。普遍主义需要现代以前的文化边缘地区，甚于它需要未开发的土地与原料贮藏。显然，现代大批生产的发展兴旺依赖容易得到的木材、矿石、石油与耕地。但是它甚至更依赖迟迟未泯灭的现代以

前的艰苦朴素，即大批量生产出来的商品的庞大容器。同样地，它还依赖于现代早期巨大农业部门作为它的贮水库，一面在工业增长时提供劳动力，一面在工业危机时吸收悲惨不幸。

当公司经济日益扩展且富有成效时，它耗尽了它的缓冲地带，使它的聚集地拥挤不堪。它现在到处和它自己造成的障碍相撞：和日益枯竭的石油产地，和日益被冲刷的土壤，和再也容纳不下更多污染物的河流，和已经致富却已失去温顺的工人们，和已经饱和的市场相撞。固然，商品饱和还不是普遍现象。在发展中国家，甚至在我们社会不景气的广阔边缘地区，仍经常极度缺少赖以生存的住房、食品、药物、化学产品、器具，等等。然而，在先进工业化国家的中心地区，商品饱和预示着现代主义的薄暮和衰微。甚至半个世纪以前，似乎根本不会相信，将来会有一天我们的空间与时间都不能适应更多的汽车、电视机、厨房用具、家具或运动设备。[49]可是，那一天眼看就到了。和它一起到来的，不仅是我们物质能量的消耗殆尽，而且是那曾点燃起现代时期进行无限有生产价值的努力尝试之热情渴望，消耗枯竭。

同它自身发生龃龉的普遍经济控制，必须采取全面的控制措施，或者退到幕后。方法上的极权主义仍然是一种可能性，并且有一阵子，跨国公司被认为是它的中介。它们看来似乎是不可抗拒的有强大力量的巨兽，能够把它们的意志强加于所有国家之上。但是像任何公司一样，跨国公司是在部分地超乎它控制的环境中活动，它依靠在当地能获得的资源、运输、交通和技术人员；它受到当地税收、环境保护规定和劳动法的制约。跨国公司只能短期违犯这样的条件运行，自担风险。它无望成为国际上现代等级制公

司的继承者,但它很可能是一灵活的全球经济的通道,在那里迅速采取营运行动,使公司迁到地球上最有利的地方。

跨国公司是全球性的,但不是普遍的,并且当然不是极权的。极权主义是一种要么就全要,要么就全不要的制度。因为设置这种系统或制度负担重、代价高,它的回报———一定的与普遍增长的财富——似乎遥远而不可靠。并不是功利与合算的种种考虑,迫使人们抛弃经济的极权主义。各种花费与诸种期望总是与人的境遇和坚忍不拔精神有关的事实。但是后者正经历着破天荒地向开放性与多元主义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后现代主义划时代的标志之一。[50]

强健的个人主义,除因急需使用于意识形态以外,是真正暗指那激发许多美国殖民者竭心尽力获取成就的充沛精力与自力更生精神。这个意义上的精神、体力的旺盛,不常是英雄业绩之父,而更常是严肃不苟的忍耐力之母。在以上任一情况下,这种坚毅健全的激发力量来自对付艰难困境、有时甚至绝境的需要,并且来自诸多令人喜悦的事情:第一次竟有了可称为自己的一块土地,或自己的汽车,或能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世界上所有令人兴奋的事情。

当必要性与喜悦开始减少时,豪迈坚毅性与专心致志的努力也在减少。这个国家的集体纪律开始松弛的第一个迹象是,60 年代美国人不愿意勇敢地面对这样的选择,即是在越南炫耀军事力量,还是在国内提高福利。既要大炮又要牛油的选择,就是以未来更大的困难为代价,以避免目前的困难。其次是 1971 年放弃金本位制与固定汇率,企图回避辛苦费力的工作与纪律严格的协作,而只有这样工作与这种协作,才能使现实的美国经济,提高到和汇率

所蕴藏的美国优越性的堂皇设想相称的水平。

对70年代的石油危机作出的反应，也不够坚决。最后在80
65 年代，美国经济力量日趋衰弱，每个人都看得到了。美国虽仍拥有世界上最大、效率最高的经济，但是它的地位相对地在滑坡。60年代以来，生产力增长已减少一半。80年代中叶，在美国的外国投资开始超过美国在国外的投资，进口开始超过出口。这些趋势一直持续到今天；只要美国的储蓄率仍远远低于其竞争者，这些趋势似乎就不会改变。[51]

当然，上述评述所依据的数字的准确性是个问题。例如，生产力可以用不同方法计量，现行的计量法可能忽视了我们一些商品与服务价值的主要赢利。[5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无意中泄露我们怨恨的数字，很不可靠、不现实，因为我们已经怨恨甚大，没有从原则上修正我们对资料的概念，没有确保细心收集的资料是现在产生的。[53]虽然人们可能挑剔资料的质量与解释，并可能指出美国经济画面上有许多亮点，但我们的经济上直观事实与经验之累积的力量，是令人失望的。一般来看，我们得自数字与图表的消极印象，同这个国家中外国经济日益增长现象，以及在外国的美国人所感到的权力与自由的减少情景，甚为一致。

贪图享乐的个人主义并没有与它的同类即强健的个人主义同步衰退。向外国经济机构借钱，已经使我们能提高消费超出生产保证的水平。因此现在有双重阴影笼罩着消费。不仅早已享受不到过去曾庆贺破土的消费品的喜悦，并且也损毁了作为我们劳动正当报酬的消费的乐趣。靠借贷消费是偷偷摸摸的享乐。

不过，在今天的经济这种令人怨恨的混乱中，我们能够发现一

可供选择的、后现代的经济轮廓。因为对每一个现代原则来说，一种肯定性正在出现：信息加工代替侵略性现实主义，灵活的专业化代替方法上的普遍主义，以及宁愿要消息灵通的合作而不愿要强健的个人主义。正如后现代主义已经改变理智的争论和建筑的常规一样，后现代经济的形成也造成基本的变化。考虑到现代主义 66
绝望挣扎图存的重负，我们必然欢迎这样一种变化。不过，前述那些严峻的问题在后现代经济中，仍然未得到解决。

信 息 加 工

我们这里所说的信息，其意义最初是指人类在表述与回忆日常生活各种事物与安排上之能力的延伸扩大。一万多年以前，近东各地民族使用黏土作记号，记录哪个草地上有多少只羊，谁已将多少小麦送到谷仓等等。[54]书写和印刷的发明标志信息与传播网络增张的划时代进步，它们不但能帮助人们描绘、记忆得更多，而且能用抽象思考方法，构建机器、房屋、音乐作品和社会组织，一旦使之成为具体的东西，便会在大小、巧妙性与复杂性方面，凌驾于人手能直接创造出来的任何事物之上。没有设计、地图、表格、一览表与分类账，征服北美大陆一定会慢得多，软弱无力得多。信息构成强而有力与范围广泛的机构之骨架和生命血脉。

信息在延伸扩大人的记忆和概念的过程中，使人的心智或精神更强而有力。直到最近，不论信息是工具性的，抑或是最终形式的，力量的对比一直向人的一边倾斜。工具性信息由记录与指令组成，它们帮助我们生产与保存事物。账目帮助我们熟悉我们的财产；工程公式帮助我们建造房屋。最终形式的信息由各种文本

组成，它们本身就是令人喜欢之物，例如，文学作品与乐谱。但无论是工具的或是最终的信息，人的能力对信息价值来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人需要训练才能成为能记账的会计，才能成为应用公式的工程师。一个人需要有写读能力，才能阅读莎士比亚，要演奏巴赫就需要训练。

然而，人的有支配地位的能力，对人们能够有效吸收的信息量
67 设置了限度。等级制机构能使有用的信息量自乘一次。但是公式与资料的清晰度与流动性，迟早会开始受阻，这是由人们性格上的缺点造成的，他们是大机构中信息的保管与传达工具。

20 世纪后半叶，通讯系统网络的增长以及计算机的爆炸性发展，不但已使信息成为现代经济之必要的及有用之物，而且占有了中心与突出的地位。计算机强有力的地位，归功于它们以之交谈的朴质语言，一种只有两个字母的语言。计算机语言的这种基本上二进位特性，使计算机能够通过简单的电压变化而传递信息。仅仅借助两个符号传递信息是冗长乏味、大可扩展的过程。但是，电流的速度及它对极微小物质的存储与操作的敏感性，大大抵偿了基本计算机语言的笨拙不适用与延伸过长。因此计算机能够用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或数字的语言，准确地捕获信息，能够在数十亿电子限定的空间，存贮大量信息，并且几乎能以光速操作、传递信息。计算机能迅速检查、分析信息或情报。

最初，计算机主要用来当作数据的又大又明晰的贮存器。电子数据管理的及时出现，正好可以免得银行、保险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与政府机构等因数据过量而陷入硬化、终至瘫痪的境地。计算机帮助上述机构组织保存它们的数据并使之流动。

自然，由计算机所激起的种种希望更加宏伟。计算机不只被视为更有力的总账——信息的贮存器——而且是电脑——信息的使用者，思考与指令的代理者。人们曾希望，装备有传感器与效应器的计算机，会减轻或免除人们一切危险、困难或冗长枯燥乏味的工作，目标是自动化。

自动装置（或译机器人），就像无限供应的清洁能源一样，似乎曾是技术进步过程中一个显然即将来临的阶段。但是，人工智能的计划与强有力的智能设计，在令人惊讶或令人沮丧地冗长乏味细枝末节中停步不前了。[55]可是技术却在许多方面灵活地前进着。只要计算机的发展还不够充分复杂精致，还不能关闭从读出作业 68
（通过对它监控与评估）到指引、完成它的这一环路，就仍剩下为人们插手而提供最终控制的余地。正如舒姗娜·朱鲍夫曾指出的，[56]看起来似乎充分利用不令人满意的处境，证明是依赖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的方法。人们能够把自动装置环路可悲的中断，变为企业结构的观察窗。在窗口出现的不是操作的有形外貌，而是文本，它非常透彻地表述种种设计与过程。

当然，甚至19世纪的铁路公司，也有计划、地图、程序表、清单与书籍，它们可以保存并且用图表说明这一机构的过去与现在。可以说，没有这种文本，铁路早就陷于碰撞与混乱的泥潭了。然而，电子文本则含有更多得多的信息。传统文本提供粗糙的简短描写，而电子文本提供公司密集结构的活动图像，再者，这一图像能被停顿、加速、放大、缩小，以及随意从不同角度加以研究。

工商企业的电子文本内容非常丰富，能构成为企业运转或操作的替身现实，并且不只是现实事物的苍白、不完全的拷贝，而是

一复本或对应物，远比它的原始物更明晰、更容易了解。最后，电子文本甚至不只是现实的鲜明图像或模型；它是上面的实在。因为操作电子模型就是操作潜在于其下的实在。电脑支配整个运转或操作的机械主体。

差不多任何工商企业均能被电子文本化，并且用电子控制。朱鲍夫详细论述造纸厂、保险公司、银行与电话系统。此外，杰姆斯·鲁尔与保罗·阿特韦尔研究批发与零售商业、建筑业与服务业。[57]为了了解计算机深透与启迪的力量，请看鲁尔与阿特韦尔称之为多科塞得·格里尔饭店的情况：

> 它是个计算机化的大饭店，雇用约 59 人，坐落在郊外。在这里，计算机化也用来建构通讯联络与工作流程图。男女服务员照常接受命令，然后把这些命令谨慎地输入整个企业的计算机终端。每个命令均是在厨房打印出来的，并且一般
> 69 不允许男女服务员与厨房工作人员之间有其他联络。只能按照由计算机传递的命令准备食物或者拿出厨房。这机器向男女服务员显示出每一饭桌所点菜肴，计算机化的命令最后用账单形式打印出来。计算机系统既控管餐厅与厨房工作人员的工作，也使他(她)们按生产流程工作。这就使得，比如说，任何食物未在账单上显示便不能上，也不太可能端出顾客们根本未点要的东西。而且，据餐厅与厨房工作人员反映，他们都说，这种办法避免餐厅与厨房之间有关顾客真正点要什么东西的争吵，这类争吵是大部分饭店的毛病。[58]

令外行人立刻感到惊讶的是，这样一个传统的、个人的企业竟能使用计算机。人们听说木屑慢慢变为纸浆，然后纸张将由计算机监视，计量，整理，检验与指挥，他们几乎并不感到惊奇。饭店似乎像个有机组织，一个群体，如果把计算机插入其中，它会毁灭的。但是在这样一种业务活动中，是需要利用、制备与交流信息的，便采用计算机获得、整理与完善信息。

无论如何，计算机的用处不止于此。它能使企业各方面都公开、可见，这些方面一位经理可能会直观地了解，但常常出错。善于经营的经理知道哪个服务员工作效率高，哪些菜在哪些天、一天什么时间卖座最好；传统上，他们除去正式观察外，还依靠更重要的东西，例如支票、收据、现金出纳机、账单，等等。但这种信息或资料太零散、难以掌握，有时还不可靠。而一架计算机可提供饭店运营的更加完全、合理与容易了解的图像。

最后，计算机还不仅仅提供与图示企业的情况。它还能进入企业，改变企业。在饭店中，计算机首先进入的是：更换了那些组成社交性的联系因素，如说话声与叫喊，手势与表情，问候与便条，70
失望与感谢。所有这一切都由计算机传输装置与贮存器替代。总有一天，计算机化系统会变为企业的中心智能——一切都由计算机连接与进行。

计算机网络不但具有企业之内中枢神经系统的地位，而且也将远方与比较独立的企业，一体化为单一的有机组织。在制衣业，纤维生产者、纺织品制造商、服装制造商以及零售商店，过去经常根据直觉与希望相互彼此供货，多多少少能符合彼此的愿望，但也一直出现耽搁误时与损失等。计算机网络用共同的与不断更新的

信息把各个企业融合成一体，从而能使准确生产所需商品，对口销售生产的货物，一致同意什么纤维最适合哪些纺织品，哪些纺织品最适合什么衣着式样。用这种方法便减少了难以抗拒的远距离，难以克服的耽搁误时机会，以及难以避免的滞销与无用商品的积压。[59]

正如鲁尔与阿特韦尔指出以及朱鲍夫着力证明的那样，首先需要下大力训练工人熟悉计算机网络，阻止他们躲避它，例如仍进行人与人的交流，或仍经由传统的书面记录，获取信息，或者走去看计算机显示已溢出纸浆的大桶。一旦厉行这种训练，计算机系统便开始成为企业的中心现实；事事人人都变为它的附庸了。当然，在民主制度下，任何这种发展，若没有人们的同意或共谋，是不可能发生的。但是当美好生活的流行模式被认为是贪图享乐的个人主义时，有管理权的计算机网络的扩张便与所有人的意愿相符合，例如摆脱粗鲁无礼的伙伴、粗枝大叶的通信以及不可靠的记忆等重负，以便更快地享有更多更精美商品的幸福。在饭店中，用计算机不但摆脱重负，而且能增富。有了计算机，它就可消灭因错备饭菜所造成的浪费。有了计算机，饭店便可以进行人工控制的实验，发现顾客还喜欢什么别的东西，喜欢什么时候享用它们，以及他们对各种改进有什么反应。

71 更概括地说，计算机化的信息能使一切物质商品趋于小型，较少惰性。有了计算机辅助的设计，汽车工程师就可以自由变换、考察材料厚度，或组件结构，直到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而且，将计算机或至少将电子设备安装在汽车中，就能使我们得到最舒适、最安全、最经济的享受。[60]

甚至在与土壤、植物与动物打交道的农业中，计算机信息也在逐渐替代过度机械化、化学化对土地造成的破坏，这种信息直到20世纪后半叶现代时期终了时，才盛行起来。今天计算机化的信息帮助我们培育更高产、更抗病的牲畜与作物。它使我们能够监测天气、土壤情况、害虫活动，从而能严格适时栽种，节省农药和灌溉用水。[61]再更加概括地说，计算机使我们能够为复杂的农业环境构建明晰的模型，这样我们就能取得自然物质活动与经济收益的最佳平衡。目标准确的运作不至于大而无当，盲目干扰。

计算机化的信息可以作为联结性智能，起到组织与合理化生产过程的作用。它报告关于物质产品的情况，并且精制这些产品，使它们“放光彩”。最后，正是计算机化的信息组成支配近现代文化的消费品。在这个阶段，信息不但组织和精制物质的现实，而且完全取代它。这种信息上升于物质之上，这种“从物到思想”的运动，戴卫·盖伦特曾对之得意地欢呼：“铁、钢、钢筋混凝土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曾经是建筑新型的、富于幻想的建筑物最卓越的媒介物，而今则是软件。”[62]

媒介技术把这些信息结构变成为强烈感人的景观与声响。信息本身最终成为目的。信息代表消费的丰富性和物质的衰减情势两者令人惊恐的融合。一台立体声装置和一些光盘，占空间10立方英尺，能成百成百小时发出由巨大无比的管弦乐队和歌唱队演奏的音乐。一台大屏幕电视机和一些录像带，占据几立方英尺多的地方，可展示各大洲的景色和几世纪的历史画卷。而所有这些音响与景观都是，或至少能够并且将是最精致清新和鲜明斑斓的。

72

灵活的专业化

现代工业，自 18 世纪晚期诞生以来，它的产品面对的是无限广阔的自然空间和文化空间，只有大批量生产才能填满它们。既然任务如此明显而巨大，用庞大的、专门化的机器完成这一任务，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样，成百万收割机、缝纫机、自行车、汽车、电话、无线电、电冰箱和电视机便生产出来了。然而，在大规模生产 200 年以后，自然空间与文化空间都被占满了。商品再也没有更多的泛滥余地了。它们现在必须争夺偏僻角落与空隙，淘汰和磨损提供了替换的空场。消费者不那么大量买东西了，更加仔细挑选了。大批量生产的机器过于庞大、不易改变的专业化，对这一任务来说确是尾大不掉，非常不灵活；为大规模生产提供经济结构的大型公司，也是如此。

当然，环顾地球，仍有一些未开发的广大地区，从理论上说，它们是耐用消费品的广阔市场：东欧、前苏联、中国和一些发展中国家。但这些市场能回报的却很少。原材料已不像从前那么重要。把原材料野蛮地从它原产地掠夺，虽属便宜得多，可这对第一世界来说，已不再是能掉以轻心的问题了，因为工业化聚集的后现代时期，从环境视角来看，再也没有第一、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分界了。技术进步与消费品将不断向世界其他地域散布，不过它们将散布得很慢。这至少是近现代的技术、商品流动轨迹所暗示的。不过，后现代的危机可能是足够严峻的，从而使全球性的不平等问题能够更负责任地得到解决。

不论在什么情况下，发达工业国家这种典型的后现代经济，代

表一种结构紧密、贮备丰富的环境。经济活动日益朝寻找小空间、恰当场地与空隙发展，这些小地方充塞高度精致的与专业化的商品。卡罗尔·费根和凯瑟琳·恩格尔姐妹住在蒙大拿州比特鲁特河谷，1985年开始手工制作艺术风向标。风向标既实用又可作装 73
饰，长期在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两位富于创造性的姐妹发现了发挥“随风吹艺术”的空间，制作出精美雅致、艳丽引人、代表“海鸭、罂粟与草原野玫瑰”的风向标。她们就在其父母的地下室，没有任何资本，由她们的祖母、父亲、母亲与侄子帮助，开始劳作起来。她们真正的资本是教育、技术与善于应变的机智。人们告诉我们：“恩格尔获有动物学博士学位，曾是一位颇有成就的编织物艺术家。费根曾制造定做的衣服与户外用衣服。”5年内，她们雇用15个全日制工人，产量提高到一年为国际市场生产3.2万个，毛利增加了250倍。[63]

费根与恩格尔的风向标公司的后现代特点，即它的灵活性、低资本费用及它的精美华丽，当和另一坐落在河谷下方约50英里的企业相比较时，显得非常明显。斯通容器公司不久前在那里兴建了一座回收工厂，这一工程项目，就它使成千上万棵树木免于被砍伐而言，是后现代性的，可就其他方面而论，是现代性的；这座高度机械化的工厂，每年可将14.5万吨废旧箱子变为制新箱子的纸浆；建造这个工厂，光设计就用了几年，建设用了一年，耗资1600万元。它雇工不比风向标公司的多，但每个工人竟耗资100万元之巨。[64]

并不是后现代商品都像风向标公司的制品那样轻盈或美丽。也有德国西南部地区生产的机床，意大利中部地区生产的流行纤

维织品，美国东北部地区小型炼铁厂铸造的钢条与钢梁。[65]所有这些企业的共同点是它们的规模相对较小，资本费用低，技术水平高，灵活适应性强，以及生产专业化。这些实例说明了一种新型生产范式，即麦克尔·皮奥里与查尔斯·萨贝尔所说的灵活的专业化。[66]这种专业化并不构成全新的企业模式，更确切地说，它是手工业生产的继承者。我们一般认为，手工业生产是注定被工业革命毁灭的中世纪晚期技艺；但是正如皮奥里与萨贝尔所证明的，它
74 和技术进步完全是相容的、不矛盾的，并且事实上在和大规模生产成功地竞争，例如在那些高度分化的市场，就需要供应小型、专门、高质量的商品，它们都是由有家庭、自治市或资助人共同支持的小专业公司生产的。[67]

在近现代经济中，拥挤的市场喜欢专业化商品，全面教育能提供专门知识，家庭依然提供共同的支持。不过这最后的要素正日趋次要。先进工业国家成熟与高度关联的经济，提供充足的交通运输工具，使企业家能从一般经济环境中汇集以往只有靠特殊团体才能聚合在一起的东西。近现代物质财富丰盛，鼓励冒风险，宽宥失败，而这在较为严峻的环境中根本是不允许的。一些与灵活的专业化相竞争的典型大公司，也越来越多地在改变自身，成为新生产模式的摇篮。它们正在设法使结构不太集中，机能更多方面，从而能提供一种灵活适应性强的专业化框架。

服务业的灵活多变与专业化，比任何其他产业都明显。因为它提供无形的商品，它不需要为它的出售寻找任何空间。它需要的是时间，顾客们向来自己做的事情，它必须花费时间替他们做，或者顾客们过去常简简单单做的事情，现在要为他们服务，做得细

心又周到。手里有现金、谨慎行事的公民过去是到银行开储蓄账户。现在银行给你提供许多保障你存款获利的方法。这些可能性是如此复杂，以至于美国有 1200 万人寻求理财家们的服务，他们专为顾主咨询、操心和决断。[68]有专业人员为你的狗食、你的孩子以及你的住房的安全操心，要不然就为你文件夹的杂乱、你个人品德上的弱点而操心。[69]

服务业似乎成为灵活适应性强的专业化新范式的缩影；实际上，它常被认为完全是后现代的经济。关于当代经济很平常的老话是，我们正从商品生产经济朝着以时间为导向的经济发展。各种服务已经从 4 代人以前占总就业的 1/10 增加到今天的 3/4 了。[70]但是，这种简单的全球趋势掩盖了极为纷繁的复杂性。[71]华尔 75
街的律师们一年挣 200 万美元，他们属于服务业；给他们清洁浴室的管房工友，也属于服务业，可是挣的钱不足前者的 1/100。服务业不仅越过了这种令人沮丧的社会理解的范围，而且沿着大体上接近产品生产的维度发展。医生提供的即便是极简单的服务，也是纯粹的服务。但是，许多律师和金融家所支持的商品生产者，他们没有法律的和金融的服务，很快就会停产的。更加复杂的一些服务进入生产企业内部，并且对产品的安全、复杂性和样式起促进作用，它们对产品价值的贡献，估计平均在 75%—85%左右。[72]

商品生产产业和服务性产业之间的区别，使关注社会公正和正出现的后现代经济的决定性模式的人，感到迷惑不解。灵活适应的专业化是较好的指导者。它使我们注意看到，近现代经济是如何利用信息和专门技术对付外界环境限制，以及内部商品积压的窒息所造成的困境。

这种灵活适应的专业化的兴起，从历史上说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完全值得欢呼或明白无误地对人们有利。它在19世纪很可能就已经普遍实行了。[73]这种专业化现在能用全面管控的范式加以抑制。它将能与标准商品大量生产，以及与负责公共事业的大公司，无限期共存下去。并且它的灵活适应性应归功于临时劳动者付出苦难。无论如何，就它出现的意义来说，新的范式构成了新经济时代的标志。可是，甚至就在它清楚出现的地方，它就包含了深层的含糊不清，尚待在后现代时期加以解决。

信息灵通的合作

当报纸过去是传递信息的主要媒介时，信息曾是珍贵的商品。为使信息见诸报端并安排有序的出版，需要不少人手和很多时间。一旦得到信息而它又限于不多几张报纸之内，信息便成了权力的来源。需要等级制的组织收集资料或信息，它们的权力因占有消
76 息而大大增加了。与此相反，计算机化的信息则时常是自动收集的，偶尔才做些需要它去做的什么事情，例如接受命令，记录销数，或者使用能受电子监控的任何装置。计算机能够收集、整理和分析所有那种信息，使它适合任何具有终端装置的人之用。报纸偏爱信息的等级组织和权威的传输路线，计算机则意味着信息的共和国以及合作的网络。

计算机化的信息提倡一种新的合作，同时必然也需要这种合作。每种集体工作都需要合作。规则太容易被破坏而不能从根本上支持共同的事业。当一个新的集体工作项目开始时，例如一个工厂，规则起初是它工作的惟一向导。通常的情况是，生产开始慢

吞吞、零零散散地进行，直到逐渐增长的合作精神，反映在上升的学习曲线上，才能改变僵滞不前的状况。任何共同的事业，当它的成员置合作精神于不顾，一切严格按规则办的时候，都会无法进行。

计算机化的信息尤其需要合作，因为它也容易损坏，比较不连贯一致。计算机化信息的这种缺点与知识的弹性和融贯性相比较时，有时可以看得很清楚。[74]复杂精致的软件和自动化，呈现为一种有机的、强大的存在，人们有时认为它等同于人心智的存在。但是当这种断言超出推测与理论时，会导致将困难事务交托由知识贫乏的人照料的自动化，这样一来，大灾大难必将临头了。[75]

反过来说，当计算机化的信息深入到有远见、愿合作的人民群体时，它的透明性和力量就能最好地加以利用了。在传统的纸浆工场中，切碎机、蒸煮器、锅炉、管道、量具等，组成物质上丰富和有形的环境。它们为行动与合作提供容易了解和熟悉的具体背景。蒸缸显然满着，纸浆有一定的成形与触感，一个阀门正开着。当所有这些状况和进程用电子监控，并且作为数据收集在荧屏上时，便能看到更加连贯、清晰的运行情况。但是，任何这种文本化的表示法也是朴素的、含糊不清的。朱鲍夫谈到一起引起公众注意的事件：一个纸浆工场发出蒸缸在流溢的警报，其他数据说这蒸缸是空的，可就是警报无法停住。操作工人们和一位经理齐集在计算机 77
终端。随之而来的是种种建议、猜测、到工场各个部门去查看。[76]这样的合作和对话引起许多想法和经验，丰富而明确，从而产生进一步了解和查看的余地，指出问题所在：原来是短路。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做不到这一点；由人们组成的等级制结构则可能是太僵化、

笨拙不灵活，也根本做不到这一点。

典型的后现代公司或企业是由一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组成的，他们热情而机敏地寻找市场空隙，迅速将高质量的商品和服务布满其中。在这里，信息灵通的合作是第二天性，是繁荣兴旺所必需。而在尊重传统的结构僵硬的大企业里，则不是这样，在它们的发展所需要的灵活与合作的气氛形成以前，便引进了信息和计算机技术。在那里存在一种保持等级制的倾向或诱惑：人为地分割与分派信息，限制工人之间信息交流，使他们的能力保持低水平。[77]人们可能认为，屈从于这种诱惑会招致竞争失利，并最终招致经济灾难。[78]但如果真的会这样的话，那不是因为铁的必然性，而是因为普遍后现代的消息灵通的合作之蓬勃发展，才使经济氛围对僵硬的等级制十分不利。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强健的个人主义将对僵化和支配起到某些保护作用。

在美国，萦绕于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以特殊的恶感污染政府和产业之间的关系。[79]其他国家愿意合作的种种成就，已经迫使不甘愿的美国伙伴们采取有限的合作。但是，美国对危机与无序的高度容忍，却在阻碍采取积极与明确的互相协调行动。并且有的时候，当批评合作的人请我们描绘出协调体制的轮廓，然后他们指出任何这样的体制实行起来都是不便的、浪费的、代价昂贵的时候，现代主义会再一次且最后一次将后现代主义绊倒。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它是合作性的，而因为它是在僵硬、独断的现代意义上的一种体制。然而，支撑后现代合作的，将不是僵硬的结构，而是共同分享的信息和灵活的适应。[80]

第4章　超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的力量和模糊性

过去二三十年思想艺术与经济的发展，已经引导我们走过现代主义广阔的、一度富饶的平原，到了这样一处地方，我们从这里回顾，能够看到我们已不可逆转地高居于现代主义的无不安感的侵略性、无边无际与无拘无束之上。现代主义现在似乎对我们纵令不是太傲慢、暴虐，也是极轻率、不管不顾的。从现代主义过渡到后现代主义，反映在同情的许多相互类似的转变中：从相信明显的命运转向尊崇土著美国人的智慧；从白人安格鲁－撒克逊新教的霸权转向种族多元主义；从男性沙文主义转向多种女权主义；从自由民主理论转向共产社会主义的思想；从诉讼转向斡旋；从冒险的医疗技术转向为晚期病人设立临终关怀医院；从工业主义转向环境主义；从硬解决方式转向软解决方式。

也一直存在从光明向黑暗的转变：从开明转向独断；从宽容转向种族争斗；从自由主义转向惟我独善；从自由转向新闻出版等的检查。但总起来说，向好的方面转变已比较普遍。然而，只有极有眼光的洞察，才能够抓住这些转变的特质：硬的东西是脆性的，压

制性的,危险的,而最终是软弱的;软的东西是柔韧性的,有生气的,稳定性的,而最终是力量充沛的。这一点是当后现代一代人的出现正达到它的中点时,艾默里·洛文斯预见性地提出来的。洛文斯公开宣布他所关心的是能源政策。可是他的议论揭示了两种较为广阔的模式:一种是硬的模式,另一种是软的模式;前者只能称为突然而剧烈变动的现代主义;后者则展现了所有后现代的特点,如适应性、多样性、柔韧性、精致性、节约性、群体性、约束力和手工艺。[①]

虽然美国仍然太多地采取硬方式,但整体来说,还是听取了洛文斯的许多忠告,倾向于走软的与有益的路子。解决能源危机的硬方式大都未被采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我们集中精力考虑能源资源时,想不到一个更大的难题从我们背后袭来:即能源
79 消耗对大气组成及气候稳定造成的最终有害影响。然而,我们需要的不是回到硬的路子,而是采取较软的方式使我们的地球安然有序。

后现代主义这种转变的力量,纵然有它有益的一面,但这种力量仍不确定,因为它未能解决个人主义的模糊性问题。个人主义一词指明人类状况已丧失它的前现代的共同联系。但是,我们对于这个词所指的个人缺乏统一、确定的理解。个人曾被认为是现代规划的起点和归宿,现代规划的创始者与受益人,但是这种一致性的认识原来是一种幻想。

个人,作为创始者,过去实际上不过是一庞大的、有系统的事业的同谋,这一事业虽然建立在大多数人同意之上,却赋有它自身的外形和推动力。个人,作为受益人,最初确实是更多食物、较好

住房与更健康等好处的继承者。但从一开始同那些幸福混在一起的，则是心情纷乱不安和被剥夺选举权这一祸害。并且虽然利益仍然存在，虚弱则随着时间而过度加重了。现代人一直不愿承认：强健的个人主义之终极的不相关和享乐的个人主义之终极的虚弱，这两者正是现代规划特质产生的必然结果。现代规划方法上的普遍主义没有为个人具有的热忱与活力留有余地，它的侵略性的现实主义如此压制与驯服现实，以致它再也不能鼓舞人，使人道德高尚了。

的确，现代规划中这种严重错误，是由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界线公开地、表面上表示出来的。但是人们认为这条界线是显而易见的、不成问题的。后现代危机的根本性质依赖于是否充分考虑和重新划出那条界线。后现代主义至今没有这样做。思想上的批评本质上是向后看。这种批评为前现代的社区、《圣经》中及共和主义的传统之消失而悲叹；它把个人主义看作决定性的破坏力量。但这是指出无名的作恶者，只能从已造成的伤害查明他是谁。犯 80
过者的特性、习惯、住所和真正身份，仍在人所不知的暗处。事实上，对社区的致命损害是由集体生产力量造成的。这个人的实际身份就是消费者的身份。如果个人主义不在消费中加以辨认并加以限制，它将继续流行发展。

后现代主义对经济的批评，已经迫使现代生产企业摈弃物质上掠夺性的与方法上僵硬的特性。这种批评确实隐含地区别个人主义之健全坚强的和安逸享乐的本质。这种批评反对前者，是因为它的误导与无效果的恶作剧，而它发现，在商品消费最近已超过商品与服务的生产条件下，后者应受到严厉责难。控制消费已成

为主流派经济学家开出药剂的标准组分。但是这一做法的含意恒久不变的是:现在减缩消费之所以合理,完全是为了将来更大量的消费。[②]因此,现在对商品消费的批评变成对商品消费本身无保留的肯定,从而也是对贪图享乐的个人主义无保留的肯定。

后现代的批评还必须认识到,现代主义是由一种模式支持和增强的,它的主要特点是互相配对的东西的区分与协调,诸如生产与消费、机器与商品、劳动与闲暇、公众与私人、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手段与目的之区分与协调。这种模式,一方面培根、笛卡尔的设计和另一方面洛克的设计之间的区别模模糊糊地预先显示了。它首先在工业革命中被详尽描述,尔后,纵令不是无保留的,也已经日益得势了。这一模式构成了现代性在改变现实中已经取之作为向导的样板。[③]

如果我们同意称这一与众不同的重整世界的道路是现代技术的话,那么我们应该向后现代主义提出挑战,问一问后现代主义是否将用其他方法超越技术。当奉献于技术已结出一些它的最甜美果实的时候,提出这个问题似乎不合情理。人们很可能认为最近在前苏联和东欧的变化是公众要求得到技术的经销特许权。

81 在共产主义经济中,技术的事业是由党的干部代为经管和监督的;所有别的人都变成为中央计划内的公务员。只有党的上司才是技术领域的投资保管人。结果是,当技术的模式不能使所有人得到不被分割的拨款时,从总体来看,它便不能顺遂成功。这模式的一半发展了,达到可能发展的程度,却牺牲了另一半——生产超过消费,机器有害于商品,集体主义以牺牲个人主义为代价。如果说成熟的现代技术导致怨恨与过度活动,那么,未充分发展的现

代技术则导致更坏的事物——残忍与怀疑，内部痛苦与外部好战。当这种共产主义对现代技术的理解与误用被怨声载道的抗议而排除时，共产主义国家中人民生活的艰苦状况则被扭转，并且全球核战争的威胁得以解除了。

当人们认为技术是一种内容广泛、有特色的生活方式，并且开始要求他们的技术特权时，这些物质上好转的变化终于发生了。更准确地说，当人们竭力想达到技术与自由民主制之混合时，这些变化便发生了；这种混合构成先进工业国家的公共秩序。有理由相信，没有技术，自由民主制度不能实现。[④]现在看来，没有自由民主制度，技术也不能发展兴盛。在任何情况下，假如技术力量是良好有益的，现在能有什么理由传唤技术到道德法庭受审呢？请考虑一下前苏联、东欧以及或早或晚中国的发展前景。往最好处说，它们将总结或也采取大力发挥技术力量的做法，并且享受它新鲜果实的乐趣，这些成果是先进工业国家都经历过和留下来的。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最新的皈依者终究也将不得不面临技术的危机。

冷战结束已经加重了后现代危机，尤其在美国是如此。它已缓解了我们社会的外在气氛与内在紧张。公众不再会因为一听到 82
共产主义侵略便立即跑去工作了。我们作为非共产主义世界首领的习惯与身份，已逐渐受到削弱。虽然这也是向好的方面的转变，但它似乎更容易滑向怨恨与过度活动。因此，我们提出的关于后现代主义的问题仍是急迫的：后现代主义将是采用其他方法的技术呢，还是能够变成另一种真正更优雅高尚的生活方式？

超 现 实

工具的超现实

后现代主义,不论好坏,应该变成不同于现代主义的东西。在后现代主义初期阶段,它已经显示了两个特殊倾向。第一个倾向是,使技术纯净。在这里,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无保留地忠诚于技术,但它不同于现代主义之处在于它给技术以极细致与极复杂的设计。我称这一倾向为超现代主义。另一个倾向是,使技术发展为一种生活方式,使它为现实服务,为那些令我们尊敬我们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高尚、增色的种种事物服务。我称此为后现代现实主义。

超现代主义倾向于对后现代经济3个显著进展——信息处理、灵活适应的专业化以及信息灵通的合作——产生极度异常发展的变体。当然,超现代的倾向在关于智力争论和建筑学中也很明显,但是前者建设性不足,后者则过于坚固没有清楚展示超现代主义。一旦我们认识到经济中的超现代设计,我们也能够发现在知识分子与建筑家这些人中这种设计的魔力。

信息处理达到如此超现代的极度异常发展程度,它竟可以胜过并且代替有形的、触摸得到的现实。甚至在它极度异常发展情况下,信息处理继续以技术模仿,并且仍保留劳动领域与闲暇领域的区分。这种超现实的对劳动领域的修改,起初构成令人痛苦、不知所措的过程。工人们习惯了能触摸、可听到、有刺鼻味的宽敞环境,现在感到很难通过监测器与键盘进入不实在的计算机化的信

息世界。朱鲍夫让我们听一下一位造纸场操作人员痛苦不安的证 83
言。

> “由于计算机化，我比以前任何时候离开我的工作都更远了。我过去听到锅炉发出的响声，就能完全知道它运转是否正常。我看燃烧炉里火光颜色，就能知道它燃烧得好不好。从颜色的深浅，我就能知道需要采取哪些方法调整。有许多人也说，各种不同气味能告诉你机器远行的各种不同情况。看不到这些颜色，闻不到这些气味，我感到不舒服。现在我只能靠数目字运作了。我怕那个蒸锅，我感到，要控制它，我必须更接近它才行。”⑤

但是别人，天生更赋有朱鲍夫所说的智力技巧，开始占用信息世界，学习其中语言或文字的连贯与力量。⑥事实上，这新的现实原来是胜过旧的现实。它更充分地遵从技术的承诺，从事物的顽抗、环境的混乱与人的弱点中解放出来。⑦

当然，这新的现实是一人为的现实，可它并不是坏的替代物。它在明丽、丰富性与可塑性等方面都超过传统的与自然的现实。昂伯托·艾科与琼·鲍德里拉德已经恰当地称之为超现实。⑧按照技术模型，我们能够把超现实的工具变体与它的最后变体区分开。我们已经知道，前者是如何从后现代对掠夺性或侵略性现实主义的目的做出的反应产生出来的。可是，超出具体与容易毁坏的环境的急迫需要，是有害的。这在若干方面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工具的超现实已经吸收并消化了抽象的领域，即笛卡尔

的普遍主义遗产。为了组织与控制突然袭击现实,必须从个人的、直接的参与工商业后退一步,必须在纸上、大规模地重新创建、协调各部分的动作,因为仅凭赤手空拳袭击,现实是永远无法控制的。结果是,建立了错综复杂、影响深远的法律与金融的机构,它们使现代经济结合在一起,具有恢复元气的力量。

由于从一开始就是抽象的,这些机构注定被并入工具的超现
84 实。计算机与通讯首先使法律与金融领域更清晰易懂,更易驾驭,然后加以整合,大大加以扩充。它们在当地是这样做的,如增大律师事务所、会计公司与银行的规模并增加其业务种类,扩大工厂、医院、公用事业公司等的法律和财务部门。当几大洲的金融市场用电子连接在一起,组成 24 小时金融交易,把法律与商业部门无情地拖入昼夜不停的轨道时,超现实便进入全球的时空了。

为了解工具的超现实魅力,请考虑实际建设一个工厂的工作是多么缓慢乏味吧:先得购置工地,得到城市规划委员会的批准,制订计划,招标,清理场地。此时,自然现实与人性的不顺从不过是刚刚开始表现出来。地下水位变得比原来的预料高。重型设备操作者工会 45 分会要求停止挖掘工作,因为这些工作正由不属于工会的工人干着。至此,只做了 1/10 的工作,还得做大量的工作才能成为新制造厂的所有者。

相比之下,通过法律与金融的压价手段,获得一个拥有许多工厂的公司是多么快捷而显赫。一个华尔街律师事务所的接收专家,可以调集几亿美元,解雇成千上万工人,解除几十个经理的职务,使无数股票拥有者致富,击败竞争对手,抢在证券交易委员会之前行动,等等,这一切都是在兴奋、发狂般的几个月里干的。最

后，他们使媒体扬名，给他们自己与公司带来几千万美元的巨额财富。这就说明了，为什么这种法律与金融的超现实，尤其在美国，一直吸引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

法律与金融的超现实是个有各种门窗的想像空间，其中有电话(不但有蜂窝式的，还有有绳的)、调制—解调器、计算机(台式的、便携式的、掌上的)、传真机、调页装置等。它们以及它们信息的存储与连接仍在发展过程中，这是由对超现实尽管未言明的但却是广泛而有力的理解促成的。⑨

这种直觉力在不同解释中可以看到。一种解释揭示这种迈向 85
整体的动力是学者智能终端的设计，在那里，萤光屏连同键盘和操纵装置一起，能打开一个世界，它以前是由事实上存在的打字机、黑板架、绘图桌、排字工厂、实验室、图书馆(有些是远隔重洋)、会议室，等等组成的。据说，这个新世界“必定仅仅受学者想像力的约束，而不受人为强加技术障碍的约束”。⑩

智能终端代表试探性地实现文化上与维度上可扩展的超现实空间，而飞行模拟则代表完美实现的具体的、三维的超现实。⑪飞行模拟的组成部分是：驾驶舱，装置在活动平台上，用突出平面密闭起来，在平面上展示场景。计算机制导正在滚动或飞行的波音737的声音、力量与运动，超巨型电子计算机提供华盛顿国家机场、一座航空母舰或瑞士一处景色的映象。这种飞行模拟的真实性令人震惊，并且被这一事实所证实：从模拟中学到的各种技能，可直接引伸到现实世界。而且，因为是超现实的，模拟装置为新手学习提供卓越的具体环境；由于能完美地表现超现实空间，它突出地展示了超现实的独有特点。

飞行模拟,不像真正飞行,是容易驾驭的而不是不服从的。假定你想要练习着陆。现实会使你用95%的时间让飞机绕圈子与滑行。而模拟装置可削减这些不需要的动作,使你每小时着陆多达20次。[12]现实使你陷入时间的无情流逝之中;模拟装置允许你冻结瞬间或重新播放一件事。进一步说,飞行的真实世界与模拟的丰富性相比,是很有限的。真实的飞行,会限制你,比如说,把你限制在华盛顿国家机场。在模拟装置中,按几下电钮就会把你送到亚特兰大城或任何什么地方。大多数真实的飞行,即使不令人厌烦,也要为未发生意外感到欣慰,而在模拟装置中,你却能体验很多惊险、许多紧急情况或灾祸,想要多少都可以。[13]最后,现实世界时常是混乱的,它的轮廓、坡度与障碍都不显明,难以分辨清楚。模拟装置能把它们增大,使之清楚,提供更为明快、更加清晰的,也即极明亮的现实。[14]

86 在模拟装置中被异常清楚展示的东西,在朱鲍夫所讨论的造纸厂、银行、电话公司以及制药厂的计算机网络中,都竞相出现。[15]它也在医学上出现,并且也多是在那里出现。医学映象提供病人的超现实变体,可以任意对之探察,不必实际接触身体。我确信,医学专门系统有望人为地提供诊断的空间,它将立即准确无误地揭示一个人的疾病。[16]并且一小片据称能治病的超现实之物已经出现在医院房间没有窗子的墙上,在那里,计算机化的显像模拟通向一田园诗般景色的视野,这种景色通过程序设计可随着外部世界而变化。[17]

为了发展，工具的超现实必须保持半人半马怪物* 的形状。它的精制加工部分必须仍保持与原状部分连接；信息加工处理必须与研究、开发以及制造紧密联系。有些经济学家担心，美国工具的超现实将脱离它的实体下部，像伊卡罗斯** 那样，离地腾飞到不负责任与危险的路上去。任意脱离科学与工程学约束的超现实，就变成伪现实。现在这已成为过时的谚语了：遇到难题时，美国人请律师，而日本人请工程师。当然，除非美国重新回到肯定的（如果不是侵略性的）现实主义之尺度，那获得、支持以及促进超现实的实体结构将会坍塌，超现实本身也将坍塌。

然而，我们坚信，人们共同对技术的理解将能限制工具的超现实极为异常发达的趋势。人们仍然认为，这种超现实是导致宽绰舒适生活的机器一部分。由奇思怪想支撑的商品是技术框架内的一个矛盾，在那里，没有负担且充实丰富的生活，是需要仿照科学的确定性与令人信服的力量，采取各种安排、措施来保证的。技术的气质对这些要求甚为敏感，并且能够依赖它支持这些要求。在美国，对社会与经济的困难的容忍精神极高，恐怕更晚些时候才会发生这种变化。

---

* centaur，根据希腊传说，它胸部以上为人形，下半身为马。在荷马、索福克勒斯等人的作品中，都有关于马人的故事。——译者注

** Icarus，希腊传说中的能工巧匠和建筑师 Daedalus 之子。他父亲给自己和儿子用蜂蜡、羽毛做成双翼，腾空飞离被囚禁的迷宫，在空中伊卡罗斯飞得过高，太阳把蜂蜡晒化，遂落海而死。——译者注

87

最后的超现实

最后的超现实不同于工具的超现实，是不受现实原则约束的。为使我们对什么处于危险境地的直观更有活力，请思索一下这一实例。一位住在蒙大拿西部地区的职业运动员，有人提供给她在中西部一个可赚钱的、令人兴奋的工作机会。她有意接受，但是这样一来，她将因为不能每天经海尔盖特峡谷沿克拉克·福克河跑步，以及每周末到响尾蛇荒野短程旅行，而感到惋惜。这位雇主又进一步提供某一健身俱乐部免费会员资格，在那里，他们有安装在电视荧光屏前的踏车，使在踏车上练习跑步的人，感到自己正经由展现在屏幕上的景物移动。这雇主实际上表示给职位候补者喜爱的连续不断的崎岖小道拍电视镜头。

自然，将在这里提供的替代物与实在的东西相比，是很差劲的。往旁边一看，看到的不是落叶矮树与秋沙鸭，而是锻炼的伙伴与成套的机械装置，那儿空气污浊，充满哼唱与呻吟声。但是请想像提高到超现实十全十美的情景：色彩清晰鲜艳的全景式微粒荧光屏；随着展现的天然景色而忽高忽低、连续不断跑步的画面；洒有香水与温度控制的吹风装置，它根据阴暗、日光与季节的变化模拟空气流动和香味；扩音器发出流水激荡、鸟儿啁啾与松树飒飒的声音；监控器按照跑步者费力大小调整风景、声音、风向与连续不断跑步的画面速度。并且请设想，使用这完美的跑步模拟器的人们，都公开承认完全为它所迷、为之振奋，它赋予新的力量或生命。

在我们探求这个故事的寓意以前，让我们利用这一例子，概括一下特别清楚地显示于它最后变体中的超现实的 3 个特点。首

先,超现实是技艺高超的。技艺高超有包括一切的一面,又有排除一切的一面。它完完全全包括我所有的感觉,不像差劲的替代物那样,不只包括我的中央视觉,而且也包括我外围的视觉。并且不只包括我的视觉,而且还包括我的听觉、嗅觉、温度的感觉、本体感受等等。真正智能化的超现实将排除一切不想要的信息,例如,排除那些视觉或听觉的刺激,因为它们会暴露与超现实商品不相称的机器的在场或存在。技艺高超也意味着了无声音。

第二,超现实是丰富的。在跑步模拟器中,蒙大拿州西部地区 88
的景色有更多的动植物,更多的雷鸣电闪,更多的阳光,更深更干硬的雪。并且它将为我们的职位候补者不仅提供在密苏拉河谷跑步的机会,而且也可以围绕夏威夷岛上欧阿呼的钻石顶跑,以及到黑森林的圣欧提林跑。超现实的理想极限是百科全书式的全面性。

最后,超现实是能变通的,容易驾驭的,完全受我的欲望与操作的支配。岩石、树根、下雨和严寒全从超现实的崎岖跑步小路上排除了。不必驾车驶向小路的起点,也不必等待阳光。对路途上的任何自然特征都可以调整。从技术上说,变通性与易受驾驭包括相互作用或配合。我愿意用富有魅力一词集中形容智能化、丰富与易驾驭性。

超现实的逻辑的终极目的,可能是制造出极富魅力的模拟装置。虽然彻底实施这一计划会因不可逾越的技术障碍而失败,可是这种想法却具有让我们发挥想像力的巨大力量,并且,对此了解更多的专家们,已经预言了这一想法。微软公司董事会主席威廉·盖茨说:

"20年内,信息时代即将来临,这是毫无疑问的。将世界数据库置于你手指尖下的梦想必将成为现实。你甚至将能够召集人们拍电视、电影,你自己也参加。"⑱

全球媒体公司的董事长,即时重放装置的发明者托尼·维纳有这样的预言:

收视者将能够用电视机战胜空间与时间。某一天导演与制片人的工作将在控制室里结束,收视者的工作将开始。借助于激光图像,你将在美景中到处散步。借助于传感图像,你能够感到胜利的惊喜或失败的苦恼。"⑲

可是,即使一个不能达到的目标,也能够成为强有力的驱动力。上述那富有魅力的跑步模拟装置,从技术上讲,是完全可能的,并且引发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的生活因常常穿经原始森林和山地跑步而增光且充满活力,她是否会迷恋中西部风景优美的温
89 泉疗养地和落基山西部。当一个人沉迷于最后的超现实,濒于危险的是什么?

伍迪·艾伦在他的小说《库格尔马斯趣闻》中探讨过这一问题。

库格尔马斯是城市学院人文科学教授,因再婚很不愉快。达夫妮是个笨拙的粗人。他和他的前妻芙洛生有两个傻儿子,因负担离婚赡养费与儿子抚养费陷入困境。

他对他的精神分析师说:"我需要找个新女人,我需要尝

> 尝爱情的滋味。这看起来我不太合适，但我也是个需要情爱的人。我需要温存，我需要调情。可我再也不会年轻了，所以趁现在还不太晚，我想要在威尼斯做爱，在晚上9点互相说说逗弄的话，伴有烛光红酒，眉来眼去调逗戏谑。你明白我说的意思吗？”[20]

这不难明白。但世间的事对库格尔马斯一直是如此困苦、严峻而令人忧虑，如果真搞风流韵事，只会令苦境雪上加霜。于是他转而求助于和电子学与计算机技术以前的技术极相似的东西，即魔术。艾伦给我们描述了帕斯基(一位魔术师与超现实发生器的设计者)是如何将库格尔马斯(第一位被运送到超现实中的人)引进这装置的。

> 帕斯基走到后面的房间，库格尔马斯听见到处挪动箱子与家具的声音。帕斯基又出现了，向前推着一件放在轧轧乱响的四轮旱冰鞋轮子上的大东西。他挪动放在它上面的几只旧手帕，掸掉点儿灰尘。那是间显得低劣的中国式小屋，简陋地刷过日本漆。

库格尔马斯要求和爱玛·包法利来一次风流韵事。帕斯基让他进到小屋，扔进一本平装的福楼拜的小说，然后把门全关上。艾伦继续写道：

> 帕斯基敲小屋3下，然后猛地把所有的门全推开。　90

> 库格尔马斯走开了。就在同时,他出现在扬维尔镇查尔斯与爱玛·包法利家的卧室里。在他面前有位貌美女人,一个人站在那里,当她折叠好一些白色内衣裤时,便扭转身子背向着他。[21]

看来库格尔马斯至少有一会儿心醉般地享受他一直所企盼的所有这种消魂乐趣。

虽然如此,艾伦相信,人不能够既在超现实的又在现实的世界平静地生活。在他 1985 年拍摄的电影《开罗的紫玫瑰》中,他又论及这个问题。无论在上述小说还是电影中,当超现实的主角从超现实步入现实的世界时,当包法利夫人从小说中走出来,以及勇猛的汤姆·巴克斯特从影片中闯出来时,都突然引起危机。在短暂的舒适安乐以后,在两种情况下都产生了混乱;超现实的主角们回到他们超现实的家,而现实的主角们则被忘记了。可是真正现实的主角们却无法安于现实的世界了。库格尔马斯又在帕斯基的门前出现,"脸上带着不自在的神情"。[22]塞西莉亚,《紫玫瑰》中的女主角,人们最近一次看到她正在看一部由弗雷德·阿斯泰尔与金格·罗杰斯同演的电影。

这些不愉快的结果是产生于超现实的本质缺陷呢,还是仅仅产生于现实的主角们笨拙地擅用了超现实领域?人们可能回答说,都不是。错误可能在于艾伦对超现实事物的误解。他的各种说法不是真正可以接受的。如果帕斯基真给库格尔马斯提供一个极富魅力的超现实的话,西德尼本来会得到柔顺的爱玛,她不会想到超越她的超现实界限的。

但这是个容易引起误解的回答。艾伦是为更深的关怀与要求所驱动。他提出，现实事物和超现实事物为得到我们的忠诚而竞争。看起来，我们终究不能离开现实而进入超现实，我们也不能勉强接受现实而避开超现实的诱惑。我们应如何评判艾伦的观点呢？完全没有必要着力去猜测一个答案。超现实已经既以密集的方式又以扩散的方式侵入我们的世界了。当然，两种方式中没有一个是完全富有魅力的。可是魅力构成有用的标准，和它对照，我们能够判断当代超现实达到什么范围和程度。

电视在我们的闲暇中是最常见、占主导地位的消遣工具。[23]美 91
国96%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机；多一半家庭至少有两台；近70%有录像机；正如我们已了解到的，我们多一半的闲暇时间消耗在看电视上。[24]如果我们认为，电视是广播节目或录制的节目的总和，那么它确实达不到富有魅力的标准，因为它不是可变通、易驾驭的，也就是说不是互动性的。电视也没有达到它可能有的那种智能化程度。但是，现在正积极努力使之更智能化，提供更好的声音，在当地广播习俗允许的范围内设计更大更明快的屏幕，并且引进高清晰度电视机的先进技术。[25]最近20年随着有线电视节目的增加、碟形天线的出现以及电视录像产业的拓展，电视节目日益丰富多彩。现在差不多任何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能从几百个节目中挑选出自己喜爱的节目。

电子游戏构成容易驾驭的或互动性的超现实事物，因为玩游戏的人能进入它们，并且能参与改变事件的进程。[26]互动的方式一般仍限于用手操作，仍限于在那里很小范围地手控配合或干扰。但是在这里，也要设法发挥手的更为敏锐的触觉能力，并且也要与

头脑、脚的活动结合。显而易见,这一目标,在适应性方面是要尽可能接近主动感觉的完全性,这种完全性在智能化方面对应于接受感觉的完全性。当然,在技术的完美性能达到的更高有效范围内,智能化和强适应性趋向一致,正像在现实世界,动作和感觉大体上一致一样。电子游戏的超现实生活仍是粗糙、不自然的,但随着民用电子设备展览一个接一个地举办,正如游戏数目与种类日益丰富那样,轮廓分明的形象与平稳的动作的智能化水平正在提高。

电子化的超现实在其混合式的诸变体中,在现实与人工的融
92 合方面,更为扩散。计算机网络代表这种混合的世界。确实,人们安装它们一般都有合理的目的,也就是使使用者能彼此通讯,能获取信息和服务。计算机网络确是为这些目的服务的。[27]但是,人们也使用它们按一定程式谈情说笑。[28]这样看来,计算机网络,在窄频带之内,是完全互动性的超现实。信息或交流限制在键盘与监测器间狭窄通路之内,但在那些界限内,一个人什么事情都能说,什么事情都可以问。有 500 万用户的弗朗斯电信电视网络中,一定也有各种各样的回答者。看来这种超现实领域的互动性与丰富性,颇能弥补它完全没有智能的缺点。

一种更富刺激性的电子化现实与技巧的混合物,在 1988 年总统竞选活动中出现了。用莫林·多德的话说,它的特色是:

> 杰克·坦纳,是个虚构的总统候选人,他代表一种超现实,这种超现实可能是真实的候选人(他们时常似乎是假的)立志以求的。他的竞选口号是“For Real”(求真,有时误拼成“For

Reel”),主题的这种变换意味着:如果真实的候选人能够想出怎样在真实的讲台上搞竞选活动,那实际上就会取得突破。(仍和我在一起?)正如这个节目的政治顾问《华盛顿邮报》记者西德尼·布卢门撒尔解释的那样:“我们的目的在于一种超现实。”[29]

从那里开始,电视上超现实物的连续统一体向现实延伸扩展,在不同阶段,有显著不同内容的戏剧性娱乐:新闻事件、历史剧以及晚间新闻的有倾向性的拍摄和编辑。[30]这种对超现实界限的有效模糊,反映在了电视收视者那里,他们把自己与像约翰尼·卡森那样的明星的真实社会距离混同于这样的明星出现在他们家里时的那种亲密关系,把女演员的真实身份混同于她所扮演的角色的性格。[31]

在音乐中,现实和超现实之间的界限则完全被抹掉了。当我们静听巴赫的《马太受难曲》密纹唱片时,不会认为我们是在听什么不是真正的音乐。如果它是超现实的音乐,完美无瑕,有超自然的明朗、清晰,那就更好。真实的音乐是不是应该由活人用可以触 93
摸的乐器在此时此地一齐演奏,并且具有此时此刻的优雅气氛,这个问题很早就不考虑了。

电子学从本质上说与超现实有亲和力。电子学凭自身的力量,便满足了创造超现实世界所需的信息能量和运行速度。相比之下,牛顿物理学与有机化学则缓慢而使用不便,可是它们也一直在充当扩散超现实的工具。化学被用来减少我们的卡路里负担,卡路里是我们喜爱的真实食物的不受欢迎的附加部分。“清凉奶

油”是搅打过的超现实奶油，更便宜，更耐久，比真奶油的卡路里低得多。“清凉奶油”不需要搅打，根本没有胆固醇。为了给我们提供没有卡路里的脂肪与糖，已经采取了极多的措施。营养食品也要加工制造得更便宜、更具吸引力、更方便与更有益于健康。[32]

一旦我们睁开眼睛看超现实，它的增长发展可见于无数事例。超现实似乎是偶然地以一真实东西为榜样，并且把它的帝国强加在现实的、似乎难以攻破的堡垒之上。登山运动似乎就是对山这一现实的绝妙反应，对它陡峭的、令人畏惧的与危险的山崖的反应。可是攀登墙却用纤维玻璃做成，并且移到室内，供攀援之用；这种攀登活动有益于体格健美、方式多样，而且能经常进行。[33]

最后的超现实，像它的工具性补充物一样，仍处于联合或合并的过程。它的电子化各部分还需要整个地互相连接、调适。这里存在着技术善于利用的无限事物。超现实的电子、化学与物理的组分也将互相配合，因此，在近现代文化中，人造物或非真实物的沉积将日益密集、深厚，已经出现了充分结合成一体、相当巨大的超现实岛状之物：迪斯尼乐园就是一富有迷人魅力的王国，甚至三四天都游览不完。[34]

当我们想到迪斯尼乐园享有清洁与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好名声，考虑到它每年吸引 2500 万游客时，我们很可能变得不知如何
94 从道德上理解超现实的盛行或统治。[35]相沿成习的伦理学说准则对超现实有多大影响，消化作用对蔗糖聚酯这种超现实脂肪也有多大作用。

当脂肪酸不是像它们在脂肪分子内附着在甘油上，而是

> 附着在蔗糖上的时候，这样形成的结构使消化酶没有黏附的地方，并且开始破坏这分子。结果是：虽然代脂肪使人感觉在嘴里像脂肪，烹调中也起脂肪作用，如果你不小心把一块用它炸过的鸡腿，掉在你胸前，它也会弄脏你的领带，但在任何一点上它决不是食物。[36]

超现实本身在任何情况下似乎也不是道德问题。正如代脂肪“在消化上具有惰性”那样，超现实似乎在道德上也具有惰性。[37]当然，代脂肪能弄脏你的领带，毁掉一盘菜，或点燃火炉的火；超现实能诲淫诲盗，鼓励暴力或贬低读书写字能力。[38]但是这些也是我们在现实中发现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对道德的担忧固定在这些问题上，超现实和现实之间的界线就消失了。但是为什么坚持这种区分呢？完全接受超现实之所以令我们犹疑不决，可能不仅仅是因为我们脾气乖张，或多愁善感吧？

请再考虑一下我们开始时讲的那件事情。那位职业女选手，在极紧张的早晨训练之后，正在她喜爱的冬天景色中跑步。刚下的雪在阳光下光彩耀眼，可踩起来蛮好。一群雪雁蓦地从河里飞起。当时四野寂静无声，只有斯太勒养的几只樫鸟发出粗厉叫声。一只雪鞋兔（一种生长于北美北部的兔子，后腿长厚绒毛，皮毛秋季为茶色，冬季变为白色。——译者注）正沿崎岖小路向前蹦跳。突然树丛中发出一阵哗啦啦迅奔、猛扑声；一只美洲狮已抓住这只兔子，缓慢地奔回高山坡。山谷又变得静悄悄。一群麋鹿正在远处啃草。崎岖小路越来越高。这位跑步者在伸展全身跑动；她到了斜坡顶上；又跑了 1/4 英里，小路的起点呈现在眼前。

跑步的具体环境是现实的景色或超现实的景色，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倾向于说，只要超现实的景色极富魅力，体验就是一样的。可能是一样的体验，因为根据规定感觉的输入，在两种情况下都会是一样的。然而，在这个自明之理之下，却隐藏着深刻差别。

95 设想这位女士的跑步就要结束了。她走过小路的起点到了停车地点，进入车内，驱车直下雪白的山谷奔向自己的办公室。她感到得意扬扬，许多人在山上住了多年也从未看到过狮子。在狩猎最猛烈时能看到狮子，是罕见的幸运。她也感到幸福的是：能生活在十分宽阔的荒野又能使美洲狮自由生存的地区，能生活在适宜雪雁在北方筑巢、南方过冬的大陆上。她酷爱早冬的凛冽，这样的天气驱赶雪雁从加拿大南飞，麋鹿从高地向下移动。峰顶、山脊处的积雪一定已有 10 英尺深。春天一来，很可能有大量雪水从那里倾泻而下，整个夏天激流满河滚滚。这就是她想要生活的地方。

让我们再设想这位女士刚跑到她跑步活动的终点。这时，狭长的景色看去渐渐暗下来了，刚跑过的平面缓慢向下伸延，天花板上的灯亮起来。她走进更衣室，淋浴，换好衣服，然后她回到潮湿闷热的下午，又走在两边大厦耸立的都市街道上。真正跑步时所见所闻一切为真的东西，现在都变成不真实的了。这超现实的跑步根本不会显示她周围环境的任何情况，不会给她带来任何欣喜、幸福的感受，也根本不会是她确认她周围世界的机会。

关于实在或现实的种种传统理论，哲学家称之为本体论，正像相沿成习的道德理论那样，没有能力解释现实与超现实之间的差别。[39]有人会说，超现实在本体论上是惰性的。超现实从物质上说毕竟和现实一样是真实的。除非在超现实的时髦健身房中空气分

子的平均动能确实比较低，否则就不会有冷的感觉；除非空气确实相应周期性地予以压缩，否则就不会有雪雁或椋鸟的叫声。传播视觉信息的光波也是这样。

可是，超现实和现实给予人经验的力量则有明显的差别。要领会那种力量，我们不应认为经验是一定时间过程中感觉刺激的总和，而应是一个人与世界的突出遭遇。前者关于经验的观念与经验的具体环境没有什么关系，而后者则是人在世界之内才熟悉的。超现实与现实可能导致同样的经验，人们认为它们一样不一样无所谓，但是当超现实的经验是在超现实背景中产生的时候，经验的力量便是可以随意使用的、不连续的，也就是说，它便毫无真正的力量。超现实的阳光照射的冬日景色，可以随便由跑步者使 96
用。她能够在任何时候，无论冬天夏天，白天夜里，把它调出来。一旦调出来，她便能随意处理它——将它停放、重播，或把它换成夏威夷的秋天景色。超现实从经验上说必须和它的具体环境是不连续的，才是可以随意使用的。如果超现实深深植根于它的环境的话，那么，把它连根拔起加以替换，就会很耗费精力与时间。现实则是障碍与限制。可随意使用或处理以及不连续性是超现实魅力的标志，而魅力又是完美商品的表征。

商品，尤其富于魅力的商品，是有诱惑力的，但它们不能持久。[40]高度互动性的超现实可能会使你感到神清气爽。能完全使人轻松的种种超现实之物，通过日益精致化与侵犯性的刺激作用，会抑制空虚感的侵袭。但是，由于商品还不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我们迟早一定会走出商品领域步入现实世界。这是一种典型地令人愤恨和与沮败或幻灭的回归现实；令人愤恨，是因为与超现

实的魅力相比，现实极为贫乏；归于失败或幻灭，是因为极为贫乏的现实不可避免地坚持它对我们的要求，并且，像西德尼·库格尔马斯那样，在魅力诱人的爱玛怀抱中时，我们已完全抛弃了真实的达夫妮。[41]

现实在许多方面是令人肃然起敬的，连续不断的。技术性机器的机械性现实需要经常维护、更换与改进。饥饿、病痛或监禁的压迫性现实残酷无情，折磨得人生不如死。具有焦点的现实将我们的世界集拢在一起，照亮我们的世界。在所有情况下，都存在着人类生活和其具体环境的对称关系。超现实环境无法提供唤起人们的耐心与勇气的人们工作与幸福。超现实环境非真实、不连续的魅力引发心神分散和行无定向，二者都处于抑郁愤恨和活动过度努力之极为危险的边缘。[42]

阐释这些对称关系之间的对立，是一项既是本体论的、道德的、审美的、神学的，又是政治的任务。它是本体论的，因为它提出了什么是真实的这一问题。它是道德的，因为它能使我们看清人类行为的本质。它是审美的，因为它使我们潜心研究人类的哪些作品真正具有魅力和富有启发性这一问题。它是神学的，因为它
97 引导我们考虑恩典与神性的问题。并且，它必然成为政治的，使我们为公共秩序而思考我们应负的责任。我们要么从方方面面领会这一任务，要么完全不领会这个任务。

伍迪·艾伦希望我们考虑这任务的紧迫性与存在的困难。他建议，我们终归不能既是超现实领域的公民，又是现实世界的公民。而且，如果像库格尔马斯那样，我们一直回避这个问题，继续屈服于超现实诱惑力，等待我们的是孤寂凄凉的命运。库格尔马

斯在他最后一次进入超现实旅行时，他没有被一本小说的魔力所吸引，而是“全身心地投入了读一本旧课本《西班牙语正误》(Remedial Spanish)，当 tener (“to have”，有)这个词——一个大大的而且多毛的不规则动词——用它的细长腿在后面追他时，他正奔向一个荒寂、多石的地带逃命”。[43]迄今我们已经这样奔跑很长时间了，并且有时看起来似乎已经把这样一个世界抛在后面，而且永远失掉了它：这个世界曾一度“充满上帝的庄严伟大”，宾根的希尔德加德*这样赞美它道：

啊！最崇高的富有年轻活力的主，
你植根于太阳，
你以闪耀着的无私光芒普照大地，
在地球上没有世俗的技能会战胜你；
你被神圣的弥撒围绕着拥抱着，
你发射的光芒像破晓时分的红宝石，
你闪耀的光辉像发自太阳的火光。[44]

过 度 活 动

灵活的专业化给工业提供的模式，在它的设置与目标方面是比大公司和大规模生产优越的。可是这种模式，可能有被我们只

---

* Hildegard of Bingen (St. Hildegard, 1098 – 1179)，德意志女隐修院院长，多次见异像的神秘主义者。此诗系我知友刘国勋教授所译，特此致谢。——译者注

能称之为过度活动的工作方式推翻的危险。的确，无休无止的活动向来是现代运动的显著特征。观察家们已经看到这种活动进行的不同形式。1848 年，马克思与恩格斯指出资产阶级是现代规划的推动力。他们以无与伦比的敏锐性，捕捉到规划的似无止境、永不衰竭的能量。

98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了。[65]

这段话最为全面和概括地揭露了现代的躁动不安。尔后没有任何一代人曾感到真正有过警告。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令人迷失方向的现代主义的推动力，再一次在特殊背景中识别它。欧内斯特·荣格尔* 1930 年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导致变革的力量时，他再次发现了这推动力[66]。他认为，这次战争是点燃民主制与科技爆炸性结合的火花，引爆了他称之为总动员的熊熊大火。战争是这种总动员的第一个最明显的实例。在 20 世纪，战争不再

---

* Ernst Jünger (1895－　)，德国小说家、短论作家，早年是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虚无主义者，后来又改变为坚信和平、欧洲联盟及个人尊严。——译者注

是受限制的事情了，而是由政府决定，由军队进行的事情；更准确地说，战争把所有人的同意和整个经济的成果都卷入它的漩涡。总动员不是强加给人们的意识形态设计，而是把一切努力与愿望都投入进步运动之中。荣格尔着迷地冥思总动员，最后无根据地盼望总动员会导致德国的民族复兴。[47]

可是，在每次宣布科技大火以后，还有很多传统的与自然的现实尚未毁灭。当更多的现实化为灰烬时，便吸引精力充沛、野心勃勃的人火上加油。50年代后期，心脏学家们开始关注这种纵火狂所导致的伤亡数字。10年之后，世界卫生组织注视着心脏病的发展，担心它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人类所遭逢的最大流行病”。[48]

1959年，迈耶·弗里德曼与雷·罗森曼两位医生注意到，有一种特殊行为模式，似乎主要是伴随或引起冠状动脉心脏病的。它 99
是由紧张、无休止地倾注于形形色色、意义不清的目标所造成的综合症。[49]这种由弗里德曼与罗森曼两位医生称为A型的行为模式以及它和心脏病的关系，已经被后来的研究所证实。A型行为模式的外形轮廓或要点，被更明晰地描绘为一种生活方式，

> 其特征是：竞争性到了极点，奋力争取成就，侵犯性（有时严加抑制），匆忙，无耐性，焦躁不安。过度警惕，言语激动，面部肌内紧绷，以及时间紧迫感和责任挑战感。有这种行为模式的人，常常将全身心贡献给他们的天职或职业，以致他们相对地忽略了他们生活的其他方面。[50]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现象是过度活动的大致轮廓或要点，是通

过冠状动脉心脏病这一透镜捕捉到的。心脏病的发病率后来已经减少,可是过度活动的表征,即使不用临床工具,今天也可以察觉出来。这一事实揭示"一个过度参与的,'疲惫不堪的'人"在压力下的生活方式。[51]确实,没有疾病与死亡的真正重负,过度活动便成为人们生活方式的原型,它完全和超现实的状态相适应。

为弄清楚过度活动与超现实的对应关系,我们可以想像后者为一游戏,前者为对该游戏的癖好。现实有它无限的困难,而一种游戏总是受到比如说它的棋盘、它的纸牌,或者它的游戏场地或规则的限制,这样就可避免发生预料不到的刺激而惹怒的情况。同时,一场好的游戏或比赛在这些保护性的界限内,可以带来无限的可能性与挑战。真实的或现实的世界能够容纳痛苦与仁慈,而超现实的领域则只包含新闻报道以及需要人们作出反应的挑战。并且,在现实中,一个人可能遭遇失败或者得到救赎,而在超现实中,他只能赢、胜或输、败。在现实世界中,一个人能博得爱情与感佩,而在超现实的框架内,则只有奖品与喝彩。

过度活动初看起来似乎是引起矛盾的——它的目标既过分狭隘,意义又极不明确。但是,当把活动过度的背景看作游戏或比赛
100 时,这种矛盾便解决了。它的种种界限与规则以及明确的成功条件,给了它超现实的准确性。可是,从一个生手或输后手气转好的人的观点看来,再玩一场,试试另一种策略,再取得一次胜利等等,似乎是无止境的、没有意义的娱乐消遣。有此癖好的人认为他们了解得更清楚。没有任何东西像游戏或比赛给人以飘渺的、确定无疑的兴奋感觉那样甜美了。相比之下,现实是肮脏污浊的,似乎是无休止的模糊不清。并且现实随着每天的、季节的与世代的变

化节奏从容不迫地运动。超现实的游戏任何时候都能玩。

让我们想像某公司一位广告部主任，当她早5点半驾车上班时，并不必非得到办公室后才开始工作。她在车上的时候，就可以轻按移动电话，检查语音邮箱，给欧洲的客户打电话。还可想像某国际律师事务所的一位重要合伙人，他在半夜搞完他的案情摘要离开办公室时，并不必非得等到第二天用打字机打出它，他可以请事务所24小时值班的文字处理员打出它。[52]还可以想像，某一位建筑师和他妻子在安盖拉海滩上，估计是在休假，但他仍用电子装置和他的工作人员保持联系。[53]

游戏一般来说是现实内的一个领域，是与周围世界分开又能遮风避雨之处，而超现实则威胁突破它的界限，淹没那里的一切。已经存在着活动过度的游戏者，他们认为，超现实的游戏已经变成一切。现实已被降低为游戏中多输少赢的对手。玩游戏和扩大游戏范围之间不再有差异了。无论什么时候谈论全球经济时，其背后都是完全超现实的概念。全球性的超现实图像准确反映游戏的概念。因为是全球性的，超现代的经济是无限的，并且，因为是超现实的，超现代的经济清除了现实的困难与黑暗。从而正出现的全球性的经济产生一具有无比魅力的领域，永远在激励更多、更富创造性的行动：又一个简报，又一个备忘录，又一个建议，又一个论点，又一个为项目筹资、为委托人辩护、争取到合同、击败竞争对手的方法。请看鲍伊德·杰弗里斯怎样忙活吧：他凌晨1点半钟起床，一直到晚7点钟召开董事会，在那里说服动员银行、慈善机构投资者以及接收专家结成新的联盟，要静悄悄地进行，然后突然出击，迫使别人按他的命令行事。[54]

由于超现实与游戏有这种密切关系，对那些着迷于它的人来说，它很容易模糊它的工具性的一半与它表示目的的一半之间的界限，模糊劳动与闲暇之间的界线。当然，甚至对过度活动的专业人员来说，也仍然存在可辨别清楚的娱乐与消费的领域。在这领域过度活动是随心所欲的，并且这种现象在它发生时早被发现与描述过了。斯塔芬·林德 1970 年在所著《匆忙的休闲阶级》一书中，研究、描述了时间压力对富裕的上流社会休闲生活的影响。[55] 自从 1970 年以来对时间的约束越来越严酷，但其他方面对休闲与消费的限制却一直在减少。我们的性急、无耐性被即时递送的最为奇特动人的商品所纵容，任其发展；我们特殊的爱好受制于定做的产品。每一种我们懒惰的或不安的倾向，都有某种服务性产业予以满足。可是，不论这种产业多么繁荣兴盛，休闲领域对过度活动来说都是次要的，终归是满足不了它的要求的。休闲就是玩游戏；游戏本身并不重要。

过度活动不仅有它闲暇的背面，也有它没人喜欢的劳动与郁郁寡欢闲暇的底面。活动过度的工作被珍视和隐藏起来，而把无需费脑筋劳动的荒芜地区留给紧迫感较少与受教育较少的人们。这块荒芜地区包括服务行业中比较微贱的工作——打扫、照管房间、做饭、伺候开饭——以及生产中较低级的工作，如装配工作，电子数据处理中较低级的工作，如数据输入。这些工作的缺点是无需技能，没有灵活性，但优点是可以通过电子监测与记录加以控制。无须费脑筋的工作具有外在的压力或紧张，过度活动的工作令人从内心感到兴奋，两者相互对应，但前者令人感到不愉快。

由于无需费脑筋的工作无比辛苦劳累，耗费体力，不得不做这

种工作的人，极容易被有卸除重负作用的、有趣的超现实事物所感动。同样，超现实事物本身也极有力地使我们疏远现实世界，使我们感到再进入现实特别困难，令我们忧伤，郁郁不乐。我们逐渐变得感觉不到现实的灿烂光辉，终至像但丁所说的那样，困于地狱般的、不可名状的痛苦之中。

“阳光使大气清新甜蜜，　102
在这甜蜜的氛围中我们却抑郁怨愤；
在光彩夺目的阳光中我们的心倾泻出
痛楚的浓烟。我们开始怨愤；
永远躺在这湿暗的阴沟中，我们怨愤”。
他们在喉咙中嘀咕着重复着这个祷文，
好像他们在歌唱，但言语不清，又无旋律。[56]

超　智　能

由于计算机化信息的透明性与可进入性，它引诱人们进行互通信息的合作。分享知识与责任显然是后现代独有的做事情的方式，取代了那种聚藏信息、通过隶属关系安排工作的做事情方式。某些作者已经预言，后现代电信的扩展将益发广泛，这种电信网络扩展会把我们置于范围极广泛的共同结构之中，甚至把我们联合在一全球性的村庄之内。[57]任何有理性的人都不会反对这些令人深感温暖亲切、涵盖社会各领域的动向，可是他们也易受超现代的膨胀与污浊混乱的损害和影响。

无论如何,计算机与电讯设备的网络将变为后现代世界所特有的基础设施。[58]它大致包括 4 部分。第 1 部分由网络的线路组成:电线、光导纤维电缆以及地对地的或借助于卫星的电磁波传输装置。第 2 部分包括与世界各地联网的传感器与监控器:照相机、记者、通讯社以及记票装置、温度计、地震仪等较普通的仪器。第 3 部分由各种数据库组成,其中包括各学科的信息、音乐与戏剧演出以及各种录制品。最后第 4 部分是信息处理器,一方面保持网络本身正常工作,一方面提供特殊需要的专门服务。

显而易见,这一系统的某些部分已经安装妥当,其他部分将逐渐增添,整个系统还需要一个向精深度扩展与整合的时期。[59]这一正在出现的基础设施能够用不同方法加以分析。[60]但是,以下简短的描述使我们能通过后现代基本设施与人类智力的相似之处来理解。

103 信息线路就像遍及人类机体并使之活泼有生气的神经。传感器与监控器类似使我们与世界接触的人的感官。数据库相当于人的记忆;信息处理器执行人的推理与理解的功能。一旦后现代基础设施合理地整体化,它将在作用范围、敏锐度、能量及准确性方面,大大超过人类智力。因此,乔治·布格利阿莱洛已经恰当地把这一发展中的系统称为超智能。[61]

为什么超智能的兴起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呢? 首先,有安全与自由的问题。[62]超智能可能危及安全,因为构成超智能的中心智能的软件,现在是如此庞大复杂,以致详细理解它完全超出了人的能力,无法保证程序不发生错误,并且按原来意图运行。越来越强有力的程序设计变得越来越扩张和危险。受托在大系统中管理通

信量的程序有时因紊乱而毁弃。[63]程序从另一方面危及安全，即这些程序一旦被放入网络，它们便传播它们自己，并且损坏或替换信息。像人脑一样，超脑有受到病毒感染生病的危险，纵令不是死亡。

危及自由的似乎是超智能的构造物与运行。如果像超智能结构这样巨大、复杂的东西，要避免巴别塔* 的命运，那只能通过全球性的设计才能解决。而像这样一种支配一切的指令，只能来自有力的判定与指挥。但是，集中化的、决定性的行动必定排除某些不同的选择，并且采用原始的指令而不采用不同的指令。所以，看来超智能似乎将不得不把普遍的控制与排除的种种结构包括进去。一个结构集中的系统一旦运行起来，似乎能提供全部监控的可能性。超智能包括这么多关于我们每个人的信息，并且很快、很容易地就可得到，以致我们似乎完全受中心智能的掌握。[64]

这些危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有理由相信，技术，作为涉及世界的一种方法，有应付这些问题的办法。技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04
差不多得到所有人不容置疑的肯定。它不是受审判，需要提出无争论余地的成功证据影响犹豫不决的陪审团的裁定。对技术来说，为进行第二次和第三次尝试，为找出种种临时应付办法与近似正确的估计，将有足够的时间与空间。人类的耐性将弥补技术不完美所留下的缺陷。因此，超智能，不是遵照普遍的笛卡尔式设计发展，而将是零星地逐步地出现，既具有活力与复原力，也具有不

---

* The Tower of Babel，巴别是《圣经》中的城市名，诺亚的子孙拟在此建通天塔，上帝怒其狂妄，使建塔人突操不同的语言，因此未建成塔。——译者注

整洁与多余部分。安全将得到保障,虽然以某些不雅与浪费为代价。

自由也将因同样的理由得到保障。由于超智能是技术的后代,它将得到无数父母的照看,不仰赖一位家长的严厉管理。超智能将由全国与国际的团体达成的许多协议、合同迅速而松散地联合在一起。不用说,做广告者与利益集团会利用超智能发挥影响力。但是它们的力量大小并非由我们依赖他人、而是由我们共谋决定的。不用说,人们不应低估全球性的协调技术的挑战,以及保持隐私的法律任务。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超智能将是后现代的而不是现代的产物,是以灵活性与合作精神培育起来的,而不是强行建立的普遍的等级制。

随着为安全与自由做了合理准备之后,超智能似乎注定成为履行技术承诺的最后工具;它将能使我们自己终于像笛卡尔所说的那样,"成为大自然的主人与拥有者"。[65]看来它似乎就是如此。但是实际上,超智能,若任其极度膨胀发展,将导致人类智力严重衰退。并不是说,超智能对人类生活本质的突袭将是前所未有、不可理解的。毕竟,有些超智能的部件已经安装有 30 多年了。应该注意的新问题是:这些目前刚出现的分散的影响会不断加剧,越来越协调一致地起作用。

通过思考超智能和人类智力的相似,我们还能了解超智能的集合力量。我们生来就有的神经系统激活我们,使我们能随动机与善意而活动,而超智能系统将分布得如此广泛,以致无须向任何
105 地方移动,就已是无处不在。它使我们能在任何时候和每个人接触或交往。这种无所不存在性时常被人们认为是有利于普遍联系

与团结，这从表面意义上说确实如此。然而，更深思一下，超智能的神经系统将把我们彼此分开。如果每个人，不论他在地球何处，都是不在乎地在场或存在，那么就没有人是引人注意地在场的。那些经由信息传输装置在场的人，他们的出现会被减少，因为如果他们的出现使我们感到烦恼，我们随时能够使他们从荧屏上消失。进一步说，我们利用筛选装置，完全可以避免看到我们不欢迎的人出现。因为也会轮到我是别人所不欢迎的人，所以严格地说，并非每个人都会无差别地接近我。实际上仍有无数的谈话伙伴可以联系。

当然，电话网是超智能通讯设施的早期变种，并且我们知道，电话已经以什么方式导致人与人的联系中断。它已经消灭了看上去严肃不苟的书信交流方式。[66]可这种严肃性曾是不易识别的财富。人们写封信要坐下来，集中思想，收集世情，不惜力地将它们书写在纸上。这样的劳动曾是精神集中与负责任的向导。任何人都要和他的环境实际打交道，必须将具体情况收集起来加以简要说明。与此相对应，书信的读者，必须集中注意他们的通信者，全身心渗透于投信者的世态之中。信件过去等于是一生的纪念物，是小心翼翼建造起来，并令人愉快地设法珍藏的。

打电话也已经减少了使我们能完全而真正彼此面对面的拜访机会。我们逃不脱向来访者透露我们全部的存在，诸如当时也许我们面带愁容，我们身体疲软无力，我们衣着不整，我们住处杂乱不堪。但是既然透露了我们自己的真相，我们也能希望得到真正的安慰——某人关切的神色，愿意伸手帮我们收拾干净饭桌，洗刷杯盘碗碟和摆好椅子。

广泛覆盖的超智能网络也割断我们和一些人的联系，我们过去在音乐厅听音乐、运动场看比赛以及参加政治集会时可能偶然
106 会遇到他们的。可是现在，我们总是已经安装好有自动传输装置，连通我们喜欢的音乐与消遣节目以及政治信息资料。我们由此可以依附于通讯网，无需到处走动，这起着双重剥夺我们生活的作用。它切断我们见到周围的人所感到的喜悦，以及同他们相遇和受到他们的批评所得到的教益。它抢去我们听音乐或看比赛时那种令人全神贯注、才智奋发的社会共鸣。

这就使我们感觉到，超智能无处不在的感官是怎样影响我们占用我们世界的方式的。并且似乎通过我们到处都有的超智能耳、目，我们能够获得眼界无比广阔、明察秋毫的世界公民的资格。但是那以超智能途径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世界，已经丧失它的力量与抵抗力。在世界深处和我们身体占有的世界之间，存在一种对称性。在真实世界里，人们有每天通过身体亲迎世界自然的性好，以满足该对称性，如到处走走，谈谈天气，干些杂事儿，处理事情，承担责任，等等。当然，人们为了更广泛了解或占有世界，一向依赖间接的情报，先是靠听故事或闲谈，以后靠读书看报。但是，甚至在印刷术使消息的收集机械化和私有化之后，世界上的情报仍保持为占有空间的有形实体。你必须去取报纸，拿到屋里，坐下来，展开它并且拿着它看。报纸本身有它可触摸到的广延性与组织，有它的气味和沙沙声。

超智能的感觉中枢，正因为它非常敏锐与涵盖广阔，才能把整个世界呈现于我们耳目之中，并且使身体的其余部分不动与不适用。世界和身体的对称性降低到这种程度：一方是尽管富有魅力

但却浅薄的世界，一方是消息极为灵通但灵魂却脱离躯体的人。

当我们亲见一个人记忆力逐渐衰退的时候，我们会认识到，你就是你所记忆之物。使你在世界上成为人的，是由你收集、保存于记忆中的对世界的概括了解。在我们头脑中已经收集并构成现实以后，我们便能大致根据世界本身条件应付它，犹如微观世界面对宏观世界那样。阅读写字的能力扩大了我们支配世界的能力，并且使它变得更不稳定了。读写能力使储存知识而不是控制知识成 107
为可能。但书写与印刷本领还有一扩展了的空间现实性：它加强了定出和记住个人的书籍、信札、笔记与报纸等位置之实际能力。

超智能使我们摆脱必须记住这个或那个的负担：例如立即要办的事情、要立即完成的任务、要立即赴的约会、或者历史、科学、学术、文学、语言等方面的广泛知识。一个人睡眠时可能突然得健忘症；但是只要他醒来能记起自己的名字，记起怎样接通超智能，他将受到引导，去见约好的一个又一个人，并拿到需要做的事情的摘要。一个人能在几分钟内找到需要的任何信息，并且再用几分钟便将该信息以适当形式发出。

相反地，现在有些思想健全的人，他们若没有他们刚学会使用的超智能作支撑，便会堕入一种和健忘症差不多的无依无靠状态。尼古拉斯·内格罗蓬特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极其努力地工作，提倡使用超智能，把非常重要的数据存储在他的手表里，并且很为他的外部储存器的有限寿命担忧。斯图尔特·布兰德报道说："果然，几天以后，他的手表电池变弱，所存数据消失了；他几个星期陷于信息瘫痪状态。"[67]

一方面真正超现代的人会因为没有超智能信息而受伤致残，

另一方面传统知识则已经由于有超智能信息而变得可笑了。如果在实际求学时期,你有个关于文艺复兴时代绘画的面部特征问题,或关于古希腊教科书中某些格言来源问题,你会去请教一些学者,他们经过几十年游历与考察或读书与研究,已经熟谙艺术与文学,他们已将散见于现实中的文学艺术收藏在他们的记忆中。这种人是值得尊敬的人物,是因为他们的勤奋与智力而受到尊敬的。[68]今天,计算机化的影像与超文本,能使初学者在几小时或几天内通过筛选得出的答案,比博学者花费终生时间记忆的有关事情更加完全、准确。[69]

失掉记忆的人也就失掉了为活动定向的能力。首先,在应付他们具体环境的命令中存在着裂缝与缺口;遗忘的裂缝和缺口会
108 逐渐扩及整个有关意识。他们的过去破裂成一块块互不相干的记忆。他们的现在缩小成意识与能力的愈来越狭小的孤岛。达到极限,这样的人就会变成纤细干瘪的人。那些舍实而屈从超智能的人,会遭遇一些不这么严重但却令人甚感麻烦的事情。插入通信与计算机网络以后,他们就似乎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而一旦离开他们的网络,他们就会若有所失,彷徨失措。他们不再能够像他们本身是人那样支配他们的世界了。他们的谈话没有深度,缺少风趣;他们的注意力茫然飘忽不定;他们对地方或所在地的感觉是不确定的,易变的。

在超智能的中心是软件,它支撑着结构,使信息运行畅通,它执行特别困难而关键的任务。但是人工智能的热心提倡者,一直企望它承担还要更高尚的责任,并且能表演出终会超过人类智力的判断力与创造力的技艺。这些希望从上一代就大事渲染了。我

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一种像人的智力那样渊博的智力，基本上而且必然具体表现为它现在的样子。人为的现实很可能仍将只运用于有限的与工具性的工作上。有人害怕或希望，人工智能创造物将使人类过时，这是错误的。因此，不论超智能的附带部件还是它的中心部件，都不会使人类面临灭绝的威胁。[70]

可是，超智能的力量，如果我们放任不管，将完全能使我们的本质大大变弱或减少。它已经开始改变社会的结构、我们与现实的交往以及我们在世界上方向的辨识。最终，它将导致一种缺乏联系的、无实质的、茫然无定向的生活。人的本质，通过同时发生的对个人的扩散作用与个别化过程，将被逐渐减少或贬抑。超智能使我们能把注意力和行动分散到越来越广袤的空间。与此同时，我们逐渐退缩到作业指令源，最后退到恣意进行点击。

超智能既非全然地、也非不可避免地覆盖于现实世界与人类智力上面的东西。它明显地是在增长着，密集着，窒息着现实和人类，使人越来越分散注意力，越来越不聪明。在较早年代，正如托 109
马斯·阿奎那所证明的那样，人类智力是深刻理解现实的，并引用他最喜爱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话说："在人的灵魂中，有某物存在，凭借它能生成一切事物，并且也有某物存在，凭借它能制造一切事物。因此，我们必须强调有一种主动的智力（或译理性——译者注）。"[71]

第5章　后现代现实主义

道德决定和物质文化

我们时常要作出大的和小的决定，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在西方文化中，特别是那些检验或决定我们生活价值的决定，被称为道德决定。在德国传统中，以及越来越多地在我们国家的传统中，“实际的”是“道德的”同义词。它的含义是，我们的关键决定与我们的行为有关系，与我们作出什么动作有关系，与我们制造什么则没有关系。这种将行动与制造分开、将道德与生产分开的做法，可回溯至亚里士多德，并且后来经由伊曼努尔·康德延续到现代。[①] 这对哲学家和公众来说，都是个令人感到安慰的传统，因为它表示，完全颠覆和破坏了传统生产的现代发展，没有使道德受到损害；如果不是在它的细节上，那么，至少在作为人类行为的道德理论与实践之一般特质上，没有受到损害。

有些现代文化的观察者确实注意到，在当代行为与制造、在伦理学与技术之间，存在着悬殊和紧张关系。他们抱怨，技术已戏剧性地长足进步，而我们处理技术的道德才能并没有提高。但是，这种抱怨像普遍把行为与制造分开一样，是极为错误的。他们没能

看到，一种技术成就，一种技术设计的开发与采用，常常而且已经构成道德的决定。

更准确地说，生产中需要从道德上考虑的，与其说是生产，倒不如说是产品。就生产是一种行为而言，它是能用传统的道德处理的，这种传统道德最近已经像嫩叶似地逐渐出现在职业伦理学、工程伦理学、商业伦理学与风险评估等分支上。始终没有受到审查的是深刻影响我们行为的产品，即生产的物质结果之力量。任何认为社会物质环境基本是中立性场所的道德理论，都是大错特错的，无益的；事实上，大部分现代的与当代的伦理学都是如此。②

为了揭露有人认为不应对物质文化进行道德思考的借口，我们必须更仔细地研究人们是怎样形成他们的人生道路，怎样一路 111
走下去的。③为实现我们的愿望，我们按每天的与基本的决定行事。一项每天的决定是在一特殊日子，只为那一天而作出的，一项基本的决定是面向未来的行动，保证我们未来许多时候都要做的事情。如果我的愿望是要熟谙莎士比亚的剧本，并且要等我每天的决定去做什么的话，那么我会几乎每天决定是否在那天读莎士比亚，如果读，还要决定什么时候读、在什么地方读以及读什么。如果我是按照基本的决定实现我的愿望，我便会在地区学院注册上莎士比亚剧本的课，在日历上标明上课时间，买书，交学费，向我的教师与同班同学明确许诺，我愿在每周一、三、五上午8时准时上课。

在上面的例子中，当然，每天的决定与基本的决定，从习惯或传统上说，都是合乎道德的。它们是能够通过传统伦理学加以分析研究的，如做出许诺、不违许诺、最大限度满足、自我实现、对自

己与他人的义务，等等。进一步说，人们对传统的那种每天的决定与基本的决定之间的关系，有某种认识。他们觉得，每天的各种决定必须同基本的决定相一致；如果有不一致的地方，每天的各种决定将随着分配给它们的愿望一起消亡。然而，在新年除夕，这一真义却屡见不鲜地变成为饮酒和感伤的牺牲品。

甚至更常见的，不是未能作出合适的基本决定，而是作出的基本道德决定没有洞察对它应负的责任。这些是典型地关于形成我们物质环境的决定。50 年代早期某位父亲带给家里一台电视机，想给家人一份惊喜。自己很以为这种设备给家里增加了件新东西，会丰富家庭生活。他们可以看莎士比亚的戏剧、新闻、球赛；尽管生活信息更灵通丰富了，可在其他方面，生活可能仍和往常一样。

加里·拉森曾详细描述这位父亲与他的家庭“在电视前的日子”。爸爸坐在长沙发上，儿子与女儿躺在地板上，狗卧在他们中
112 间，他们 4 个都瞪着眼睛看一块空无一物的墙壁。[④]一旦把这种沉默作态的情景明白表示出来，它就会变为一幅漫画，揭示以下假设的荒诞不经，这种假设认为生活有能够被填满的空穴，而不需要重新安排生活秩序。生活总是满的，并且已经满了；生活是一完整的结构。它可能包括一些未占用的空间，办些零星琐事。但是如果把耗费时间的任何事物添加到生活之中，生活之网就被撕破与重织；新的设备在它上面捅了一个洞。在这里，节省时间与耗费时间结果是一样的。节省时间的设备在传统实际生活中产生的空穴，不比吞噬时间的设备产生的空穴少。

一旦家里有了电视机，每天决定是读书，写信，玩游戏，讲故

事，出去散步，坐下来吃饭，还是看电视，就不再真正涉及这 7 个可能的选择了。电视的存在已经把所有这些选择压缩为一种选择，这种被压缩的选择之下的次一级选择，全包括在这个问题里面：今天晚上我们打算看什么节目？

或者让我们考虑一下某位母亲的做法。她常听到十几岁的女儿坚决而又认真地对她说，如果她自己有汽车的话，会减轻母亲的负担，不必每周三下午从学校送她去上笛子课，也不必每周六早晨从家里送她去田径运动会；并且用她自己的汽车能够找件周末工作干，冬天可以从事越野滑雪活动。如果这位母亲发慈悲，给女儿买车，那么对这个喜欢到处跑的十几岁孩子来说，问题不再是是否周末留在家里练习吹笛子，或者请朋友到家来，而仅仅是开车到哪里去，是到不太遥远却具有强烈诱惑力的海滩，或迪斯科舞厅，或可开车入内的餐馆，还是到郊区大商场或诸如此类的地方。

在一般情况下，家庭生活的道德结构的形成，与其说是由习惯，还不如说是由新得到的东西，是由物质决定的（我愿称这些决定是物质的），而不是由实用决定。当然，家长并非在真空中作出基本的物质决定。当电视机比较便宜，节目又非常吸引人时，买台电视便成为一项难以拒绝的建议了。当邻近地区的社会结构已变得十分乏味，不能向年轻人提供富有生气、刺激的活动场所时，给青少年买辆汽车似乎成为必要的事情。在公共机构很分散、公共交通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自家没有一辆汽车的话，要过一种富有活力、精神充沛的生活，则需要父母与子女付出英勇的、筋疲力竭的努力。

显而易见，个人的基本物质决定源于集体的基本决定，后者则 113

模仿真实的社会环境。个人每天的实际决定离不开个人的基本物质决定,正如后者离不开集体的物质决定一样。在每一例子中,都是后者有力地预先决定前者。既然这样,我们集体的基本物质决定,便有最大的道德意义。它们是如何作出的呢?很多理论家可能会看不到或者甚至会否认,真的有人在作出集体的基本物质决定。正如我们知道的,保守主义者诉诸强健的个人主义以逃避集体的责任。自由主义者热情地接受这种集体责任,但是他们把注意力过于集中在它的实际方面,以致忽视了物质的一面。自由主义者的急务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他们现在把注意力集中在公民权利与刑事程序等问题上。他们关心的是这个国家长期的事情,并且突出地反映在了宪法中。

可是甚至就在这些变化彻底重塑物质生活条件的初始阶段,我们的建国元勋已认识到,宪法必须至少要为运用集体的力量与责任指导物质变化方向,保有一狭窄开口。宪法中关于州际商业的条款便是那个开口,其时,技术进步的急迫需要已经把这开口挖掘成宽阔的联邦活动通道。

一般观点中无疑有某些真实性,即世界的技术变革不曾、也一直不能是主要靠政府设计取得的。共产主义曾经是建立在那一假设上的实验,现在看到了些结果。发展技术曾是所有成功的工业国家广泛采取的计划;似乎已把每个人都牵连在技术之中。政府也是一样。横贯大陆的铁路建设,如果联邦政府没有提供成立公司或法人组织的特许状,授予大片土地,保障地役权及有限的责任的话,根本是不能进行的。[5]事实上,如果联邦政府真正倾全力、以更富建设性的精神行动,铁路产业可能会少遭受些贪污腐化的损

害，少些突然而剧烈的变动。20世纪早期与中期，各级政府通过运用征用权、奖励性分区以及大量注入资金，不当地帮助野蛮改造城市格局。[6]1956年，联邦政府开始修建州际公路系统，其后30年，该系统已包含4万4千英里公路。[7]

114

城市再建与州际工程项目都是以政治手段通过可疑的、不正确的推理提倡而实施的；为它辩护的理由包括健康卫生、安全、效率以及经济活力。而从来没有具体深入考虑这些政策会造成深刻、时常是剧烈、不可救药的影响。[8]这种间接的行动方法正好可以说明，公众为何对集体塑造物质文化感到普遍不安。当70年代末期与80年代初期，政府打着产业政策的幌子，软弱无力地试图明确承担责任时，这种政策的狂热支持者被舆论彻底击败了。[9]可是，高举强健个人主义旗帜的保守政府，80年代又一次发觉自己与有点像产业政策的事情有牵连。它建议用44亿美元建设超导的超碰撞机，逐渐扩大超导的优先权，目的是放宽反垄断法促进工业合作，并且宣布政府支持Sematech公司，帮助半导体工业。政府透露了高性能计算战略，答应5年内支援17亿美元，并且鼓励较小型项目，促进计算机集成机器人以及计算机辅助设计的发展。[10]最近以来，已经有立法上的努力，旨在支持国内研究和开发高级存储芯片与高清晰度电视，加速建立州际光导纤维通讯系统。

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关于物质文化的观点上趋于一致。双方都想要把物质文化一事交托给消费者的至高无上权威。保守主义者喜欢消费者的背景，自由市场，因为这种背景是保护保守主义者种种特权的堡垒，而自由主义者在消费者的自由决定与选择范围中，看到价值－中立的公共领域的正当理由。但是过度

赞扬消费者就是否定公民。当消费者开始行动时，就已经作出基本的决定了。消费者处于政治上与道德上软弱的地位。他们政治上软弱，因为他们能够向当局发送的关于公共秩序的信号，大部分
115 是模棱两可、意义不清的。购买一件商品是表示赞成、轻率，还是缺少更好的选择余地？拒绝购买是表示对这商品的式样、安全、耐久性或它的根本存在不满吗？可是，事情更加令人迷惑不解，因为任何行动，只有在相互对立的行动被仔细考虑和事先预料到的情况下才是可以理解的。

消费者在道德上处于软弱地位，就像任何人没有能力执行日常决定那样。日常决定是由基本决定预先形成的。那些已经塑造了技术社会的基本物质决定，留给消费者执行日常决定的余地微乎其微。我每天要在农贸市场购买东西的决定没有什么用，最后完全没用，因为农贸市场是在城市另一头儿不起眼的地方，又没有多少东西可买，而超级市场就在我回家的路上，那里有我愿意买的一切东西。

即使政府与事物的有形秩序建设没有牵连，但如果人们对物质环境呈现的形象不满意的话，作为政府也应明确规定法律手段，维护自由人民的意愿。人民与各党派未能对事物的秩序负起更多、更大的明确责任，这说明对当代生活的实质特性没有任何深刻的不同意见。可是因为没有明显的不满就推论出普遍赞成的结论，这是草率的。在全心全意赞成与极力反对之间，存在着事态演进常有的趋势：一知半解地与半心半意地向前行进，以及向前推进某种事物的发展。

我认为，这种趋向表明了人们对技术、对它最近的超现代发展

的可能性具有的共同态度。我们正再一次被纠结于其中无法摆脱:作为公民,我们赞成促进超现实、过度活动与超智能的公共措施,而作为消费者,我们却屈服于新环境的迷人魅力、躁动不安与难以捉摸的魔力。无论如何,这样的矛盾纠结充满疑虑不安与痛苦,在这些情绪中,一种真正的解决办法悄悄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种解决办法若要具有生命力,就必须是后现代的。所以,任何鼓励、支持这种解决办法的人,都必须避免支持那些侵犯性的、普遍的或个人主义的解决办法。我们特别需要的不是任由共同意志行事的更多有效的议事程序,而是真正的对话。我们必须在公众论 116
坛商谈,讨论那些有决定意义的事情,讨论如何使这些事情在我们生活中能占有确定而主要位置的共同措施。

焦点的现实主义

我们怎样才能遏制超现代主义令人分心与使人衰弱的力量呢?既然我们都与现在正在确立超现代文化的基本措施有牵连,只有富于远见的共同行动,才能够扭转流行的趋势。但应该有什么具体行动呢?政府应阻止资助电子学、计算机、通信与媒体技术的研究开发么?应该制定法律限制所有人的工作周长短么?应该禁止建设全国光导纤维通讯系统么?纵令这些措施是真可行的,它们也会使人感到窒息与讨厌。现代技术的灵巧创造力,尚且不谈科学的创造力,代表人类伟大创造性成就之一。如果拦阻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有规律的流势,那会使人类精神严重贫乏。当然,科学技术政策有其界标,据此我们对特殊计划通过立法行动表示

赞成或反对——对超音速客机说“不”,对超导超碰撞机说“是”。政府制订的关于科学技术流向的无数决定,显然应该把它导向有益于身心的、内容充实的东西,而远离含糊暧昧的无聊东西。

无论如何,一般不能用阻止或禁止的办法对待超现代主义,而应用一种真正的可供替代的解决方法应对。在有限的世界,对一事一物的热心专注,会限制纵情于另一事一物。我打算把献身于正确的另一选择称为后现代现实主义。它的方针是接受后现代批评的教训,解决后现代环境的意义含糊,采取坚韧态度,为建立以共同庆祝活动为中心的公共秩序而努力。凡能激扬这种态度并且提供庆祝活动中心的,就是现实。

117 当后现代批评的第一个目标一直是现实主义时,现实怎么能是任何后现代方针的中心呢?固然,侵略性的现实主义和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现实主义两者的可信性及权威性,几乎被它们的后现代批评者剥夺净尽。然而,这种批评的真正牺牲品不是现实,而是侵犯性的与方法上的对现实的攻击。这样一种攻击不是破坏现实,就是未看见现实,并且在现代现实主义支配下,现实终于消失或者变得看不见了。

然而,后现代的批评过早陷入困境,当它批判性地考虑到现代对现实的不当主张以后,却天真地接受了妄自尊大的遗产,即现实的消失。更糟的是,当后现代的批评把后现代会话仅限于人类,不经进一步思考,便摈弃富有生动感人表现力的事物的可能性时,它就陷于独断论了。后现代理论家一向如此热中于使种族中心主义与语言中心主义受到怀疑,却没有看到他们自己的人类中心主义。为什么先天地就拒绝考虑事物也有自己的权利可以对我们说话的

可能性呢?

那仅仅是可能性。用必然性获得现实曾是近代哲学无法实现的计划。人们可以真正抱有的希望是,现实实际上终于会出现的。但是在一本书的页面上,现实怎么能这样做呢?作者与读者能够确定的惟一现实是页面上的墨迹。这些记号,无论如何真实,如果它们不是深刻而牢固地固定在共同语境中,在那里它们邀请并指导读者记起或引起一定的现实,它们会永远是沉默的。单独一本教科书是无能为力的;要求帮助是它的优点。它需要的活力来自文化教育界与富有感人表达力的现实。[11]这些当然应该是生活的条件。当生活条件受到限制,生活脱离条件只能使它从虚无中显现,超现实就是结果。指导人们记起现实的方法可能或多或少是详细而丰富的。在这里,我想纵览现实景色,指出其中的焦点。当我们谈论公众庆祝活动时,我愿用它的特殊词语,用它的专用名字描绘现实。

虽然只存在一个现实,但能从许多方面加以考察。物理学让我们从极近处与极远处观察它。物理学揭示现实有规律的微观结 118
构,即电子、电子颗粒以及也许更微小的部分,例如纤维的微观结构;它揭示太阳系、银河系以及银河团的宏观结构。我们可以认为,普遍规律性是现代物理学的特点,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认为后现代物理学的特点是它了解到:现在关于极小与极大的多重规律性起因于一特殊事物的独一无二的故事——宇宙来源于大爆炸——及对其的理解。有关世界的物理学说明有着决定性的约束力量,对演变方向与解释都有确定的限制。任何关于现实的可信看法,必须与迄今物理学所发现的宏观宇宙与微观宇宙的条件相

一致。但是,最后极关重要的现实则介乎物理学的微观尺度与宏观尺度之间。必须承认,它的适当尺度就像一张画,如果从显微镜或从卫星上看,就画的词义而言,它就会完全消失的。⑫

物理现实的这个中间区域,由现实事物与超现实事物之间的界线分为两部分。一边是具有威仪相貌、给人深刻印象的与世界相连接的人或物;另一边是一次性的与断断续续的经验。这一分界线在一方面与机器和商品之间的技术分界是相符合的。最后的超现实是商品;它不完全是一次性的与断断续续的,而仅仅是以错综复杂的机器为基础。机器既非一次性的也非断断续续的。它需要心灵手巧与特别的关心;它需要有地方安放保护,如果它开始工作,还需要与能源连接。工具性的超现实,当它继续依靠机器而存在的时候,便跨越、无视这分界线。

我们可以在广义上称机器的现实是由机械制成的,包括电子的与化学的机械在内。虽然它足够真实,它也是沉默的。它运转毕竟是为商品服务,而商品的惟一要求是能引人注意、富于诱人魅力。当机器的现实变得或仍然是噪声太吵人时,那是技术不完美的标志。技术完美的机器的沉默不仅征服机器本身,而且也征服它的最后边缘,即现在我们所说的种种资源。当河流用坝拦住时,它们的声音减弱了,寂静下来了。大草原被剥开挖煤时,也使得它们闭口无言了;山岭一被砍伐就变得迟钝无生气了。然而,技术远
119 远不是完全有力量的,技术边缘的现实在很多方面阻碍事物发展,而且很难驾驭。技术无法吸收我们的废弃物,不能出产更多的水与石油。虽然医学技术对防治疾病和益寿延年贡献很大,但仍留有不能控制的疾病与不免一死的边缘。

在超现实与支持它的机械及边缘现实之另一边，存在着富有感人表达力的现实。这种现实凭它自身的权利用许多声音说话：它说旁白、讲道，有时它苦恼、威胁，也有时给人安慰与鼓舞。与“富有感人表达力的”这个词义相近、常见到的名称是“自然的”或“传统的”。前现代的现实完全是自然的与传统的，它典型地受地区的限制，被置于宇宙中心，是由神建立的。后现代的现实只有在超现实与它的机械支撑物所留下的缺口处，才是自然的、传统的。进一步查考，在超现实与富有感人表达力现实之间的界线，原来是由密集网络构成的。超现实像个越来越复杂的网络，覆盖下面自然与传统的现实，使之迷蒙不清。达到极点，超现实的覆盖物将会使它下面的现实窒息，使之完完全全处于机械的与边缘的状况。

可是，这不是后现代状况，那里还有慷慨为富有感人表现力的现实敞开的缺口。事实上，很难想像，怎么还能够有多大的缺口呢。人类生活已变得离不开技术的帮助了，没有人会愿意离开它们。某种技术性机器之必不可少，这并不是什么不幸。正像许多技术性商品一样，技术性机器与富有感人表达力的现实是相容的。只有当技术性机器在超现实商品无限增加的情况下仍极度发展时，富有感人表达力的现实才会发觉自己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

与这一趋势相对抗的力量是富有感人表达力的现实本身，特别是在它出来收集我们的思想与方法及照亮后现代状况的地方。我把这样的现实叫作焦点的现实。在我这篇文章中，“焦点的现实”一词仅仅是指我们每人所遭遇的那些事物，它们自然而然地吸引我们身心关注，并且占据我们生活的中心地位。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仪、与世界相联结以及起中心作用的力量，是焦点事物的标 120

志。然而,它们不是可以得到什么东西的凭证。焦点的事物证明它们本身是正当有理的。描述它们和回想它们都是一样的。

我现在关注的仅仅是从远方回想焦点的事物,以便能看见它们中内在的一致性。在这个大陆上,未开垦的荒地在富有感人表达力的事物中间,有着最清晰的声音。在它那个地方,它与大地联结不断。如果它不是像它现在早已改变了的那个样子,它当然是原始世界最亲近的后代。因此荒野的声音也有一种强有力的令人肃然起敬的回响,因为它的声音里没有人为音调的痕迹。它很自然地和我们说话。当然,它是从过去说起,直到技术很发达的现在。任何敢于去未开垦的荒地的人,永远不会忘记:技术覆盖了荒野,任何时候都能使它窒息。但对真正有后现代细腻感情的人来说,荒野这方面缺乏攻不破的坚固性,并不是软弱的标志。

在荒野之外,一切事物都展现了人类之手干预的印记。人们可能认为,人类创造性的标记很像马身上的烙印,这烙印证明马为人所拥有,并且拒绝让它代表它自己说话的可能。事实上,驯养的马不只是人的所有物,而是人类的产物,是几千年繁殖的结果。但如果焦点事物的地位是由普遍标准决定的话,我们就会退回到现代主义了。让事物自己表达自己的意思吧。马就是用无双的力量与优美姿势把话说清楚的。

有各种各样驯化的自然物充满富有感人表达力的东西。虽然我们在一般意义上不能裁定它们的焦点现实,但我们根据经验知道,植物与动物会变得软弱无力。当它们完全脱离它们祖先的土地,降解为工具或玩具,像一株培养液中、在促长光线下的西红柿作物,或一只离船上岸、永远关在公寓单元的狮子狗那样,它们便

失掉了全部焦点的意义。

在手工艺中，人类与自然进行积极、密切的结合。自然物质——石头、泥土、金属、木材、毛皮、纤维——手艺人拿来加工改造。天然的性质并没有在加工物件中消失；艺人们用新方式把它显露出来供人欣赏赞美，例如独木舟的几块红香柏木条，钓鱼竿上的几条东京湾竹子窄纹。[13]艺人们用这些东西证明它们产生的根源，并且预见到溪流、湖泊的自然环境而采取适当的措施；其他事物，如 121
小提琴或保龄球，则指向音乐或家庭环境。手工艺品是自然的，同样也是很传统的。它们具体体现手工艺人与天然材料打交道的经验，以及这些工人群体的目的与环境。

由斯特拉迪瓦里* 制作的小提琴可追溯到 17 世纪末或 18 世纪初，它突出地居于一系列弦乐器的顶端。它讲述的是它为巴罗克风格音乐设计的，以及彼时以后它所服务的音乐传统。人们能在纽约市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玻璃橱里，或在悠悠玛** 的怀抱中，看到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博物馆被定为保护人们所创造的最富有感人表达力的事物的地方。但是，在保护与囚禁之间，在展览与拔除中心内容状态、甚至亵渎之间，存在着一条细微界线。在公共机构中间存在着表示尊敬的次序。在较低的一端是人类学博物馆，在那里圣物被当作奇异东西或研究材料陈列。中间一层是美术馆，在那里，像这样的东西被尊为艺术品。音乐厅或圣所如教堂寺庙等处于最高点，在那里，像这样的东西在宗教仪式中有其

---

* 斯特拉迪瓦里(1644? – 1737)，意大利小提琴制作家，他使制琴工艺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译者注

** Yo-Yo Ma，传入美国的一种菲律宾玩具。——译者注

焦点地位。

把斯特拉迪瓦里制作的小提琴放在大提琴家或小提琴家手里供他们演奏,当然比放在大都会博物馆中展览更为合适。事物只有在人经常实际的负责照管下才能成为焦点的东西——当作远足活动的荒野;刷洗、训练与骑乘中的马;钓鱼用的钓竿。焦点的现实只有在事物与实践活动的匀称布局中,即在由人们照料的自然、手工业与艺术的匀称布局中,才是存活的,有活力的。人的技术与事物的威严仪容相称,人的挚爱与事物同世界的深刻连贯性相一致。

对现代与超现代的感受力来说,焦点的事物看来似乎是分散的,被人遗弃的。现代观察者对缺乏条理秩序与原则性理由感到震惊,超现代观察者对缺乏感人魅力而失望。但是对受焦点事物鼓舞以及参与焦点的实际活动的人来说,缺乏说服力是后现代的生活标志,而缺乏灿烂的光辉则是现实的特征。这就是后现代现实主义。虽然它在身体的参与、共同或集体的庆祝活动与焦点的
122 确定方向中会活跃起来,不过后者还是不确定的事情。

参加焦点实际活动的人庆幸地承认,他们挚爱的焦点事物具有直接的、起中心作用的力量。你不能不为一匹训练有素的良种马的温和、善于配合而感动——重 1 千多磅、骨架宽大、肌肉丰满的动物,皮毛平滑,气味好闻,顺从,有规矩,可总是对人们构成威胁,一有风吹草动便全力奔跑;并且总是个负担,需要喂它,为它驱虫、钉掌,避免它碰伤、割伤、得传染病、跛脚与喘息症。但是当它嘶鸣着欢迎你,蹭磨着你的胸部,用又大又水灵的眼睛凝视着你时,你似乎感到一切心愿都已得到了满足。

因为逶责逃避责任要依回答为根据，这问题就算暂时解决了。[14]马的焦点领域看来很像一个受神灵保护、漂流在技术世界中的岛屿。这个世界已不再是“手和马以及手工具和马工具的世界”了。[15]如果焦点的魅力是和超现实的兴奋感一样没有基础，这个世界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悲伤兄弟或姐妹。但是焦点的事物实际是建立在底层现实基础上的，并且焦点的实际活动继承了由来已久的传统。无论如何，这种不确定的根源与联系是存在的。后现代现实主义者当面对焦点事物的孤立和焦点实际活动的稀少时，有时便悲观失望，然而，无论他们在路上什么地方相遇，他们总能彼此相知，而且感觉到这种集中精神于某事物的生活是一见如故，或有亲属关系。音乐家能认出园艺家；骑手能理解手艺人。

这种一见如故的经验令人鼓舞，因为在焦点的重要事物突然受阻时，它能消除受限制的感觉。当个人能力渐衰或环境变动不得不放弃焦点事物时，它打开了使人重新聚焦个人生活的较为广阔的现实。它也提供用若干焦点事物的外形勾画出来的栖息地：不仅用自然、手工艺和艺术，而且也用运动、餐饮文化、语言文字训练以及用对上帝或神的崇拜。当然这种崇拜不只是许多焦点中的一种。当超现实主义以极度的分散注意力威胁后现代现实主义时，宗教则以整体的主张令它不安。

忍耐的活力

123

如果父母能给予孩子们一种生活态度，但必须在抑郁怨愤与过度活动之间作出选择，毫无疑问，他们会喜欢过度活动。我们希

望我们的孩子能应付他们时代的各种挑战，在工作中表现杰出，获得成功，并且能过上积极的、愉快的生活。怨愤的人们已被排斥在当代活动场所中心令人兴奋事物之外，并且也被禁止分享在那里作战获取的战利品。同时，他们对现实困难的斗争已经绝望，对于必须要做的事情的种种挑战已渐渐变得无感觉了。即使他们不听任他们的房子搁置不刷，不听任他们的篱笆搁置不剪的话，他们也会毫不在意他们的桌子乱摆乱放，他们书籍闲置不读，他们有故事不讲，有歌不唱，任凭孩子无人照料。然而过度活跃相当于伪造的活力与快乐。尽管父母看到过度活跃的孩子已获得当代社会的奖励赞赏而感到欣慰，但当他们看到生活的主旨在努力与雄心的烈火中耗尽时，他们感到的是悲哀，而不是自豪。

大萧条中的艰苦生活具有的那种令人振奋的效果，似乎从第三代的记忆中逐渐消失了。祖父母如果看到他们的子孙郁郁不乐、忧愤不已，便感到很不理解而灰心失望，如果他们过度活跃，则虽然赞成，又感到不安。那值得尊敬的、不停工作的对策，似乎被抑郁怨愤者所鄙视，并且被过度活动者所误解。实际上，它不适用于现代规划的最后一场危机。倒数第二场危机大萧条，是通过现代主义军团的再一次重整而被克服的。[16]国外的极权主义需要强有力的回答，并且不顾抵抗而占优势的需要，是和它的现代说法不顾力量而为准则奉献，是一致的——其决心是：不顾自然的抵抗在侵略上占优势，不顾复杂性在方法上占优势，不顾传统在社会上占优势。

不管不顾的力量一直是现代技术的主要刀锋。它一直也是技术社会中充分享有这种特权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都利用这

种力量，通过开关、电钮、按键盘，不论何时、何地、技术好坏、力气大小，都能使我们内心希望的任何东西浮现于脑际。虽然不管不顾的力量可能在它的高雅超现代化身中继续存在，现代主义的无 124
理性及傲慢的后代已失掉它的活力与人们的信任。

如果抑郁怨愤需要补救，过度活动需要抛弃以及不管不顾的力量需要退出历史舞台，那么对后现代环境的正确反应是什么呢？后现代的现实和它的现代的祖先一样，是严峻的。从现实的胁迫性与坚实性可以看到它的严峻和艰巨。在痛苦与灾难中我们能充分体会到现实的这种胁迫性。当现实的坚实性激励振奋我们精神时，我们越能感到这种坚实性。当今我们受威迫的特殊原因是国土的限度、人民的敌对与身体的虚弱。现代对这些重负的典型回答一直借助于科技手段。大规模生产与自动化是解决社会不公正的科技手段，氢弹是避免战争的科技手段，避孕环是对付性淫荡的科技手段，核脱盐工厂是对付浪费的科技手段，计算机与通信技术是弥补不熟练教学的科技手段，更安全的汽车是对付鲁莽驾车的科技手段。[17]

上述情况有一点真实性。技术是后现代命运的一部分，不应该阻止或阻碍技术带来的利益的流动。把前现代的性吸引责任完全推脱到妇女身上是无情的，拒绝接受在处理水的问题方面科学技术的高精尖性是狂妄的。但是部分后现代经验也告诉我们，现实的胁迫性不应该完全用强硬的办法解决。无论如何，关键性的任务不单纯是抑郁、怨恨地忍受现实的不顺从，而是要即使不是愉快地也是勇敢地忍受它。

忍耐表明比力量更强。当力量以它典型的现代形式占优势

时,它是在困难环境的废墟上以及通过对不合作人民的压迫,建立秩序的。不管不顾的力量靠破坏支撑,并且破坏不断。忍耐则有时间与力量去认识复杂情况与不合作的人民,让他们参加合作与谈话。强有力者令人忌妒与恐惧;有耐心者赢得尊重与爱戴。我所说的忍耐没有消极的意思,而是耐性,是我们钦佩一个运动员具有的那种劲儿,他有力气跑完一定距离或经得住比赛的考验。

就环境来说,后现代忍耐的任务是忍受国土的限度。我国幸
125 好有一特别富饶、广袤的大陆。我们不能在自己生产的能源和处理废物的能力范围内生活,表明我们的文化是一种无忍耐力的、不成熟的文化。我国对它的贫苦、无依无靠者缺乏耐心,也显出少年特有的那种自以为是。虽然自由派人士会觉得自己并不缺乏社会耐心(至少在原则上),可当我们遇到那些显然对我们抱有恶意,并且用恫吓的言词抨击我们的不闻不问态度的人时,我们中没有一个人会免于接受耐性的考验。当然,耐性有它的限度,即它以保护我们的基本福利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为度。但在那限度周围的地方,有很多非正式的但深深令人苦恼的敌意。在这一范围内,人们不能再强求忍耐了,但还是不要失去耐心。

我们身体的虚弱也需要社会与个人的耐性。我国的健康保健工作非常混乱——关于保健的发展、分配与财政支持都混乱不堪。直到我们认识到对不治之症、老年衰弱以及日常生活中的疼痛等痛苦应有共同的、实际上集体的耐性,这个问题是没有希望澄清的。这是后现代的突出任务,因为任何侵略性的、普遍的以及个人主义的强迫人们甘愿受苦的设计,在最坏情况下,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或者充其量不过是强加给充满愤恨的公众而已。只有共同

的理解才能鼓励个人忍受以及社会一致同意对医疗干涉采取明确、合理的限制。更恰当地说，只有当社会有点像共同体，个人更像共同体一员时，才能使健康状况与耐性一致起来。[18]

忍受现实需要有耐性，可是耐性本身也需要力量的来源。有时当我们控制不住急躁与气愤时，我们就赞赏耐性，并且希望早有耐性多好。这并不是说有耐心的人容易失掉他或她的耐性。忍耐是一种美德，它像它的运动员弟兄或姐妹的耐久力一样，是天长日久习惯养成的技能，是逐渐获得并且通过锻炼而保持的。万事开头难：忍耐的困难在于开始，一旦我们开始忍耐了，就要坚持，尤其当环境难熬与无望时要坚持不懈。激励鼓舞我们决心学到运动员的耐力并在困难面前不松劲的，是那种优雅安逸的舒适前景，是高超的技艺与人的能力之间的平衡。[19]

同样，耐性的报偿是活力，当已经忍受现实的磨难以后，我们的力量因此而增辉，更不容易动摇。这对于工匠来说也是真实的，他经过长期训练与更长期的劳作，奠定了他的手艺的地位以后，以 126
锉光滑竹子为乐，带着“聚精会神的宁静表情，那是一个人从其工作中得到极大满足的神情”。[20]对那骑马的人来说，这也是真实的。她似乎无尽无休地训练她的马，又细心护理它的创伤与腺疫。当她套上鞍、骑上它时，马很镇静；当她任何时候稍微抖动缰绳或移动她的重心时，它跑的步子稳健，反应灵敏，她为马的镇静与泰然自若感到骄傲。

积极有力的人可能反映现实的坚实性、事物的阻力与真正价值，它们都在以当前的明确方式考验我们，鞭策我们。正因为焦点事物是难于发现的，确实的，所以活力是镇静的，可理解的。现实

的灿烂光辉激起人的活力，并且使人有精神，增强耐力。显然，我们多数人并没有可以使注意力集中于我们生活上的那种有手艺或养马的天赋或环境。小瞧上述手艺人或马主人的忍耐力量可能是气量太小。但是无视这些焦点事物的有限、不确定的条件，也可能是自鸣得意。如果一件事物被隔离起来，并且完全用超现代的技术将它包围的话，该事物的焦点力量便被人否认与嘲笑。事物必须从处于下层的现实汲取它的活力。如果没有这样的基础，焦点事物终将飘浮到超空间去。因此，后现代状况需要比有限的焦点练习活动所能给予的更大忍耐力与更加普遍的活力。我们必须努力养成极大的耐性，以便在典型的后现代环境中找到种种焦点事物的位置，并加以培育。

共同的庆祝

后现代主义和群体

我们已把现代主义抛在我们后面，现在必须决定，是在超现实主义的似无止境、无乐趣的大平原上继续前进呢，还是跨越到另一个更真实的世界。尤其对这个国家来说，这后一任务落实在已经成为我们的国土上，就是不再不停地到别处寻找超现实，而是耐心地、充满活力地使自己顺从自然与传统。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与经济学的提纲是够清楚的。大部分设计从主流派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的工作计划中，可以知道得很清楚。我们必须减少污染与能
127 源消耗。我们必须保护自然界尚存的野生动植物，重建被滥用的环境。我们应该使供穷人寄宿的公共房屋整齐适用，更节省些，更

注意基础设施，更致力于研究与发展，在我们的探索中更多地合作，更关注我们的工人的技艺。

但是所有这些都符合愚蠢的、不公正的社会秩序的要求。正出现的后现代经济能顺利地发展成超现代主义，一种文化上空虚、社交上冷淡的设计。正如现代的侵犯性或攻击性不能让超现代的空虚茫然恢复活力一样，现代的自由主义也不能纠正超现代主义的社会不公正现象。正统的自由主义已同现代主义一起被丢在后面了。[21]为请贫穷的人参加到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秩序中来，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件是提供好的工作，为所有人提供充分的工作，给每个人提供做好工作所需要的教育。正统的宽容大度的人比其他任何人都支持社会公正的这一要素，但是他们一直未达到这一目的，因为他们很武断地反对为建立包括整个社会的秩序所必需的另一个要素：即群体的思想。没有群体感，为所有人提供做好工作的问题就永远不会列入政治议程。工作的量与质必将任由超现代消费所左右。当然，也有充分的理由应警惕群体的排他与压迫的趋向。这些无偏见的忧虑需要加以回答，但是它们不应泛滥成为对社会秩序不容分说的挑战。

偏袒共和主义者同情群体或社区这一观念，研究哲学的共和主义者则把它当作为他们政治幻想的中心。尤其是后者，他们把恢复无私与公共秩序的社会内聚力视为自己的事情。后现代经济学，因为反对严格的等级制度与思想意识上的个人主义，似乎赞成共和的社会共产主义或群体主义。但通常赞成共产社会主义的成员并不利用这些意义含糊的一点支持，他们更未曾准备提出具体的社会设计。[22]因此，在理论上，他们一直很容易受主张改革的批

评者的困扰，后者公开指责，意义含糊不清是为了逃避任何群体固
128 有的压迫性趋向所付出的代价。在实践上，超现代主义构成推翻社会共产主义的威胁。既然共和主义理论家既未提供对现代技术中肯的批评性分析，又未提供真正的相反建议，就任由超现代技术确切说明社会共产主义含糊之处了。现代以前的乡村仍是社区的最清楚实例之一。当超现代技术提出超现实的、过度活动的与超智能的地球村为当代社会的例子时，社会共产主义者并没有作出回答。

如果后现代的生态学、经济学与社会想要抵制超现代的迷失方向与干涸空虚的话，它们必须以现实为基础和中心。后现代时代的底层现实在首都以外各地最有力地凸现，有力地在当时当地出现，若有若无和时隐时现地涉及占主导地位的当代文化，这种当代文化必定是城市的，并且正如劳伦斯·哈沃斯曾指出的那样是大都市的：

> 城市与乡村曾经代表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并且我国曾是两个相邻的国家。但现在这不再是真实的了：这两种方式正合二为一，正像所有的阶级都在进入中产阶级一样。给人更真实的总印象是：国家正在变为城市，这不只是在城市正向外扩展这个意义上说的，而且是在生活方式正变得千篇一律的城市化这更深层的社会意义上说的。大都市是这一时尚的先锋。[28]

除非我们能在社区中、城市中发现并滋养那些在家庭、乡村中茁壮

成长的焦点事物与惯常做的活动，后现代时代的底层现实必将到处失去活力。人们必须在小的对称现象中，例如在焦点事物与参加焦点实践、精力充沛的人之间的对称现象中，发现并且恢复更大的对称现象。更大的对称现象显现出公众对底层的后现代现实的肯定。

人们可能希望通过理论的说明促进这实际任务的解决。如果这样的说明是要包括整个公共领域，显然，它必须是全面的。同样，全面、广泛性本身也必须能使用恰当的词汇，纵令不是共同的，也必须是一般的词汇。但是如果我们满足那一要求，我们只有依靠现代主义的话语了。处理这问题不只是方式方法的事情。它涉及这种危险，即在我们企图普遍地证明现实的存在与重要性的尝 129
试中，我们却会完全错过现实。我们认识现实必须根据它自己特殊的、本身的条件。

特殊主义已被誉为后现代主义的标志。[28]特殊的话语有多特殊？当把特殊的话语降低为专有名词时，它离现实最近。谈到城市生活，我愿实际地谈谈蒙大拿州密苏拉市。如果该城远非示范或典型的话，那就更好了。它确实是实在的。可是，如果能够避免超现代的不连续性与用后即丢弃的多逸闻的、主观的与过度显示文雅的种种变形不发生的话，那就必须有更大的连贯一致性与深度。事实上，所有真实的事物在被技术包围和被超现代主义威胁之下，都是连贯一致的。在那种笼罩一切的、危险的一致之下，是预先想不到的现实的亲属关系。后现代现实主义要通过概要的说明了解现代主义与超现代主义，用这样的方式提供一块空地，在那里现实终于能在详细的叙事中存在或出现。因此，后现代的话语

是严格叙事体的,但当它涉及一般特点与遗传特性时,它也是概要地表示。

首先大致提醒一下,现代主义曾经是破坏真正都市生活的敌人。这种破坏的催化剂当时就是汽车。它为清除不整齐的城市结构,以及用公园中以塔式建筑点缀的假乡村生活景色替换它,提供了依据。它为上流社会与中产阶级在郊区寻找假农村风味的环境,提供了交通工具。现代的规划未能完全成功,可是在破坏城市中心以及阻碍建设性地帮助下层阶级摆脱苦境方面,它却甚为得手。

密苏拉城市中心过去居民根本不多。居民区过去一直围绕和支持以商店、银行、商业机构、咖啡馆、饭店、旅馆与火车站组成的中心地带。由于汽车的离心拉力作用,这个中心维持不住了。郊区向外扩展很远,以致不能步行进城了,而开车到那里又不太方便。购物中心与大停车场在郊区纷纷建立。各种企业沿城边的公路建起了店铺。1978 年,密苏拉建起它禁止车辆进入的购物中心,那是一座赏心悦目的砖结构建筑,周围景色美丽,为山脉、山峰
130 所环绕。然而,一旦进到里边,就算你任何地方都去了,却觉得是空空如也,哪儿也没去。

同时,城里的商店都已关门歇业。火车站毁于州际间公路与飞机场的竞争压力。闹市商业区变得更冷冷清清了。1980 年,密苏拉市议会发现闹市衰败,并根据政府法律规定,指定它为税收增值区;该市、该县与该校区的房地产税冻结在 1978 年水平,一切由于房地产涨价而增加的税收遂不断流入密苏拉重建开发署。初始的点涓收入汇为汹涌的钱流,该机构用这些钱把破烂的房地产都

买下来，并且为开发、重修老旧建筑以及用帆布篷、购物中心、植树等美化市商业中心区，提供了资金。为银行与律师事务所新建用房，增加了停车场；城市中心看来正变为各种专门职业的服务中心。

在纽约、芝加哥、波士顿与西雅图，都曾发生在规模或程度上更不寻常得多的衰落与更新重建现象。高层建筑与城市商业网点是改组的显著标志。[25]但是，这种装修常为一种不现实的氛围所萦绕。多用途的摩天大楼与精心设计的商业网点都是自我中心的小世界，它们根本不理睬真正的城市形象。细心的观察者发现这些建筑是受控制的、不自然的、假的、表面上的——这样的感受令人不安，尤其当看到保存古建筑是为了给最流行、最精致的消费形式撑门面时，这种不安令人震颤。正是城市的超现实使这些批评者苦恼忧虑。[26]

平日的城市

虽然如此，要感谢上帝，真正后现代的城市继续存在，并且表现出反对超现实的颠覆或暗中破坏的信心。如果我们借用教堂日程表的词汇，我们可以称城市现实的两方面一为平日的，一为节日的，即日常生活的常见现实与庆祝的节日现实。

珍妮·雅各布斯一直是城市的日常现实的守护神。她的调解活动使现代主义对愉快的城市生活中常见城市结构的攻击中止了。那种结构的经纬就是交织在小街区方格里的街道。街道生活 131
是真实的，使人感到它的外观威严有致，感到它与时间、地点相连续。街道生活引起我们的注意与喜爱，因为它自己主动地顺利发

展,并且按自己的节奏继续前进。街道生活是能够受人喜欢的,无疑也是能被破坏的,但却不能被控制。

密苏拉建于 1864 年底,当时 C.P.希金斯、弗兰克·沃登与戴卫·帕蒂,在拉特斯奈克小溪流入克拉克福克河以西不远处建了个锯木厂。第二年,在连结密苏里河与哥伦比亚河的马伦公路旁边,又建了个面粉厂,把仓库也移到了这里。旅馆、商店与住宅跟着建立起来了。不怎么整齐的街道格网出现了。密苏拉开始兴旺繁荣起来。[27]当人们所关切的各式各样事情趋同一致,并且不论沿着街道或从街道这边到那边也好,都能继续互相连贯时,城市生活就出现了,就健康发展起来。你不能设计或控制城市生活;你能听任它发生,并且通过允许商店与住宅、制造业与零售业、实用的与奢侈的事物之共存,才能为促进城市生活的正确发展做出贡献。

一条街道展现一种无遮掩的、人们可以理解的秩序。面包店与其店主不同于杂货商与杂货店。我们闻到烤面包的气味;我们看到农产品正装上货车。相反,在超级市场,所有潜在于商品之内的差别及连接部分都被合并,被掩盖了。留给我们看的是商品的表面陈列。街道生活是有它的昼夜、季节的节律的。街道一大清早被迸发的忙碌声惊醒了,午前稍有放松,近中午又逐渐熙熙攘攘,下午再次平静下来,从下班到晚餐时间变得乱纷纷,到晚上安定下来,可平稳地进行各种活动。街道生活夏季常是比较懒散,秋季激动兴奋,冬季克制冷静,春季活力充沛。[28]然而,在照明很好、有空调设备、24 小时营业的超级市场,时间索然寡味地流逝,微乎其微地反映市场外现实世界的种种变化。

在密苏拉,城市生活从未完全消失。70 年代,这种生活在零

星分散的咖啡馆、饭店与商店还保持下来，然而，城市的结构质地已被撕扯得破烂不堪。80年代，它开始再生。商店开始在空地上建立，建筑物恢复到前一时期那样壮丽雄伟。近来密苏拉已开始解开现代早期天然物生产业的束缚（它一直是蒙大拿的祸根），逐 132
渐形成一种后现代经济。[29]密苏拉的木材工业日趋衰落；手工业、小规模生产、轻工业、专门化园艺以及专业服务日渐增长。

人们已回到城市中心工作、购物，到那里餐饮、聊天、走走、看看。当然，一个小城的城市结构，和一个大都市那种紧身、时尚的服装相比，是件宽松的便服。密苏拉根本没有像珍妮·雅可布斯所喜爱的哈得孙大街那么复杂的、节奏快速的沸腾生活，或者像威廉·怀特所喜爱的勒星顿大街那么不整洁而迷人的活力。[30]密苏拉的步行街从不拥挤；晚间与周末它们空荡荡。但密苏拉确实有令人愉快的挤满人的时刻和地方。希金斯大街北头、通向以前北太平洋铁路车站、堂皇雄伟的新文艺复兴建筑，现在供一个大饭店和小啤酒厂使用。这个建筑正东，市里划出一条旧的砖砌街道的一部分作为农贸市场，在夏季每周二傍晚与周六早晨营业。在马伦上校纪念碑和一个旧蒸汽火车头（它致使马伦上校修建的里程碑式的公路完全过了时）中间的地方，差不多有100个种植者、面包师、咖啡制造商，向悠闲的人们兜售他们的商品。种植者中最突出的是逃离越南高地的土人，在密苏拉山谷种植蔬菜大显身手。那里有个小戏台，有时被音乐家占用，经常总是有人坐在围绕它的台阶上喝咖啡。人们多是谈天而不是买东西，似乎是在织补着社会结构已磨损、绽线的边缘。孩子们生活得怎样？今年夏天情况可好？你能够参加那个聚会吗？你听说唐某人打算退休么？你遇见

克莱尔了吗？她刚搬到这儿住，她是位作家。有用的事物与十分有趣的事物都交织在一起了。

每周 3 中午，在距此向南 3/4 英里、希金斯大街跨越克拉克福克河的地方，他们也这样谈天说地。一个小露天圆形剧场，与河边碧绿草地、树木相对而立，在一个有瓦顶的购物中心开放。一个乐队正在那里演奏，大约有 30 个食品小贩把桌子与手推车摆在周围。1500 多密苏拉人正在这里用午餐，听着音乐，互相交谈着，彼此照应着。

133 由工业技术的隐藏状态和超现代的脆弱性形成的环境中，日常城市生活有一种令人人胜的坚实性与可理解性，是人类几千年来一向熟悉的秩序。这里有真实的空间，有界限，有形状，可居住，并可穿越。这里有真实的人，用他们的面部、手、足的姿态和他们的衣着、他们的镶宝石饰物，表达内心感情。这里有真正的差事，把衬衣送到洗衣店，在面包房买个菱形面包，从报摊买张报纸。平日的城市喜欢一种身体精力充沛、联系交往丰富以及以平安为方向的生活。不过，活力、方向以及联系性，必须扩大其范围与深度。如果真实的城市状态限制在平日的活力与多样性的孤岛之中，那么超现代主义潮流将冲蚀它的基础，平日的城市生活必将衰落或漂浮到超现实中。日常的现实应该与自然相连接，提高到节日水平，并且扩展到贫苦阶层。

一点自然物——花草树木——使平日城市生动活跃；大量的自然现象——大片大片的青草、灌木和树木——则扼杀平日的城市。街道像个扩大了的房屋内部。它是一种传统的人类高度集中与互相影响的设施。日常的东西不能和自然的东西相混杂，但它

应该同它相连接。它应该包括公园，应该有小径同乡村及荒野相连通。米尔瓦奇道路公司过去曾占据克拉克福克河南岸，它破产以后，密苏拉市获得这份地产，并把它改作公园，园内有一条小径穿经全城，并在其东边穿过赫尔盖特峡谷直达该河岸。几个公园与几条小径也在河北岸一块一块地凑集起来。有一块是卡拉斯公园，密苏拉人经常在夏天的每周三在那里吃午餐。另一条小径沿拉托斯奈克小溪延伸（该小溪是克拉克福克河北部的支流），延伸 7 英里后进入拉托斯奈克国家娱乐区；再经 8 余英里即达拉托斯奈克公共莽原区。

更大的城市有更长的小径。[31]不过，在每种情况下，真正的连接是城市同乡村的连接。人们由经验知道，从城市转变为农村决不是在屏幕上或挡风玻璃后一掠而过景色的变化，而是通过身体精力充沛，一步一步地从一般固定的环境前进到适合于生长发展的环境。经常跑步的人与经常散步的人，更深切地知道地势、风向以及太阳的方位，所以他们能更清楚地辨认世界中的正确方向。[32] 134

节日的城市

当召集专家们考察各个城市的公众生活时，他们时常发现那里的公众生活是分散的，使人迷失方向的，或者完全失去生命的。[33]这部分地是因为他们忽视公众生活的平日的一面。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面对的就是现代主义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公共领域最著名的所有地已经为这些事物而牺牲了：为技术工具、为运输与储藏、为高速公路与高层建筑。但甚至专家们调查分析的较好的一半也缺乏远见，从他们拿不稳究竟丢失了什么这一点就可

证明。他们通常能想到的最好补救办法就是:建立新型的城市,极力扩展空间,增强炫耀作用,把那些更忙碌、更摆阔气的各种各样的散步和交谈、穿戴和行动、卖和买的人们,集聚在广场或购物中心。[34]

然而,公众生活的最终实现,倒不在于日常生活过度活动的增加,而在于节日的庆祝。这种欢庆活动不需要,而且是不能够设计或制造出来的。它们鲜活于体育、艺术与宗教之中。它们未受到注意是因为它们的不稳定的、有时是其纯洁性遭到损害的情况。我们受技术发展方式的引导,已经不断采取精巧复杂的措施使庆祝机械化、商品化,把颁布庆典的重担转移给大功率的、隐蔽的机器,把参加者托付给一种能保证使他们兴奋与快乐的商品。[35]当技术向庆祝推进时,真正庆祝的要素——现实性、群体性与神性——就被削弱了,并终于被排除了。

体育中的现实性并不丰富,但极为重要。玩棒球,你需要的是一块平整的场地、四个垒、一根球棒和一个棒球。不过,对一项精彩的运动来说,这种现实性必须加以保护,以免被败坏。各垒的间距必须配置得当,棒球大小与弹力必须正确,球棒必须有其应有的硬度与重量。在有组织的棒球运动中,这种核心现实是受到尊敬与保护的;没有它,运动会变为闹剧。可是这真实的核心却总是被孤立起来,隔离起来,并且因超现实的环境,因人造草皮与带圆顶、有空调的场地而失去活力。这样,运动便成了适意的商品,观众成
135 了顾客。

不久前,人们对现实的渴望和对群体精神的向往在巴尔的摩有幸得以实现。当巴尔的摩的奥里奥尔斯公司决定建造一个新棒

球场时，该公司没有在城外选一块空地，当作一个有围墙、空调与人造草皮的宇宙飞船的降落地点，这种宇宙飞船也完全可以降落在德国法兰克福来举办足球赛，或者降落在日本东京来举办相扑比赛。相反，该公司和市、州当局合作，决定在闹市边缘一个被弃置的铁路调车场的旧址上建造棒球场，用公众娱乐代替公共事业。这块场地的一面以一巨大、令人肃然起敬的砖砌仓库为界。建筑师们没有拆掉它，却把它包括到运动场内当作右外场的背景，当作办公用地。运动场本身则以其砖砌拱门与仓库的石造部分相对应。它将使人忆起在芝加哥、底特律与波士顿的那些人们深爱的古老城市体育场的特征。它不仅向风、雨与太阳开放，也向巴尔的摩闹市区的名胜开放。各种比赛将在草地上进行。当你坐在运动场看台上时，你确实感到这里就是巴尔的摩，现在正是夏天，并且正在进行一场令人肃然起敬的传统比赛。[36]

需要有丰富的现实（如由组织机构提出计划、工程项目或资助等）才能激发人们的群体感。一个考虑周到、优雅的棒球场像为乐器调好音一样，能使人们思想感情协调一致。它能诱发共同的自豪感与愉悦之情、共同的季节与地点感，以及共同对一连串戏剧性事件的预料。在这种和谐气氛下，玩笑与笑声自然地荡漾于陌生人之间，并且把他们连成为一个群体。当现实与群体这样协同行动时，神性会突然降临这场运动或比赛，那是一种不具人格可是却有力量的神性。在真正比赛开始时，根本无法预知或控制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谁也不能左右或保证比赛的不息变化。这种变化在比赛或运动、游戏中展现出来。变化的起伏引起赞美与绝望，激起豪情和失败情绪，使人充满热情并且使人痛苦。这种变化起伏、扣

人心弦的比赛或运动永远比它所团结在一起的个人更伟大得多。

弗莱特黑德人、库坦奈人与彭德多瑞尔人聚集在印第安人居留地6月初举行的阿尔里集会仪式上，先是成群地兜圈子，随便到处坐下来，一面指指点点议论白人的衣服、食物、酒与烟草的好处与害处，他们的议论比白人旅游者的议论一点也不少。但是当他
136 们坐下来玩棍棒游戏时，却引起全场一阵兴奋，但很平静，那种使游戏者增加隐藏力量与看见力量的精气神，充溢在他们之间。当他们集合到大鼓周围不断歌唱、游戏时，他们沉浸于活力与荣耀之中。

神圣的棒球游戏正在密苏拉兴起，从“美国军团*队”经由“密苏拉棒球队”、“娱乐联队”，一直发展到“小联队”和种种投掷棒球游戏，不一而足。棒球是富有活力，广为流传的游戏。然而，重大的庆祝比赛活动需要聚焦更强的力量。这种活动的力量来自它能唤起多少人的注意，吸引多少人到场参与。一个小棒球联队就能聚集密苏拉人，并能聚焦市民的公众生活，能主导和高扬其群体意识。恰似一个新的棒球运动场的工程项目已经捕捉到巴尔的摩人的想像力那样，把一个专业棒球队带入密苏拉的计划，也到处鼓舞了人们的积极热情与合作精神。这些人对搞集体建筑并没有兴趣。吸引他们的友好善意的是棒球，是它的魅力与种种传统。群体总是围绕现实而产生或发展的。

但是现实也向群体或社会挑战。在什么地方修建棒球场？就建在郊外空地，用一连串汽车长长地枯燥地和城市连接起来？衰

---

* American Legion：美国全国性退伍军人组织。——译者注

退的现代经济留给巴尔的摩一个被弃置的铁路调车场的旧址，可供修建棒球场。它也留给密苏拉一块用地，那是在克拉克福克河南岸滨河公园正西锯木厂的旧址。这块用地距离商业中心和停车场都不远，步行即可到达，周围是住宅区。在那个位置建个棒球场会加强与城市的联系；在晚间与周末举行的许多比赛也会给正陷于懒散的、有气无力的城市生活增加活力与生气。但是在闹市区修建棒球场，则费用大得多，而且需要更多献身精神。

不论我们有怎样的忘我献身精神，棒球运动只构成有限的领域。当然，那是个丰富多彩、文雅的世界，由我们一些最好的体育运动撰稿人呵护，但它毕竟主要是男性的世界。它很少关心婚姻、生死，甚至更不把遥远时代与文化当一回事。与此相反，艺术则对所有这一切都加注意，把它们表现于文字、诗歌、动作以及那些大体上能聚焦与说明世界的种种事物之中。艺术的健康也是以现实、群体精神与神性的活力表现出来的。

艺术甚至比体育更加严重地被技术所破坏。在通俗音乐会 137
上，现实被撕裂为两部分，一边是巨大、复杂的表演机械，另一边是有诱惑力、过于昂贵的商品。先锋派艺术通过排斥或轻视群体，在社会中已占有一定地位。流行艺术虽然太肤浅不易蕴含神性，而高级艺术则是太收缩了的一种构成。在这些令人失望的极端之间，幸而存在着可喜的各式各样现实与群体的艺术。密苏拉人曾在1987、1990年举行国际合唱节，邀请并且庆祝这种艺术。来自加拿大、立陶宛、德国、意大利、乌拉圭、大瀑布城以及其他地方的合唱团集合到几十处地方，给成千上万人歌唱。他们的音乐涵盖广泛，从流行音乐到技巧音乐，从抒情音乐到严肃音乐，从世俗音

乐到圣乐，应有尽有。这些歌唱者所收集的世界，其深广程度决非任何世界丛书所能比拟，这一世界比最为激动人心的比赛或游戏包含着更多的痛苦与欢乐。

整整有一个星期，密苏拉成了个欢庆的群体；全市居民的能量集中于音乐。可是尔后这种能量变弱了，尤其是曾积极组织这一活动的市民核心集团的能量变弱了。是他们组织了音乐节，尽管缺少工作人员、资金与住所。他们以勇气弥补了上述所有不足，并竭尽全力支付所需款项。经过两年的恢复以后，他们将重聚他们的力量，或者像过去他们那样去做。*

在没有合唱节期间，艺术活动在密苏拉并没有停歇。有本地经常举行的诗歌朗诵、艺术展览、交响乐演奏会以及室内乐演出。密苏拉是个爱好体育运动与技艺的城市。体育运动与文艺，包括美术和大学文科，都牢固地编织入城市的质地中。而且体育运动把密苏拉的建筑环境与自然环境连接起来。有一条河穿经城市，招引人们钓鱼、漂流与游泳。河两岸有白杨树和青草地构成翠绿地带，其中有可供跑步的一些小径、游戏场和一个游泳池。也许有一天会在那里建个棒球场。跑步者、徒步旅行者、骑自行车旅行者以及滑雪者，会时常在城市与连绵山地之间穿梭般来来往往。

密苏拉对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说本来是个微不足道的挑战，可是已经保留它大部分优美文雅的建筑。在城东头，在赫尔盖特峡谷起点与克拉克福克河形成的小三角洲土地上，建有一个内有

---

* 据悉国际合唱节在2000年7月又在密苏拉市举行，而且邀请了古巴合唱队参加。——译者注

音乐学院与美术学院的大学。它是许多成绩斐然的作家卜居之处。但是创建社区庆祝的命运迄今未定，建立专业棒球队及其场 138
地的前景未定，合唱节也未定。此外，密苏拉城面对着希根斯桥南面昔日的米尔沃基车站，以及它北面的威尔玛剧院。前者，是个美丽的新罗马式建筑，现在面对滨河公园，作为一个饭店已经维持不下去了。后者，是密苏拉惟一像宫殿的电影院与节日礼堂，可能将同它目前的业主一起退出公众生活。在破败与商业发展之间，这个城市应该努力为公众的庆祝把这些醒目的地标搞到手。

公 共 政 策

如果把上述这些问题和大都市市中心贫民区的现实——破坏、暴力与贫穷——相比较，它们看起来并不重要，甚至有些奇特。我们若是不考虑到城市官员与社会工作者为控制、缓解这种痛苦所做的种种努力，我们就是傲慢自大。虽然如此，后现代现实主义还是向纽约和密苏拉提出这一同样的任务：即负责管理公众的庆祝事宜。关心和管理是公共政策中心之所在。它的任务就是：肩负起现代主义已对之丧失信心的重大职责，履行公正的义务，以及建设性地对付超现代的幽灵。

首先谈后一任务，这个问题与其说是阻止超现代主义，不如说是忠实于现实主义。鉴于我们作为公民不可避免地参与根本的、重大的决定，应该照料一下这件事，即这些决定必须公开确认政府有举行公众庆祝活动的责任。我们应该通过政治行动，确保艺术与体育在我们社区中拥有中央的与适合于节日活动的建筑物和场所，应有筹建公众庆典舞台的全部工作人员。

从理论上说,保守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都想要把这个任务留给各种志愿协会去做,保守主义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将是这种协会的主要控制者与喜爱者,自由主义者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希望当涉及追求优秀时,政府能保持中立。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决不是政府是否而是如何介入塑造这种有形的、道德上有决定意义的公众生活环境。并且实际上,政府同意负担运动场、比赛场、博物馆、音乐厅、体育项目、艺术与音乐学院的费用,同意帮助它们或给它们便利。

139 我们需要的并非激进的改革,而是从推进超现代的机器强有力地转向支持建立现实、群体与神性得以在庆祝活动中融为一体的场所。虽然密苏拉市需要各种各样的商业发展,加强与加速城市化组织,但它毕竟正确地拒绝了把滨河人行道让给商业主义。它帮助密苏拉儿童剧场获得了空着不用的中心学校建筑,因而已经为社区庆祝保存了一块场地,它也许还可能保存甚至建立其他庆祝中心。

宾夕法尼亚车站 1963 年被彻底摧毁。5 年以后,纽约市地标保护委员会成立。自那以后,不少可用于庆祝的建筑被保存、恢复,有些是由私人企业做的,有些是由城市当局做的。虽然纽约对建筑物的公共管理记录一向还不错,可是对土地管理欠佳。创建巴特里公园城保存了沿哈得孙河公共空地,但是前宾州铁路用地以及纽约圆形大剧场占用的土地,却未经任何手续便留给了私人股份。[37]

显然,没有强有力的支持,公众庆祝的地方将仍然在城市环境中处于不重要的地位。但即使在政府力图保留地标以及创建公共

使用空间的地方，其结果很多时候却令我们失望。不是庄严的历史建筑有着酷似其俗不可耐的现代兄弟建筑一样的商业、官僚气或夸耀性消费的内容，就是有些公共空地其开辟出发点虽好，但一直是空无一物。甚至计划极佳的工程项目都未能信守其诺言。[38] 理查德·森奈特抱怨道：

> 我们的文化正因过量的千篇一律而受到损害。就以巴特里公园城这个曼哈顿南部最近的大规模开发地为例，它修建得看来更像这个城市，而不像有别于其他建筑的工程。它是暗灰色的，构造相同的。它的社会功能明显落空，令人痛心；其建筑内外的公共空地几乎总是空荡荡的。[39]

当然，有些公共庆祝活动的地方，就其本质来说，大部分时间只能空着，像棒球场与音乐厅就是这样；有些地方，像公园，部分时间就没人，是空的。既要区分日常娱乐与节日庆祝的不同，也要认 140
清它们之间的连续。街道、球场、花园、广场、市场、喷水池与纪念碑是终日极为热闹的地方，人们在那里歇脚、谈天、就餐、看书，享受他们城市的乐趣。每当街头演奏音乐家、耍把戏者，或魔术家表演，欢庆的人群在表演者周围围观时，快乐和乐趣便升华为小规模的庆祝了。日常的乐趣与庆祝也需要更加坚决、慷慨的市政府的支持。城市当局应该劝导各企业开放其经营场所，要热情好客，并且必须保护街头的人们不受他们的旧对手、商人们的侵扰。[40] 实际上，城市当局应保证能为街头音乐设立欢庆的环境与舒适的座位，

并且提供进行试听、预定节目、日期等的工作人员，只要发现有的地方需要，就这样做。城市当局应该为音乐家与听者服务，可是，不应想方设法去控管、布置安排什么事情。

虽然如此，支持欢庆的与聚焦的庆祝活动这一最困难、最重要的任务，应仍然留交政府去做。因为正如庆祝场地，如没有公众的支持，只能限于边缘地带一样，许多庆祝活动的演出，如果交由私人财力设法解决，则使其稳定性落空。稳定的社区庆祝活动，即便在名义上也绝非私人赞助的活动。公司的赠予、市政的设备以及税收的优惠，都直接或间接包含公众对交响乐团、博物馆与球类俱乐部的支持。但只有这些还不够，需要做得更多些。密苏拉的合唱节，如果不是公众通过市政府作出支撑它的根本性决定，将是时有时无、非常不稳定的事情。

当喜欢搞庆祝活动的共产社会主义提上政治日程时，我们不能完全希望它引起的争论会比街道边石－和－排水沟自由主义引起的少。[41]在任何情况下，庆祝总比街道边石和排水沟将成为更具实质性的公众辩论的论题。不过，我们应当小心不要采用现代主义的策略，把庆祝提上后现代的日程。任何人不应策划一些机制与措施，以便一劳永逸地保证庆祝活动的挑选及资助。[42]后现代现实主义的政策是专心致力于这一特殊的庆祝群体，然后再致力于那一庆祝群体。密苏拉市议会高兴地用 1 万元研究建立高尔夫球场的可能性，可是它又为花费不足该款 1/5 创立一文化委员会而
141 困扰不休。有系统地进行不过是借用自由主义的武器而终至因自由主义的偏见无法进行而已。最后，当然，充满活力的公民权利要求：公民对话要等于公民实践。公众需要增强对公共庆祝的意识

与信心，这样他们就能够以公民权利而不是通过消费者权利，取得难以得到的东西。

自然，当公众对话转到公共或社区的庆祝上时，将激烈地提出宽容与不偏不倚的问题。为什么支持合唱节而不支持爵士乐节？为什么支持音乐而不支持高尔夫球赛？怎样照顾乘摩托雪橇的人的利益？开明的批评家在与共产社会主义者的争辩中，很快解决了这些特殊问题，并且逐一地责难共产社会主义者很容易受托尔克马达*们、斯大林们、希特勒们与波尔布特们的蒙骗。他们举出更好的理由指出现时民族的、宗教的与种族的冲突实例。[43]对开明的人们第一个回答就是提醒人们记起这一件事：政府在维护公共秩序的道德建树方面决不是中立的。超现实主义对后现代现实主义的偏见，比后现代现实主义对超现实主义的偏见一点儿也不少。民族的或宗教的分化本身，时常不过是不平等的技术富裕分配的借口而已。

虽然如此，确有更具建设性的回答。焦点现实主义，公共或社区的庆祝出发点，本质上乃是一种消除盲信、狂热的抗毒药物。迷恋于音乐的人让他们孩子学音乐课程；他们邀请邻居、力劝朋友到音乐会听音乐。他们愿意自己搞音乐，但是他们并不排斥赛跑的人或责难作家。事实上，他们自己可能就跑步或写作，或者就有爱跑步和写作的配偶或熟人。各庆祝社区的交错互动作用可为各社区提供的是共同体，而不是宗派的社会。[44]

---

* Torquemadas(1420 – 1498)，西班牙的第一任宗教裁判所长，以冷酷闻名。——译者注

此外，政府应该提高警惕，防止狂热与招人忌恶的做法。在公众支持群体或社区进行庆祝方面，至少应遵守两项原则——公开的成员资格与提供资金要有竞争性。公开的成员资格意味着任何人，不论阶级或民族，只要他或她挚爱群体或社区所庆祝的事情，就能够参加该群体。[45]在阿尔里部落印第安人的欢庆仪式上，总有
142 些白人，一般是男子，对这些土著美国人服装的华丽以及他们舞蹈表现的力量，特别感兴趣，于是他们也穿戴起来，参加舞蹈。稍带讽刺意味的是，他们部落间的联系是由土著美国人和由自愿参加舞蹈的白人两者建立起来的。可是，就印第安的文化而论，土著美国人是背负着独一无二的礼物与重担的人。

上述阿尔里印第安人欢庆仪式并不接受直接的公众资助，而是依靠人们的慷慨解囊。不过，任何确实接受公众支持的群体，必须是向群众开放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而且，它应当时常说明自己的活动以及公共资金开支情况，常常考虑到那些资金说不定何时会中断。政治任务就是力求保持稳定性与责任感之间微妙的平衡。没有什么可以保证这种平衡的公式，也没有什么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哪个群体将得到支持、哪个得不到支持的公式。为什么合唱节在密苏拉是个看好的得到支持的候选者？因为密苏拉有个设有音乐系的大学。该系合唱队的指挥具有远见与能力，而且他已经激励这个群体行动起来。这就是情况的实质。在后现代现实主义中，实质告知做事情的步骤。

在庆祝的群体中实行公开成员资格的做法，为公平参与提供新的机会，所以公众对日常城市生活乐趣的关注也一定是这样。新的机会之所以必需，是因为自由主义对公正的追求已经陷于困

境。当然，视公正为一种平等，这本身就是现代自由主义留给后现代现实主义的重大、珍贵的遗产。更应特别指出的是，约翰·罗尔斯已经提出极谨慎细心、富有同情心的关于自由主义的公正设计。但是该设计未能激起学界以外人们的热情，并且一方面它几乎禁止公众支持庆祝的群体，另一方面则完全对超现代制定的规格与暗中破坏持开放态度。[46]

自由主义的公正是极不完整的。可是，不应摈弃它，而应修正、补充它。不要把我们的全部精力仅用于靠正式权利与公平机会来提高公民的会员资格，我们应认识到，公民会员资格本质上、实际上是在共同庆祝中实现的。在庆祝中，富人不是在帮助穷人；是他们加入穷人之中。[47]群体是一种富有成效地介乎私人密切与公众无名之间的个人关系，即它不像私人关系那样密切，也不像公众关系那样不为人所知，而是介于二者之间的那种关系。密切性 143
将有共同道德信念与经济条件的亲友们结合起来。密切性被扩展到更大范围的群体是假装的，贫富间假装的密切是欺骗性的。[48]无名性是大众社会中个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人所共有的不过是经济政治活动需要的工具性事物、公共事业与官僚机构。无名性已经使富人更容易忽视穷人。

群体是建立在具体条件上的善意关系。在参加庆祝活动的群体中，条件是由所要庆祝的现实规定的。当人们每星期六上午参加在芝加哥的湖滨平地举行的垒球比赛时，他们承认他们并不共有他们的私人财物与信念；他们只是为了比赛才聚集在一起的。虽然场地的界线与比赛规则成为他们合作的一定限度，但是划出赛场的界线和遵守比赛规则是有价值的，很有意义的事情。赛场上激励人们展露他们的坚韧、他们的雅量、他们的勇气与他们的幽

默。并且如果事情进行顺利,无限的热情使他们奋发充满活力,使他们团结一致。

天国的城市

这些人会把他们的一些热情带到他们不同的社会岗位。喜欢举行庆典的群体会把欢庆气氛与协调一致的精神向社会放射。它本质上是聚焦的;它放射而又收集。它收集过去的事,犹如它为中年垒球运动员做的那样:他稳稳地站在本垒上,回忆着、模仿着厄尼·邦克斯;它为年轻的接球手打开了未来前途,他想赶上或超过卡尔敦·菲克斯。棒球,以它对纪录与统计数字的爱好,有着广泛基础与很多层次的组织,也许比这个国家中任何其他单一机构具有更大的聚焦力量。它是抗御超现代群众的真正堡垒。虽然它也受过度活动冲击和超现实磨损消耗之害,它仍然是人们真正参加庆祝的领域。如果我们有像它那样令人肃然起敬的威仪,我们一定能明智地行动,充满活力地遏制超现代主义。

当然,还需要做更多的事情。我们不仅必须维护与建立更多棒球场与运动场;我们还必须在我们城市内为其他体育运动保留与清理出些中心空地,为音乐会、博物馆、学院,为跑步与游戏,为唱歌与跳舞,为绘画与雕塑保留与清理出些中心空地。我们应该敬重并且经常做我们很了解、确信的一些了不起的事情,如网球、
144 体操、巴罗克音乐与爵士乐、伦勃朗* 与亨利·穆尔**。但是谁能知

---

* Rembrandt(1606 - 1669),荷兰画家、版画家。——译者注

** Henry Moore(1898 - 1986),英国人,20 世纪西方最重要的雕塑家之一。——译者注

道哪些种类的庆祝将出现，又知道在哪里举行呢？后现代现实主义不是一种关于舞台与节目单的思想体系，而是灵活性与合作的问题。

这样结束问题会是不诚实的。这会压制一种深切需要与至关重要的共同的庆祝：即宗教。人们感到极愿意能掌握范围广泛、充分理解的方向。是人就要有支配、利用一切事物之始终的能力，并且有能力在其中寻得一定位置。尽管艺术与体育具有强有力的现实性，但它们仅仅是整个世界的部分景物，但它们却是靠不住的礼物，人们无法借此在世界中，得到一块优雅、和平的地方。现代神学家们曾尝试证明，只有以宗教才能克服人类的根本缺陷。[49]如果这种尝试在那时候曾是可望成功的事业的话，它已经和现代主义一起终止了。我国大多数人都在宗教中寻觅正确方向，现在这完全是事实。他们一定是出于实际需要才这样做的，因为不论人们可能对不久前的现代时期提出什么责难，它并没有强制或诱骗人们去基督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或寺庙。同信奉民主政治相比较，美国人显然更信奉宗教。[50]

这并不是说，人们的需要就可以由宗教充分满足了。实际上，单单把这个问题当作公共政策提出来，都会给美国人带来巨大困难。我们现在把美国宪法第一条修正案看作是使宗教问题和公共广场隔离开的一道墙，虽然无论这一修正案的缘起或是它的措辞，都没有要求建立这堵墙。[51]无论是什么历史的偶然性导致了竖立这堵墙，它同时也被给予了自由灵活的基础。这种自由主义的论点是：只有暂时把我们个人的信仰搁置一边，我们才能够就公平、持久的社会秩序取得一致意见。但是如果一个人坚信宗教，那么，

这种搁置,如有的话,也是由信教的人以宗教理由做出来的。如果我们对这一搁置是出于那个人的宗教信仰而感到不满意、不相信的话,我们还怎么能要求这搁置或是依赖它呢?那么,我是在为民主主义与社会公正寻求宗教根据么?如果存在后现代政治话语的普遍原则,它只能是:让人人以第一人称单数形式和复数形式说话。

145 我们基督徒无例外地从基督那里学得我们对每个人的同情与关心。他的榜样已经教导我们忍耐。他的教导继续活在回到他那里的群体中。他的楷模常常在似圣徒般的人们中具体表现出来。尤其对我们天主教徒来说,基督教就是这个活着的群体,因举行圣餐仪式庆典从而生气勃勃。

天主教会经受的现代主义损害极大。在她的历史上,她第一次不能占用周围的文化,使之专为圣用。最初,她退守到中世纪思维方式与建筑风格,一面坚持与世俗化疏远,一面却使她的经营管理屈从现代主义的掠夺性与有条不紊的工作趋势。在本世纪后半期,她抛弃了她曾留下的文化真义,从而证明她自己没有能力在她自己的共同秩序中,接受并且履行民主制这一完全精神的与政治的任务。

虽然如此,我们圣公会修士修女的功德,尚可告慰。一座引人瞩目的后现代宗教庆典的纪念物就是曼哈顿北部的圣约翰大教堂。在欧洲人眼里,它是美国及美国文化的象征,无边无际,没有完结,充满智慧而且精力充沛。天主教会主教团想要抓紧神性不放,却回避现实,轻视群体。因此,教会患病于中心,仅仅主要在城市外围与犹太人中幸存下来。圣约翰大教堂中的人们认识到:神

性应该变成实在的;艺术,昔日曾是宗教之女,现在能成为她的姐妹。真正的艺术是揭露焦点的现实,这本身就是神圣的,纵使是试探性的。于是便把各种艺术品藏置在大教堂,并且成为礼拜仪式的一部分;还有一批批的舞蹈家与音乐家;有住在教堂里的艺术家与手艺人的工作室。[52]

神性与现实性激励鼓舞群体。圣约翰大教堂一直实行公开会员资格的原则,一切阶级、语言与教派的人都受欢迎,只要他们乐意参加圣餐庆典。这种庆典是按照神圣庄严的公祷书进行的,但它一直欢迎犹太人、佛教信徒、神道信徒及非洲人的祈祷与圣礼。当我们被邀请参加并因神圣庆典而感到生命清新充满活力时,我们就要去帮助年老体弱者慢慢站起,走过来参加;当有很多人不能行走时,仅仅开开门是不够的。确信自己的位置的人,也有耐心扶 146
助那些刚能站立起来的人慢慢前行。神圣的耐心最后终于流行开了。因此,圣约翰大教堂的人们给饥饿者食物,收留无家可归者过夜,为穷人建房,照料年幼者,不论他们是否在这大教堂作礼拜。[53]

像圣约翰大教堂这样的教堂值得公众支持。它间接地接受公众帮助,如通过它的免税地位,通过用于住宅项目的市政基金。一般说来,政府乐意资助教会增进社会福利;公众大都倾向于接受并且喜欢神圣的建筑物。[54]当有些基督徒的尽力救助行为被当作社会公正,他们的圣所被当成文化遗产时,他们可能感到未受到适当的重视。天主教信仰和教义在我国的复兴,无论如何,都依赖于它是否与民主下的平等和当代文化取得和解。这就是后现代精神、献身于宗教的精神召唤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不应放弃市中心的大教堂,而应以圣约翰大教堂为榜样,设法谋求与政府、基金会、地

区协会、姐妹教派、艺术家、少数民族以及妇女团体等进行灵活的合作。

1989年6月11日星期日下午,4千人聚集在圣约翰大教堂,参加为主教保罗·穆尔告别纽约主教区举行的仪式。用英语、西班牙语与法语诵读了圣经。圣奥古斯丁的新约福音书唱诗班吟咏了赞美诗;大教堂学校唱诗班的男童歌手也吟咏了赞美诗;詹姆斯·泰勒也吟咏了赞美诗。一位黑人男市议员、一位女议员、耶鲁大学校长和一位主教讲了话。他们都赞美并且感谢这位即将离任的主教,称他是这个国家希望的化身,是一位具有婆罗门教特征与遗产的人,他已经成为穷人与无权势者的代言人,他向他们敞开教堂,他和妇女、少数民族、同性恋者拥抱。

那天下午,穆尔主教给予了主教区他最后的告诫,结束时说:

> 你们是恩受上帝之美的信使。要抱有希望,要坚强,要勇敢,要自由,要诚实,要仁爱,要向人们展示圣城的美景。不断除去遮蔽你们眼睛的障碍物,以便能清楚地看到圣城,决不要停滞不前,直至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立起耶路撒冷。[55]

147 当整个仪式看来似乎已结束时,他开始从大教堂的中殿走下来,像连祷似地唱出主教辖区中所有常到教堂作礼拜的教徒的名字;又停下来,颤巍巍、慢悠悠地向前移步,穿插点缀些轶事趣闻,并停下来向朋友们致谢。他把会众拥抱在他的歌声里,笃爱上帝的人们依次拥抱他。

注　　释

第 1 章

1　C.默里:《失去阵地:美国的社会政策》,1950 - 1980 年(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4 年),和 T.索厄尔:《许多设想的冲突》(纽约:未来出版社,1987 年)。这些思想感情当然可追溯到 E.伯克的《法国大革命的反思》(1790 年)。[Charles Murray, *Losing Ground: American Social Policy, 1950 - 1980*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and Thomas Sowell, *A Conflict of Visions* (New York: Morrow, 1987), These sentiments go back, of course, to Edmund Burke's 1790 *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

2　见 R.J.诺伊豪斯:《光秃秃的公共广场:美国的宗教与民主》(大瀑布城,密执安州:W.B.伊尔德曼斯,1984 年);J.P.迪金斯:《美国政治学失去的精华:美德、私利与自由主义基础》(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4 年);M.J.桑德尔:《程序上的共和国与不受阻碍的自我》,载《政治理论》,12 期(1984 年),第 81 - 96 页;R.N.贝拉等人:《心灵的习惯:个人主义与美国人生活中的奉献精神》(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 年);C.拉希:《自我陶醉的文化:希望递减时代美国人的生活》(纽约:沃纳书店,1979 年);以及 P.斯莱特:《追求孤寂:处于极点的美国文化》(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70 年)。[See 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Mich: W.B. Eerdmans, 1984); John P. Diggins, *The Lost Soul of American Politics: Virtue, Self-Interest, and the Foundations of Liber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Michael J. Sandel, "The Procedural Republic and the Unencumbered Self." *Political Theory* 12 (1984): 81 - 96; 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Individualism and Commitment in*

American Lif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Christopher Lasch, *The Culture of Narcissism: American Life in an Age of Diminishing Expectations* (New York: Warner Books, 1979); and Philip Slater, *The purstuit of Loneliness: American Culture at the Breaking Point* (Boston: Beacon Press, 1970).]

3 尤尔根·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T.麦卡锡翻译,两卷。(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85 – 1987 年),和 B.R.巴伯:《强大的民主制:新时代的参与政治学》(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4 年)。[Jürgen Habermas,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trans. Thomas McCarthy, 2 vol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5 – 1987), and Benjamin R. Barber, *Strong Democracy: Participatory Politics for a New Age*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4 为了解相似的、历史涵盖更广泛的要略,参见 C.米查姆:《探索科学、技术与社会的新关系》,载《社会中的技术》11 期(1989 年):第 409 – 417 页,和《对待技术的三种方法》,载于《从人工制品到对技术的关键性啮合的研究》,G.L.奥米斯顿编辑(伯利恒,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31 – 59 页。[For a similar, historically more comprehensive schema, see Carl Mitcham, "In Search of a New Relation betwe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 *Technology in Society* 11(1989):409 – 417, and "Three Ways of Being-with Technology," in *From Artifact to Habitat: Studies in the Critical Engagement of Technology*, ed. Gayle L. Ormiston (Bethlehem, Pa.: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31 – 59.]

5 H.-G.克劳佐特:《毕加索的奥秘》,法国 1955 年;彩色电影,85 分钟。[Henri-Georges Clouzot, *The Mystery of Picasso*, France, 1955; color, 85 min.]

6 为了解我们外债最近情况,参见 P.帕塞尔:《经济比赛中美国的名次》,载《纽约时报》,1990 年 3 月 4 日,第 4 节,第 4 – 5 页。[For a recent picture of our foreign debt, see Peter Passell, "America's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Race," *New York Times*, 4 Mar. 1990, sec. 4, 4 – 5.]

7 B.M.弗里德曼:《冠军隐瞒的问题》,载《纽约书评》,1988 年 10 月 13 日,第 37 页。[Benjamin M. Friedman, "The Campaign's Hidden Issu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3 Oct. 1988, 37.]

8 C.B.甘斯:《是电视使美国选民不感兴趣吗?》载《纽约时报》,1988 年 3 月

7日,第4节,第24、28页。另见F.F.皮文、R.A.克洛沃德:《为什么美国人不投票》(纽约:潘塞翁,1989年)。[Curtis B. Gans, "Is TV Turning Off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Times*, 7 Mar. 1988, sec. 4, 24 and 28. See also Frances Fox Piven and Richard A. Cloward, *Why Americans Don't Vote* (New York: Pantheon, 1989).]

9 在1986年,所有18岁以上的美国公民有87%的人领有驾驶汽车执照。参见《美国1990年统计摘要》(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商业部,1990年),第13、608页。在1990年,96%的家庭都有彩色电视。参见J.范:《电视对社会的影响未减速》,载《芝加哥论坛报》,1990年6月3日,第7节,第1页。[In 1986, 87 percent of all U.S. citizens over eighteen were licensed to drive. Se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90* (Washington, D.C.: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0), 13 and 608. In 1990, 96 percent of all homes had color television. See Jon Van, "T.V.'s Impact on Society Not Slowing," *Chicago Tribune*, 3 June 1990, sec. 7, 1.]

10 《48个州选举中的实际投票人数下降》,载《密苏拉人报》,1988年11月14 150
日,第10页。["Voter Turnout Shows Decline in 48 States," *Missoulian*, 14 Nov. 1988, 10.]

11 T.弗格森、J.罗杰斯:《美国向右转的神话》,载《大西洋》,1986年5月,第43-53页,和《经济利益的投票》,载《科学美国人》,1986年7月,第62页。[Thomas Ferguson and Joel Rogers, "The Myth of America's Turn to the Right," *Atlantic*, May 1986, 43-53, and "Pocketbook Voting,"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86, 62.]

12 R.海尔布伦纳:《资本主义的胜利》,载《纽约客》,1989年1月23日,第107-108页。[Robert Heilbroner, "The Triumph of Capitalism," *New Yorker*, 23 Jan. 1989, 107-108.]

13 C.詹克斯:《如死般寂静的街坊四邻》,载《新共和》,1988年6月13日,第23-32页。[Christopher Jencks, "Deadly Neighborhoods," *New Republic*, 13 June 1988, 23-32.]

14 M.富门托:《流行病的政治用途》,载《新共和》,1988年8月8日或15日,第19-23页。[Michael Fumento, "The Political Uses of an Epidemic," *New Republic*, 8/15 Aug. 1988, 19-23.]

15 E.A.纳德尔曼:《合法化的论据》,载《公众利益》,92期(1988年夏):第

14、24 页。[Ethan A. Nadelmann, "The Case for Legalization," *Public Interest* no.92(Summer 1988):24,14.]

16 J.霍根:《行为中的无知》,载《科学美国人》,1988 年 11 月,第 17 页。[John Horgan, "Ignorance in Ac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Nov.1988,17.]

17 L.C.瑟罗:《美国麻醉品政策:惊人的无知》,载《纽约时报》,1988 年 5 月 8 日,第 4 节,第 29 页。[Lester C. Thurow, "US Drug Policy: Colossal Ignorance," *New York Times*, 8 May 1988, sec.4,29.]

18 M.伊西可夫:《有两个层次的麻醉品文化出现》,载《华盛顿邮报》,1989 年 1 月 3 日,第 A3 页。[Michael Isikoff, "'Two-Tier, Drug Culture Seen Emerging," *Washington Post*, 3 Jan.1989, A3.]

19 B.坎特罗威茨:《三人不欢》,载《新闻周刊》,1986 年 9 月 1 日,第 68 – 76 页,和 M.斯米尔吉斯:《丁客族到这里来了》,载《时代周刊》,1987 年 4 月 20 日,第 75 页。[Barbara Kantrowitz, "Three's a Crowd," *Newsweek*, 1 Sept. 1986, 68 – 76, and Martha Smilgis, "Here Come the DINKs," *Time*, 20 Apr. 1987,75.]

20 L.M.弗里德曼:《完全的公正》,(纽约:罗素·塞奇基金会,1985 年),第 43、60 页。[Lawrence M. Friedman, *Total Justice* (New York: Russell Sag Foundation, 1985, 43, 60.]

21 同上引书,第 154 页。Ibid, 154.

22 "对不起,你的政策被取消了",载《时代周刊》,1986 年 3 月 24 日,第 16 – 26 页。["Sorry, Your Policy Is Cancelled," *Time*, 24 Mar. 1986, 16 – 26.]

23 C.西斯特尔:《论刑法中完全责任的使用》,载《加拿大哲学杂志》,17 期(1987 年):第 395 – 407 页。[Christine Sistare, "On the Use of Strict Liability in the Criminal Law," *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7(1987):395 – 407.]

24 J.奥康内尔和 R.J.西蒙:《为疼痛与痛苦付款:谁想要什么、什么时候要、为什么要?》,伊利诺伊大学《法律论坛》(1972 年):第 1 – 55 页,以及奥康内尔和 T.M.贝利:《为疼痛与痛苦付款的历史》,伊利诺伊大学《法律论坛》(1972 年):第 83 – 109 页。[Jeffrey O'Connell and Rita James Simon, "Payment for Pain and Suffering: Who Wants What, When and Why?"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Forum* (1972):1 – 55, and O'Connell and Theodore M. Bailey "The History of Payment for Pain and Suffering," *University of Illinois Law Forum* (1972):83 – 109.]

25 弗里德曼:《完全的公正》,第 154 页,和奥康内尔、西蒙:《为疼痛与痛苦付款》,第 1 - 2 页,第 5 页。[Friedman, *Total Justice*, 154, and O'Connell and Simon, "Payment for Pain and Suffering," 1 - 2, 5.]

26 奥康内尔和西蒙:《为疼痛与痛苦付款》,第 26 - 27 页。[O'Connell and Simon, "Payment for Pain and Suffering," 26 - 27.]

27 A.C.米凯洛斯:《10 年期间 30 个国家中的乐观主义》,《社会指标研究》杂志,20 期(1988 年):第 177 - 180 页。[Alex C. Michalos, "Optimism in Thirty Countries over a Decade,"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 (1988): 177 - 180.]

28 A.莱昂斯:《重访美国》;J.X.哈里奥特:《美国外交政策:一位欧洲人的观察》;D.埃尔利:《来自国外的报告》;和 J. - Y.卡尔韦兹:《美国与美国教会》,载《美国》,158 期(1988 年 5 月 7 日):第 470 - 484 页。[Adrian Lyons, "The United States Revisited", John F. X. Harrio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 European Perspective"; David Elly, "A Note from Across the Border"; and Jean-Yves Calvez,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 S. Church," *America* 158 (7 May 1988): 470 - 484.]

29 美国议程有限股份公司,G.R.福特与 J.卡特,董事长:《美国会议议程:向美国第 41 届总统报告》(坎普山,宾州:当月书俱乐部,无日期);B.M.弗里德曼:《在经济困境中》载《纽约书评》,1988 年 12 月 22 日,第 18 - 19 页;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技术与美国经济变化:适合将来要求的人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处,1988 年,第 15 - 54 页,第 443 - 463 页;S.伯杰等人:《走向新工业的美国》,载《科学美国人》,1989 年 6 月,第 39 - 47 页;和 G.C.洛奇:《该是美国经济重建的时候了》,载《大西洋》,1989 年 4 月,第 35 - 36 页。[American Agenda, Inc., Gerald R. Ford and Jimmy Carter, Chairmen, *American Agenda: Report to the Forty-Firs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mp Hill, Pa.: Book-of-the-Month Club, n.d.); Benjamin M. Friedman, "In an Economic Fi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Dec. 1988, 18 - 19; U. 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Choi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 C.: U. 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15 - 54, 443 - 463; Suzanne Berger et al., "Toward a New Industrial America,"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89, 39 - 47; and George C. Lodge, "It's Time for an American Perestroi-

ka," *Atlantic*, Apr. 1989, 35 – 36.]

30 《韦伯斯特的第 9 版新大学词典》,参看"活动过度的。"[*Webster's Ninth New Collegiate Dictionary*, s.v. "hyperactive."]

151 31 S.W.波杰斯、K.M.史密斯:《给过度活动下定义:心理生理学的与行为的策略》,载于《活动过度儿童》,C.K.惠伦、B.亨克尔编辑(纽约:学会出版社,1980 年),第 75 – 104 页,和 A.J.赞麦特金等人:《童年时就有多动症的成年人大脑葡萄糖的新陈代谢》,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323 期(1990 年 11 月 15 日),第 3 节,第 1361 – 1366 页。[Stephen W. Porges and Karen M. Smith, "Defining Hyperactivity: Psychophysiological and Behavioral Strategies," in *Hyperactive Children*, ed. Carol K. Whalen and Barbara Henke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0), 75 – 104, and A.J. Zametkin et al., "Cerebral Glucose Metabolism in Adults wish Hyperactivity of Childhood Onset,"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23 (15 Nov. 1990): 1361 – 1366.]

32 S.拉巴顿:《对 B.杰弗里斯的审判与错误》,载《纽约时报》,1989 年 1 月 15 日,第 3 节,第 1、10 页。[Stephen Labaton, "The Trials and Errors of Boyd Jefferies," *New York Times*, 15 Jan. 1989, sec. 3, 1 and 10.]

33 L.沙姆斯:《贪婪工作》,载《纽约时报》,1988 年 12 月 4 日,第 2 节,第 30 页,和 J.霍利、B.卡罗尔、B.R.利特尔:《生活方式的类型学》,载《社会指标研究》杂志,20 期(1988 年):第 383 – 398 页。[Lawrence Shames, "A Greed for Work,"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4 Dec. 1988, sec. 2, 30, and James Horley, Barbara Carroll, and Brian R. Little, "A Typology of Lifestyl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1988): 383 – 398.]

为了证明工作量与力量大小的相互关系,另见 F.P.斯塔福德、G.J.邓肯:《美国家庭使用时间与技术的情况》,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F.T.贾斯特、斯塔福德编辑(安阿伯,密执安州:调查研究中心,密执安大学,1985 年),第 253、257、270、271 页,和 J.P.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一个历史概观》,同上引书,第 308, 309 页。[For evidence that the amount of work and the amount of power are correlated, see also Frank P. Stafford and Greg J. Duncan, "The Use of Time and Technology by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ime. Goods, and Wellb-Being*, ed. F. Thomas Juster and Stafford (Ann Arbor, Mich.: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253, 257, 270, 271, and John P. Robinson, "Changes in Time Use: An His-

torical Overview," ibid., 308 and 309.]

34 M.帕克、J.斯劳特:《紧张管理》,载《技术评论》,1988 年 10 月,第 37 – 44 页。[Mike Parker and Jane Slaughter, "Management by Stress," *Technology Review*, . Oct. 1988, 37 – 44.]

35 美国国会,技术评价部:《技术与美国经济变化》,第 382 – 383 页。[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382 – 383.]

36 贝拉:《恢复公益》,载《公共福利》杂志,114 期(1987 年 12 月 18 日):第 740 页。另见 J.法洛斯:《困难艰苦的生活》,载《大西洋》,1989 年 5 月,第 16 – 26 页。[Bellah, "Resurrecting the Common Good," *Commonweal* 114 (18 Dec. 1987): 740. See also James Fallows, "The Hard Life," *Atlantic*, Mar. 1989, 16 – 26.]

37 R.德沃金:《新英格兰》,载《纽约书评》,1988 年 10 月 27 日,第 58 页。Ronald Dworkin, "The New Eng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7 Oct. 1988, 58.]

第 2 章

1 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冒风险的社会预测》(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3 年]1976 年),第 53 – 54 页。[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1976), 53 – 54.]

2 同上引书,第 34 – 36 页。Ibid., 34 – 36.

3 E.R.柯蒂厄斯:《欧洲文学与拉丁中世纪》,W.R.特拉斯克翻译(伦敦:鲁特莱芝出版社,1953 年),第 251 – 254 页,和 J.哈贝马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载《新德国评论》杂志,22 期(1981 年冬):第 3 页。[Ernst Robert 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and the Latin Middle Ages*, trans. Willard R. Trask (London: Routledge, 1953), 251 – 254, and Jürgen 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 *New German Critique* no. 22 (Winter 1981): 3.]

4 柯蒂厄斯:《欧洲文学》,第 20 页。[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20.]

5 哈贝马斯:《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第 3 – 4 页。[Habermas, "Modernity versus

Postmodernity,"3 – 4.]

6 柯蒂厄斯:《欧洲文学》,第 20 – 24 页。[Curtius, *European Literature*, 20 – 24.]

7 M.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载于 K.伯恩卡姆、G.埃贝林格编辑《文选》,6 卷本(法兰克福:英塞尔,1982 年)第 1 卷:第 238 – 263 页。[Martin Luther, "Von der Freiheit eines Christenmenschen," *Ausgewahlte Schriften*, ed. Karin Bornkamm and Gerhard Ebeling, 6 vols. (Frankfurt: Insel. 1982) 1: 238 – 263.]

8 J.多恩:《诸多周年纪念日》,F.曼利编辑(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63 年),第 73 – 74 页。为了解这一段事情发生的更宽阔背景,见 S.图尔明:《大都市:现代性的隐蔽议程》(纽约:自由出版社 1990 年),第 62 – 69 页。[John Donne, *The Anniversaries*, ed. Frank Manle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3), 73 – 74. For the wider setting of this passage; see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62 – 69.]

9 "现代主义"这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说明中,它曾以许多意义使用。例如,它曾用来指明开始于 20 世纪初期的一种唯美主义运动。然而,要使那种意思成为它的专用的意义,正如 D.J.辛格尔强调的那样,好像是非历史性的、独断的。参见辛格尔:《关于美国现代主义的定义》,载《美国季刊》,39 期(1987 年):第 7 – 8 页。["Modernism," as a glance at 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will show, has been used in many senses. For example, it has been used to designate an aesthetic movement that began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To make that sense its exclusive meaning, however, as Daniel Joseph Singal urges, seems ahistorical and dogmatic. See Singal,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American Modernism," *American Quarterly* 39(1987): 7 – 8.]

152 10 R.笛卡尔:《方法谈》,L.J.拉弗勒尔翻译(印第安那波利斯:鲍勃斯 – 梅里尔,1956 年);F.培根:《伟大的复兴与新大西岛》,J.温伯格编辑(阿林顿高地,伊利诺伊州:H.戴维森,1980 年);和 J.洛克:《政府论和关于宽容的信札》,C.L.谢尔曼编辑(纽约:阿普尔顿 – 森奇里 – 克罗夫茨,1965 年)。[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Laurence J. Lafleu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6); Francis Bacon, *The Great Instauration and New Atlantis*, ed. J. Weinberger (Alington Heights, Ill.: Harlan Davidson, 1980); and John 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and 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 ed.

Charles L. Sherman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65).]

11 E.A.佩特洛夫:《导言》,载于《中世纪妇女的幻想文学》,佩特洛夫编辑(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 年),第 37 - 44 页。[Elizabeth Alvilda Petroff, "Introduction," in *Medieval Women's Visionary Literature*, ed. Petroff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37 - 44.]

12 这是概括地、追溯地了解培根、笛卡尔、洛克和基督教的关系。要看更详细、有细微差别的说明,参见 C.泰勒:《自我的来源:现代同一性的产生》(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139 - 142 页,第 230 - 233 页,第 234 - 247 页。[This is to see Bacon's, Descartes's and Locke's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 schematically and retrospectively. For a more detailed and nuanced account, see Charles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9 - 142, 230 - 233, 234 - 247.]

13 W.利斯:《自然的控制》(纽约:乔治·布雷泽尔,1972 年),第 57 - 61 页。[William Leiss, *The Domination of Nature*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72), 57 - 61.]

14 培根:《伟大的复兴与新大西岛》,第 2 页;笛卡尔:《沉思录》,拉弗勒尔翻译(印第安那波利斯:鲍波斯 - 梅里尔,1960 年),第 17 页;和洛克《政府论》,第 4 页。[Bacon, *The Great Instauration and New Atlantis*, 2; Descartes, *Meditations*, trans. Lafleur (L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60), 17; and 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4.]

15 为了解自我怎样使自身已与世界分离,又继续依赖它自身以外的资源,参见泰勒的说明:《自我的来源》。[For the story of how the self detached itself from the world while continuing to draw on sources beyond itself, see Taylor, *Sources of the Self*.]

16 《T.杰弗逊名著袖珍本》,M.D.彼得森编辑(哈蒙兹沃思:企鹅,1977 年),第 435 - 436 页。[*The Portable Thomas Jefferson*, ed. Merrill D. Peterson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77), 435 - 436.]

17 哈贝马斯:《现代性——未完成的规划》,载《简明政治论文集》。[Habermas, "Die Moderne ——ein unvollendetes Projekt," *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Frankfurt: Suhrkamp, 1981) 444 - 464.]

18 A.D.小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美国商业的管理革命》(坎布里奇,马萨诸

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84 页。[Alfred D. Chandler, Jr., *The Visible Hand: The Managerial Revolution in American Busines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7), 84.]

19 为了解甘油炸药的动力,参见 B. D. 萨尔维托尔:《甘油炸药》,载《纽约客》,1987 年 4 月 27 日,第 42 - 72 页和 1987 年 5 月 4 日,第 38 - 58 页。[For the power of dynamite, see Bryan Di Salvatore, "Dynamite," *New Yorker*, 27 Apr. 1987, 42 - 72, and 4 May 1987, 38 - 58.]

20 J. F. 斯托弗:《美国铁路》(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1 年),第 11、224 页。[John F. Stover, *American Railroad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1), 11, 224.]

21 W. 华兹华斯:《诗集》第 2 版,E. D. 塞林科特、H. 达伯希尔编辑(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1954 年),第 61 - 62 页。另见 L. 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4 年),第 3 - 33 页。[William Wordsworth, *Poetical Works*. 2d ed., ed. E. de Selincourt and Helen Darbshire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54), 61 - 62. See also Leo 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3 - 33.]

22 《在铁路上工作》,R. 莱因哈特编辑(帕洛阿尔托,加州:美国西部,1970 年),第 57 - 58 页。[*Workin' on the Railroad*, ed. Richard Reinhardt (Palo Alto, Calif.: American West, 1970), 57 - 58.]

23 《弗莱特黑德铁路协议,1882 年》,载于《最后、最好的地方》一书,W. 基特里奇、A. 史密斯编辑(赫勒纳,蒙大拿州:蒙大拿出版社,1988 年),第 359 页。["Flathead Railroad Treaty, 1882," in *The Last Best Place*, ed. William Kittredge and Annick Smith (Helena, Mont.: Montana, 1988), 359.]

24 同上引书,第 354、358 页。Ibid., 354, 358.

25 同上引书,第 358、363 页。在 1855 年赫尔盖特协议中,美国印第安人给出什么、保留什么,现在仍有争论。参见 R. 塞尔登:《地主、灌溉者都想法子使部落处于不利地位》,载《密苏拉人报》,1990 年,B2,10 月 31 日。[Ibid., 358, 363. What the Native Americans gave and what they kept in the Hellgate Treaty of 1855 is still in dispute. See Ron Selden, "Landowners, Irrigators Weigh in against Tribes," *Missolian*, 31 Oct. 1990, B2.]

26 《弗莱特黑德铁路协议》,第 357 - 358 页,和 E. V. 斯莫利:《北太平洋铁路史》(纽约:普特南出版社,1883 年),第 420 页。["Flathead Railroad

Treaty," 357 – 358, and Eugene V. Smalley,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New York: Putnam, 1883), 420.]

27 斯莫利:《北太平洋铁路史》,第 416 页。[Smalley,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416.]

28 同上引书,第 417 – 418 页。Ibid., 417 – 418.

29 同上引书,第 416 页。Ibid., 416.

30 L.T.伦兹:《北太平洋铁路史》(费尔菲尔德,华盛顿州:加利昂,1980 年),第 96 页。[Louis Tuck Renz, *The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Fairfield, Wash.: Galleon, 1980), 96.]

31 《在铁路上工作》,第 70 页。[*Workin' on the Railroad*. 70.]

32 同上引书,第 72、74 – 75 页,第 77 – 81 页。Ibid., 72, 74 – 75, 77 – 81. 153

33 同上引书,第 76 – 77 页。Ibid., 76 – 77.

34 斯莫利:《北太平洋铁路史》,第 419 页。[Smalley, *History of the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419.]

35 L.凯尔贝尔:《密苏拉过去是这样的》(密苏拉,蒙大拿州:盖特韦,1972 年),第 57 页。[Leonora Koelbel, *Missoula the Way It Was* (Missoula, Mont. Gateway, 1972), 57.]

36 斯托弗:《美国铁路》,第 74 – 76 页。[Stover, *American Railroads*, 74 – 76.]

37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45 – 187 页。[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45 – 187.]

38 斯托弗:《美国铁路》,第 4、10 页,和钱得勒:《看得见的手》,第 87 页。[Stover, *American Railroads*, 4 and 10, an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87.]

39 R.W.埃默森:《年轻的美国人》,载于《论文与演讲》,J.波特编辑(纽约:美国图书馆,1983 年),第 213、216 页。[Ralph Waldo Emerson, "The Young American," *Essays and Lectures*, ed. Joel Porte (New York: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213, 216.]

40 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第 196 – 202 页。[Marx, *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 196 – 202.]

41 《在铁路上工作》,第 219、220、221 页。另见埃默森:《年轻的美国人》,第 215 页。[*Workin' on the Railroad*, 219, 220, 221. See also Emerson, "The Young American," 215.]

42 《在铁路上工作》,第 223 页。[*Workin' on the Railroad*, 223.]

43 H.G.巴格比:《美国的荒野》,载《美国宗教学会杂志》,42 期(1974 年):第 614 – 615 页。[Henry G. Bugbee, "Wilderness in Americ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42(1974):614 – 615.]

44 W.斯特格纳:《安宁角》(纽约:福西特,1972 年),第 344 页。[Wallace Stegner, *Angle of Repose* (*New York*: *Fawcett*, 1972), 344.]

45 S.德夫林:《水供应在危险中》,载《密苏拉人报》,1989 年 10 月 8 日,第 F1 – F2页,和《寻找 BN 污染物质进入高潮》,载《密苏拉人报》,1989 年 11 月 1 日,B1。[Sherry Devlin, "A Water Supply at Risk," *Missoulian*, 8 Oct. 1989, F1 – F2, and "Search for BN Contaminants Goes Full Bore," *Missoulian*, 1 Nov. 1989, B1.]

46 E.S.弗格森:《1830 年以前的蒸气机》,载于《西方文明中的技术》,M.克兰兹伯格与小 C.W.珀塞尔编辑,2 卷本。(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67 年),第 1 卷:第 245 – 263 页;J.B.雷:《发明的发明》,同上引书第 1 卷:第 334 – 335 页;和雷:《能源转化》,同上引书,第 1 卷:第 339 – 343 页。[Eugene S. Ferguson, "The Steam Engine before 1830," in *Technolog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ed. Melvin Kranzberg and Carroll W. Pursell, Jr., 2 vo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 245 – 263; John B. Rae, "The Invention of Invention," ibid., 1: 334 – 335; and Rae, "Energy Conversion," ibid., 1: 339 – 343.]

47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47、153、158 – 159 页,和 M.J.皮奥里、C.F.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繁荣的各种可能性》(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4 年),第 50 – 65 页。官僚主义有时是公司的外貌,其他时候则是另一种不同形式。参见 M.韦伯:《经济与社会:社会学解释大纲》,E.菲施霍夫等人翻译、G.罗特、C.维蒂克编辑(纽约:贝德明斯特出版社,1968 年),第 974 页。关于官僚主义架构或作风作为对复杂性的反应,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72 页。关于官僚主义与公司的合理性质,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87 – 989 页,第 1002 页,和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95 页。[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47, 153, 158 – 159, and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50 – 65. Bureaucracy is sometimes an aspect and at other times a variant of the corporation. See Max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trans. Ephraim Fischoff et al., ed.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1968), 974. On bureau-

cracy as a response to complexity, see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72. On the rational character of bureaucracy and corporation, see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87 – 989, 1002, an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95.]

48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79、201 页,和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68 – 69 页。[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79, 201, and 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68 – 69.]

49 笛卡尔:《方法谈》,第 12 页。[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12.]

50 关于公司以前与官僚制度以前经济的有机整体主义与局限因素,参见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56 – 957 页,和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8, 35 – 36、47 页。[On the organic holism and limitations of the precorporate and pre-bureaucratic economy, see 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56 – 957, an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8, 35 – 36, 47.]

51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75 页,和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08 页。[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75, an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08.]

52 笛卡尔:《方法谈》,第 12 – 14 页。[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12 – 14.]

53 皮奥里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64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64.]

54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73 – 975 页。[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73 – 975.]

55 J.K.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3 年),第 81 – 154 页。[John Kenneth Galbraith,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3), 81 – 154.]

56 斯托夫:《美国铁路》,第 157 – 158 页。然而,是科学的关注,而不是经济的关注,给了建立标准时间的初始驱动。参见 I.R.巴特基:《标准时间的采用》,载《技术与文化》,20 期(1989 年):第 25 – 26 页。[Stover, *American Railroads*, 157 – 158. Scientific concerns, however, not economic ones, gave the initial impuls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tandard time. See Ian R. Bartky, "The Adoption of Standard Time," *Technology and Culture* 30 (1989): 25 – 56.]

57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36 – 37 页。[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36 – 37.] 154

58 皮奥里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29 – 35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29 – 35.]

59 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137 – 144 页。[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137 – 144.]

60 同上引书,第 94 – 109 页。Ibid.,94 – 109.

61 韦伯:《经济与社会》,第 958 – 959、962、968 页;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 2 版(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2 年),第 128 – 158 页;和钱德勒:《看得见的手》,第 3 – 4、95、180 – 181 页。[Weber, *Economy and Society*, 958 – 959, 962, 968;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128 – 158; and Chandler, *The Visible Hand*, 3 – 4, 95, 180 – 181.]

62 加尔布雷思:《经济学与公共目标》,第 42 – 44 页,和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50 页。[Galbraith, *Economics and the Public Purpose*, 42 – 44, and 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50.]

63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19 – 48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19 – 48.]

64 J.C.科茨四世:《国家接管法令与公司理论:旧辩论之再兴》,载纽约大学《法律评论》,64 期(1989):第 806 – 876 页。[John C. Coates IV, "State Takeover Statutes and Corporate Theory: The Revival of an Old Debate," *New York University Law Review* 64(1989):806 – 876.]

65 洛克:《政府论》,第 5 – 12、20、21 页等其他处均可见到。[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5 – 12, 20, 21, and passim.]

66 A.de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P.布雷德利编辑,2 卷本(纽约:最佳出版社,1945),第 2 卷:第 104 页。[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Phillips Bradley, .2 vols. (New York: Vintage, 1945), 2:104.]

67 洛克:《政府论》,第 18 – 33 页。[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18 – 33.]

68 J.乔伊斯:《太平洋海岸》,载于《种族问题、地方至上主义与其他美国问题》(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1908 年),第 173 页。[Josiah Royce, "The Pacific Coast," *Race Questions, Provincialism and Other American Problems* (New York: Macmillan, 1908), 169, 173.]

69 H.S.梅因:《古代法律与社会早期历史和与现代观念的关系》(伦敦:J.默里,1912 年),第 123 – 174 页;H.阿伦德提:《人类环境》(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50 – 67 页;和 J.B.埃尔什泰恩:《公职男人,非

公职的女人:社会、政治思想中的妇女》(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1 年),第 3 – 16 页。[Henry Sumner Maine, *Ancient Law: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Early History of Society and Its Relation to Modern Ideas* (London: J. Murray, 1912), 123 – 174; 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50 – 67; and Jean Bethke Elshtain, *Public Man, Private Woman: Women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3 – 16.]

70 为了解关于这种欢乐时节的描述与讨论,参见《男修道院院长休格论圣丹尼斯大教堂及其艺术珍品》一书,E. 帕诺夫斯基翻译、编辑,第 2 版由 G. 帕诺夫斯基 – 塞格尔编辑(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年),和 O. 冯·西蒙:《哥特式大教堂》,第 2 版。(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62 年),第 129 – 141 页。[For the description and discussion of such a festive occasion, see *Abbot Suger on the Abbey Church of St. Denis and Its Art Treasures*, trans. and ed. Erwin Panofsky, 2d ed. by Gerda Panofsky-Soergel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and Otto von Simson, *The Gothic Cathedral*. 2d ed.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2), 129 – 141.]

71 R. 森奈特《公职男人的没落:损害公众生活和压在无力尽其职责的现代心灵的种种力量》(纽约:诺夫,1977 年),第 45 – 122 页。[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The Forces Eroding Public Life and Burdening the Modern Psyche with Roles It Cannot Perform* (New York: Knopf, 1977), 45 – 122.]

72 同上引书,第 123 – 255 页。Ibid., 123 – 255.

73 J. R. 斯蒂尔戈:《大都会的走廊:铁路与美国景象》(纽黑文,康涅狄格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83 年),第 36 – 45 页。[John R. Stilgoe, *Metropolitan Corridor: Railroads and the American Scen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6 – 45.]

74 同上引书,第 189 – 221 页。Ibid., 189 – 221.

75 同上引书,第 335 – 345 页。Ibid., 335 – 345.

76 A. L. 哈克斯泰布:《曼哈顿悄悄的巨大畸形发展》,载《纽约时报》,1987 年 3 月 22 日,第 2 节,第 1、36 页。[Ada Louise Huxtable, "Creeping Gigantism in Manhattan," *New York Times*, 22 Mar. 1987, sec. 2, 1 and 36.]

77 T. 赫夫:《清醒地考虑隐私》,载《华盛顿法律评论》,55 期(1980 年):第

785－786 页，和 J.W.德库：《为受宪法规定的隐私权保护私者的辩护》，载《价值探索研究杂志》，20 期（1987 年）：第 171－184 页。［Thomas Huff, "Thinking Clearly about Privacy," *Washington Law Review* 55(1980):785－786, and Judith W.Decew, "Defending the 'Private' in Constitutional Privacy," *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21(1987):171－184.］

78　赫夫：《清醒地考虑隐私》，第 779、786 页。［Huff, "Thinking Clearly about Privacy," 779,786.］

79　同上引书，第 777－794 页。Ibid.,777－794.

80　同上引书，第 780 页。Ibid.,780.

81　《我要买那个！：50 个小神奇之物与大量交易对消费者生活产生了革命化作用》（蒙特弗农，纽约州：消费者导报书籍出版社，1986 年），第 xii 页。［*I'll Buy That!: Fifty Small Wonders and Big Deals that Revolutionized the Lives of Consumers* (Mount Vernon, N.Y.: Consumer Reports Books, 1986), xii.］

155 82　F.T.贾斯特：《男子与妇女时间上的投资》，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贾斯特、F.P.斯塔福德编辑（安阿伯，密执安州：调查研究中心，密执安大学，1985 年），第 173 页，和贾斯特：《简论近来时间利用方面的变化》，同上引书，第 317 页。［F.Thomas Juster, "Investments of Time by Men and Women,"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ed. Juster and Frank P.Stafford (Ann Arbor, Mich.: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173, and Juster, "A Note on Recent Changes in Time Use," ibid.,317.］

83　贾斯特：《时间上的投资》，第 173 页。［Juster, "Investments of Time," 173.］

84　M.S.希尔：《时间利用的诸模式》，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第 135－137 页。［Martha S.Hill, "Patterns of Time Use,"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135－137.］

85　斯塔福德、G.J.邓肯：《美国家庭时间的利用与技术》，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第 271、274 页，和 J.P.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一个历史概观》，同上引书，第 309、311 页。［Stafford and Greg J.Duncan, "The Use of Time and Technology by Household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271, 274, and John P.Robinson, "Changes in Time Us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bid.,309,311.］

86　希尔：《时间利用的诸模式》，第 138 页。正如 R.库贝、M.奇克桑特米哈尔伊在《电视与生活质量：观看电视如何影响日常经验》一书（希尔斯戴

尔,新泽西州:L.厄尔鲍姆伙伴出版社,1990 年)中指出的,看电视和家庭成员在一起,平常环境下,比独自看更愉快些(第 73 - 74 页)。但是没有电视机,个人的交互影响则更有活力(第 116 - 117 页)。[Hill,"Patterns of Time Use,"138. As Robert Kubey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Point out in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 J.: L. Erlbaum Associates, 1990), watching television with family members, the usual setting, is more pleasant than watching alone (73 - 74, 111). But personal interaction is more vigorous without television(116 - 117).]

87 贾斯特:《时间上的投资》,第 173 页。[Juster,"Investments of Time,"173.]

88 托克维尔:《美国的民主》,第 2 卷,第 106 页。[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2:106.]

89 贾斯特:《工作与闲暇上的偏爱》,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第 336、337 页;G.K.道与贾斯特:《商品、时间与幸福:共同依赖的问题》,同上引书,第 404 页;和库贝、奇克桑特米哈尔伊:《电视与生活质量》,第 80 - 87 页,第 164、172 - 173 页。[Juster,"Preferences for Work and Leisure,"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337, 336; Greg K. Dow and Juster,"Goods, Time, and Well-Being: The Joint Dependence Problem," ibid., 404; and Kubey and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80 - 87, 164, 172 - 173.]

90 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第 309 - 310 页。[Robinson,"Changes in Time Use,"309 - 310.]

91 贾斯特:《简论最近时间利用上的变化》,第 315、317、319 页。[Juster,"A Note on Recent Changes in Time Use,"315, 317, 319.]

92 斯塔福德与邓肯:《时间的利用与技术》,第 270 页,和贾斯特:《工作与闲暇上的偏爱》,第 340 - 344 页。[Stafford and Duncan,"The Use of Time and Technology,"270, and Juster,"Preferences for Work and Leisure,"340 - 344.]

93 洛克:《政府论》,第 19、22 - 23 页,第 32 页;另见第 27 页。[Locke, *Treatise of Civil Government*. 19, 22 - 23, 32; see also p. 27.]

94 同上引书,第 20、27 页。Ibid., 20, 27.

95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66 - 67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66 - 67.]

96 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67 年)。[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67).]

第 3 章

1 其他人做得很好,特别是 J. - F.利奥塔:《后现代状况》,G.本宁顿与 B.马苏米翻译,载于《文学理论与历史》,10 卷(明尼亚波利斯: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1984 年);C.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纽约,里佐里,1987 年);W.韦尔施:《没有一致的多数》,载《哲学年鉴》,94 期(1987 年):第 111 - 141 页;和戴卫·哈维:《后现代性的环境:文化变化根源探索》(牛津:布莱克韦尔,1990 年)。我应指出,哈维已经先于我把后现代的理智、文化与经济的各种发展联系起来。他对文学的全面评述比我的评述内容广泛得多,并且他的方向与结论和我的方向与结论十分不同。[Others have done it well, notably Jean-François Lyotard,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 trans. Geoff Bennington and Brian Massumi,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vol. 1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Charles Jencks, *Post-Modernism* (New York, Rizzoli, 1987); Wolfgang Welsch, "*Vielheit Ohne Einheit*?" *Philosophisches Jahrbuch* 94(1987): 111 - 141; and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1990). I should note that Harvey has preceded my effort to link postmodern intellectual, cultur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His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is much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mine, and his orientation and conclusion are quite different from mine.]

2 参见 R.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普林斯顿,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9 年),第 162 页和 317 页关于这种主张的弱点。[See Richard 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162 and 317 on the weakness of this claim.]

1563 参见同上出处。See ibid.

4 参见 S.图尔明:《大都市:现代性的隐蔽议程》(纽约:自由出版社,1990 年),第 45 - 87 页。[See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45 - 87.]

5 罗蒂:《哲学与自然之镜》,第 389 页。[Rorty,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389.]

6 像我们这一代的所有作家一样,罗蒂不得不学习怎样从使用对性别 - 有

偏见的语言转到使用性别－中性的语言。他在《哲学与自然之镜》中，试用这种蹩脚的过渡手段，要求读者懂得整个这本书里“诸如‘他自己’、‘男子’等词语是‘他自己或她自己’、‘男子与女子’等等的缩写”（第4页，注释1）。［Like all writers of our generation, Rorty had to learn how to go from gender-biased to gender-neutral language. In *Philosophy and the Mirror of Nature* he tried the awkward transitional device of asking the reader to understand that terms “such as ‘himself’ and ‘men’ should, throughout this book, be taken as abbreviations for ‘himself’ or herself, ‘men and women,’ and so on”(4, n.1).

7 同上引书，第347、300页。C.Z.埃尔金同样声称：“事物并不以任何有特权的词汇或范畴系统呈现给我们”（N.古德曼与埃尔金：《哲学、艺术与科学的重新构想》［印第安那波利斯：哈克特出版社，1988年］，第7页）。［Ibid., 347, 300. Catherine Z. Elgin similarly asserts that “things do not present themselves to us in any privileged vocabulary or system of categories” (Nelson Goodman and Elgin, *Reconceptions in Philosophy and Other Arts and Sciences*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8], 7).］

8 《意外的解围神力：女权主义者对技术的种种看法》，J.罗特席尔德编辑（纽约：珀格蒙出版社，1983年）。［*Machina ex Dea: 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Technology*, ed. Joan Rothschild (New York: Pergamon Press, 1983).］

9 C.麦钱特：《开采地球的内部》，同上引书，第99－117页。［Carolyn Merchant, “Mining the Earth’s Womb,” ibid., 99－117.］

10 罗特席尔德：《技术、家务与妇女解放：理论分析》，同上引书，第79－93页，和C.G.布什：《妇女与技术评价：想，就存在；不想，就自由》，同上引书，第151－169页。［Rothschild, “Technology, Housework, and Women’s Liberation: A Theoretical Analysis,” ibid., 79－93, and Corlann Gee Bush, “Women and the Assessment of Technology: To Think, to Be; to Unthink, to Free,” ibid., 151－169.］

11 R.笛卡尔：《方法谈》，L.J.拉弗勒尔翻译（印第安那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1956年），第15－20页。［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Laurence J. Lafleu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6), 15－20.］

12 I.康德：《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L.W.贝克翻译（印第安那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1959年）。［Immanuel Kant, *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9).］

13 同上引书,第 39 页。Ibid.,39.

14 G.W.F.黑格尔:《法哲学》,T.M.诺克斯翻译(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2 年),第 28、33、89 – 90 页。[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 T. M. Knox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28, 33, 89 – 90.]

15 L.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哲学:道德各阶段与公正的观念》(纽约:哈珀与罗,1981 年),第 412 页。[Lawrence Kohlberg,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Moral Stages and the Idea of Justi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1), 412.]

16 科尔伯格、C.莱文、A.休尔:《道德各阶段:当前有系统而确切的说明以及对批评者的反应》(巴塞尔:卡尔格尔,1983 年)。[Kohlberg, Charles Levine, and Alexandra Hewer, *Moral Stages: A Current Formulation and a Response to Critics* (Basel: Karger, 1983).]

17 C.吉利根:《对心理学理论与妇女发展的不同意见》(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18 页。[Carol 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Psychological Theory and Women's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18 科尔伯格:《道德发展的哲学》,第 410 页。[Kohlberg, *The Philosophy of Moral Development*, 410.]

19 吉利根:《不同意见》,第 25 – 32 页。[Gilligan, *In a Different Voice*, 25 – 32.]

20 M.沃尔泽:《公正的范围:为多元主义与平等辩护》(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3 年),第 10 – 13 页。[Michael Walze,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10 – 13.]

21 P.J.戴维斯、R.赫什:《笛卡尔的梦:根据数学推算出来的世界》(圣迭戈:H.B.约万诺维奇,1986 年);T.S.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62 年);S.J.古尔德:《非常愉快的生活:公民页岩与历史本质》(纽约:W.W.诺顿,1989 年);C.格尔茨:《本土知识:进一步解释人类学的论文》(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3 年);S.谢芮:《公民美德与宪法裁决中女子的声音》,载《弗吉尼亚法律评论》,72 期(1986 年):第 543 – 616 页;和 J.德里达:《写作与延异》,A.巴斯翻译(芝加芝: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8 年)。[Philip J. Davis and Reuben Hersh, *Descartes' Dream: The World According to Mathematics* (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Thomas S. Kuhn,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Stephen Jay Gould, *Wonderful Life: The Burgess Shale and the Nature of History* (New York: W. W. Norton, 1989); Clifford Geertz, *Local Knowledge: Further Essays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Suzanna Sherry, "Civic Virtue and the Feminine Voice in 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 *Virginia Law Review* 72 (1986): 543 – 616; and Jacques Derrida, *Writing and Difference*, *trans*. Alan Ba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22 L.厄尔德里奇:《爱情医学》(多伦多:班塔姆,1984 年)。[Louise Erdrich, *Love Medicine* (Toronto: Bantam, 1984).]

23 同上引书,第 6 页。Ibid., 6.

24 R.N.贝拉等人:《心灵的习惯》(伯克利与洛杉矶: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 年),第 53 – 141 页。[Robert N. Bellah et al., *Habits of the Heart*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53 – 141.] 157

25 同上引书,第 55 – 56 页,第 144 – 147 页。Ibid., 55 – 56, 144 – 147.

26 同上引书,第 152 – 162 页。Ibid., 152 – 162.

27 J.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纽约:最佳出版社,1961 年),第 7、23 页,第 338 – 371 页,和 V.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修正版(纽约:H.霍尔特,1988 年),第 280 – 281 页。[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1961), 7, 23, 338 – 371, and Vincent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rev. ed. (New York: H. Holt, 1988), 280 – 281.]

28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20、177 页,和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67、251 页。[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20, 177, and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67, 251.]

29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3 – 25 页;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第 27、29 页;和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64 – 166、171、173、180、198、241 – 242、245 – 249 页。[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3 – 25; Jencks, *Post-Modernism*, 27, 29; and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64 – 166, 171, 173, 180, 198, 241 – 242, 245 – 249.]

30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23、418、435 – 440 页;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第 29 页;和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84、190 – 192

页。[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23, 418, 435 – 440; Jencks, *Post-Modernism*, 29; and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84, 190 – 192.]

31 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第 29 页;和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78 页。[Jencks, *Post-Modernism*, 29, and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78.]

32 K.C.布卢默和 C.W.穆尔:《身体、记忆与建筑学》(纽黑文,康涅狄克州:耶鲁大学出版社,1977 年),第 1、73 – 74 页。[Kent C. Bloomer and Charles W. Moore, *Body, Memory and Architectur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1, 73 – 74.]

33 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69、193、252、291 页。[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69, 193, 252, 291.]

34 同上引书,第 167 – 169 页。Ibid., 167 – 169.

35 P.戈德伯格:《为什么设计不能改变城市》,载《纽约时报》,1989 年 6 月 25 日,第 2 节,第 1、30 页。[Paul Goldberger, "Why Design Can't Transform Cities," *New York Times*, 25 June 1989, sec. 2, 1 and 30.]

36 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42、180 页,和戈德伯格:《任务本身已成为里程碑》,载《纽约时报》,1990 年 4 月 15 日,第 2 节,第 36、40 页。[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42, 180, and Goldberger, "A Commission that Has Itself Become a Landmark," *New York Times*, 15 Apr. 1990, sec. 2, 36 and 40.]

37 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257 页。[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257.]

38 同上引书,第 274 – 276 页。Ibid., 274 – 276.

39 詹克斯:《后现代主义》,第 250、258、272、285、297、315、346 – 350 页,和斯卡利:《美国建筑与都市化》,第 195 页。[Jencks, *Post-Modernism*. 250, 258, 285, 297, 315, 346 – 350, and Scully, *American Architecture and Urbanism*, 195.]

40 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冒风险的社会预测》(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6 年),第 xii 页,第 26、116、126 – 127 页。另见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技术与美国经济变化:适合将来要求的人选》(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处,1988 年),第 151 – 158 页。[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xii, 26, 116, 126 – 127. See also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Choices for the Futur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8), 151 – 158.]

41 E.D.拉森、M.H.罗斯、R.H.威廉斯:《过了材料时代以后》,载《科学美国人》,1986年6月,第34 – 41页。[Eric D. Larson, Marc H. Ross, and Robert H. Williams, "Beyond the Era of Materials,"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86, 34 – 41.]

42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6页。[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26.]

43 J.K.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2版(波士顿:霍顿·米夫林,1972年),第45 – 71页。[John Kenneth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2d 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72), 45 – 71.]

44 C.劳特尔布尔格:《在等级制度结束之前》,第2版(杜塞尔多夫:埃孔,1980年),和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技术与美国经济的变化》,第177 – 190页。[Christoph Lauterburg, *Vor dem Ende der Hierarchie*, 2d ed. (Düsseldorf: Econ, 1980), and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177 – 190.]

45 J.P.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一个历史概观》,载于《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F.T.贾斯特、F.B.斯塔福德编辑(安阿伯,密执安那州:调查研究中心,密执安大学,1985年),第311页。[John P. Robinson, "Changes in Time Us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in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ed. F. Thomas Juster and Frank B. Stafford (Ann Arbor, Mich.: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311.]

46 参见,例如P.施迈塞尔:《美国在衰退吗?》,载《纽约时报杂志》,1988年4月17日,第24 – 27、66 – 68、96页,和P.肯尼迪:《美国能保持第一么?》,载《纽约书评》,1989年3月16日,第36 – 42页。[See, for example, Peter Schmeisser, "Is America in Declin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7 Apr. 1988, 24 – 27, 66 – 68, 96, and Paul Kennedy, "Can the U.S. Remain Number On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16 Mar. 1989, 36 – 42.]

47 这一段落其余部分,我部分地采用M.J.皮奥里、C.F.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繁荣的各种可能性》一书(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4年),第165 – 220页的材料与看法。[For the remainder of this section I draw in part

on materials and obeservations in Michael J. Piore and Charles F.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Possibilities for Prosper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4), 165 – 220.]

158 48 贝尔:《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6 年)。[Bell, *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6).]

49 皮奥里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184 – 187 页,和 J.B.奎因、J.J.巴鲁克、P.C.帕凯特:《用于服务的技术》,载《科学美国人》,1987 年 12 月,第 50 – 51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184 – 187, and James Brian Quinn, Jordan J. Baruch, and Penny Cushman Paquette, "Technology in Services," *Scientific American*, Dec. 1987, 50 – 51.]

50 经济极权主义与政治极权主义不完全相同。前者和后者不一样,很像大公司做的那样,要取得人民的同意与合作以便导致繁荣兴盛,而后者则做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就会产生经济极权主义:人们喜欢墨守成规而不喜欢变化,喜欢坚实可靠而不喜欢灵活变通,喜欢强硬解决办法而不喜欢温和办法。但是根本没有这样的偏爱选择出现。关于人们从前对公司的拥护,参见加尔布雷思:《新工业国》,第 130 – 139 页。[Economic totalitarianism would not be the same as political totalitarianism. The former, unlike the latter, would have the consent and cooperation of the people as the giant corporations once did, thus leading to prosperity as the latter could not. Economic totalitarianism would come into being if people strongly preferred predictability to variety, security to independence, solidity to flexibility, and hard to soft solutions. But no such preference is emerging. On people's erstwhile allegiance to corporations, see Galbraith,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130 – 139.]

51 P.帕塞尔:《美国在经济竞赛中的名次:数字说明了与掩盖了什么》,载《纽约时报》,1990 年 3 月 4 日,第 2 节,第 4 – 5 页。[Peter Passell, "America's Position in the Economic Race: What the Numbers Show and Conceal," *New York Times*, 4 Mar. 1990, sec. 4, 4 – 5.]

52 F.布洛克:《后工业的发展与经济范畴的渐被淘汰》,载于《修正的国家理论:政治学与后工业主义》一书(费城:坦普尔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42 – 170 页,和 J.施莱弗:《了解生产效率争论的意义》,载《技术评论》,1988 年 8 – 9 月,第 28 – 40 页。[Fred Block, "Post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Obsolescence of Economic Categories," *Revising State Theory: Essays in Poli-*

tics and Postindustrialism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142 – 170, and Jonathan Schlefer, "Making Sense of the Productivity Debate," *Technology Review*, Aug – Sept. 1988, 28 – 40.]

53 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技术和美国经济的变化》,第 462 页。[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462.]

54 D.施曼德蒂 – 贝塞拉特:《最早的写作先躯》,载于《语言的出现:发展与演化》一书,W.S.Y.王编辑(纽约:W.H.弗里门,1989 年),第 31 – 45 页。另见拙著《文本与事物:抓住现实不放》,载于《生活世界与技术》一书,T.凯西、L.恩布里编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大学出版社,1989 年),第 93 – 116 页。[Denise Schmandt-Besserat, "The Earliest Precursor of Writing," in *The Emergence of Languag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ed. William S.-Y. Wang (New York: W.H. Freeman, 1989) 31 – 45. See also my "Texts and Things: Holding on to Reality," *in Lifeworld and Technology*, ed. Timothy Casey and Lester Embree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89), 93 – 116.]

55 H.L.德赖弗斯、S.E.德赖弗斯:《心智支配机器:人类直觉的力量与计算机时代的专门技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 年);D.F.诺布尔:《生产的诸力量: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 年);和 W.W.鲍威尔:《说明技术的变化》,载《美国社会学杂志》,93 期(1987 年):第 185 – 197 页。[Hubert L. Dreyfus and Stuart E. Drey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David F. Noble, *Forces of Production: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and Walter W. Powell, "Explaining Technological 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3 (1987): 185 – 197.]

56 S.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工作与力量的未来》(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8 年)。[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57 同上引书,第 58 – 76、80 – 96、126 – 171、207 – 251、327 – 337,和 J.鲁尔、P.阿蒂韦尔:《计算机做什么?》,载《社会问题》,36 期(1989 年):第 225 – 241 页。[Ibid., 58 – 76, 80 – 96, 126 – 171, 207 – 215, 327 – 337, and James Rule

and Paul Attewell, "What Do Computers Do?" *Social Problems* 36(1989):225 – 241.]

58 鲁尔、阿蒂韦尔:《计算机做什么?》,第 236 – 237 页。[Rule and Attewell, "What Do Computers Do?"236 – 237.]

59 奎因等人:《用于服务的技术》,第 57 页,和 E.科科伦:《米利肯公司:管理纺织革命的性质》,载《科学美国人》,1990 年 4 月,第 74、76 页。[Quinn et al., "Technology in Services," 57, and Elizabeth Corcoran, "Miliken and Co.: Managing the Quality of a Textile Revolu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Apr. 1990, 74 and 76.]

60 K.赖特:《事情形势如此发展》,载《科学美国人》,1990 年 5 月,第 92 – 101 页。[Karen Wright, "The Shape of Things to Go,"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1990, 92 – 101.]

61 国家研究委员会:《非传统性农业》(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国家研究院出版社,1989 年),第 135 – 194 页。[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1989), 135 – 194.]

62 D.盖伦特:《信息管理的变形》,载《科学美国人》,1989 年 8 月,第 66 页。[David Gelernter, "The Metamorphosis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Scientific American*, Aug. 1989, 66.]

63 G.莱克斯:《典型的麻烦、例外的成功》,载《密苏拉人报》,1990 年 4 月 8 日,第 F1 页,和《姐妹们找到她们货物的国际市场》,载《密苏拉人报》,1990 年 4 月 8 日,第 F1 页。[Greg Lakes, "Typical Troubles, Exceptional Success," *Missoulian*, 8 Apr. 1990, F1, and "Sisters Find International Market for Their Wares," *Missoulian*. 8 Apr. 1990, F1.]

159 64 《斯通计划用 1.55 千万美元建工厂项目》,载《密苏拉人报》,1988 年 11 月 18 日,第 1 页,和 J.路德维克:《斯通为回收利用工厂举行落成典礼》,载《密苏拉人报》,1990 年 11 月 4 日,第 C1 页。["Stone Plans $15.5 Million Mill Project," *Missoulian*, 18 Nov. 1988, 1, and Jim Ludwick, "Stone Inaugurates Recycling Plant," *Missoulian*, 4 Nov. 1990, C1.]

65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213 – 220 页,和 M.T.卡茨曼:《从马车到小工厂》,载《公众利益》,92 期(1988 年):第 121 – 135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213 – 220, and Martin T. Katzman, "From Horse Carts to Minimills," *Public Interest* no.92(1988):121 – 135.]

66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28 – 35、258 – 277 页。与此有关的、有竞争性的示例是《变化的多种可能》(载于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技术与美国经济的变化》一书,第 87 – 141、201 – 279、425 – 441 页),和《不景气生产》(载于 J.P.沃马克、D.T.琼斯、D.鲁斯:《改变了世界的机器》一书(纽约:罗森伙伴,1990 年)。[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28 – 35, 258 – 277. Related and competing paradigms are "the transformation scenario" in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87 – 141, 201 – 279, 425 – 441, and "lean production" in James P. Womack, Daniel T. Jones, and Daniel Roos, *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 Rawson Associates, 1990).]

67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28 – 35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28 – 35.]

68 C.克莱曼:《财政金融计划标准加强了》,载《芝加哥论坛报》,1989 年 4 月 30 日,第 8 节,第 1 页。信息简报构成另一可选择的财政金融意见来源。100 多份简报我应相信哪一个?赫尔伯特财政金融文摘给出回答:它给 120 件投资函件评分。但是我们能相信马克·赫尔伯特吗?别担心,已组成特别委员会评估赫尔伯特的方法。直到现在我们距有形经济已三四个阶段了。参见 S.艾德沃凯特:《业务通讯在评估投资简报中找到它最合适的工作》,载《芝加哥论坛报》,1990 年 11 月 4 日,第 7 节,第 12B 页。[Carol Kleiman, "Standards Stiffen in Financial Planning," *Chicago Tribune*, 30 Apr. 1989, sec. 8, 1. Investment newsletters constitute an alternative source of financial advice. They also produce more perplexity. Which of the more than one hundred newsletters should Itrust? The *Hulbert Financial Digest* has the answer: it rates 120 investment letters. But can we trust Mark Hulbert? Never fear. A special committee has been formed to evaluate Hulbert's methods. By now we are at four or five removes from the tangible economy. See Stephen Advokat, "Newsletter Finds Its Niche Rating the Investment Newsletters," *Chicago Tribune*, 4 Nov. 1990, sec. 7, 12B.]

69 A.米勒、D.茨伊安塔:《贩卖忠告或意见者》,载《新闻周刊》,1989 年 5 月 22 日,第 60 – 61 页。[Annetta Miller and Dody Tsiantar, "The Advice Peddlers," *Newsweek*, 22. May 1989, 60 – 61.]

70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130 – 131 页,和奎因等人:《服务中使用的

技术》,第 50 页。[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30 – 131, and Quinn et al., "Technology in Services," 50.]

71 在美国国会,技术评件局:《技术与美国经济的变化》一书(第 148 – 150 页)中,已经拟订更为突出的 10 个行业经济体制。[A more revealing ten-sector economy has been drawn up in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ic Transition*, 148 – 150.]

72 奎因等人:《服务中使用的技术》,第 56 页。[Quinn et al., "Technology in Services," 56.]

73 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19 – 48 页。[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19 – 48.]

74 D.J.布尔斯廷:《民主制及其令人不满处:关于日常的美国的反思》,(纽约:最佳出版社,1975 年),第 20 – 21 页。[Daniel J. Boorstin, *Democracy and Its Discontents: Reflections on Everyday America* (New York: Vintage, 1975), 20 – 21.]

75 L.赫希豪恩:《机械化以后:后工业时代的工作与技术》(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4 年)。[Larry Hirschhorn, *Beyond Mechanization: Work and Technology in a Postindustrial A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4).]

76 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第 197 – 199 页。[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197 – 199.]

77 同上引书,第 206 – 218、362 – 386 页。[Ibid., 206 – 218, 362 – 386.]

78 S.伯杰等人:《论新工业的美国》,载《科学美国人》,1989 年 6 月,第 41 页。[Suzanne Berger et al., "Toward a New Industrial America,"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89, 41.]

79 G.C.洛奇:《该是美国改革的时候了》,载《大西洋》,1989 年 4 月,第 35 – 36 页。[George C. Lodge, "It's Time for an American Perestroika," *Atlantic*, Apr. 1989, 35 – 36.]

80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128、159、160 页注释 30,第 298、364、366 页,和皮奥里、萨贝尔:《第二个工业分水岭》,第 265 – 267、269 – 270、273 – 275、279、283、303 – 306 页。[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128, 159, 160n, 30, 298, 364, 366, and Piore and Sabel, *The Second Industrial Divide*, 265 – 267, 269 – 270, 273 – 275, 279, 283, 303 – 306.]

第 4 章

1 A.B.洛文斯:《能源战略:方法未被采用?》,载《外交事务》,55 期(1976 年 10 月):第 65 – 96 页,特别是第 77 – 78、91 – 94 页。[Amory B. Lovins, "Energy Strategy: The Road Not Taken?" *Foreign Affairs* 55(Oct. 1976): 65 – 96, esp. 77 – 78, 91 – 94.]

2 R.兰多:《美国经济的增长》,载《科学美国人》,1988 年 6 月,第 44、49、52 页;B.M.弗里德曼:《在经济困境中》,载《纽约书评》,1988 年 12 月 22 日,第 18 – 19 页;和 S.伯杰等人:《论新工业的美国》,载《科学美国人》,1989 年 6 月,第 46、47 页。[Ralph Landau, "U. S. Economic Growth,"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88, 44, 49, 52; Benjamin M. Friedman, "In an Economic Fix,"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22 Dec. 1988, 18 – 19; and Suzanne Berger et al., "Toward a New Industrial America," *Scientific American*, June 1989, 46, 47.] 160

3 参见拙著:《技术与当代生活特质:一种哲学探索》(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 年)。[See my *Technology and the Character of Contemporary Life: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4 参见同上书,第 85 – 101 页。[See ibid., 85 – 101.]

5 S.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工作和能力的未来》(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8 年),第 63 页;另见第 xii、59、62 页。[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63; see also xii, 59, 62.]

6 同上引书,第 85 – 95 页。另见美国国会,技术评价局:《自动化与工作地点:选择的劳动者、教育与训练问题》(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处,1983 年)。[Ibid., 85 – 95. See also U.S. Congress,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Automation and the Workplace: Selected Labor, Education, and Training Issues*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3).]

7 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第 90 页。[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90.]

8 U.埃科:《在超现实中旅游:散文》,W.韦弗翻译(圣迭戈:H.B.约万诺维奇,1986 年),第 3 – 58 页,和 J.鲍德里拉德:《文集》,M.波斯特编辑(斯坦

福,加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88 年),第 166 – 184 页。[Umberto Eco, *Travels in Hyperreality*: *Essays*, trans, William Weaver(San Diego: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6), 3 – 58, and Jean Baudrillard, *Selected Writings*, ed. Mark Post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166 – 184.]

9 S.布兰德:《媒体实验室:在麻省理工学院发明将来》(纽约:瓦伊金,1987 年),第 30 页。[Stewart Brand, *The Media Lab*: *Inventing the Future at MIT* (New York: Viking, 1987), 30.]

10 R.F.E.韦斯曼:《从个人计算机到学者的工作站》,载《学术性的计算》,3 期(1988 年 10 月):第 11 页,和 C.雷蒙德:《人文科学研究者在其专业中使用计算机经历面目一新》,载《高等教育时报》,1989 年 7 月 12 日,第A6 – A8 页。[Ronald F. E. Weissman, "From the Personal Computer to the Scholar's Workstation," *Academic Computing* 3(Oct. 1988): 11, and Chris Raymond, "Humanities Researchers Experience a 'Sea Change' in the Use of Computers in Their Disciplin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2 July 1989, A6 – A8.]

11 J.R.奇尔斯:《当飞机驾驶员的最坏恶梦成真时——在模拟装置中》,载《斯密生博物馆报》,1986 年 6 月,第 78 – 87 页,和 R.N.哈伯:《飞行模拟》,载《科学美国人》,1986 年 7 月,第 96 – 103 页。[James R. Chiles, "When Pilots' Worst Nightmares Come True—In Simulaators," *Smithsonian*, June 1986, 78 – 87, and Ralph Norman Haber, "Flight Simula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July 1986, 96 – 103.]

12 哈伯:《飞行模拟》,第 103 页。[Haber, "Flight Simulation," 103.]

13 同上引出处,和奇尔斯:《当飞机驾驶员的最坏恶梦成真时》,第 83 – 84 页。[Ibid., and Chiles, "When Pilots' Worst Nightmares Come True," 83 – 84.]

14 哈伯:《飞行模拟》,第 103 页,和布兰德:《媒体实验室》,第 139 页。[Haber, "Flight Simulation," 103, and Brand, *The Media Lab*. 139.]

15 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第 58 – 96、159 – 171、327 – 337、362 – 386 页。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58 – 96, 159 – 171, 327 – 337, 362 – 386.]

16 布兰德:《媒体实验室》,第 90 页;J.布朗齐诺、V.H.史密斯、M.L.韦德:《医学技术与社会:跨学科的视角》(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0 年),第 305 – 321、369 – 508 页;和 E.H.肖特利弗:《计算机程序支持临床决策》,载《美国医学协会杂志》,258 期(1987 年 7 月 3

日):第 61 – 66 页。[Brand, *The Media Lab*, 90; Joseph Bronzino, Vincent H. Smith, and Maurice L. Wade, *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90), 305 – 321, 369 – 508; and Edward H. Shortliffe, "Computer Programs to Support Clinical Decision Making,"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258 (3 July 1987): 61 – 66.]

17 J.西利格曼、L.巴克利:《一间窗外有好景色的病房》,载《新闻周刊》,1990 年 3 月 26 日,第 61 页。[Jean Seligman and Linda Buckley, "A Sickroom with a View," *Newsweek*, 26 Mar. 1990, 61.]

18 引自 M.朗:《预言者们的目录》,载《大全》,1987 年 1 月,第 38 页。[Quoted in Marion Long, "The Seers' Catalog," *Omni*, Jan. 1987, 38.]

19 同上引书,第 40 页。Quoted ibid., 40.

20 W.艾伦:《库格尔马斯一段经历》,载《副作用》一书(纽约:巴兰坦书籍出版社,1981 年),第 61 – 62 页。[Woody Allen, "The Kugelmass Episode," *Side Effects* (New York: Ballantine, 1981), 61 – 62.]

21 同上引书,第 63 – 65 页。Ibid., 63 – 65.

22 同上引书,第 77 页。Ibid., 77.

23 J.P.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一个历史概观》,载《时间、商品与幸福》一书,F.T.贾斯特、F.P.斯塔福德编辑(安阿伯,密执安州:调查研究中心,密执安大学,1985 年),第 289 – 311 页,和 R.库贝、M.奇克桑特米哈伊:《电视与生活质量:观看电视如何影响日常经验》(希尔斯戴尔,新泽西州:L.厄尔鲍姆伙伴,1990 年)。[John P. Robinson, "Changes in Time Use: An Historical Overview," *Time, Goods, and Well-Being*, ed. F. Thomas Juster and Frank P. Stafford (Ann Arbor, Mich.: Survey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85), 289 – 311, and Robert Kubey and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How Viewing Shapes Everyday Experience* (Hillsdale,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1990).]

24 J.范:《电视对社会的影响并未减速》,载《芝加哥论坛报》,1990 年 6 月 3 日,第 7 节,第 1 页。[Jon Van, "TV's Impact on Society Not Slowing," *Chicago Tribune*, 3 June 1990, sec. 7, 1.] 161

25 H.范特尔:《新投影器把观者放入大的画面》,载《纽约时报》,1990 年 1 月 28 日,第 2 节,第 18 页。[Hans Fantel, "New Projectors Put the Viewer in the Big Picture," *New York Times*, 28 Jan. 1990, sec. 2, 18.]

26 S.特克尔:《第二个自我:计算机与人的精神》(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84年),第64-92页,和库贝、奇克桑特米哈伊:《电视与生活质量》,第143-144页。[Sherry Turkle, *The Second Self: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Spirit*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4), 64-92, and Kubey and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143-144.]

27 为考查计算机网络,参见R.柯卡姆:《计算机网络》,载《APA简报》89,2期(1990年冬):第34-39页,和K.赖特:《到全球村之路》,载《科学美国人》,1990年3月,第83-94页。[For a survey of computer networks, see Rick Kirkham, "Computer Networks," *APA Newsletter* 89, no. 2 (Winter 1990): 34-39, and Karen Wright, "The Road to the Global Village," *Scientific American*, Mar. 1990, 83-94.]

28 J.德莱西:《有吸引力的计算机》,载《大西洋》,1987年7月,第18-26页;布兰德:《媒体实验室》,第25-26页,和H.肯纳:《在我的计算机视窗外》,载《哈珀的月刊》,1989年11月,第76-80页。[Justine de Lacy, "The Sexy Computer," *Atlantic*, July 1987, 18-26; Brand, *The Media Lab*, 25-26, and Hugh Kenner, "Out My Computer Window," *Harper's*. Nov. 1989, 76-80.]

29 M.多德:《八十八个什么的》,载《新共和》,1988年8月1日,第37-40页。[Maureen Dowd, "Eighty-Eightsomething," *New Republic*, 1 Aug. 1988, 37-40.]

30 T.卢克:《电视的民主与极有权威、魅力领袖的政治策略》,载《终极目的》期刊,70期(1986-1987年冬):第59-79页,和F.W.弗兰德利:《在电视上:新闻、谎言与录像磁带》,载《纽约时报》,1989年8月6日,第2节,第1、27页。[Tim Luke, "Televisual Democracy and the Politics of Charisma," *Telos* no.70 (Winter 1986-1987): 59-79, and Fred W. Friendly, "On Television: News, Lies and Videotape," *New York Times*, 6 Aug. 1989, sec. 21, and 27.]

31 J.梅罗维茨:《没有地点的感觉:电子媒体对社会行为的影响》(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18-122页。[Joshua Meyrowitz, *No Sense of Place: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Media on Social Behavio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18-122.]

32 E.拉尔森:《美好的新食物》载《哈珀的月刊》,1988年5月,第18-22页,和J.戈尔曼:《什么东西你都不想狠咬一口吃》,载《纽约时报杂志》,1989年6月11日,第40、42、44页。[Erik Larson, "Brave New Foods," *Harper's*

May 1988, 18 – 22, and James Gorman, "Nothing to Sink Your Teeth Into,"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1 June 1989, 40, 42, 44.]

33 B.巴德:《在午餐前,爬每座山》,载《新闻周刊》,1989 年 11 月 13 日,第 102 页。[Bill Bard, "Climb Every Mountain, Before Lunch," *Newsweek*, 13 Nov. 1989, 102.]

34 C.利尔森:《迪斯尼它是怎样做的》,载《新闻周刊》,1989 年 4 月 3 日,第 50 页。[Charles Leerhsen, "How Disney Does It," *Newsweek*, 3 Apr. 1989, 50.]

35 同上引书,第 49 页。Ibid., 49.

36 戈耳曼:《什么东西你都不想狠咬一口吃》,第 42 页。[Corman, "Nothing to Sink Your Teeth Into," 42.]

37 同上引书,第 42 页。Ibid., 42.

38 E.K.库格林:《电视上的暴力行为有害我们的健康吗?》,载《高等教育时报》,1985 年 3 月 13 日,第 5、8 页。[Ellen K. Coughlin, "Is Violence on TV Harmful to Our Health?"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3 Mar. 1985, 5 and 8.]

39 在拙著《人造的现实》一文中可以找到论据,此文载于《思想中感情的存在》一书(B.D.奥登、M.默恩编辑(纽约:彼得·兰,即将出版)。[Arguments can be found in my "Artificial Realities," in *The Presence of Feeling in Thought*, ed. Bernard Den Ouden and Marcia Moen (New York: Peter Lang, forthcoming).]

40 就由电视播放的超现实情况来说,这是最明显不过了。参见库贝、奇克桑特米哈伊:《电视与生活质量》,第 119 – 148、186 – 187 页。[This is most evident in the case of televised hyperreality. See Kubey and Csikszentmihalyi, *Television and the Quality of Life*, 119 – 148, 186 – 187.]

41 同上引书,第 130、133 – 134、137 页。Ibid., 130, 133 – 134, 137.

42 W.J.唐利:《五彩纸屑时代》(纽约:H.霍尔特,1983 年),第 173 – 198 页。[William J. Donelly, *The Confetti Generation* (New York: H. Holt, 1983), 173 – 198.]

43 艾伦:《库格尔马斯一段经历》,第 78 页。[Allen, "The Kugelmass Episode," 78.]

44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Scivias》,第 3 册,第 13 幕,载于《歌剧大全》,F.A.鲁斯、J.P.米格内编辑《拉丁纳教父遗书》(巴黎,1882 年),卷 197,732 栏;我的翻译《上帝的威严伟大》,载于 G. M.霍普金斯著《诗歌与散文》,W.H.

伽德纳编(哈蒙兹华斯:企鹅出版社 1953 年),第 27 页。[Hildegard of Bingen, *Scivias*, bk. 3, vision 13, in *Opera Omnia*, ed. F. A. Reuss and J. P. Migne, *Patrologia Latina* (paris, 1882), v. 197, col. 732, my translation, "God's Grandeur" is in Gerald Manley Hopkins, *Poems and Prose*, ed. W. H. Gardner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53), 27.]

45 K.马克思、F.恩格斯:《共产党宣言》,S.H.比尔编辑(纽约:阿普莱顿 - 森图里 - 克罗夫茨,1955 年),第 13 页。[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ed. Samuel H. Beer (New York: Appleton-Century-Crofts, 1955), 13.]

46 E.于恩格尔:《全面动员》,载《作品集》,10 卷本。(斯图加特:克莱特[1960 - 1961]),第 5 卷:第 123 - 147 页。[Ernst Jünger, "Die totale Mobilmachung," *Werke*, 10 vols. (Stuttgart: Klett, [1960 - 1961]), 5: 123 - 147.]

47 关于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产生的保守主义与技术治国的混合物,参见 J.赫弗:《魏玛与第三帝国的反动的现代主义技术、文化与政治》(坎布里奇: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 年)。[On the amalgams of conservatism and technocracy Germany produced between the World Wars, see Jeffrey Herf, *Reactionary Modernism: Technolog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Weimar and the Third Reic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162 48 C. D.詹金斯:《心脏病的心理与社交上的先兆》,载《新英格兰医学杂志》,284 期(1971 年 2 月 4 日):第 244 页。[C. David Jenkins, "Psychologic and Social Precursors of Coronary Diseas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284 (4 Feb. 1971): 244.]

49 M.弗里德曼,R.H.罗森曼:《特别明显的行为模式与血液、心血管的发现有连带关系》,载《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69 期(1959 年 3 月 21 日):第 1286 页。[Meyer Friedman and Ray H. Rosenman, "Association of Specific Overt Behavior Pattern with Blood and Cardiovascular Finding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69 (21 Mar. 1959): 1286.]

50 詹金斯:《心脏病在心理与社交上的先兆》,第 309 页。另见罗森曼等人:《冠状动脉心脏病预测研究》,载《美国医学协会杂志》,189 期(1964 年 7 月 6 日):第 15 - 22 页,和詹金斯:《容易患冠动脉血栓症者的个性》,载于《注意心肌梗塞形成与心脏保护的心理方面》一书,W.D.金特里、小 R.B.威廉斯编辑(圣路易斯:莫斯比,1975 年),第 5 - 23 页。[Jenkins, "Psy-

chologic and Social Precursors of Coronary Disease," 309. See also Rosenman et al., "A Predictive Study of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189(6 July 1964):15 – 22, and Jenkins, "The Coronary-Prone Personality," in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Myocardial Infarction and Coronary Care*, ed. W. Doyle Gentry and Redford B. Williams, Jr. (Saint Louis: Mosby, 1975), 5 – 23.]

51 布朗齐诺等人:《医学技术与社会》,第 42 页,和 J.霍利、B.卡罗尔、B.R.利特尔:《生活方式类型学》,载《社会指标研究》,20 期(1988 年):第 389 页。[Bronzino et al., *Medical Technology and Society*, 42, and James Horley, Barbara Carroll, and Brian R. Little, "A Typology of Lifestyles,"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20 (1988):389.]

52 P.T.基尔本:《来自数字显示踏车的报道》,载《纽约时报》,1990 年 6 月 3 日,第 4 节,第 1、3 页。[Peter T. Kilborn, "Tales from the Digital Treadmill," *New York Times*, 3 June 1990, sec. 4, 1 and 3.]

53 N.吉布斯:《美国怎样耗尽了时间》,载《时代周刊》,1989 年 4 月 24 日,第 60 页。[Nancy Gibbs, "How America Has Run Out of Time," *Time*, 24 Apr. 1989, 60.]

54 S.拉巴顿:《B.杰弗里斯的反复试验》,载《纽约时报》,1989 年 1 月 15 日,第 3 节,第 1、10 页。[Stephen Labaton, "The Trials and Errors of Boyd Jefferies," *New York Times*, 15 Jan. 1989, sec. 3, 1 and 10.]

55 S.B.林德:《匆匆忙忙休闲的阶级》(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 年)。[Staffan B. Linder, *The Harried Leisure Clas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56 但丁(阿利季埃里):《地狱篇》,J.奇阿尔迪翻译(纽约:新美国图书馆,1954 年),第 76 页。[Dante Alighieri, *The Inferno*, trans. John Ciardi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54), 76.]

57 《通讯的考察》,E.卡彭特、M.麦克鲁汉编辑(波士顿:灯塔出版社,1960 年),第 xi 页。另见 D.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冒风险的社会预测》(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6 年),第 128、129 页,第 160 页注释 30,第 298、364、366 页。[*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 ed. Edmund Carpenter and Marshall McLuhan (Boston: Beacon Press, 1960), xi. See also Daniel 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A Venture in Social Forecasting* (New York: Ba-

sic Books, 1976), 128, 129, 160n.30, 298, 364, 366.]

58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 xv 页。[Bell, *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 xv.]

59 G.斯蒂克斯:《10^9 比得连接》,载《科学美国人》,1990 年 10 月,第 118、120 页,和 M.L.德托佐斯:《建立信息市场》,载《技术评论》,1991 年 1 月,第 28 – 40 页。[Gary Stix, "Gigabit Connection," *Scientific American*, Oct. 1990, 118 and 120, and Michael L. Dertouzos, "Building the Information Marketplace," *Technology Review*, Jan. 1991, 28 – 40.]

60 为了解另一不同分析,参见 G.巴格里阿莱洛:《论超智能》,载《知识:创造、传播和利用》,10 期(1988 年):第 67 – 89 页。[For an alternative analysis, see George Bugliarello, "Toward Hyperintelligence," *Knowledge: Creation, Diffusion, Utilization* 10 (1988): 67 – 89.]

61 同上引书,第 73 – 78 页。Ibid., 73 – 78.

62 同上引书,第 81 – 83 页。Ibid., 81 – 83.

63 R.L.恩弗尔德:《软件可靠性的限度》,载《技术评论》,1987 年 4 月,第 36 – 43 页,和 M.罗杰斯:《我们能相信我们的软件吗?》,载《新闻周刊》,1990 年 1 月 29 日,第 70 – 73 页。[Ronald L. Enfield, "The Limits of Software Reliability," *Technology Review*, Apr. 1987, 36 – 43, and Michael Rogers, "Can We Trust Our Software?" *Newsweek*, 29 Jan. 1990, 70 – 73.]

64 朱鲍夫:《在时髦机器的时代》,第 315 – 361 页。[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315 – 361.]

65 R.笛卡尔:《方法谈》,L.J.拉弗勒尔翻译(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 – 梅里尔,1950 年)第 40 页。[René Descartes, *Discourse on Method*. trans. Laurence J. Lafleur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0), 40.]

66 鲁宾逊:《时间利用上的变化》,第 299 – 300 页。[Robinson, "Changes in Time Use," 299 – 300.]

67 布兰德:《媒体实验室》,第 256 页。[Brand, *The Media Lab*, 256.]

68 参见西蒙·布莱克本对霍布斯、洛克与贝克莱的电子文本之评论,载于《心》,99 期(1990 年):第 489 – 490 页。[See Simon Blackburn's review of electronic versions of texts by Hobbes, Locke, and Berkeley in *Mind* 99 (1990): 489 – 490.]

69 J.A.特纳:《博物馆计算机化:这种演化已经开始》,载《博物馆新闻》,66

期(1988年7-8月):第24-25页;W.H.霍南:《未来的博物馆都在芯片里》,载《纽约时报》,1988年11月27日,第2节,第1页;和C.雷蒙德:《人文学科研究者在其专业中使用计算机经历'面目一新'》,载《高等教育时报》,1989年7月12日,第A6页。[Judith Axler Turner, "Museum Computerization: The Evolution Has Begun," *Museum News* 66 (July—Aug. 1988): 24-25; William H. Honan, "The Museum of the Future: It's All in the Chips," *New York Times*, 27 Nov. 1988, sec. 2, 1; and Chris Raymond, "Humanities Researchers Experience a 'Sea Change' in the Use of Computers in Their Disciplines,"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12 July 1989, A6.]

70 H.德赖弗斯、S.德赖弗斯:《心智控制机器:计算机时代人的直觉能力与专门技能》,(纽约:自由出版社,1986年)。[Hubert Dreyfus and Stuart Dreyfus, *Mind Over Machine: The Power of Human Intuition and Expertise in the Era of the Compute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163

71 T.阿奎那:《神学大全》,第1部分,问题79,第3篇文章。积极的智能或智力是灵魂用以制作一切事物的能力。也有消极的智力能使灵魂以某种方法变成为一切事物。[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ca*, pt. 1, quest. 79, art. 3. The active intelligence or intellect is the power with which the soul makes everything. There is also the passive intellect that allows the soul, in a certain way, to become everything.]

第 5 章

1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1139a 26-b9页;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第1025b18-26、1064a10-18页;和I.康德:《实践理性批判》,L.W.贝克翻译(印第安纳波利斯:鲍勃斯-梅里尔,1956年)。虽然西方哲学中没有集中一贯地关注物质文化,但对技术与人工制品的偶然讨论,一直以热烈离题话与富启发性插入语进行。参见C.米查姆:《从三方面认识技术》,载于《从人工制品到住房:对技术的关键性啮合的研究》,G.L.奥米斯顿编辑(伯利恒,宾夕法尼亚州:里海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31-59页。[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39a26 - b9; Aristotle, *Metaphysics* 1025b18 - 26, 1064a10 - 18; and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 trans. Lewis

White Beck (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 1956). Although there is no central and sustained concern with material culture in Western philosophy, occasional discussions of technology and artifacts have been carried on in lively asides and illuminating parentheses. See Carl Mitcham, "Three Ways of Being-With Technology," in *From Artifact to Habitat: Studies in the Critical Engagement of Technology*, ed. Gayle L. Ormiston (Bethlehem, Pa.: Lehigh University Press, 1990), 31 – 59.]

2 重要的例外是:L.霍沃斯:《好城市》(布卢明顿: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1963年),第14 – 15、25 – 38页,和L.温纳:《人工制品有政治吗?》,载《鲸与反应器:寻找高技术时代的局限》一书(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9 – 39页。更确切地说,这个工作表明,物质环境的现实是如何引起激烈道德争论的。像马克思主义者做的那样,把物质环境仅仅视为权力关系的表现,或者像M.道格拉斯、B.伊舍伍德那样,把物质环境仅仅视为信息分布的系统,都是未抓住现实。参见道格拉斯、伊舍伍德:《商品世界》(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79年)。[Important exceptions are Larry Haworth, *The Good C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14 – 15, 25 – 38, and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The Whale and the Reactor: A Search for Limits in an Age of High Techn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19 – 39. The task, more precisely, is to show how the reality of the material setting is morally charged. To take the material setting merely as an expression of power relations, as the Marxist does , or as a system of information distribution, as Mary Douglas and Baron Isherwood do, is to miss the reality. See Douglas and Isherwood, *The World of Goods*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3 我是在分析道德决定,要了解道德决定是否是日常的或根本的,实用的或本质的,个人的或集体的决定。把它们排列成3 – 维矩阵,这些3对的差别可产生8种可能性。我不愿令人厌烦地逐次考虑每一可能性,而非正式地最终谈谈我所说的那种根本的、实质的、集体的道德决定。[I am analyzing moral decisions by asking whether they are daily or fundamental, practical or material,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Arrayed in a three-dimensional matrix, these three pairs of distinctions yield eight possibilities. Rather than tediously considering each possibility in turn, I proceed informally to the kind of decision that finally concerns me, to decisions that are fundamental, material, and collective.]

4 G.拉尔森:《在远方的那一边》(堪萨斯城,密苏里州:安德鲁斯,麦克米尔

与帕克,1983 年),〔14〕。[Gary Larsen, *Beyond the Far Side* (Kansas City, Mo.: Andrews, McMeel & Parker, 1983), 〔14〕.]

5 L.M.弗里德曼:《完全的公正》(纽约:罗素·塞奇基金会,1985 年),第 55 – 58 页。[Lawrence M. Friedman, *Total Justi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85), 55 – 58.]

6 J.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纽约:最佳出版社,1961 年),第 3 – 25 页。[Jane 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1961), 3 – 25.]

7 美国统计局:《美国统计摘录》(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处,1989 年),第 591 页。[U.S. Bureau of the Census,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198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89), 591.]

8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3 – 25 页,和 H.莱维特:《超高速公路——超级骗局》(纽约:道布尔戴,1970 年),第 27、34、50、187 – 188、269 页。[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3 – 25, and Helen Leavitt, *Superhighway-Superhoax* (New York: Doubleday, 1970), 27, 34, 50, 187 – 188, 269.]

9 1972 年,国会更尽心竭力建立了技术评价局。虽然评价局的报告因其技术高水准与实用价值受到重视,但缺乏道德的判断与价值。要了解背景情况,参见 T.J.奈特:《技术的未来》(马拉巴尔,佛罗里达州:克里格,1982 年)。[A more concerted effort wa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Office of Technology Assessment by Congress in 1972. While the office's reports are valued for their technical quality and utility, they lack moral judgment and weight. For background, see Thomas J. Knight. *Technology's Future* (Malabar, Fla.: Krieger, 1982).]

10 R.赖克:《看:我们有个工业政策》,载《纽约时报》,1988 年 5 月 22 日,第 4 节,第 29 页。另见 M.博勒斯:《国家的重要关头》,载《科学与技术中的问题》,7 期(1990 年秋):第 40 – 48 页。[Robert Reich, "Behold: We Have an Industrial Policy," *New York Times*, 22 May 1988, sec. 4, 29. See also Michael Borrus, "Chips of State," *Issu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7 (Fall 1990): 40 – 48.] 164

11 在拙著:《文本与事物》中能看到更加技术性与详细的说明,该文载于《生活世界与技术》一书,T.凯西、L.恩布里编辑(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美国大学出版社,1990 年),第 93 – 116 页。[A more technical and detailed

account can be found in my "Texts and Things," in *Lifeworld and Technology*, ed. Timothy Casey and Lester Embree (Washington D.C.: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1990), 93 – 116.]

12 为说明刻度尺如何从很大量滑到很少量,参见菲利普、菲利斯·莫里森:《10 的力量:一本关于宇宙中事物的相对大小与增加另一个 0 的结果的书》(纽约:科学美国人图书馆,1982 年)。[For an illustration of how the scale can slide from the very large to the very small, see Philip and Phylis Morrison, *Powers of Ten: A Book about the Relative Size of Things in the Universe and the Effect of Adding Another Zero* (New York: Scientific American Library, 1982).]

13 J.E.拉科姆比:《造独木舟者实现一个梦想》,载《密苏拉人报》,1986 年 3 月 9 日,第 B3 页,和 C.P.克劳:《惟一的办法》,载《纽约客》,1987 年 6 月 22 日,第 34 – 44 页。[James E. Larcombe, "Canoe Maker Realizes a Dream," *Missoulian*, 9 Mar. 1986, B3, and C. P. Crow, "The Only Way," *New Yorker*, 22 June 1987, 34 – 44.]

14 B.迪莫特:《与马共同生活》,载《纽约时报杂志》,1985 年 2 月 17 日,第 65 页。[Benjamin DeMott, "Hanging Out with Horses,"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7 Feb. 1985, 65.]

15 N.麦克莱恩:《树林、书籍与荒废职务的官员门》,载于《诺曼·麦克莱恩》一书,R. 麦克法兰、H.尼古拉斯编辑(刘易斯顿,爱达荷州:康弗伦斯出版社,1988 年),第 81 页。[Norman Maclean, "The Woods, Books, and Truant Officers," in *Norman Maclean*, ed. Ron McFarland and Hugh Nichols (Lewiston, Idaho: Confluence Press, 1988), 81.]

16 L.芒福德当时对经济大萧条会比那种情况造成更深刻而有益的危机,抱有很大希望。参见所著:《专门技术与文明》(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和沃尔德〔1934 年〕1963 年),第 364 – 435 页。[Lewis Mumford, at the time, was hopeful that the Depression would constitute a crisis more profound and salutary than that. See his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34] 1963), 364 – 435.]

17 A.温伯格:《科学技术能代替社会工程学吗?》,载于《科学技术与未来》一书,第 5 版,A.H.泰克编辑(纽约:圣马丁的出版社,1990 年),第 29 – 38 页。虽然温伯格想到了科技的困境,但即使科技会部分地解决些社会问题这一点,他决未曾想到。[Alvin Weinberg, "Can Technology Replace Social

Engineering?" in *Technology and the Future*, 5th ed., ed. Albert H. Teich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0), 29 – 38. Though Weinberg conceived of the technological fix, he never thought of it as more than a partial solution to social problems.]

18 丹尼尔·卡拉汉曾对这个问题在所著两本书中做过重要的尝试研究:《规定老年化社会中医疗目标的限度》(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87 年),和《哪种生活是医学进步的极限》(纽约:西蒙与舒斯特,1990 年)。[Daniel Callahan has made a significant start on this problem in *Setting Limits: Medical Goals in an Aging Society*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87), and *What Kind of Life: The Limits of Medical Progress*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90).]

19 M. 奇克桑特米哈伊:《流动:最佳经验心理学》(纽约:哈珀与罗,1990 年)。[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 Row, 1990).]

20 克劳:《惟一的方法》,第 41 页。[Crow, "The Only Way," 41.]

21 参见拙著:《技术与自由主义的危机》,载《技术变化:语境与概念的含义》一书,E. F. 伯恩、J. C. 皮特编辑《多尔德莱希特:克鲁弗尔学院,1989 年》,第 105 – 122 页。[See my "Technology and the Crisis of Liberalism," in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Contextual and Conceptual Implications*, ed. Edmund F. Byrne and Joseph C. Pitt (Dordrecht: Kluwer Academic, 1989), 105 – 122.]

22 参见拙著:《科技社会中共和主义者的品德》,载于《科技变化与美国的变化》一书,S. E. 戈德堡、C. R. 斯特兰编辑(卡尔邦德耳:南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1987 年),第 159 – 175 页。[See my "Republican Virtue in a Technological Society," in *Technological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America*, ed. Steven E. Goldberg and Charles R. Strain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87), 159 – 175.]

23 霍沃思:《好城市》,第 145 页。[Haworth, *The Good City*, 145.]

24 M. 沃尔泽曾强调指出,他的论据,载于《公正的范围:为多元主义与平等辩护》一书(纽约:基础书籍出版社,1983 年)"是激进的特殊主义的"(第 xiv 页)。另见 S. 图尔明:《大都会:现代性的隐蔽议程》(纽约:自由出版社,1990 年),第 31 – 33、188 – 189 页。[Michael Walzer has stressed that his argument, in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is radically particularist" (xiv). See also Stephen Toulmin,

Cosmopolis: The Hidden Agenda of Modern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90), 31 – 33, 188 – 189.]

25 B.J.弗里登、L.R.萨加林:《闹市区股份有限公司:美国怎样重建城市》(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89 年)。[Bernard J. Frieden and Lynne B. Sagalyn, *Downtown, Inc.: How America Rebuilds Citie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26 同上引书,第 199 – 213 页。Ibid., 199 – 213.

27 L.凯尔贝尔:《密苏拉曾经是这样的》(密苏拉,蒙大拿州:盖特威,1972 年),第 29 – 33 页。[Lenora Koelbel, *Missoula the Way It Was* (Missoula, Mont.: Gateway, 1972), 29 – 33.]

165 28 W.H.怀特:《城市》(纽约:道布尔戴,1988 年)。[William H. Whyte, *City* (New York: Doubleday, 1988).]

29 它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约束。参见 T.M.鲍威尔:《有经济效益的质量追求》(阿蒙克,纽约:M.E.夏普,1988 年),第 106 – 168 页。[It was a mental as well as physical straitjacket. See Thomas Michael Power, *The Economic Pursuit of Quality* (Armonk, N.Y.: M.E. Sharpe, 1988), 106 – 168.]

30 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第 50 – 54 页,和怀特:《城市》,第79 – 102 页。[Jacobs,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50 – 54, and Whyte, *City*, 79 – 102.]

31 C.E.利特尔:《美国绿化之法》(巴尔的摩: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1990 年)。[Charles E. Little, *Greenways fo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 在 K.弗兰普顿:《关于批判的地区主义》一文中,能看到恳求确定建筑中的方向,与对无地方性的普遍主义的批判,该文载于《反美学的:关于后现代文化论文集》一书,H.福斯特编辑(汤森港,华盛顿州:海湾出版社,1983 年),第 16 – 30 页,和《地点 – 形式与文化的同一》一文,载于《现代主义以后的设计:超出主体的范围》一书(J.撒卡拉编辑(纽约:泰梅斯与赫德森,1988 年),第 51 – 66 页。[A plea for orientation in architecture, along with a critique of placeless universalism, can be found in Kenneth Frampton, "Towards a Citical Regionalism," in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modern Culture*, ed. Hal Foster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16 – 30, and "Place-Form and Cultural Identity," in *Design after Modernism: Beyond the Ob-*

ject, ed. John Thackara (New York: Thames and Hudson, 1988), 51 – 66.]

33 参见《公共空间》,载《异议》(1986 年秋):第 470 – 485 页,其中有 M.沃尔泽、M.拉斯廷、G.泰勒、M.伯曼等人的稿件;和《公共广场变成了什么东西?》,载哈勃的杂志,1990 年 7 月,第 49 – 60 页,其中有 J.希特、R.L.弗莱明、E.普拉特 – 朱伯克、R.森奈特、J.瓦因斯、E.齐默尔曼等人的稿件。[See "Public Space," *Dissent* (Fall 1986): 470 – 485, with contributions by Michael Walzer, Michael Rustin, Gus Tyler, and Marshall Berman; and "Whatever Became of the Public Square?" *Harper's*, July 1990, 49 – 60, with contributions by Jack Hitt, Ronald Lee Fleming, Elizabeth Plater-Zyberk, Richard Sennett, James Wines, and Elyn Zimmerman.]

34 例如参见伯曼在《公共空间》文中第 478、480、483 – 484 页中意见。[See, for example, Berman, in "Public Space," 478, 480, 483 – 484.]

35 参见拙著《庆祝的群体》,载《哲学与技术的研究》,10 期(1990 年):第 315 – 345 页。[See my "Communities of Celebration," *Research in Philosophy and Technology* 10 (1990): 315 – 345.]

36 R.安吉尔:《最坏的与摇摆不定的东西》,载《纽约客》,1990 年 5 月 21 日,第 79 – 83 页。[Roger Angell, "The Pits and the Pendulum," *New Yorker*, 21 May 1990, 79 – 83.]

37 弗里登、萨加林:《闹市区股份有限公司》,第 252 – 255 页。[Frieden and Sagalyn, *Downtown, Inc.*, 252 – 255.]

38 P.戈德伯格在《超越乌托邦:接受新现实主义》一文中,考虑过巴特里公园城前途有望,该文载《纽约时报》,1989 年 6 月 25 日,第 2 节,第 30 页。[Paul Goldberger considered Battery Park City Promising in "Beyond Utopia: Settling for a New Realism," *New York Times*, 25 June 1989, sec. 2, 30.]

39 森奈特在《公共广场变成了什么东西?》一文第 51 页中的意见。[Sennett, in "Whatever Became of the Public Square?" 51.]

40 D.科恩、B.格林伍德:《沿街卖艺者:街头娱乐史》(牛顿 – 艾博特:戴维与查尔斯,1981 年),和怀特:《城市》,第 25 – 55 页。[David Cohen and Ben Greenwood, *The Buskers: A History of Street Entertainment* (Newton Abbot: David & Charles, 1981), and Whyte, *City*, 25 – 55.]

41 C.拉希:《社会共产主义者对自由主义的批评》,载《试探》,69 期(1986 年):第 60 – 76 页。[Christopher Lasch, "The Communitarian Critique of Liber-

alism," *Soundings* 69 (1986):60 – 76.]

42 关于追求建立好城市工作中指导与公开性之间的平衡,参见哈沃思:《好城市》,第 132 – 141 页。[On the balance between guidance and openness in the pursuit of the good city, see Haworth, *The Good City*, 132 – 141.]

43 B.巴里对 M.桑德尔的评论:《自由主义与公正的极限》,载于《伦理学》,94 期(1984 年):第 525 页,和 M.金斯库在《论公民的自由主义:专题研讨会》一文中的意见,文载《新共和》,1990 年 6 月 18 日,第 26 页。[Brian Barry, review of Michael Sandel,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in Ethics* 94 (1984): 525, and Michael Kinsky, in "On Civic Liberalism: A Symposium," *New Republic*, 18 June 1990, 26.]

44 霍沃思:《好城市》,第 16 – 17 页。[Haworth, *The Good City*, 16 – 17.]

45 同上引书,第 64 – 65、67 – 69、119 – 121 页;沃尔泽:《公正的范围》,第 3 – 63 页;和伯曼在《公共空间》一文(第 480 – 483 页)中意见。[Ibid., 64 – 65, 67 – 69, 119 – 121; Walzer, *Spheres of Justice*, 3 – 63; and Berman, in "Public Space," 480 – 483.]

46 J.罗尔斯:《正义论》(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 年),第 282 – 284 页。[John Rawls, *A Theory of Justic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282 – 284.]

47 为了解比这些看法更普遍的意见,参见 M.考斯:《为了新的平等》,载《新共和》,1990 年 5 月 7 日,第 18 – 27 页。[For a more general proposal along these lines, see Mickey Kaus, "For a New Equality," *New Republic*, 7 May 1990, 18 – 27.]

48 H.阿伦德提:《人类环境》(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8 年),第 38 – 49 页,和桑奈特:《公务人员之没落:损害公众生活和压在无力尽其职责的现代心灵的种种力量》(纽约:最佳出版社,1978 年),第 257 – 340 页。[Hannah Arendt, *The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38 – 49, an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 The Forces Eroding Public Life and Burdening the Psyche with Roles It Cannot Perform* (New York: Vintage, 1978), 257 – 340.]

166 49 例如,参见 M.布伯:《上帝的黯然失色:宗教与哲学的关系研究》,M.S.弗里德曼等翻译(纽约:哈珀与罗,1952 年);J.马利丹:《接近上帝》,P.奥赖利翻译(纽约与伦敦:麦克米伦出版社,1954 年);和 P.蒂利希:《信仰的

动力学》(纽约:哈珀与罗,1957 年)。[See for example, Martin Buber. *Eclipse of God: Studies in the Relation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trans. Maurice S. Friedman et al.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2); Jacques Maritain, *Approaches to God*. trans. Peter O' Reilly (New York and London: Macmillan, 1954); and Paul Tillich, *Dynamics of Faith*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1957).]

50 W.A.高尔斯顿:《自由开明国家的公共道德与宗教》,载《政治科学》,19 期(1986):第 807 - 824 页,和 K.D.沃德:《美国的宗教与政治》(纽约:圣马丁的出版社,1987 年),第 1 - 21 页。[William A. Galston, "Public Morality and Religion in the Liberal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19 (1986): 807 - 824, and 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1 - 21.]

51 W.B.米德:《过去政教'分离'如何严格?》,载《对立倾向》,26 期(1986 年):第 244 - 247 页,和沃德:《宗教与政治》,第 102 - 141 页。[Walter B. Mead, "How Strict Was '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Cross Currents* 26 (1986): 244 - 247, an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102 - 141.]

52 我从 C.米查姆处得知,与此相似的更新,已在布鲁克林的圣詹姆斯以及在路易斯维尔的圣查尔斯·卢万加罗马天主教大教堂产生。[I have it from Carl Mitcham that similar renewals have taken place at the Roman Catholic Cathedral of St. James in Brooklyn and St. Charles Luwanga in Louisville.]

53 K.L.伍德沃德:《一个大教堂的觉醒》,载《新闻周刊》,1986 年 6 月 16 日,第 59 - 60 页,和 A.L.古德曼:《不仅是大教堂:圣约翰教士》,载《纽约时报杂志》,1987 年 11 月 15 日,第 2 节,第 22 - 25、74 - 76 页。[Kenneth L. Woodward, "The Awakening of a Cathedral," *Newsweek*, 16 June 1986, 59 - 60, and Ari L. Goldman, "More than a Cathedral: St. John the Divin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15 Nov. 1987, sec. 2, 22 - 25, 74 - 76.]

54 戈德伯格:《一个社区的宗教界标中信仰的两个表示》,载《纽约时报》,1986 年 9 月 28 日,第 2 节,第 31、35 页。[Goldberger, "Two Gestures of Faith in Religious Landmarks of a Community," *New York Times*, 28 Sept. 1986, sec. 2, 31 and 35.]

55 小 P.穆尔:《他的最后指控》,载《大教堂》,1989 年 9 月,第 7 页。[Paul Moore, Jr., "His Final Charge," *Cathedral*, Sept. 1989, 7.]

索　　引*

（页码为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

Abortion, resentful opposition to, 8 – 9[忿恨地反对堕胎]

Adolphe, Chief, 29 [酋长阿道尔夫]

Aggressive realism: and constructive enthusiasm, 32 – 33, 51 – 52; an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27 – 28; in Philosophy, 49 – 50; and the railroads, 27 – 34 [侵略性的现实主义:和建设性的热情;和工业革命;哲学中的;和铁路]

Agriculture, and computerized in formation, 71 [农业和计算机化的信息]

AIDS, and resentinent, 9 [艾滋病和忿恨不满]

Allen, Woody, 89 – 90, 97 [W.艾伦]

Anthropocentrism, postmodern, 117 [后现代的人类中心主义]

Architecture: modernist, 57 – 59; Postmodernist, 59 – 60 [建筑:现代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

Aristotle, 109, 110 [亚里士多德]

Arlee, Chief, 29, 30 [酋长阿尔里]

Art: as communal celebration, 136 and divinity, 145; subverted by technology, 136 – 137 [艺术:作为共同或集体的庆祝;和神性;被技术破坏的]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hyperintelligence, 108 [人工智能及超智能]

Attewell, Paul, 68 – 70 [P.阿特韦尔]

Automobile: and modernism, 58, 129, purchase of, as a moral decision, 112 [汽车:和现代主义;买汽车视为道德决定]

Bacon, Francis, 23 – 24 [弗朗西斯·培根]

Baltimore Orioles, 135 [巴的摩尔奥

---

* 索引中页码系原书页码，即本书边码。——译者注

里奥尔公司]
Baseball, as communal celebration, 135, 143 [作为共同或集体庆祝的棒球运动]
Baudrillard, Jean, 83 [琼·鲍德里拉德]
Bell, Daniel, 20, 60 – 61 [丹尼尔·贝尔]
Bellah, Robert N, 19, 57, 149n. 2 [罗伯特·N. 贝拉]
Blacks and unemployment, 9 [黑人和失业]
Brand, Stewart, 107 [斯图尔特·布兰德]
Bugbee, Henry G., 33 [亨利·G. 巴格比]
Bugliarello, George, 103 [乔治·布格利阿莱洛]

Callahan, Daniel, 164n. 18 [丹尼尔·卡拉汉]
Catholic Church, 145, 146 [天主教会]
Celebration: public, in the eigh teenth century, 40 – 41; elements of genuine, 134. *See also* Communal celebration [庆祝:18 世纪中的公众庆祝;真正庆祝的要素。另见 Communal Celebration]
Charlemagne, 21 [查理曼大帝]
Christianity, 145 – 147 [基督教]
Christowe, Stoyan, 33, 39 [斯托扬·克里斯托]
Citizen vs. consumer, 115 – 116, 140 – 141 [公民与消费者比较]
City: daily, 130 – 134; damaged by modernism, 58 – 59; as the dominant contemporary setting, 128; festive, 134 – 138; heavenly, 143 – 147; and hyperreality in urban redevelopment, 130; and trails, 133 – 134; and urban renewal as a moral decision, 113 – 114. *See also* Street life [城市:日常的;被现代主义破坏的;作为最重要的当代环境;节日的;天国的;和城市发展中的超现实;和小径;和作为道德决定的城市重建。另见 Street life]
Clark Fork River, 30 – 31, 131, 132, 137 [克拉克福克河]
Clouzot, Henri-Georges, 6 [H.-G. 克劳佐特]
Cold War, end of, 81 – 82 [冷战结束]
Columbus, Christopher, 21 – 22 [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ommunal celebration: in baseball, 135, 143; two principles for public support of, 141 – 142; requires public support, 140 – 141; and religion 144 [共同或集体的庆祝:棒球运动中的;获得公众对其支持的两原则;需要公众支持;和宗教]
Communal politics, centered on celebra-

tion 138 – 143 ［集中于庆祝的公共政策］
Communism, and modern technology, 80 – 81 ［共产主义和现代技术］
Communitarianism, vagueness of, 127 – 128 ［社会共产主义(社群主义)的含糊不清］
Community: positioned between intimacy and anonymity, 142 – 143; premodern, 40 ［群体或社区:介于密切与无名之间的;现代以前的］
Computer: and dematerializing reality, 71 – 72; an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67 – 71; and textualizing of reality, 67 – 69 ［计算机:和非物质化的现实;和信息加工;和现实的文本化］
Computer network: as central intelligence, 69 – 70, 71, as final hyperreality, 91 – 92 ［计算机网络:作为中央的智能;作为最终的超现实］
Conservatism: disavows responsibility for material culture, 114, 138 – 139; restrained in shaping society, 3 ［保守主义:不承认对物质文化负有责任;对塑造社会持克制态度的］
Consumer vs. citizen, 115 – 116, 140 – 141 ［消费者与公民相比较］
Control: electronic, over work, 101, modern inclination toward, 2 – 3 *See also* Power, regardless ［控制:对工作用电子操作的;似是现代趋势的。另见 Power, regardless］
Cooperation, informed, 75 – 77. ［信息灵通的协作］
Copernicus, Nicolaus, 21 – 22 ［N. 哥白尼］
Corporation: as reflection of Cartesian order, 35 – 37; decline of, 61;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74; and informed cooperation, 77; multinational, in postmodern economy, 63 – 64; as response to openness of New World, 36 ［公司:作为对笛卡尔式秩序的反映;之衰落;和适应性强的专业化;和消息灵通的协作;后现代经济跨国的;作为对新世界公开性的反应］
Crafts, as focal reality, 120 – 121 ［作为焦点现实的手工艺］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155n. 86, 160n. 23, 164n. 19 ［M. 奇克桑特米哈伊,155 页注释 86,160 页注释 23,164 页注释 19］

Dante, 101 – 102 ［但丁］
Death penalty, advocacy of, out of resentment, 8 ［出于怨恨而提倡死刑］
Decision: collective vs. individual, 112 – 116; fundamental vs. daily, 111; material vs. practical, 111 – 112 ［决定:集体的与个人的相比较;根本的与日常的相比较;物质的与实际

的相比较]
Descartes, Rene, 22, 24, 35 – 36, 50, 52 [瑞内·笛卡尔]
Discourse: modern, 2 – 3; postmodern, 3 – 4, 129, 144, *See also* Narrative; Schema [话语:现代的;后现代的。另见 Narrative;Schema]
Disney World, as final hyperreality, 93 – 94 [作为最终超现实的迪斯尼世界乐园]
Divinity: and art, 145 – 146; in celebration, 135 – 136 [神性:和艺术;庆祝中的]
Domestic nature, as focal reality, 120 [作为焦点现实的驯养自然物]
Donne, John, 22 [约翰·多恩]
Dowd, Maureen, 92 [莫林·多德]
Drugs, war on, and resentment, 9 – 10 [向毒品开战和怨恨]
Dworkin, Ronald, 19 [R.德沃金]

Eco, Umberto, 83 [昂伯托·艾科]
Economy. *See also* Productivity—modern: failure of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in, 77; decline of rugged individualism in, 64 – 65; constrained by environment, 62 – 63; goods saturation in, 63; mass production in, 61, 72; economic totalitarianism as possible successor of, 63 – 64 [经济。另见 Productivity——现代的:在其中产业与政府间协作的失败;在其中强健个人主义的衰弱;受环境限制的;其中商品饱和;其中大批生产;可能为其后继者的经济极权主义]
—postmodern: defined b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informed cooperation, 65; dematerialization in, 60 – 61;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 61 – 62; paradigmatic firm in , 77; resistance to, 77; and economic totalitarianism, 63 – 64. *See also* Computer;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后现代的:以信息加工、灵活的专业化、消息灵通的协作阐明的;其非物质化;其中个人主义的衰弱;其中范式化的公司;反对之阻力;和经济极权主义。另见 Computor;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In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United States: decline of, 12 – 13; federal budget deficit of, 7; foreign debt of, 7; standard prescription for, 13, 126 – 127——美国:其衰落;其联邦预算赤字;其外债;为其开的标准治疗方法
Emerson, Ralph Waldo, 32 – 33 [R.W.爱默生]
Eneas, Chief, 29, 30 [酋长恩尼阿斯]
Engel, Catharine, 72 – 73 [凯瑟琳·恩格尔]

Engels, Friederich, 97 [F.恩格斯]
Enlightenment, as unfinished project, 26, 142 [作为未完成计划的启蒙运动]
Environment: constrains the modern economy, 62 – 63; and soft vs. hard solutions, 78 – 79 [环境:限制现代经济;和软的与硬的解决办法的比较]
Episcopalian Church, 145 – 147 [主教派(圣公会)教堂]
Equal Opportunity affirmed, 26 [赞成平等机会]
Erdrich, Louise, 55 – 56 [路易斯·厄尔德里克]
Ethics: failure of, to illuminate hyperreality, 94; failure of, to consider material settings, 110 – 111; particularist, 54 – 55; universalist, 52 – 53 [伦理学:解释超现实之失败;考虑物质环境之失败;个别主义的;普遍主义的]
Experience, indifferent vs. oriented, 143 – 144. *See also* Symmetry of reality and humanity [不关心、不在乎的经验与有确定方向的经验之比较。另见 Symmetry of reality and humanity]

Fagan, Carol, 72 – 73 [卡罗尔·费根]
Fallows, James, 151 n.36 [J.法洛斯]
Farmers' Market, 115, 132 [农民的市场]
Femininism: as critique of aggressive realism, 51; as critique of universalist ethics, 53 – 55 [女权主义:作为对侵犯性现实主义的批评;作为对普遍主义伦理学的批评]
Flathead Reservation, 29, 135 – 136 [弗拉塞德人居留地]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and contingent work force, 75; and the corporation, 74; instances of, 72 – 73; and service industry, 74 – 75 [适应性强的专业化:和偶然、不定的劳动力;和公司;其实例;和服务产业]
Flight simulation as an instance of instrumental hyperreality, 85 [飞行模拟作为工具的超现实的实例]
Food as final hyperreality, 93, 94 [食物作为最终的超现实]
Frampton, Kenneth, 165n. 32 [K. 弗兰普顿]
Friedman, Lawrence M., 150n. 20 [L. M.弗里德曼]
Friedman, Meyer, 98 – 99 [迈耶·弗里德曼]

Galbraith, John Kenneth, 47, 61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Gallery, 121 [美术馆,陈列室]
Gates, William, 88 [威廉·盖茨]
Gelernter, David, 71 [戴卫·盖伦特]

Gilette, Edward, 28, 38 – 39 ［爱德华·吉列特］
Gilligan, Carol, 53 – 55 ［卡洛尔·吉利根］
Glamour as the perfection of hyperreality, 87 – 88, 90 – 91 ［作为超现实之完美的魅力］
Global village, 102, 128 ［全球村，地球村］
Government as an agent of fundamental, material, collective decisions, 113 – 116 ［政府作为根本的、物质的、集体的决定之代理人］
Great Depression and hardness of reality, 123 ［大萧条与现实的困难］
Habermas, Jürgen, 149n.3, 151n.3, 152n.17 ［尤尔根·哈贝马斯］
Hallett, J. L., 30, 31, 38 – 39, ［J. L. 哈利特］
Hard vs. soft solutions, 78 – 79 ［硬的与软的解决办法相比较］
Harvey, David, 155n.1 ［戴卫·哈维］
Haworth, Lawrence, 128, 165n.42 ［劳伦斯·哈沃斯］
Healy, Charles, 31 – 32 ［查尔斯·希利］
Healy, Mrs. Charles, 31 – 32 ［查尔斯·希利夫人］
Higgins, C. P., 131, 132 ［C. P. 希金斯］
Hildegard of Bingen, 97 ［宾根的希尔德加德］
Hopkins, Gerald Manley, 161n.44 ［G. M. 霍普金斯］
Horses, 120, 122, 126 ［马］
Huff, Thomas, 42 – 43 ［托马斯·赫夫］
Hulbert, Mark, 159n.68 ［马克·赫尔伯特］
Hyperactivity: as addiction to a game, 99 – 101; cultural vs. clinical, 13 – 14; as general mobilization, 14 – 18; in Great Britain, 18 – 19; as illness, 13; in Japan, 18 – 19; as national mood, 13 – 18; perils in the pursuit of, 15 – 16; and rule of the vanguard, 14 – 17; and subordination of civilians, 16 – 18; and suspension of civility, 14 ［活动过度：像对（某种）游戏或运动的酷爱；文化的与临床的相比较；像总动员；在英国；像疾病；在日本；像全国的一般态度；对其追求招致的灾难；和先锋者的统治；和平民的隶属地位；和文明礼貌的中止］
Hyperintelligence: analogy to human intelligence, 102 – 103, 104 – 109;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08; disconnects, 105 – 106; disembodies, 106; disorients, 106 – 108; parts of, 102 – 103; and threats to security and liberty, 103 – 104 ［超智能：用人的智力作比拟；和人工智能；使分离；

使无实体;使失去方位;其各部分;和对安全与自由的威胁]

Hyperreality: defined as brilliant, rich, and pliable, 83, 85, 87 - 88 [超现实:其特征是技艺高超、丰富、易驾驭性]

—final: impenetrable to ethical analysis, 93 - 94; instances of,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93 - 94; paradigmatic instance of, 87; disposable and discontinuous, 95 - 96; distinguished from reality, 94 - 97; in urban redevelopment, 130——[最终的:伦理分析难理解的;其在当代文化中的实例;其典型实例;用后即丢弃的、不连续的;与现实区别;在城市的重新发展]

—instrumental: has absorbed universalism, 83 - 84, difficult to appropriate, 70, 82 - 83; fascination of, 84; as a game, 99 - 101; instances of, 85 - 86; and realism, 86 [——工具的:已经吸收普遍主义;难以占用的;其吸引力;作为一种游戏或比赛;其实例;和现实主义]

Individual, sovereignty of, in Locke, 24 - 25 [洛克著作中的个人主权]

Individualism: ambiguity of, 37 - 38, 79 - 80; and destruction of European culture, 57; origin of, 37 - 38; postmodern critique of, 55 - 57; and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39 - 47 [个人主义:其意义含糊不清;和欧洲文化的破坏;其根源;后现代对其批评;和公 - 私的区别]

—commodious: and consumption, 43 - 45, 65; as mobility, 39; origin of, 38; sheltered from criticism by social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39 - 45 ——[享乐的:和消费;作为移动性;其起源;以社会的公 - 私区别避开批评的]

—rugged: decline of, in modern economy, 64 - 65; decline of, in postmodern economy, 61 - 62; as justification of shortcomings of modern economy, 45 - 47; origin of , 37 - 38; and resistance of reality, 64 ——[强健的:在现代经济中微弱的;在后现代经济中衰微的;作为为现代经济弱点的辩解;其起源;和现实的抵抗]

Indolence: and compensation for pain and suffering, 11 - 12; evident in the economy, 7; evident in voting behavior, 7 - 9 [懒散:和痛苦的补偿物;经济中极明显的;选举行为中极明显的]

Information: and human competence, 66 - 67; instrumental vs. final, 66; origin of, 66 - 67; precious commodity before computers, 75 - 76 [信息:和人的能力;工具的与最终的比较;其起

源:计算机以前珍贵的商品]
—computerized: and agriculture, 71; and cooperation, 76 – 77; instrumental, 67 – 71; final, 71 – 72. *see also* Hyperreality ——[计算机化的:和农业;和合作;工具的;最终的。另见 Hyperreality]
Information processing, 66 – 72 [信息加工]
Informed cooperation, 75 – 77 [消息灵通的合作]
Interstate highway system: as moral decision, 114; as project of modernism, 34 [州与州之间的公路系统:作为道德的决定;作为现代主义的计划]

Jacobs, Jane, 130 – 131, 132 [简·雅各布斯]
Japan and hyperactivity, 18 – 19 [日本和过度活动]
Japanese management and hyperactivity, 17 [日本的管理和过度活动]
Jefferies, Boyd L., and the perils of hyperactivity, 15 – 16 [博伊德·L.杰弗里斯和过度活动的危险]
Jefferson, Thomas, 25 – 26 [托马斯·杰斐逊]
Jünger, Ernst, 98 [厄恩斯特·荣格尔]
Justice: enmeshed in modernism, 26 – 27; total, as accommodation of sullenness, 11 – 12. *See also* Conservatism;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公正:陷入现代主义中的;完全的,作为对愠怒不快的和解。另见 Conservatism; Enlightenment; Liberalism]

Kant, Immanuel, 52 – 53, 110 [伊曼努尔·康德]
Kaus, Mickey, 165n.47 [米基·考斯]
Koelbel, Lenora, 153n. 35, 164 – 165n.27 [伦诺拉·科尔贝尔]
Kohlberg, Lawrence, 53 – 54 [劳伦斯·科尔贝尔]
Kubey, Robert, 155n.86, 160n.23 [罗伯特·库贝]
Kyner, James H., 31, 38 – 39 [詹姆斯·H.凯纳]

Labor. *See* Work; Work force [劳动·见 Work; Workforce]
Lakes, Greg, 158 – 159n. 63 [格雷格·莱克斯]
Landmarks, as guides of inquiry, 4 – 5 [作为探索的地标]
Language. *See* Discourse [语言。另见 Discourse]
Larsen, Gary, 111 [加里·拉森]
Larson, Eric, 60 [埃里克·拉森]
Leiss, William, 152n. 13 [威廉·莱斯]
Leisure: hyperactive, 101; as passive consumption, 43 – 45; sullen, 101 [闲暇:活动过度的;作为消极的

消费;郁郁不乐的]
Liberalism: activist in shaping society, 3; disavows responsibility for material culture, 114, 138; no longer effective, 52 – 53, 127, 142; rejects community, 127; and religion, 144; as an unfinished project, 52, 142. *See also* Enlightenment; Liberal democracy [自由主义:改变社会的积极分子;否认对物质文化负责;不再有效的;拒绝社会;和宗教;作为一未完成的计划。另见 Enlightenment; Liberal democracy]
Liberal democracy, and technology, 81 [自由民主和技术]
Linder, Staffan, 101 [斯塔芬·林德]
Locke, John, 22, 24 – 25, 37 – 38, 45 [约翰·洛克]
Lovins, Amory, 78 [艾默里·洛文斯]
Luther, Martin, 22 [马丁·路德]

Marx, Karl, 97 – 98 [卡尔·马克思]
McCammon, Joseph Kay, 29 – 30 [约瑟夫·凯·麦卡门]
Method. *See* Narrative; Procedure; Schema; Soft vs. hard solutions [方法。另见 Narrative; Procedure; Schema; Soft vs. hard solutions]
Methodical universalism: and the corporation, 35 – 37; and science, 35. *See also* Universalism [方法上的普遍主义:和公司;和科学;另见 Universalism]
Michalos, Alex C., 150n.27 [亚力克斯·C.米凯洛斯]
Michelle, Chief, 29 [酋长米歇尔]
Middle Ages, and origin of modernism, 21 – 22 [中世纪和现代主义的起源]
Mies van der Rohe, Ludwig, 60 [路德维格·米斯·范·德罗艾]
Milwaukee Road, 34, 133, 138 [米尔沃基公路]
Missoula: baseball park in, 136; beginning of, 131; damaged by modernism, 129 – 130; Farmers' market in, 132; and the railroads, 30, 31, 34; redevelopment of, 130; street life in, 131 – 133 [密苏拉:其中的棒球场;其起源;被现代主义破坏;其中的农民市场;和铁路;其重新发展;其中的街区居民生活]
Mitcham, Carl, 149n.4, 163n.1, 166n.52 [卡尔·米查姆]
Mobilization, as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e, 14 – 15, 98 [作为总动员的社会和经济的状态]
Modern, etymology of, 20 [现代的词源学]
Modernism: as conjunction of domination of nature, primacy of method, and sovereignty of the individual, 25; damage of, to cities, 58 – 59; distinguished as a project from modernity as an era,

22, 151 – 152n. 9; in philosophy, 49 – 50; and predictions of its end, 20; as unfinished project, 26, 52 – 53; restlessness of, 97 – 99 [现代主义:对自然的控制、方法的首要地位和个人主权结合一起的;对城市之破坏;作为规划有别于作为时代的现代性;哲学中的;和对其终结的预言;作为未完成的规划;其不平静]

Modernity: discourse of, 2 – 3; distinguished as era from modernism as project, 22, 151 – 152n. 9 [现代性:关于它的谈论;作为时代有别于作为规划的现代主义]

Moore, Paul, Jr., 146 – 147 [小保罗·穆尔]

Mullan, John, 131, 132 [约翰·马伦]

Music: as communal celebration, 137; as final computerized information, 71; as final hyperreality, 92 – 93 [音乐:作为共同或群体的庆祝;作为最终计算机化的信息;作为最终的超现实]

Narrative, as discourse appropriate to particulars, 5, 6, 128 – 129 [叙事体,适合于谈论详细情况]

Native Americans: acceptance by, of Wannabees, 141 – 142; celebration among, 136; destruction of culture of, 55 – 57; and the railroads, 29 – 30 [土著美国人:为沃纳比部族所承认的该部族人;该土著人中的庆祝;其文化的破坏;和铁路]

Nature, domination of, in Bacon, 23, 25. *See also* Domestic nature; Wilderness [培根著作中关于对自然的控制。另见 Domestic nature; Wilderness]

New York City: street life in, 132; and urban redevelopment, 139 [纽约市:其中的街道生活;和城市再建]

Northern Pacific Railroad, 29 – 32, 34, 132 [北太平洋铁路]

Ontology, inability of, to distinguish reality from hyperreality, 95 [本体论,不可能区别现实与超现实]

Optimism and sullenness, 12 [乐观主义与愠怒不快]

Parent, resentment of being a, 10 – 11 [因当父母而不满]

Particularism, 5, 6, 128 – 129 [特殊主义]

Patience: and frailty of the body, 125; needs invigoration, 125 – 126; and power, 124 [忍耐性:和身体的虚弱;需要健壮增强活力;和能力]

Pattee, David, 131 [戴维·帕蒂]

Penty, Arthur J., 20 [阿瑟·J.彭蒂]

Philosophy: modern, 22 – 27, 48 – 50,

52 – 53; postmodern, 51, 53 – 55. *See also* Ethics; Ontology [哲学:现代的;后现代的;另见 Ethics; Ontology]

Physics, as view of reality, 117 – 118 [物理学作为现实的观点]

Picasso, Pablo, 6 [帕布洛·毕加索]

Piore, Michael J., 73 – 74, 157 – 158n. 47 [迈克尔·J.皮奥里]

Politics, communal, 138 – 143 [公共政治学]

Poor and powerless: and Cathedral of St. John the Divine, 145 – 146; and communal celebration, 142 – 143; national impatience with, 125; resented by voters, 8 – 9 [贫穷和无力的:和圣约翰神大教堂;和共同或群体的庆祝;全国对之不耐烦;被选举人所忿恨的]

Postmodern critique: of architecture, 57 – 60; of individualism, 55 – 57; of realism, 48 – 51, 116 – 117; of universalism, 51 – 55 [后现代的批评:对建筑的;对个人主义的;对现实主义的;对普遍主义的]

Postmodern divide, how to explore, 4 – 5. *See also* Postmodernism [如何考察后现代的分界线。另见 Postmodernism]

Postmodern realism defined, 116 [后现代现实主义定义]

Postmodernism: anthropocentrismin, 117; discourse of, 3 – 4, 128 – 129, 144; and shift of sympathies, 78; as a task of exploration, 4 – 5 [后现代主义:其中的人类中心主义;关于它的谈论;和同情的转移;作为考察的任务]

Power: and patience, 124; regardless, 123 – 124. *See also* Control [力量:和忍耐;不管怎样;另见 Control]

Power, Michael Thomas, 165n. 29 [迈克尔·托马斯·鲍尔]

Privacy, as ultimate individualism, 42 – 45 [隐私,作为最基本的个人主义]

Private-public distinction. *Se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私和公的区别。另见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Private sector. *Se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economic [私营部门。另见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economic]

Procedure: fails to effect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4; rise of, at beginning of modernity, 24. *See also* Narrative; Schema [程序:未能产生参与民主制;产生于现代性之始。另见 Narrative; Schema]

Productivity: decline of, in U. S., 13; gains in, through Japanese management, 17 [生产率:在美国之降低;通过日本的管理方法使之提高]

Public life: attempts at invigorating, through procedural reforms, 4; poverty of, 3 [公众生活:通过会议程序改革使之活跃有力的种种尝试;其贫乏]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公-私区别:]

—economic: as a means of disavowing public responsibility, 40, 47; exploits rugged individualism to justify shortcomings of the economy, 45 - 47; and private sector, 46 - 47; and public sector, 46 - 47 ——[经济的:作为拒绝承担公共责任的手段;利用强健的个人主义为经济缺点辩护;和私营部门;和公营部门]

—social: conceals debilities of commodious individualism, 40 - 45; history of, 40 - 41; and privacy, 42 - 45; and private consumption, 43 - 45; and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ace, 41 - 42 ——[社会的:掩盖享乐的个人主义的虚弱;其历史;和隐私;和私人消费;和公共空间的改变]

Public sector. *Se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economic [公营部门。另见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economic]

Public space: attempts at reviving, in postmodernist architecture, 60, 139; hypertrophied and atrophied after Second World War, 42; reduction of, to utility in modernism, 58 - 59, 134 [公共空间:后现代主义建筑中使之恢复的种种尝试;第 2 次大战后其过度膨胀与萎缩;为现代主义之实用而使之缩减]

Railroad: beginnings of, in U. S., 27 - 28; and corruption, 31, 32; and domination of nature, 28 - 31; influence of, on urban structure, 41 - 42 [铁路:美国铁路的开始;和腐败;和对自然的支配;对城市结构的影响]

Rawls, John, 142 [约翰·罗尔斯]

Reich, Robert, 164n. 10 [罗伯特·赖克]

Realism, postmodern critique of, 48 - 51, 116 - 117. *See also* Aggressive realism [对现实主义的后现代批判。另见 Aggressive realism]

Reality: as commanding and continuous, 96; duress of, 64, 124 - 125; eloquent, 119 - 120; firmness of, 124; marginal, 118 - 119; mechanical, 96, 118 - 119; oppressive, 23, 96; physical, 95, 117 - 118; recession of, 12, 15, 51, 62, 100, 117; symmetry of, with humanity, 96 - 97, 106, 121, 128; textual presence of, 117 [现实:威严的、连续不断的;其胁迫性;雄辩能言的;其坚实性;边缘的;机械的;强迫的;物质的;其退离;其与人性之对称;其文字上的

存在]
—focal: in celebration, 134 – 135, in crafts, 120 – 121; defined, 119 – 120; distinguished from mechanical and oppressive, 96; as domestic nature, 120; invigorates, 125 – 126; orienting one's life within, 122; underlies hyperreality, 122, 129; as wilderness, 120——[焦点的:庆祝中的;手工艺中的;其定义;与机械的和强迫的不同;作为喜爱家庭生活的本性;使人生发活力;使人内心生活有方向;潜存于超现实之下;作为荒野的地方]
Religion: and communal celebration, 144 – 145; decline of , at beginning of modernity, 23, 24 – 25 [宗教:和共同或群体的庆祝;其现代伊始时之衰落]
Republicanism and community, 127 – 128 [共和主义与社区或群体]
Resentment: and AIDS, 9; and drugs, 9 – 10; of becoming a parent, 10 – 11 [怨恨:和艾滋病;和毒品;因成为父母而产生之]
Rorty, Richard, 50 – 51, 156n. 6 [理查德·罗蒂]
Rosenman, Ray, 98 – 99 [雷·罗斯曼]
Rothschild, Joan, 51 [琼·罗思柴尔德]
Royce, Josiah, 39 [乔赛亚·罗伊斯]
Rule, James, 68 – 70 [杰姆斯·鲁尔]
Running, as real and hyperreal experience, 87, 94 – 95 [跑动 ,作为实在的与超实在的经验]

Sabel, Charles, 73 – 74, 157 – 158n. 47 [查尔斯·萨贝尔]
St. John the Divine, Cathedral of, 145 – 147 [圣约翰神大教堂]
Schema, as method of ordering and gaining distance, 4 – 5 [作为安排与获得距离的纲要]
Scholarship: overtaken by hyperreality, 85; traditional, rendered absurd through hyperintelligence, 107 [学识:被超现实赶上并超过;传统的,被超智能搞得成为愚蠢可笑]
Science, and technology, 35. *See also* Physics [科学和技术。另见 Physics]
Scully, Vincent, 59 [文森特·斯卡利]
Sennett, Richard, 139, 154n. 71 [理查德·森奈特]
Service industry: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74 – 75; indulges, 74, 101 [服务性产业:和灵活可变通的专业化;纵容]
Soft vs. hard solutions, 78 – 79 [软的与硬的解决办法相比较]
Stegner, Wallace, 33 [华莱士·斯特格纳]

Stone Container Corporation, 73 [斯通容器公司]
Stradivari, Antonio, 121 [安东尼奥·斯特拉迪瓦里]
Street life, 58, 131 – 133, 140 [街道生活]
Strict liability and total justice, 11 – 12 [严格的责任和完全的公正]
Sullenness: and apparent optimism, 12; as diagnosed by economists, 12 – 13; as indolence, 7 – 8; as national mood, 6 – 12; as resentment, 8 – 11; and total justice, 11 – 12; typically voiced, 10; and voting, 7 – 9 [愠怒不快:和表面上的乐观主义;经济学家所诊断的;似懒散;似全国性的情绪;似怨恨;和完全的公正;典型表达的;和选举投票]
Symmetry of reality and humanity 96 – 97, 106, 121, 128 [现实与人性的对称关系]

Taylor, Charles, 152nn. 12 and 15 [查尔斯·泰勒]
Technological fix, 124 [工业技术的困境]
Technology: and communism, 80 – 81; as creative achievement, 116; implication in, 115; and instrumental hyperreality, 86; and liberal democracy, 81; as a set of moral decisions, 110 – 116; as underlying pattern of modernism and hypermodernism, 80 – 82 [技术:和共产主义;作为创造性的成果;其含意;和工具的超现实;和自由民主制;作为一组道德决定;作为现代主义和超现代主义的潜在模型]
Telephone, as piece of hyperintelligence, 105 [作为超智能物的电话]
Television: amount of watching, 44; as final hyperreality, 91; purchase of, as fundamental decision, 111 – 112 [电视:观看的总数;作为最终的超现实;购买之乃基本的决定]
Third World, and end of modern economy, 63, 72 [第3世界和现代经济的结束]
Thomas Aquinas, 109 [托马斯·阿奎那]
Tocqueville, Alexis de, 38, 44 [A.德·托克维尔]
Totalitarianism, economic: distinguished from political, 158n. 50; as possible successor of modern economy, 63 – 64 [经济的极权主义:与政治的极权主义的区别;作为现代经济的可能后继者]
Type A, 98 – 99 [A型]

Unemployment, as consequence of collective resentment, 9 [作为集体怨恨后果的失业]
Universalism: as ethics, 52 – 53; instanti-

ated in the corporation, 35 – 37; and science, 50 – 51; postmodern critique of, 51 – 52. *See also* Methodical universalism [普遍主义:作为伦理学;以公司为实例说明;和科学;后现代所批判的;另见 Methodical universalism]

Verna Tony, 88 [托尼·维纳]

Videogames, as final hyperreality, 91 [作为最终超现实的电子游戏]

Vigor, as response to reality 125 – 126. *See also* Patience; Symmetry of reality and humanity [作为对现实反应的活力。另见 Patience; Symmetry of reality and humanity]

Voting behavior, and sullenness, 7 – 9 [选举投票行为和愠怒不快]

Walzer, Michael, 54 – 55, 164n. 24 [迈克尔·沃尔泽]

Weber, Max, 153n. 47 [马克斯·韦伯]

Weinberg, Alvin 164n. 17 [阿尔文·温伯格]

Whyte, William, 132 [威廉·怀特]

Wilderness, as focal reality, 120 [作为焦点现实的荒野]

Worden, Frank, 131 [弗兰克·沃登]

Wordsworth, William, 28 [威廉·华兹华斯]

Work: discipline in computerized, 70; oppressive, 101; as the road to reward and respect, 45. *See also*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Hyperactivity [工作:计算机化工作的训练;压抑的工作;作为通向得奖赏、受尊敬之路的;另见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Hyperactivity]

Work force, contingent: as consequence of hyperactivity, 16 – 18; and flexible specialization, 75 [因情况而变的工作队伍:作为过度活动的后果;和灵活变动的专业化]

Workstation as instance of instrumental hyperreality, 85 [作为工具的超现实实例的工作站]

Writing: and hyperintelligence, 105; and reality, 117 [书写:和超智能;和现实]

Zuboff Shoshana, 68 [舒姗娜·朱鲍夫]

附录　努力寻找哲学

艾尔伯特·鲍尔格曼

我出生在弗赖堡，是在一座哥特式大教堂、黑森林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曾执教的大学的庇荫下长大成人的。我的父母属于弗赖堡的天主教知识界人士，并且与伯恩阿德·威尔特、卡尔·拉赫纳、马克斯·缪勒相识。他们都曾是对海德格尔很着迷的自由主义的天主教思想家。战后不久，我母亲在基督圣体节日游行队伍中，把威尔特指给我们，说他会使海德格尔的思想对神学产生有利的影响。我父亲则愿意重新在他的人生舞台上扮演《仁爱》(Caritas)杂志编辑的角色，在家庭餐桌上扮演天主教积极分子的角色。哲学、神学与海德格尔的名字在我青少年时代的心理中是模糊的，令人崇敬的。如果我曾显示出对哲学的爱好的话，那是因为我在德文作文中喜爱分析的与艰涩的东西。我读过9年拉丁文与6年希腊文，虽然我读的古代哲学极少，但总觉得它离我并不远。

当我1957年开始在弗赖堡大学学习时，我被哲学的宏伟迷住了，但了解它的实质内容很少，又怀疑自己的能力，而且我当时也不习惯于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件事情上。当海德格尔在这个大学露面，在大礼堂发表系列演讲时，我就在他到场以前，先到那里占个

座位。我强烈地为海德格尔的主张所打动,当时我的敬畏心情无以名状。

在弗赖堡的生活环境富有并且顺利,甚至达到有些令人郁闷的程度。我生活在一个有着自由主义和可崇敬的传统的城市中,一个亲切、有教养的家庭里;可是我感到的是苦恼而不是喜爱。我1958年离开德国到得克萨斯大学,那里环境使人精神爽快,激发活力,简直令人兴奋不已。我喜欢美国大学生活那种清楚而公平的要求,并且我爱上了美国的傲慢无知最后几年的通俗文化。为了对它多些了解,我到伊利诺伊大学,两年后读完德国文学硕士学位。在那里我和南希相爱。

当我习惯于更加自制、志气更为昂扬时,我想学到哲学的自由与专断的方式方法的欲望也更强了。青年人的傲慢使我失去服务于文学的耐心。我想要以自身的权利,发表我认为重要的任何事情的意见。1961年,我跟随马克斯·缪勒到了慕尼黑大学,沃尔夫冈·施太格缪勒也在那里教学;因此,我就成了海德格尔学生的学生,以及卡尔纳普学生的学生。经过一年修道士似的忠诚努力,以及又一年南希的陪伴与帮助,我打下了哲学的基础,并且在缪勒指导下写出一篇学位论文。然而,显然他已有跟随他学习时间更长的、更有天赋的学生们,不想接受我当一名助手,这样一来就把我排挤在德国大学职业之外。

我和南希在1963年结婚。我们不愿意尝试改变缪勒的想法,或者尝试在德国别处再当一次学徒,其前景是渺茫、难以预料的。我便在弗赖堡教一年中学,并且盲目地向美国各大学申请哲学职位。只有伊利诺伊大学德语系愿意接受我,于是我们便去了那里。

我深受我同事们与以前老师们的慷慨关照，以及在伊利诺伊大学厄尔班那分校暂时教德国文学的优越条件的诱惑。虽然如此，我不能放弃研读哲学的自由与冒险，便再一次向美国哲学研究领域发出大批申请信函。如果对方得知我是马克斯·缪勒的学生的话，往好里说一定会认为他使我迷失了方向，而且如果知道缪勒是海德格尔的一位信天主教的支持者的话，我的申请很可能就没用了。当我 1965 年在伊利诺伊大学向哲学俱乐部作演讲后，人们客气地告诉我，海德格尔的思想是胡说、废话，而且不客气地告诉我，他的思想是法西斯主义的。我深深感到无法回答我那些训练有素、善用分析的批评者。若是我依赖我老师的天主教徒的敏锐感觉力与词汇为我的见解辩护，那么一切都可能变得更糟，我会立即被告知到那些不幸的天主教哲学系去求职，当时这些系正在从托马斯主义的不毛之地转向存在主义的泥沼。

可是，如果不是有这样一个系与它的大胆的、给我支持的系主任，我很可能在彼时彼地就放弃了寻找哲学的努力了。1965 年秋，我接受了德保罗大学的教职，开始出版关于语言与海德格尔的论文，那是些写得很用心但很笨拙的文章，是一位年轻人费力地使用着仍似外国语的语言与惯用语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我们 1967 年迁居夏威夷，在那里我结交了哲学同行约翰·温尼。约翰有着我曾直接了解到的最强的智力，又有引人喜爱的个性与之完美结合。他是一位无怜悯心、学问渊博的对立者，硬逼我重新考虑与改动我在哲学中所了解的每件事。我开始感到对哲学熟悉多了，得心应手，对哲学的当地习语也不费力了。临近我们住在夏威夷快 3 年的时候，我写出第一篇有些重要意义的文章《技术与现实》。我想

我终于找到了哲学。

没有人能抵御夏威夷娇媚迷人的魅力，可是我们开始感到在欧胡岛上那种地方狭窄、季节单调的恍似监禁生活的痛苦。我们看到我们3个女儿日渐长大，却无缘体验秋天的光辉灿烂与喧闹激动，以及冬天的凛冽严酷与壮丽光彩，就感到苦恼、担忧。我们便迁居到蒙大拿州，我们好像永远被那里的群山与季节变化迷住了。我继续对技术、对标准的专业问题、对心身问题以及对自由与决定论等进行批判分析。事情进行得相当顺利，但我是在无最终方向的情况下工作，在与世较为隔绝的状况下工作的。亨利·伯格比帮助我确立了工作方向，卡尔·米查姆帮助我克服了与世隔绝的状况。有一次我向来自密苏拉与波兹曼两地的同行朗读我的文章《技术的方向》；作为回答，亨利责备我分析与批评技术而没有表露我真正的态度。《心灵中的早晨》的作者申斥我也甚是恰当，我遂开始着手在哲学中寻找那些焦点事物的位置，以及那些一直占据我生活中心的实践的位置。

所有我们在蒙大拿大学的人，都住在数百英里以外较偏远的地方，很难有机会被邀请作演讲或参加会议。我们大部分人太不重要，不能被邀请充当主要的发言人或参加者。我们的专业生活集中在这里的校园。我们是富于机智的教师与诚实的同事，在哲学研究中我们也是热诚的朋友。同时，一个人的学术工作的反响或共鸣则碍于距离、也由于听者范围有限而减弱了。我开始对我的工作产生怀疑时，卡尔·米查姆1975年邀我参加哲学与技术学会成立大会。在那里，他介绍我与遥远的一群同行相互认识；是他

们的兴趣、关注，帮助我扩大与聚焦我关于技术的思想。

也是在70年代中期，有人向我介绍自由民主理论，特别是罗尔斯的自由民主理论。他的《正义论》使我重新再一次考虑我的见解。这本书也使我因是一位美国哲学家而感奋不已。直到今天，我仍深深地为这本书的慷慨、热情态度，为它对材料的熟练运用，以及为它行文的谨慎准确乃至平和的气韵所感动。海德格尔早已向我指出了需要加以注意的问题。罗尔斯则规定了解决这个问题的标准。

当我写《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质》时，我不敢确定我能胜任这一任务，一开始写还感到有些呆板僵硬与胆怯，但很快就在提出自己的论据和证明真正重要的事情时享受到了乐趣。我很感谢说出自己话的这次机会及这本书的顺利出版。回过头来看，这本书似乎太长，对我来说也比较困难。这本书虽然并非过于简单化，但看起来仍欠深透。无论如何，它确实提出了一直令人们忧虑的问题，以及那些困扰人们的事情。对这些问题与事情的共识，自此以后就成了我与许多人建立友谊的机会。

然而，帮助我大声说出话来的这本书，也开启了令人麻烦的裂缝，即在思维工具与思想中紧要的事情之间、在哲学训练与哲学任务之间的裂缝。我当时认为，后者，即哲学任务是帮助人们更加认识到技术文化太使人分心，更加相信焦点的事物与实际活动能够成为人的生活中心。我已经用训练的论据来推进任务的完成。这种训练机器发出的叮当声与研磨声，对一些同行来说是悦耳音乐，对另一些的同行是苦难经历，对所有非哲学工作者来说则是莫明

其妙的嘈杂声。那么，在哪里可以找到哲学，是在其训练中，还是在其任务、实践中呢？

载于《与智慧相恋——美国哲学家谈自己的职业》
（牛津，1993 年），戴维·D. 卡诺
斯和罗伯特·G. 休梅克编辑

译后记:关于美国哲学家鲍尔格曼

自 1986—1987 年和 1994 年我访问美国蒙大拿大学和曼斯斐尔德中心以来,有机会和该大学哲学系教授艾尔伯特·鲍尔格曼(Albert Borgmann)相识并有较多交往,讨论共同感兴趣的哲学问题,受益良多。他为人诚挚,乐于助人,为学刻苦钻研而严谨,尤其潜心于社会与文化的哲学、科学技术和消费文化的发展对美国社会传统、观念以及生活影响的研究;20 世纪近 30 年中,陆续发表关于这些方面的哲学思想论著,成果丰硕。我愿将鲍尔格曼教授从事哲学学习和教研实践情况,简要地介绍给读者。

鲍尔格曼教授 1937 年生于德国弗赖堡,在那里读完中学后入弗赖堡大学,主修哲学、德国和英国文学以及艺术史等课。读了 3 个学期以后,他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继续读德国和英国哲学及语言学一年,后又转到伊利诺伊大学厄尔班那分校继续学习两年,1961 年获德国文学硕士学位。此后,他回到德国慕尼黑研读哲学,主要从师于 M.缪勒(海德格尔的学生)与施泰格缪勒(卡尔那普的学生),1963 年以关于英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约翰·纽曼的博士论文的最优异成绩,获博士学位。

鲍尔格曼教授最初集中研究海德格尔思想与语言哲学。1974 年出版《语言哲学:历史的基础和当代的问题》一书,以此结束了他

对这一方面的研究，但他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兴趣却有增无减。1978 年他在《对技术的解释》一文中，对他前此时期的看法作了重大修改，并且开始发表他个人多年来关于海德格尔和技术的研究的评介文章。他认为，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兴趣使他越来越感到，应把技术问题当作一个哲学问题加以考察。1968 年他对这一领域开始大胆探索，发表《神学在技术时代的地位》一文，1971 年以后更深入系统地研究，发表一系列论著，逐步形成了他自己关于这一论题比较综合而连贯一致的看法。1984 年他的成名著作《技术和当代生活的特质：一种哲学探索》（约 300 页）出版。这是他寄赠我的第一本论著。

鲍尔格曼教授也发表一些关于身—心问题及自由与决定论的关系的文章。他认为，任何哲学家都会碰到这些问题；但他感到，在打算给技术哲学决定一个地位、探索它的基础时，这些问题特别使他苦恼、为难。这些年来，他一直设法弄清楚当代英美传统中因保护对技术执异议者而产生的争论问题，并加以回答，尤其注意反驳那些责怪执异议者犯了什么天真幼稚与浪漫主义毛病的论证。他仍然在这些领域饶有兴味地探索研究。此外，他还乐于参加一些科普等公益实践活动，时常演讲，发表对技术、公共政策、环境与生活素质的意见。他还是当地某水土与资源保护团体的一位发起人和成员。

鲍尔格曼教授的主要论著还有：《技术与现实》（1971）；《技术的方向》（1972）；《科学和技术中的功能主义》（1973—1975）；《心、身与世界》（1976）；《从技术框架看自由与决定论》（1979）；《评 W. 巴尔瑞特（Barret）：技术的幻象》（1980）；《海德格尔与技术问题》；

《美好的生活与适宜的技术》(1983);《论技术与民主》(1984);《关于微电子革命的哲学思考》(1985);《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1992);《抓紧现实》(1999)。

此外,在我翻译本书过程中,鲍尔格曼教授曾耐心地当面和在书信中多次给我极大帮助,在此谨表衷心谢忱。我也感谢蒙大拿大学的热情赞助。译者水平有限,错误之处难免,恳请读者指正。

译　　者

2001 年 8 月